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uperpower

下册

沈志华/主编

★ 具有93年历史、执政达74年的超级大党一瞬间瓦解了！

★ 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半世纪的超级大国神话般消失了！

★ 悠久与短暂，强盛与虚弱，历史的变换究竟说明了什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uperpower

★ 米格走廊：在朝鲜上空的苏联空军

★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后果

★ “解冻”：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

★ 发出不同声音：困扰莫斯科的持不同政见者

★ 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主义与苏联侵捷

★ 分离还是对峙：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

★ 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 修补与重构：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形成与发展

★ 分崩离析：民族问题的总爆发与苏联解体



上架建议：历史

ISBN 978-7-5097-0926-9

9 787509 709269 >

www.ssap.com.cn

ISBN 978-7-5097-09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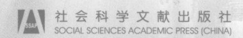
定价：148.00元（共三册）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uperpower

下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中、下册）/沈志华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097－0926－9

Ⅰ.一… Ⅱ.沈… Ⅲ.苏联－历史－研究 Ⅳ.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7879 号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中、下册）

主　　编／沈志华

出 版 人／谢寿光
总 编 辑／邹东涛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网　　址／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010）59367077
责任部门／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010）59367215
电子信箱／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宋月华
责任编辑／周志宽　杨　群
责任校对／单远举　仪莉霞　冯振华
责任印制／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市场部（010）59367028
排　　版／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77.25
字　　数／1246 千字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0926－9
定　　价／148.00 元（共三册）

目　录

上　册

中　册

下　册

难以做出的抉择：对苏联空军投入朝鲜战争的历史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最近几年，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苏美两国空军曾在朝鲜战争中对阵厮杀、拼死相搏的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①] 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这是美苏之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面对面的战争行为，尽管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把这一事实隐瞒了 40 多年。[②] 那么，一向处事谨慎的斯大林

① 相关的研究，如果说最早出现的依据主要是口述史料［见 Jon. Hallidy, Air Operation in Korea: 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 William J. Williams（ed.），*A Revolutionary War: 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1993, pp. 149 - 170］，那么稍后俄国学者便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见 *Орлов А. 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 - 1953г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4, с. 121 - 146）。笔者也曾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见《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69～74 页）。后来，美国还出版了一本专门讨论朝鲜空战的专著：Zhang Xiaoming, *Red Wings over the Yalu: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ir War in Korea*, Texas A &M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 1950 年 11 月 27 日就推断，"如果联合国空军攻击满洲的目标"，苏联极有可能秘密参战（Fiche 22, Item 100, NIE 2/2, The National Archives, U. S.）。1952 年 7 月 30 日，中情局更根据"大量迹象"断定，苏联"如此广泛地参加了敌人的空战"（Folder: PSF Intelligence File, NIE 55/1, Truman Library）。

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决定把苏联空军投入战争的？苏联空军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参战的？这些问题一直是各国学者试图解开的历史之谜。

虽然在十几年前人们已经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但那时档案文献的缺乏给人造成了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笔者和其他许多研究者一样，当时能够看到的主要是各方面的回忆录和访谈录，而相关的档案文献只是零星出现的。所以，就历史过程的链条来看，断裂的地方颇多，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史料进行推断。例如，关于周恩来赴苏的日期，中苏领导人会谈前中国是否告知已经做出的决定，黑海会谈的具体时间和最终结果，斯大林对中国到底做出了什么承诺，等等。[1] 至于苏联在华空军的部队建制、作战部署及参战过程，在以往的研究中更是语焉不详、含糊不清。最近几年，中俄两国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进一步披露出来，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的大量出现，使得研究者可以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给出比较明确的答案，可以对这段历史过程进行比较完整的描述了。[2]

苏联空军参战的过程是同中国出兵问题紧密相连的，这个过程与其说反映了苏联对美国的政策和立场，不如说体现了中苏同盟之间的微妙关系。因此，在了解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具体过程的同时，人们对于中苏之间、中朝之间乃至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同盟关系也会有一个更加细致、更为深刻的观察。

斯大林承诺将调用苏联空军

还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苏联空军就已经进驻中国。1949 年底蒋介石败

① 详见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4 年第 3 期，第 83～87 页；Alexandre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 16 – Oct. 15, 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Issues 6 – 7, Winter 1995/1996, pp. 94 – 107；沈志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关于 1950 年 10 月中苏会谈问题的争论》，《党史研究资料》1996 年第 4 期，第 7～12 页。

② 由于缺乏档案文献而导致的历史链条的断裂，笔者以前对一些历史细节的判断有误差，如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时机、金日成拒绝中国出兵援助的原因以及斯大林答应出动空军的限度等，正因为如此，深感有必要在新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把那些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

退台湾以后，凭借其空军优势，不断派遣飞机对大陆进行轰炸和袭扰，最严重的是1950年2月6日对上海的轰炸。据苏联领事馆给莫斯科的报告：由17架重型轰炸机进行的这次袭击，造成上海大面积停电，供水中断，所有企业停产；上海当局和居民情绪十分低落，人人提心吊胆，甚至做出了将工业企业迁往内地的决定。蒋介石则为此欢欣鼓舞，并在高级军事会议上要求扩大轰炸，批准将袭击目标扩展到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青岛、广州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为协助这个行动，美国人决定帮助国民党尽快修复舟山群岛上的台山机场。① 此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谈判中苏同盟条约，接到报告后，便请求斯大林给予空军援助。② 于是，苏联派遣由巴基茨基中将率一个防空集团军开赴徐州和上海，其中包括第106歼击航空师、第52高射炮兵师、近卫高射探照灯团，还有一个独立无线电技术营，共127架飞机，计有喷气式歼击机40架、活塞式歼击机41架、强击机26架、轰炸机10架、运输机10架。不到一个月，即3月7日，第一支苏联空军部队（第351歼击航空团）便进驻了徐州机场，并担负起警戒和巡逻任务。在随后的空战中，苏联空军占有明显的优势，从3月8日到8月1日共出动230架次，进行了7次空战，击落6架敌机，而自己没有任何损失。第106歼击航空师出色完成了保卫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战斗任务，击落了所有试图侵入这些地区上空的敌机，而没有让一枚炸弹落在其防御区，以至地面高炮部队完全“失业”了。③

朝鲜战争爆发后，令斯大林和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美国立即采取了干涉政策，并首先投入了空军和海军部队。④ 美国参战后立即给朝鲜人民

---

① АВПРФ，ф.0100，оп.43，д.722，п.313，л.201 - 203；АВПРФ，ф.0100，оп.43，д.138，п.314，л.43 - 47，*Кулик Б. Т.* США и Тайвань против КНР，1949 - 1952，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5，с.32 - 33.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472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9页。

③ ЦАМОРФ，ф.50 ИАД，оп.152677，д.4，л.3 - 4、91、133 - 134，*Набока В. П.*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истребители в Китае в 1950 году//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3，с.139 - 141.

④ 关于苏朝领导人战前对美国立场的估计，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147～158页。至于美国参战的决策过程，参见牛军《美国对朝鲜战争政策的演变（1950.6～1951.6）》，《美国研究》1991年第1期；沈志华《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军造成了重大损失，首当其冲的就是空军和海军。据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报告，开战仅仅几天，到7月3日，朝鲜已有36架飞机和5艘舰艇被击毁。[①] 这时斯大林便意识到，战事的发展很可能是不会顺利的，他需要考虑如何对朝鲜增加直接军事援助的问题，只是这种援助不能来自莫斯科。

战前苏联的援助主要在于训练朝鲜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制订作战计划，而斯大林绝对禁止苏联军人越过三八线、直接介入战争。例如，战争爆发前5天，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报告说，因进攻和登陆需要，金日成要求为已经抵达朝鲜的两艘舰艇提供10名苏联驾驶员和顾问。莫斯科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②] 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③] 正是由于缺乏苏联顾问的指导，继续南进的朝鲜军队完全处于混乱之中，以至什特科夫不得不请求斯大林批准给人民军每个军团派两名苏联顾问，并希望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带军官组与前线司令部一起赴汉城，并常驻司令部。[④] 对于派遣苏联顾问的请求斯大林根本不予理睬，只答复说瓦西里耶夫"住在平壤更为适宜"。[⑤] 尽管后来在金日成的直接请求下，斯大林答应可以派一些苏联顾问进入朝鲜境内，但他一方面愤怒地指责苏联大使擅自答应朝鲜人的做法，要他个人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苏联顾问成为俘虏；一方面明确指出，这些顾问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而且他们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⑥]

---

① 关于朝鲜人民军损失情况的报告，1950年7月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37。

②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Огонёк，1993，№26，с.29；*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ед.*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январь 1949 - октябрь 1950 гг.），с.33–34.

③ 参见 Kim Chullbaum（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Seoul：Eulyoo Publishing Co.，1991，pp.25–26；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第534页。

④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1日、7月4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05–107、136–139。

⑤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7月6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0。

⑥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3–144；*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с.29。

斯大林脑子里想的是在必要时由中国军队提供援助。[①] 当然，何时以及如何提供这种援助，还要看战局的发展。

美国参战也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7 月 2 日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要求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领导人对朝鲜形势的判断，并指出，为了防止美军登陆，朝鲜人民军应当加速南进，攻占南方的港口，并在仁川等地建立起强大的守卫部队。周恩来强调，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那么中国军队将以志愿军的方式并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制服与美军作战。为此，中国将在沈阳地区集中 3 个军，兵力 12 万人。最后，周恩来询问，苏联空军能否确保对这些部队的空中掩护。[②] 实际上，中国的东北边防军是在几天后才正式决定组建的，并限令 8 月 5 日前完成集结。[③] 周恩来在做出正式决定之前这样说，显然是有意让斯大林知道，中国领导人是愿意帮助朝鲜的[④]，但同时也要让斯大林明白，苏联出动空军是中国出兵的条件之一。

斯大林对此立即做出了回应。7 月 5 日斯大林回电："我们认为，立即集中 9 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⑤] 由于没有接到中国的进一步消息，7 月 13 日斯大林再次请罗申转告周恩来或毛泽东："我们不清楚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 9 个中国师。如果你们已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你们派一个配备 124 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航空师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

① 斯大林早在策划战争时就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进行商量，他说："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45；参见 Kim Chullbaum, *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p. 106。

② *АВПРФ ред.*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с. 35 – 37.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第 428 页。

④ 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中国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罗申与邹大鹏谈话备忘录，1950 年 7 月 4 日，转引自 O. A. Westa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rs, Policies, and Perceptions, 1950 – 1961, 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January 1996。

⑤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 年 7 月 5 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4, л. 79。

师也这样做。”[1] 这两个文件表明，为了催促中国下决心并尽快做好出兵朝鲜的准备，斯大林当时明确承诺，苏联除愿意帮助中国培训空军、向中国提供空军装备外，也将向“进入北朝鲜作战”的中国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也就是说，苏联空军将与中国陆军并肩作战。[2] 不过，斯大林在这里预设了一个条件，即中国出兵（当然也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机是“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

莫斯科并不急于让中国出兵

美国空军的轰炸使得平壤陷入一片紧张状态。7 月 7 日金日成约见什特科夫，再次请求苏联军事顾问尽快进驻汉城，并参与各军团的军事指挥，否则人民军将面临“失败”和“崩溃”。金日成还说，他接到大量电话，讲的都是美军空袭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包括铁路枢纽和多座桥梁被摧毁。据什特科夫观察，金日成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显得“心绪烦乱，且带有些许沮丧”。[3] 斯大林再次把注意力引向了中国，他在 7 月 8 日的电报中指示罗申：“请告知毛泽东，朝鲜人抱怨说，在朝鲜没有中国的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联系的话。”[4]

实际上，中国此时正在进行积极的准备。在部队大规模向东北集结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在加紧作战的筹划。7 月 12（或 13）日，周恩来委托中国驻朝鲜代办告诉金日成，中国不会容忍美国对朝鲜的干涉，中国政府准备在这场战争中尽可能地向朝鲜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为了能及时满足朝鲜方面的需要，请金日成在提出帮助的要求时不要客气；同时，希望

---

①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 年 7 月 13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34，л. 85。关于中国的反应和安排，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 61～69、90～91 页。

② 俄国学者大多同意这个判断，见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 100－101；Mansourov，“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 105。

③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 7 月 8 日，ЦАМОРФ，ф. 5，оп. 918795，д. 122，л. 193－194。

④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 年 7 月 8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34，л. 82。

向中国“提供比例尺分别为1比10万、1比20万、1比50万的朝鲜地图各500张，并通报朝鲜前线战况”，还要求“尽快送来朝鲜人民军军服的样品”。金日成及时地向苏联大使报告了这个情况，在会谈中，金日成心情沉重地谈到，美军的参战，尤其是美国空军的袭击，“导致朝鲜大量城市和工业企业被毁，军队不断遭到轰炸，人民军的推进受到阻碍”。金日成还提出，“既然美国等国家已站在李承晚一边参加了战争，那么，民主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什特科夫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只是说：你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内部力量，加强军队，巩固解放区，确保和增强自己在朝鲜人民中的影响力。①

7月19日金日成又报告了他在北京的代表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认为美国将长期参战，并会在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毛泽东建议金日成“命令部队停止向敌人进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还“答应给朝鲜30000支步枪，2000挺手提机枪，200挺重机枪，300门81毫米迫击炮和1000匹骡子。所有这些物资将于7月25日起运”。金日成还通报，为了解朝鲜战局情况，毛泽东本想派周恩来前往朝鲜，但由于乘飞机很困难，只好请金日成派军事代表去中国。此外，毛泽东还说，如果朝鲜需要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共32万人”，并希望金日成于8月10日以前通报自己的意见。当金日成询问莫斯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时，什特科夫答复：对此一无所知。金日成又说，他原以为毛泽东可能已同斯大林协商过此事，没有想到这只是毛泽东自己的想法。什特科夫再次表示，对此毫不知情。最后，苏联大使在电报中要求莫斯科尽快提出对中国出兵问题的看法，以便日后答复金日成。② 斯大林对此一直没有回答。看来，斯大林比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沉得住气。不到危急时刻，莫斯科并不想让中国军队介入战争，而经过几次试探后，金日成也明白了斯大林的这种考虑。

7月18日莫斯科收到苏联使馆关于朝鲜局势的长篇综合报告，其中

①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15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03－305。

②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0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52－355。

心意思是朝鲜领导人和居民已经摆脱了最初的恐慌情绪，并恢复了胜利的信心。报告说，在刚遭到美国空军的袭击时，朝鲜人担心没有苏联和中国的武装援助，就无法战胜美国武装干涉者。不过，随着人民军向南推进，特别是7月5日和11日与美国部队交战并给对方以重创、俘虏大批美国士兵后，"人民的战斗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积极要求上前线的人数急剧增长，几天内就组建了74.5万人的志愿兵部队。被解放的城市，尤其是汉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生活，建立了人民政权机构，动员了地方资源来帮助前线。人民军队的胜利还促使南方游击队运动再次活跃起来。报告的结论是，朝鲜人恢复了迅速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①] 8月，驻朝使馆再次向莫斯科提交了同样结论的报告，只是附带提到，朝鲜的干部和群众对于苏联未能及时派遣空军阻止美国飞机的轰炸流露出不满情绪。[②] 对于战局发展的乐观估计，大概就是斯大林不急于解决对朝鲜提供直接军事援助问题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出兵朝鲜的急切心情，很可能也引起了斯大林的疑虑——中国出兵的一种后果就是扩大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对苏联是不利的。[③]

毛泽东确实在认真考虑出兵的问题，特别是在得到苏联提供空军援助的许诺之后。7月22日，毛泽东答复斯大林7月13日电说："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飞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机航空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同时，毛泽东还谈到了对于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安排，计划到1951年3～4月间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师全部武器装备及改装训练的工作。对此，苏联表示完全同意。[④] 其实，在此前一天，即7月21

①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7月18日，АВПРФ，ф.0102，оп.6，п.21，д.47，л.29－40。

②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8月（日期不详），АВПРФ，ф.0102，оп.6，п.21，д.48，л.109－169。

③ 在上述两封电报及其他政治报告中，大使馆都重点汇报了苏联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问题，可见莫斯科对此问题的关注。

④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2日；维辛斯基致罗申电，1950年7月2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8－89、90。

日，苏联部长会议已经做出相关决议。根据这个决议，7月22日，苏联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指示在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和巴季茨基，将驻防上海地区的巴季茨基机群的全部飞机交给中国。8月1日，在上海的防空集团军建制取消，装备全部转交集中在上海—徐州地区等待改装训练的中国混成航空兵旅。8月10日，苏联第151歼击航空师便已最后完成在沈阳、辽阳、鞍山等地的集结任务。[①]

或许是因为中国出兵的建议迟迟没有得到朝鲜的答复，毛泽东决定通过另一条渠道向莫斯科提出这一设想。8月19日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在北京协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苏联哲学家尤金院士谈到朝鲜战事。毛泽东讲到了事情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如果美国人在朝鲜只使用目前的兵力，那么他们不久就可能被赶出半岛而再也不会回来。但是，如果美国决心要在朝鲜取得胜利，那么他们需要增兵30~40个师。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北朝鲜人就无法对付了，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如果进行这种援助，就可以消灭美国的这30~40个师。而这个方案如能实现，将会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有利。[②] 毛泽东这番话当然是说给莫斯科听的。[③] 然而，斯大林却不为所动，尽管金日成继续表达了这方面的请求。

金日成期待来自国际的空军援助

8月中旬以后，人民军的进攻在洛东江一线受阻，金日成再次表现出焦急和失望情绪。8月19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苏籍朝鲜人文日受其委托去见什特科夫。文日说，卧病在床的金日成对于前线部队因遭受美国飞机不间断的集群式轰炸而被迫放弃进攻一事“忧心如焚”，情绪极为沮丧。“金日成请求派遣国际空军来为朝鲜人民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否则部队战斗的条件就太困难了”。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

---

① 华西列夫斯基给布尔加宁的报告，1950年8月2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2；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8-89；*Набока*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истребител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3，с.141。

② *АВПРФ ред.*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с.45、47.

③ 关于中国的出兵意图，这里讲述的只是毛泽东向苏联和朝鲜表示的意见，至于中国在国内动员和部署参战的情况，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69~176页。

什特科夫只能继续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建议朝鲜人民军“迅速补充部队兵力，把后备部队投入战斗，以便尽快向前推进”。什特科夫还报告，“近期金日成情绪有些压抑”，对人民军“能否在前线坚持下来有些担心”。[①] 由于朝鲜空军损失严重，无法对敌作战[②]，金日成只能期待来自苏联的空军援助。

8月26日，金日成通过电话向苏联大使通报，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朝方拟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考虑到不便再次当面向苏联人提出他们一直回避的问题，当晚，金日成再次借文日之口对什特科夫说，他“仍然想提出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但他想知道莫斯科对此的意见，并几次想到要给斯大林写信。金日成还想把这一问题提交劳动党政治局讨论。看到什特科夫无意谈论这个话题，文日连忙改口说，上述问题都是他自作主张说的，金日成并没有请他谈这些问题。什特科夫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金日成越来越对凭借自身力量赢得战争胜利没有信心，因而多次试图征得苏联使馆的同意，以便请求中国军队来帮助朝鲜。但这次通过文日刺探口风后，金日成再未提起过这一问题。[③] 金日成在这里所说的美国打算在仁川登陆的情报，显然是中国人提供的。毛泽东在10月2日起草的致斯大林电中曾写道：“还在今年4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④] 毛泽东这样做无非是根据经验提醒金日成，若要取得胜利，此时必须要靠中国军队的援助。9月初，

---

①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8月19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621－623。

② 截止到8月24日，朝鲜人民军空军损失歼击机和强击机109架，仅存战斗机36架。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关于朝鲜人民军空军情况的报告，1950年8月26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26。

③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8月2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7，л.666－669。

④ 转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39页。

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东北边防军的兵力计划增加到70万人，另有补充兵员20万人，同时加强了武器装备。[①] 中国这样做无疑是为了防备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而金日成也是以此为由向莫斯科提出请中国出兵的问题的。

斯大林无法再置之不理了，但他否决了金日成要求提供国际援助的要求。在8月28日的电报中，斯大林首先告诉金日成，“联共（布）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接着，斯大林又安慰说，“不要因为在与外国干涉者的斗争中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在这样的战争中是没有连续胜利的。”“俄国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装干涉时期的处境，比现在朝鲜同志的处境要困难得多。”斯大林最后答应金日成，“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②] 直接听到斯大林的明确意见后，金日成“感到非常高兴，多次表示感谢”，并一再强调这封信非常重要，应该向政治局委员传达。显然是为了解脱自己，金日成解释说，“有些政治局委员情绪不对头，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对他们有好处”。[③] 8月31日，金日成向斯大林呈上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敬爱的导师，我们感谢您的谆谆教导。在朝鲜人民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得到您的巨大支援。”[④] 完全领会了斯大林的主张后，金日成便不再考虑请求中国出兵的问题，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了。[⑤]

然而，斯大林此时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仅没有及时向朝鲜提供空军援助，就连原来已经确定的为中国军队提供掩护的任务也停止执行了。8月28日，华西列夫斯基报告，鉴于8月27日美国飞机对中国东北的居民点和火车站实施了空袭和扫射，军事部请求允许让已经集结在那里的第151歼击航空师承担起为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提供空中掩护的战斗任

---

①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247～251页。

②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8月2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5－6、10－11。

③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8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12－13。

④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8月31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14－15。

⑤ 关于金日成在仁川登陆前拒绝中国援助的情况，详见Shen Zhihua，“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CWIHP Bulletin*，Winter 2003－Spring 2004，Issues 14/15，pp.9－24。

务。报告要求批准给师长别洛夫下达的命令草案。命令说：“一、在完成对中国飞行员进行再培训任务的同时，自今年9月1日起第151歼击航空师在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配合下将为部署在通化、铁岭、辽阳和安东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二、在执行掩护任务过程中，第151歼击航空师的飞机不得飞越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境线。三、与第13兵团司令部（位于安东）一起制定同人民解放军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协作计划。该师空中掩护行动计划必须通过（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以最便捷的外交邮件渠道呈交苏军总参谋部（审阅）。四、涉及空战方面的活动报告必须在每天20时以前立即通过热线电话用密码暗语向苏军总参谋长汇报。”第二天，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在该文件上批示：“退还A. M. 华西列夫斯基”，便没有下文了。[①] 8月31日，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提交报告，询问“是否有必要命令第151歼击机师在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同时，还能够为该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提供空中掩护”，并说明这项任务是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提出的。这一次，布尔加宁干脆在报告上直接用笔勾掉了所询问的几句话。[②] 布尔加宁这样做，显然是经过斯大林允许，甚至很可能就是斯大林授意的。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决定抽调部署在沈阳地区的空军兵力而加强旅顺海军基地的力量。根据9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军事部命令，第151歼击航空师于1951年2月1日结束在沈阳地区对中国飞行员的再培训工作后，将其两个团及指挥机关调至旅顺基地，与10月6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调来的第303航空师第177团和一个航空机械营，共同组建一个新的米格-15歼击航空师。[③] 在华苏联空军的这次调动命令，显然与9月4日美国飞机围攻并击落旅顺基地正在空中训练的轰炸机事件有关。[④]

---

① 华西列夫斯基给布尔加宁的报告，1950年8月2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2。

② 华西列夫斯基给布尔加宁的报告，1950年8月31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4-5。

③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1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70-171。

④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50год，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о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3，с.214-216；F. 斯通：《朝鲜战争内幕》，南佐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131页。

这充分表明斯大林对旅顺港地位的重视[①]，而对于将要出国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掩护，这时已经不在苏联空军的任务日程表中了。不过，急剧变化的朝鲜战局打乱了斯大林的这一部署。

毛泽东急于出兵援助朝鲜

从9月14日到18日，斯大林不断接到战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朝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根据苏联总参谋部的报告，9月13日美军便开始在仁川地区进行小规模侦察性登陆作战，但前线战局尚未发生重大变化。9月15日，美军集中了约150艘舰船，在舰载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在仁川地区实施登陆，主力是美国第10军。人民军只有一个海军陆战团和两个边防营进行防守，由于道路和通讯中断，零星调往仁川和汉城地区的部队情况不明。美军登陆成功后，一路向汉城进击，人民军的防线已被突破。与此同时，南部战线的美韩联军开始猛烈反击，并取得成功。9月17日，美军登陆部队已强渡汉江，汉城郊区正在激战。由于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从中国边境至前线的所有铁路和桥梁均受到攻击，交通已经陷入瘫痪。[②]

对于朝鲜局势的突然变化，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了反应。9月18日，周恩来召见了罗申和军事顾问科托夫、孔诺夫。周恩来不满地指出，朝鲜很少在军事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情报，中国曾尝试派一些军事技术干部去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不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周恩来建议，如果朝鲜缺少足够的预备队（10万人），就应该将主力北撤，以建立起突击集团，等待决战时使用。周恩来还以毛泽东的名义请求苏联政府提供更为准确的情报。最后，周恩来不无用意地指出，由于没有做长时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现在西方国家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国可能

---

① 旅顺基地与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关系，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43～146页。

② 马兰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14、15、16、17日；洛莫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1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

参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中国军队由南方向东北调动，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周恩来请求把这些意见尽快通知苏联政府并给予答复。[①] 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没有及时提供军事情报是不对的，但原因在于他们年轻，没有经验。至于中国对朝鲜作战的建议，苏联同意立即将人民军主力北撤，建立起汉城防线。但是，对于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没有任何回应。[②] 周恩来只好建议金日成集中兵力确保三八线，“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③] 9月21日，刘少奇再次向罗申表示，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如果美国在朝鲜占了上风，“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④]

在向莫斯科提出援朝问题的同时，周恩来也询问了朝鲜的意见。9月19日，周恩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向他讲述了前一天与罗申谈话的同样内容，并进一步问，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朝鲜政府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李周渊当天便电告了金日成的原话：“朝鲜人民准备长期战斗”。此外就没有任何来自朝鲜的消息。[⑤] 20日金日成向苏联大使汇报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并解释说，中朝之间有过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后方登陆，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接着金日成问什特科夫，应如何答复中国人。在苏联大使一句“无可奉告”的外交辞令后，金日成立即说，中国军队很优秀，有作战经验，但在大量美国飞机不间断地狂轰滥炸的环境下，他们将会有何表现也很难说。在场的朝鲜人都随声附和说，“如果让中国军队到朝鲜参战，而没有空军为其提供空中掩护，那么，战斗依然会相当艰难”。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则明确表示“希望能让中国参与在朝鲜的战争”。因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对这一

---

①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23－126，*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с. 106－108。

②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1950年9月2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第542～545页。

③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311～312页。

④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3－135，*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 109－111。

⑤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1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1，*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 109。

问题避而未答”。[1]

9月21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周恩来的提议。朴宪永、金科奉（最高人民议会议长）和朴一禹（内务相）都认为，朝鲜明显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打败美国人，因而必须请求中国政府派军队进入朝鲜。但金日成发言说：“我们曾经认为，我们人多，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作好所有的事情。我们所要求的武器，苏联都给我们了，我们凭什么去向中国人求助呢?”他相信，“苏联和中国是不会允许美国人完全占领朝鲜的”。最后，金日成建议“暂且不要通过关于请求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议，而是先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信，就是否请求中国军队援助的问题咨询一下他的意见”。金日成强调，“如果不请示苏联就擅自请求中国军队帮助，苏联就可能抱怨说，难道我们用顾问和武器来援助朝鲜还不够吗?”他还说，如果朝鲜加速组建一支新部队，就不必求助中国人了。会议讨论的结果是没有通过任何决议。[2] 金日成现在完全是看斯大林的脸色行事，而斯大林这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中国出兵的问题。[3] 只是不到最后关头，即敌军没有突破三八线，斯大林是尽量不让中国参战的。9月26日斯大林派往朝鲜的军事代表请示，运到朝鲜的3400辆汽车没有足够的司机，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可否建议金日成请求中国朋友向朝鲜派遣1500名以上的司机?”4天以后斯大林才答复：“你们可以这样向金日成建议，只是不要说：这是莫斯科的意思。”[4] 事情真的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在仁川登陆后不久，斯大林本来产生过出动苏联空军保护平壤的念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华西列夫斯基于9月21日报告说，可以派遣第

①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1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6－88。

②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2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9－91。

③ 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回忆说，在仁川登陆的那几天，他就在斯大林那里。斯大林的反应很平静，并说苏联对此已制订了必要的计划——要中国志愿军部队投入战斗。*Ракоши М.* 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Ракош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с.3－63；译文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04页。

④ 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6日；布尔加宁致马特维耶夫电，1950年9月30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103－106、101。其实，在斯大林答复前，金日成已经向中国提出了要求。9月29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转告金，同意为朝鲜募集数百名朝鲜籍司机。《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345页。

147 航空师第 84 团的 40 架雅克 9 型飞机前往保护平壤，航空团两天便可抵达，但全面做好战斗准备需要 8～10 天。[1] 两天后，华西列夫斯基又报告，决定改派第 32 歼击机航空师第 304 团前往，"10 月 3 日该团可以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但是，华西列夫斯基最后报告说："第一次空战后，我国飞行员保卫平壤的战斗就会被美国人发现，因为空战的一切指挥将用俄语通过无线电话进行。"[2] 或许是军事部长的这番话提醒了斯大林，或许是急剧变化的朝鲜局势迫使斯大林重新考虑了对策，总之，到了危急关头，苏联战斗机并没有出现在平壤上空。

9 月 30 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汉城可能已经陷落，人民军主力部队北撤的道路也被切断，并失去了联系。金日成担心敌军会越过三八线，而朝鲜已无法组建新的部队进行有效抵抗了。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的信，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同时也起草了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有求援的暗示。他们现在感到恐慌和缺乏信心，不知如何是好。[3] 同日夜晚，金日成来了求援信，恳求斯大林给予"直接军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4] 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莫斯科终于为中国军队开放了绿灯。10 月 1 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在通报了朝鲜的危险局势，即朝鲜已经没有任何抵抗部队、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没有任何设防后，斯大林要求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方式入朝参战，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组织防御。或许是考虑到此前莫斯科对中国出兵问题的种种反应，斯大林最后故作亲近地说："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5]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天凌晨便起草了同意出兵的

---

①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9 月 21 日，АПРФ，ф. 3，оп. 65，д. 827，л. 79－80。

②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9 月 23 日，АПРФ，ф. 3，оп. 65，д. 827，л. 81－82。

③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 年 9 月 30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47，л. 46－49。

④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 年 9 月 30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47，л. 41－45。

⑤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 年 10 月 1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34，л. 97－98。

回电。但是，这一主张在中共领导人的会议上受到质疑，毛泽东不得不答复莫斯科：中国暂不出兵，有关问题将再行讨论。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极力主张下，10月5日下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派兵入朝作战的决议。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成立，部队进入了战前的最后准备阶段。[①] 尽管出兵的决定已经做出，但中国领导人的犹豫和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关于出兵的时机，如果说在仁川登陆前中国军队可以协助防守后方，从而保障人民军主力在前线取胜；仁川登陆后中国军队可以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从而阻止敌军继续北进的话，那么到10月初人民军主力丧失殆尽、三八线已被突破的时候，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难怪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信誓旦旦地向杜鲁门保证，此时中国绝不会出兵朝鲜，否则，“对他们来说，那将是一次最大的屠杀”。不过，麦克阿瑟也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中国投入地面部队，苏联出动空军，“进行联合作战”。[②] 这恰恰就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所期待的。

从作战角度讲，与美军相比，中国军队最大的弱点就在于武器装备落后和没有空军支援，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告知了斯大林。毛泽东在10月2日起草的电报中不仅开列了包括坦克、重炮和几千辆汽车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清单，而且提到“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故要求苏联在中国军队出动时给予空军支援。[③] 如果说因这封电报没有发出而斯大林不知其内容的话，那么从其他渠道传递的信息应是十分明确的。10月7日，斯大林派驻朝鲜的私人代表马特维耶夫报告：朴一禹已于10月5日从北京返回，他在北京期间受到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两次接见，谈话持续时间长达10个小时。毛泽东说，我可以尽力帮助朝鲜，但就是不能派出军队。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出兵势必把苏联也拖入战争，而这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中国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①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79~190页。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7, *Korea*, Washington D. C.: GPO, 1976, pp. 954-955; Papers of DA, Oct. 15 1950, 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 Box 67, Truman Library.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0页。笔者在1996年1月与负责主编该书的金冲及先生谈话时了解到，除引号内的字句外，电报的其他内容在发表时被删节了。

空军和海军。[1] 毛泽东对苏联人的谈话就更直接了。10 月 6 日毛泽东与罗申谈话时说，他对斯大林提出中苏两国共同打击美国的说法感到十分欣慰，并强调，如果要打，就应该立即动手，他在刚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是这么说的。说到中国出兵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国军队的技术装备非常落后，“完全指望苏联的援助”。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关注的是空军问题”，他指出，中国出兵“必须要有空军部队”，其任务在于：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参加前线的作战行动；掩护中国重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毛泽东最后说，为了汇报中国的有关情况和全部想法，他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2] 由此可以断定，周恩来赴苏谈判之前，斯大林对其目的和要求是一清二楚的。

10 月 8 日，毛泽东分别正式通知金日成和斯大林，中国已决定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部队大约在 10 月 15 日开始入朝。随之，莫斯科与平壤之间又互通了消息。中国终于决定出兵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金日成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甚至对中国军队在朝鲜集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做了安排。[3] 但这一切来得似乎已经晚了，此时的斯大林有一种不祥之感，他在不安地等待着已经进入苏联国境的周恩来和林彪。

斯大林拒绝为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

10 月 11 日，周恩来等人经莫斯科飞抵高加索黑海边斯大林的休养地，

---

① 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 10 月 7 日，ЦАМОРФ，ф. 5，оп. 918795，д. 121，л. 705 – 706。

②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 年 10 月 7 日，РГАСПИ，ф. 558，оп. 11，д. 334，л. 126 – 128，*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 – 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 106 – 107；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588 ~ 590 页。

③ 毛泽东致金日成电，1950 年 10 月 8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3 ~ 4 页；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 年 10 月 8 日，РГАСПИ，ф. 558，оп. 11，д. 334，л. 132，*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 – 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 107 – 108；什特科夫致电斯大林，1950 年 10 月 8 日，ЦАМОРФ，ф. 5，оп. 918795，д. 121，л. 711；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 10 月 8 日，ЦАМОРФ，ф. 5，оп. 918795，д. 121，л. 712 – 713。斯大林在给北京的回电中说志愿军当然应由中国人指挥，但似乎没有向金日成提起过这个问题。这造成了日后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指挥权问题上的分歧。

并于当天下午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尚未披露，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或谈话。所幸不久前俄国公布了作为会谈结果斯大林和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再加上会后的中、苏、朝之间几件往来电报，目前关于黑海会谈的情况已经大体清楚了：周恩来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国出兵将面临巨大的实际困难，强调需要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斯大林指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要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反复讨论以后，双方认为，既然大家都未做好准备，只好放弃朝鲜，及早通知金日成安排撤退。会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指出：如在一个月内不用相当数量、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因执行掩护任务的空军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到位，装备和培训中国部队至少需要六个月，而那时援助朝鲜已无意义，故决定中国不再出兵。电报最后说，等待毛泽东做出决定。[①]

周恩来之所以接受中国不出兵的意见，显然是因为苏联没有完全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而这一点应该是毛泽东已经答应彭德怀并事先与周恩来商定的。彭德怀 10 月 9 日在沈阳召集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说明当前形势及中央意图。虽“各项准备不很充分，但为争取时间”，仍决定先派两个军于 10 月 15 日开始出动，集结在熙川、德川一线。但讨论中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特别讲到空军问题，以至于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在会后发出的电报中还提到：“陆空联络尚未规定，据说须经军委规定，请即速办理，否则（会）发生误会遭受损失。”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都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 495 ~ 498 页；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 年 10 月 10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13 ~ 14 页；Mansourov，“Stalin，Mao，Kim，and China's Decision”，*CWIHP Bulletin*，Issues 6 – 7，Winter 1995/1996，pp. 94 – 107；РГАСПИ，ф. 558，оп. 11，д. 334，л. 134 – 135，*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 – 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 108 – 109，并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 192 ~ 197 页。

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因此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① 这足以表明，中国军队出动前是得到过有空军掩护的许诺的，只是具体方式和时间尚不清楚。现在周恩来没有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任何确实的保证，自然便同意放弃朝鲜的意见了。而斯大林此时做出的推迟出动空军的决定，则有着更加缜密的思考。

斯大林说苏联空军没有做好准备明显是一种托辞，因为如上所述，不仅集结在沈阳地区的别洛夫航空师早已整装待命，而且就在十几天前华西列夫斯基还向斯大林报告，准备从滨海边疆区调往平壤的第32歼击航空师第304团和两个高炮营及其他辅助部队，只要5~6天便可以到位，并于10月3日“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② 斯大林在10月11日明确表示苏联空军不能与中国陆军同时出动的真正原因，分析起来大概有三点：

第一，斯大林一向严禁苏联军队在前线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尽管可以在后方提供空中掩护。10月2日晨斯大林得到报告：南朝鲜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③ 这就是说，朝鲜北部即将成为战区。斯大林由此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愿显示出任何苏联将与美国直接和公开对抗的迹象。莫斯科对美机空袭苏联边境机场的反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0月8日，两架美国战斗机侵入苏联滨海地区领空作低空飞行，并对距边境100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进行机枪扫射，造成7架飞机被毁。对此，苏联不仅没有任何军事方面的反应，甚至在外交抗议被退回时，莫斯科竟采取了默不作声的态度。④ 可以想见，当北朝鲜正在变为前线的关键时刻，周恩来跑来要求苏联明确表态出动空军入朝作战，斯大林自然会采取推脱的态度。

第二，斯大林对于中国出兵作战的决心及取得胜利的前景持怀疑态

① 彭德怀、高岗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9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4页；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404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第41页。

②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23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1－82。

③ 马兰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0月2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85－186。

④ 华西列夫斯基的报告，1950年10月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02－103。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见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第62～65页。

度。在美国参战后，斯大林希望中国做好出兵的准备，并表示愿意出动空军给以协助，但并不急于要中国出兵；在战局陷入危急后，斯大林极力鼓动中国出兵，以便稳定朝鲜战局，但是当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而中国在出兵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时，斯大林又失去了信心。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气了，说算了吧！”[①] 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晚两个月出动，就是要看先行的中国军队是否能在朝鲜站住脚，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给莫斯科留下一个回旋余地。

第三，斯大林还寄希望于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和平解决问题。在三八线将被突破的危急时刻，9 月 27 日正在纽约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电告，一位亲苏的美国企业家兰开斯特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表示，他可以安排与美国国务卿的助手或驻联合国大使会晤，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召集会议并做出决议，同意与美方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②] 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又采取了一个行动。10 月 4 日，联合国秘书处的苏联工作人员瓦西里·卡萨涅夫邀请挪威驻联合国代表汉斯·恩根共进午餐，希望他作为中间人向美国政府传话：如果麦克阿瑟同意在三八线止步，苏联将劝说北朝鲜人放下武器，并允许联合国委员会进入北朝鲜主持大选。[③] 显然，如果这些秘密外交取得成果，即使中国出兵不利或不出兵，危机也会过去，而苏联就没有必要再冒险与美国开战了。

接到黑海来电后，毛泽东陷入了极度思考之中。10 月 12 日下午 3 时 30 分刚看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电报，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同意你们的决定”。晚 10 时 22 分，毛泽东再电告知，中国军队尚未出发，已下令“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斯大林接着便致电平壤，将黑海会谈的结果通知金日成，并要他立即组织撤退。[④] 其实，毛泽东的态度并不像他电报

---

① 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 年 10 月 10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13～14 页。

② 维辛斯基致葛罗米柯电，1950 年 9 月 27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1950 年 9 月 27 日，АПРФ，ф. 3，оп. 65，д. 827，л. 86－87、84－85。

③ *FRUS*，1950，Vol. 7，pp. 877－878.

④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 年 10 月 12 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 年 10 月 12 日，РГАСПИ，ф. 558，оп. 11，д. 334，л. 140、141、142－143，*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 109－110。

中说得那样坚决，他给彭德怀等人的指示实际是："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部队"暂不出动"，还要彭、高二人来京一谈。[①] 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把真实想法全部告诉斯大林，也许是对在如此条件下继续坚持出兵的主张能否再次被中国领导人接受没有把握。但是，经过1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毛泽东可以向斯大林表示中国的决心了。

会议刚刚结束，10月13日21时毛泽东即刻召见罗申，并宣布：中共中央经过再次讨论决定，"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②] 此前金日成已经接到斯大林关于撤退的通知，虽然感到意外，但也只得表示遵照执行。[③] 莫斯科得到报告说，平壤的政府机关和外交使团从8日已经开始撤离，但组织混乱，情绪低落，并对苏联未能及时给予帮助颇有怨言。[④] 于是，斯大林紧急电告金日成："鉴于中国同志作出了这个新的决定，请把昨日发给您的电报中提出的对北朝鲜进行疏散以及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时间先往后拖一拖。"[⑤] 14日凌晨收到罗申关于中国出兵的补充报告后，斯大林再次告诉金日成："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⑥] 不过，罗申的补充报告特别指出了空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毛泽东还提到，希望能以贷款的方式得到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周恩来必须与斯大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⑦]

毛泽东在13日22时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把中国再次决定出兵的安排和要求讲得更清楚：第一，中国军队入朝后，"可以专打伪军"，建立根据

---

① 毛泽东致彭德怀等人电，1950年10月12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5～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2～553页。

②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3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5，*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c.110－111。

③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3。

④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10月13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4，л.136－140。

⑤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0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75。

⑥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0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77。

⑦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2。

地，以振奋士气，待苏联志愿空军和武器装备到达后，再打击美军；第二，争取用租借办法解决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问题；第三，务必要求苏联在两个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掩护京、津、沈、沪、宁、青等地。[①] 14 日 3 时，毛泽东再次发电叮嘱周恩来：主要问题在于两个月内苏联是否确实能派出前线的志愿空军及后方各大城市的掩护空军；武器装备是否可以用租借办法解决。[②] 14 日 21 时，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已决定 10 月 19 日出动 12 个步兵师、3 个炮兵师共 26 万人入朝，并要他立即通知斯大林。[③] 鉴于平壤告急，10 月 15 日凌晨毛泽东又决定志愿军提前出动，即 17 日和 18 日分别出动一个军，10 天左右全军渡江完毕。[④] 毛泽东最后的决心已下定，并一再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苏联空军的出动。中国人的立场和要求迫使斯大林不得不明确表态了。

此时周恩来已返回莫斯科，并于 14 日致函斯大林，转告了毛泽东的意见，还特别提到了"苏联志愿空军"与中国志愿军在作战时的指挥关系问题。[⑤] 莫洛托夫大概是没有弄清斯大林的实际意图，便笼统地答应苏联可以先出动 16 个团的喷气式歼击机掩护中国军队。当周恩来进一步提出"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以及苏联空军与中国志愿军的"指挥关系应如何解决"等问题时，斯大林却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即使出动也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⑥] 这不啻往中国领导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毛泽东 17 日急电彭德怀、高岗进京议事，并将出兵日期推迟。经过 18 日会议的讨论，中国决定，仍于 19 日出兵朝鲜。[⑦] 毛泽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 年 10 月 13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6 ~ 7 页。

②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 年 10 月 14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7 ~ 8 页。

③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 年 10 月 14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8 页。

④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50 年 10 月 15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10 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564 页。

⑤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 404 ~ 405 页。

⑥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502 页；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 年 10 月 10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14 页；周恩来给斯大林的信，1950 年 10 月 14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9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 ~ 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 86 ~ 87 页。

⑦ 毛泽东致彭德怀、高岗电，1950 年 10 月 17 日，毛泽东致邓华等电，1950 年 10 月 18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11 页。

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就算打不过美国也要打，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①

苏联空军飞越鸭绿江投入战斗

其实，莫斯科并没有袖手旁观，斯大林在任何时候都做好了两手准备。就在中国决心孤军奋战的时候，苏联空军也在紧张地整编和集结。按照军事部的命令，自10月14日起苏联空军相继组建了第144、第17、第328和第20歼击航空师，准备前往中国。② 10月19日，即中国出兵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报告了将派往中国的空军和坦克兵的准备情况和具体时间：11月3日前，已经部署在东北的第151歼击航空师将扩编为两个师；11月28日前，新组建的4个歼击航空师完成在沈阳集结并于12月15日前进入战备状态；11月30日前，从各军区调集的10个坦克团到达沈阳；12月1日前，新组建的3个强击航空团在沈阳完成集结。苏军总参谋部负责此次组建和集结活动。③ 10月24日，即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打响的前一天，各空军师和坦克团的组建工作结束，并陆续开始按计划发运中国。④

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苏联空军部队并没有接到作战命令。驻华军事顾问科拉特科夫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是可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

① 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7页；彭德怀关于高岗问题的一次谈话，1955年2月8日，彭办主任王焰抄记，未刊。20年后毛泽东对金日成说：中国出兵朝鲜，"那无非是进去了又被美国人赶了出来。那我总进去跟你打过一回了吧。被你们赶出来回到鸭绿江以西，那以后你美国人占领了鸭绿江以东，他总是不放心的，我们总还是可以进去嘛，以后我们两家合起来组织游击队可以再钻进去占领鸭绿江以东嘛。你如果按兵不动，以后就没有理由了嘛！"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页。笔者对于毛泽东出兵动机的分析，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78~287页。

② 巴季茨基的报告，1950年10月28日，ЦАМОРФ，ф. 16，оп. 3139，д. 16，л. 54。

③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9日，ЦАМОРФ，ф. 16，оп. 3139，д. 16，л. 15－18。

④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0月30日，ЦАМОРФ，ф. 16，оп. 3139，д. 16，л. 174。

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①] 直到10月25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遭遇战开始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者，不是“亲美分子”。[②] 于是，10月29日，苏联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③] 11月1日，苏联空军第一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了战斗。这一天，别洛夫航空师的米格-15飞机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各起飞8个架次，在安东—新义州上空击落了2架美国F-82飞机，高射炮还击中了2架。苏方在空战中没有损失。[④] 在11月1~12日的最初几次战斗中，苏联空军共击落美国飞机21架，其中包括2架B-29战略轰炸机。[⑤]

11月2日，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向斯大林详细报告了志愿军各部队不断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以及第二梯队（第9兵团）3个军将陆续调往东北的情况，11月6日的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联合国军损失惨重而志愿军顺利进展的情况。[⑥] 这更增强了斯大林的信心，他于11月15日通知中国，苏联准备向别洛夫师增派120架米格-15歼击机，并由此成立军一级的指挥机构（第64歼击航空军）。11月20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空军部队。[⑦] 按照计划安排，除已在中国的第151歼击师和在鞍山新组建的第19歼击师外，从11月到次年初，将有12个歼击机师、2个强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陆续进入中国，分别部署在东北及北京、上海、

① Viktor Gobarev,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 12, №4 (December 1999), pp. 13-14.

②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有亲身体会的。见 АВПРФ, ф.0100, оп.50а, д.1, п.423, л.19,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9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302页。

③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27页。

④ 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1月2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71-72。

⑤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1950年11月13日，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8, л.25-26。

⑥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1950年11月2、6日，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8, л.4-5、12-13。

⑦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97页；《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98页；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1月16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116；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4, л.189；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50年11月20日，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67-169。

青岛、广州等中心城市周围。①

11 月 30 日苏军总参谋部报告：军指挥机构人员已经全部抵达沈阳，各航空师已陆续到达或在调运途中。此外，计划供应中国的火炮、弹药、汽车及其他装备也陆续开始启运，有些已经运抵目的地。② 据空军总参谋部报告，至 12 月 4 日前，派往中国的空军部队已有 11 个歼击机师（第 17、20、28、50、65、144、151、297、309、324、328 师），2 个轰炸机师（第 162、186 师），以及第 64 歼击航空军指挥机关、第 6 飞行技术学校的部分人员，共计将军 5 人，军官 5058 人，部队官兵总数达 17950 人。与此同时，为组建中国空军，已移交给中国各种飞机 1653 架，其中歼击机 900 架（350 架米格 - 15、372 架米格 - 9、40 架拉 - 11、130 架拉 - 9），强击机 117 架（伊尔 - 10），轰炸机 132 架（图 2），教练机 412 架，运输机 44 架，通讯机 56 架。此外，还有各种车辆 1871 部。③

1951 年 1 月 9 日第 64 歼击机航空军的报告全面反映了苏联空军最初两个月投入战斗的情况。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有 8 月 11 日进驻沈阳、鞍山和辽阳机场的第 151 师，11 月 1 日进驻辽阳机场的第 28 师，11 月 20 日从上海移师鞍山的第 50 师，共 6 个歼击机团，每团各有 30 架米格 - 15 飞机。11 月 27 日，这三个师合并为第 64 歼击机航空军。为了接近战斗地区，12 月 3 日和 25 日，第 50 师的两个团分别调入安东机场。从 9 月 3 日起，各部队开始实行每日战斗值勤。苏联空军最初的任务只是防止美国空军对中国境内目标的空袭和侦察，特别是保护鸭绿江大桥和安东电站的安全，因此规定，所有歼击机不得越过鸭绿江。考虑到这条禁令对实际作战十分不利，且难以执行，部队于 11 月 6 日接到新命令，作战时可以进入朝鲜领空。12 月 3 日，以安东为基地的第 50 师进一步领受了新的任务——“保护北朝鲜中国志愿军的后方”，特别是从鸭绿江到清川江的交通线。此外，这些部队以及后续各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组建和培训中国空军。在苏军的帮助下，中国空军第一支歼击机部队（第 4 师）于 12 月

① 索科洛夫的报告，1950 年 11 月 30 日，ЦАМОРФ，ф. 16，оп. 3139，д. 56，л. 231。

② 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11 月 30 日，ЦАМОРФ，ф. 16，оп. 3139，д. 16，л. 181 - 183。

③ 卡特尼金和索尼里尼克的报告，1950 年 12 月 4 日，ЦАМОРФ，ф. 16，оп. 3139，д. 16，л. 130 - 132。

12 日完成组建，并立即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投入了实战训练。在两个月的战斗中，苏联空军 3 个师共出动飞机 1079 架次，击落敌机 68 架，其中 B－29战略轰炸机 12 架，苏方仅损失飞机 9 架、牺牲飞行员 7 人。自苏联飞机腾空以后的整个作战时期，敌机再无一架接近中国境内被保护的目标及安东渡口和电站。不过，由于当时在中朝边境只有一个机场，苏联驻军兵力有限，以及雷达和通讯设备缺少等原因，朝鲜境内志愿军后方交通线未能得到有效保护。①

1951 年春天中国空军参战后，朝鲜后方及志愿军的补给线得到了进一步保障，而 6 月初庙沟机场投入使用后，苏联空军在安东地区部署的兵力增至两个师，“极大地提高了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减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② 此后便形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鸭绿江至清川江上空的“米格走廊”。③ 然而，斯大林规定的苏联军人不得进入前线作战的禁令始终没有破除。在空战中，莫斯科为第 64 航空军限定了作战范围，即向南不得超越平壤—元山一线，东西两侧不得超越海岸线。按照别洛夫的说法，这是“我们的战斗指导原则，必须严格遵守”，虽然这种限制性规定导致米格飞机不能充分发挥其良好性能。④ 斯大林给在华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指示更明白：“绝对必要”的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⑤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通过换防，先后派出 10 个航空师和 4 个高炮师参战。航空师共实施战斗起飞 64300 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 49449 小时，空战 1872 次，击毁敌机 1106 架，自身损失飞行员 120 人、飞

① 第 64 歼击机航空军关于 1950 年 11～12 月作战情况的报告，1951 年 1 月 9 日，ЦАМОРФ，ф. 64. иак，оп. 173543，д. 95，л. 138－147；克拉索夫斯基给第 64 歼击航空军的指示，1951 年 1 月 16 日，ЦАМОРФ，ф. 64. иак，оп. 173543，д. 67，л. 1－6。

② 参见周恩来致斯大林电，1951 年 2 月 23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37，л. 62－65；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1951 年 6 月 15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39，л. 61－63；洛博夫在飞行战术会议上的发言，1951 年 7 月 25 日，ЦАМОРФ，ф. 64. иак，оп. 173543，д. 100，л. 168－172；别洛夫关于第 64 歼击航空军战斗情况的报告，1951 年 10 月（估计），ЦАМОРФ，ф. 64. иак，оп. 173543，д. 73，л. 22－69。

③ 关于美苏空战的情况，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 268～277 页。

④ 别洛夫在飞行战术会议上的报告，1951 年 9 月，ЦАМОРФ，ф. 64. иак，оп. 174045，д. 49，л. 38－41。

⑤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1951 年 6 月 13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39，л. 47。按照约定，平壤—元山线以南及东西海岸线以外为中朝联军作战区域。

机 335 架。高炮师击毁敌机 153 架，自身阵亡 68 人，损失高炮 6 门、探照灯 1 台。中朝联合空军投入作战的有 10 个航空师（中国 7 个、朝鲜 3 个），共实施战斗起飞 22300 架次，空战 366 次，击毁敌机 271 架，自身损失飞行员 126 人、飞机 231 架。①

至此，可以对斯大林在苏联出动空军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做一个总结了。早在战争之前苏联空军就已经来到中国，这是为了履行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盟国责任；美国参战迫使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想到了中国出兵的问题。为此，斯大林承诺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但没有说明出动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想及早派兵参战以便尽快结束战争，但斯大林并不急于使用中国军队，因为这涉及苏联出动空军及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在三八线被突破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希望立即出兵援朝，而斯大林担心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泽东出兵的诚意和效果，故拒绝出动空军；中国志愿军毅然出动并与美韩军队作战后，苏联空军也随即投入了战斗，不仅保护中国领空，而且越过鸭绿江为志愿军后方提供掩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坚持不变的原则是：无论是否越过鸭绿江，苏联空军只在后方活动而绝不进入前线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作战。至于中、苏、朝之间的同盟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出兵之前，莫斯科对北京一直怀有戒心，而金日成对斯大林则是言听计从；中国出兵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① 总参作战管理总局关于空军作战情况的总结，1953 年 11 月 3 日，ЦАМОРФ，ф. 16，оп. 3139，д. 157，л. 280 – 283。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

陕西师范大学　柳植

按照苏联共产党的传统，新的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和路线得到党代表大会的认可，才算最后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1955 年 4 月 7 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召开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报告说："自从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过去了两年半的时间。党章规定：例行代表大会至少每四年召开一次。因此，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即将临近。""我认为举行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最合适的时间是 1956 年 2 月份。"[①] 报告拟出 6 项议程：苏共中央工作报告；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 1956～1960 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指示；关于修改苏联共产党纲领；关于修改苏联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机关。4 月 8 日，主席团通过了赫鲁晓夫关于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决定大会在 1956 年 2 月 14 日召开，确定议程为：苏共中央工作报告——报告人尼·谢·赫鲁晓夫；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工作报

① 《赫鲁晓夫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致中央主席团成员的报告》，РГАНИ，ф. 1，оп. 2，д. 1，л. 7，*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с. 167。

告——报告人莫斯卡托夫；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1956～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指示——报告人布尔加宁；选举党的中央机关。[①] 主席团决定大会代表在各州、边疆区党的代表会议上和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后来，赫鲁晓夫还把这项决议提交7月中央全会通过。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如期召开。1349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8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55个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应邀参加。这是斯大林之后，在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主持下召开的首次代表大会，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会议大厅里竖立着一尊列宁发表演说的塑像，斯大林的肖像却被有意拿掉。赫鲁晓夫是大会的中心人物，他致大会开幕词，在提议为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和二十次代表大会之间失去的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活动家默哀时，有意把斯大林同哥特瓦尔德、德田秋一相提并论。他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总结报告，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月25日，他又在没有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由于赫鲁晓夫在党中央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和“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特别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鲜为人知的大镇压材料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等方面的种种错误，这次大会无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震动。几年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这些问题以及对这次大会的评价，发生了一场政治大争论。从此，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走向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出现了不同的中心。因此，苏共二十大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史上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苏共二十大距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十几年前也告一段落，大会的档案已经解密，它早已成为一个历史问题。作为历

① 苏共主席团会上批准了4项议程，修改党纲和党章没有列入本次大会议程。关于主席团为什么没有把修改党纲列入议程，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说：“党纲草案的拟定要和以几个五年计划为期的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远景计划的拟定同时进行。”在二十大只成立了一个修改党纲的委员会，党纲修改移到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至于党章，二十大只做了个别改动，没有作为一项议程。

史问题，就应该用历史学家的眼光和历史研究的方法，摈弃旧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某些政治情结，把这次大会放在整个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史中、放在俄国现代化进程和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给以批判的总结。对于那次大会，迄今不仅仍有一些观念和认识上的误区，而且有一些事实也需要进一步澄清。本文将比较详细地分析和评论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阐释的路线，追述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准备和出笼的过程及其主要内容，还将涉及大会在国内外引起的强烈反响以及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的发表，尽力介绍这次大会的全过程。

赫鲁晓夫路线在二十大的阐释与确立

按照宣布的议程开会11天，主要是听取和讨论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布尔加宁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党中央的总结报告是在赫鲁晓夫主持下的一个班子集体起草的，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动员了党中央、科研院所和许多其他机构的大批力量。[①] 报告总结了十九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提出和阐释了未来几年党的工作的方针和路线，是赫鲁晓夫思想的集中和概括，系公开会议的主题内容。布尔加宁的报告是根据赫鲁晓夫提出的思想和路线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做的一些原则性的说明。赫鲁晓夫的报告包括“苏联的国际形势”、“苏联的国内状况”和党的工作三大部分。

报告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而变成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想阻挡这一世界历史进程是无能为力的。按照不同的规律、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两个对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的同时存在，已经成为确定不移的事实。”社会主义体系正在胜利地向前发展，没有危机，也没有震荡。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加深，各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帝国主义拼凑侵略集团和煽动“冷战”，苏联和各国人民在争取缓和

① 列宁是亲自准备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据说斯大林在历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是自己准备的。大约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便由一个班子准备和起草。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这次报告的集体准备情况。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148～1149页。

国际紧张局势。报告对“二战”后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做了这样的评价：“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是战后时期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①] 这些分析和概括仍然体现了苏联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战后斯大林的基本思想理念，没有多少新意。而在“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题目下则阐释了以下三个问题。

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报告说，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原则，这个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它不是出于策略考虑，权宜考虑，“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②] 赫鲁晓夫说，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有侵略和发动战争的动机，也不想用“输出革命”的办法去推翻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两个体系的和平竞赛中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报告说：“全世界千百万人都在问：另一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难道经历过两次流血的世界大战的人类还要经历第三次大战吗？”赫鲁晓夫解释说，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原理是基于当时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对战争不感兴趣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是软弱的，组织得不好，不能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战争。战争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人民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亦起着很大的作用。现在，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有一大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代表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依然企图发动战争，“但是，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报告认为：“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越积极，防止战争的保证就越大。”[③]

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报告首先引用了列宁“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走法并不一样”的语录，又以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苏维埃和人民民主的不同政权形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中国和平改造工商业，南斯拉夫的经济管理和国家机构的

①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第4、3页。

②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35页。

③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37、39页。

特殊形式，说明迄今的社会主义就有不同特点，然后提出：“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用暴力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以及与此有关的阶级斗争的急剧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不过，社会革命的形式有各种各样。”“把暴力和内战看成社会改造的唯一途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①] 因此便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报告说了下面一段曾引起激烈争论的话：

> 在现在的条件下，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右翼资产阶级政党和他们所组成的政府，正越来越遭到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要把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回击，就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②]

应当指出，赫鲁晓夫的这些阐释并非都是新观点、新理论。报告也指出，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原则。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目前条件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最好形式，已得到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的许多国家的承认。实际上，斯大林1952年12月21日在答《纽约时报》外交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提问时也说过：“不能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两国今后也能够和平相处。”[③] 1951年英国共产党在斯大林指导下制定的新纲领《大不列颠走向社会主义

---

①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39、40、41页。

②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42页。

③ 斯大林：《答〈纽约时报〉外交记者詹姆斯·赖斯顿问》，《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第679页。

的道路》，就主张在英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实现社会主义。而且，铁托及其同志们在此前也提出了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通过不同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尤其是和平道路。

需要研究的是，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把这三个问题集中在一起加以论证和阐释？这同苏共新领导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如何对待斯大林的遗产密切相关。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苏共新领导面临着“包含着巨大危险的国际紧张局势”。所谓“巨大危险”就是，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越出了苏联一国范围，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阵营，但是，站在苏联和这个阵营对面的则是更为强大的美国和资本主义阵营。在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冷战中，由于斯大林的强硬对策，在封锁西柏林特别是朝鲜战争时期，几乎酿成一场世界大战。而斯大林对世界大战与革命的关系又做了这样一个概括：世界大战总是以革命而告终。他甚至认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是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斯大林去世后，由于美、苏两国的热核武器都有了新的发展，美国已把联邦德国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并在苏联周围建立了一些军事基地，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而且新的世界大战将对人类的威胁更加严重。面对这样的背景，如何认识和处理战争、革命与和平这三大问题，就成为赫鲁晓夫等必须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迫切问题。赫鲁晓夫等曾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争给苏联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的损失和灾难，记忆犹新。他们不愿意再经历一次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就反复思考“战争能不能避免？”最后得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结论。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列宁“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论断，只是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与壮大，全世界反对战争的人越来越多，有了能够制止战争的力量。同时，苏联的国内建设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明确地说：“我们正在我国建设共产主义，所以我们坚决反对发动战争。”[1]

因此，避免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乃是赫鲁晓夫这些阐释的核心，其他两个原则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重提“和平共处”原则，而且把“不

---

[1]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6、38、37页。

同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扩大为“两个体系之间的和平共处”，就为这一原则赋予了新的意义。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就是说，在赫鲁晓夫看来，只有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才能避免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至于重提列宁的“革命和平发展”、设想“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所谓“和平过渡”，也包含着防止新战争的思考，赫鲁晓夫担心个别国家暴力革命和内战弄不好就会导致世界范围的战争。抓住了赫鲁晓夫阐述的几个原则的这一要害，也就厘清了赫鲁晓夫的外交路线同斯大林国际战略的区别所在。斯大林战后外交路线总思考是：在两个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冷战，准备热战。而赫鲁晓夫则把它改为：在两个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冷战，避免热战。

直到现在，我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仍沿用中苏两党论战时的观点，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阐述的这几个原则概括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所谓“三和路线”。这样的概括实际上曲解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原意。不错，“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确实是赫鲁晓夫报告中使用的词语，“和平过渡”也是作为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设想形式，但是，正如我们的引证和分析，在报告阐述和论证的几个原则中，并没有把这几个词语简单地直接平列为自己的外交路线。“和平竞赛”是作为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并不是一条原则。“和平共处”也不是不讲原则，不讲斗争，一味妥协甚或投降。赫鲁晓夫曾一再强调，和平共处是国际阶级斗争的政策。他也没有放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思想和战略。赫鲁晓夫曾有一句被资产阶级国家抓住不放的名言：“我们要埋葬你们！”赫鲁晓夫在论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也没有否定暴力革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斗争激烈的程度，使用或不使用暴力，这与其说取决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取决于剥削阶级抵抗的程度，取决于剥削阶级自己是否使用暴力。”[①] 在资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便不能拒绝暴力。在历史情况有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才可以争取上面引出的那段文字所指出的道路。他实际上也主张暴力革命与

①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41页。

“和平过渡”的两手策略。

经过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检验，应该说，赫鲁晓夫这一国际政策给人类带来的是幸运而不是灾难。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只有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仅人的生命就牺牲了8000多万。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在于它们之间贪得无厌的争夺：争夺殖民地，争夺势力范围，争夺统治世界的霸权。一旦形成两个对峙的国际性的军事集团，战争的危险性就一触即发。在这种形势下，领导国家的某些战争狂人便把人类推向灾难的深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对峙和冷战局面，使世界一直弥漫在新的大战阴影下。赫鲁晓夫这一避免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策略，对保证世界和平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虽然，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互不信任，继续进行以热核武器为中心的军备竞赛，曾经几次造成十分危险的局面，但是终究没有酿成新的世界战争。这不能不是人类的幸运。

说到这里，就自然提出了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赫鲁晓夫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新的外交路线怎么就会引起共产党国家之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的激烈争论呢？从共产国际时期起，苏联共产党就一直处于对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苏联自然也就成为这个阵营的头。列宁、斯大林被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不仅要确立自己作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而且也要继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因此，他在自己报告中阐释的这部分内容不仅涉及两个阵营之间外交政策的原则，也涉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问题。为了取得各国共产党人的认可与支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报告中尽量讲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关经验，特别突出了中国的地位，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总是把中国放在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首位。他希望首先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不论从赫鲁晓夫报告阐述的原则还是从报告引起争论来说，实际上都包含着确立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权的企图。

赫鲁晓夫报告的第二个方面是对自己提出的国内建设路线的概括和阐

述。这一建设路线就是前两年同马林科夫争论中提出的：在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急剧增加农业产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尽管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赫鲁晓夫却有意回避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报告中说："苏联共产党遵循着伟大列宁的遗训，一直关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因为重工业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切部门、加强我们祖国国防、增进人民福利的基础。"他并且强调："这是我们党的总路线"，"要十分坚定地贯彻这条总路线"。报告说：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进一步发展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燃料和化学工业，日益加快电站的建设和迅速发展机器制造业，使工业水平在1960年比1955年大约增长65%，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70%。尽管赫鲁晓夫提到必须扩大消费品生产，但那是要在继续保持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前提下，所以，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仍然要超过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在五年中消费品生产增长60%。[1]

赫鲁晓夫说，必须解决工业工作中若干根本性的问题。他提出，要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要能制造出生产力最大、最经济、最可靠的机器，广泛发展生产过程的电气化、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充分应用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他指出，苏联的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但对最需要的钢材和新型金属的生产则不甚理想，要大力增加有色金属、稀有金属、不锈钢、耐热钢合金的产量。到这个时候，苏联的铁路运输主要使用的还是蒸汽机车，赫鲁晓夫提出，要改用电力牵引机车和内燃机车，同时要发展公路运输和海运。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中，要合理配置生产力，把电力和燃料开采向资源丰富而开采成本低的东部转移，使西伯利亚成为苏联煤和电力的最大基地，成为制铝、制镁、制钛以及电冶业、焦炭化学和电化学的基地，要在西伯利亚建立起全国第三大钢铁工业。赫鲁晓夫的这一路线实际上是要继续发展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军工综合体经济体系。

同斯大林的路线相区别的地方是，赫鲁晓夫维持斯大林之后马林科夫关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而与马林科夫不同的地方是，赫鲁晓夫提出："我们的任务是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大大提高农业，更迅速地

①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44、49页。

推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他说：“党面临着一个迫切的全民任务：急剧地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提高畜牧业产品产量。谷物每年的总产量在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增加到110亿普特。用什么办法达到这一生产水平呢？一方面，仍然要依靠斯大林的农业体制，即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这三大支柱。他要求加强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另一方面，则要依靠他所发动的开垦荒地和扩大玉米播种面积两大措施。他说，1955年，全国开垦荒地达到3300万公顷。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有人问：在干旱地区垦荒是否正确？”随后回答说：“党的开垦荒地的方针是正确的”，“即使今后五年，只有两年丰收，一年普通收成，两年歉收，也合算”。他认为，这是用最少的人力和物力，迅速增加谷物的办法。他又说：“有人会问，也许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适于南方种植的玉米推广到全国，犯了错误吧？这不是错误。全国各个地区玉米都能够有很高的产量，没有其他作物比得上玉米。”①

在谈到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的时候，赫鲁晓夫承认：“我们的消费品还不十分充足，房屋还不够住，而许多有关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福利的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城市和居民点的肉类、牛奶、油类和水果等物品的供应，至今仍感不足；有时连马铃薯和蔬菜的供应都中断。”他希望通过他提出的农业政策和加快住房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他也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月工资提高30%，把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至少提高40%，特别要提高工资低的那部分工人的工资。要整顿劳动报酬制度，要实行使工作人员从个人的物质利益出发去关心生产的原则。他还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对所有工人和职员都实行7小时工作制。要改善抚恤金制度。②

应该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提出的一些主要目标和口号在这个报告中几乎都出现了。例如，他已经把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苏联的主要经济任务提出。不过这个时候，他还说：“我们需要作不少的努力，才能完成我们的基本经济任务。”而关于共

①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58、62、63、64页。

②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80、81、82、83页。

产主义建设的口号已喊得很响亮了，他在报告中说："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国家在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强大的物质生产基础方面，将再向前迈出一大步。"他自己则十分乐观地说："如果用形象化的说法，就是我们已经登上了这样的山巅，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从这里已经清楚地看到走向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的广阔远景。"[①]

如果说赫鲁晓夫报告的一、二部分主要是阐述自己的外交和内政路线，那么在第三部分，则是要从党的思想和组织路线上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在"共产党队伍的巩固，党在苏维埃国家中领导作用加强"的标题下，他指出："在报告所谈到的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党在国家建设中，在国家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加提高了。"在论述这段工作时，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是以列宁的建党学说为指南的。他处处引用列宁的语录和原则。而对于斯大林，在整个报告中，只是在这一部分说到这样一段话："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我们队伍失去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敌人曾经希望我们党的队伍会发生混乱，在他的领导机构中会发生纠纷，在执行对内对外政策时会发生动摇。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党更紧密地团结在它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并且更高地举起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②] 莫洛托夫在1957年6月全会上的发言中说，在赫鲁晓夫交给主席团讨论的总结报告的初稿中，这段话的"约瑟夫"之前还有"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斯大林"之后还有"30年来，党在他的领导下履行了列宁的遗训"，而"这些话却从党的二十大上宣读的报告中消失了"。[③] 莫洛托夫这一揭示很重要，这一改动，不只是去掉了对斯大林的肯定语，而且使这段话完全变成对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颂扬。它显示了赫鲁晓夫在本次大会上"非斯大林"化，从而确定自己地位的心计。接着，赫鲁晓夫列举说：中央委员会坚决制止了贝利亚及其同谋者的阴谋活动，恢复了由列宁制定的，而且过去常常被破坏的党的生活准则，纠正了工、农业生

①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46、80、130、134页。

②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130页。

③ 莫洛托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7年6月全会上的发言，《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赵仲元等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第208～209页。

产中的错误，“中央委员会每逢发现党的领导者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时候，就一直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纠正这些错误”。然后他又说了这样一段话：党“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了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结果就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①] 虽然，赫鲁晓夫在这里没有把“个人崇拜”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但是，把他的这些列举以及对上面那段话的修改联系在一起，听众就不难体会到赫鲁晓夫的用意了。赫鲁晓夫实际上在这里为自己下一个报告埋下了伏笔。

赫鲁晓夫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任何一件重大工作的成功，都取决于党的领导”，“今后要尽力提高党的作用”。怎样提高党的领导作用？他在谈到“党的组织工作”时强调：党的工作要同经济工作联结在一起。“现在当我们的社会正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提到首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方面，是具体经济的各种问题。”关于工业、农业、建筑、运输和贸易等具体经济问题，共产主义建设的经济学问题，又必须成为我们宣传的中心。他“号召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要彻底转变过来，对经济建设进行具体领导”。“要求党的干部加强研究工业企业、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技术和经济，获得丰富的知识以便领导他们的工作”。[②] 赫鲁晓夫特别关注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为了加强党对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赫鲁晓夫在有拖拉机站的地区建立了以区委书记为首的指导小组，管理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在报告中，他同时还要求党的区委第一书记不能因此而放松对农业的领导。我们已经说到，马林科夫继承了斯大林晚年的一项重要改变，使政府成为权力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利用他掌握的党中央书记处，特别是在他做了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后逐渐又使党的机关成为权力中心。当然，不管是斯大林还是马林科夫注重政府的权力，仍然是通过行政命令管理经济。不过，马林科夫是技术官僚的代表，他是要发挥技术人员的作

①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112、114页。

②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112、115、116页。

用。而赫鲁晓夫则是党内权贵的代表，由党的机关和干部直接领导经济工作，就是由党内权贵领导和管理经济。这一改变必将更体现权力意志。这一点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报告在“思想工作问题”的标题下，赫鲁晓夫提出要“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他批评“目前思想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它在颇大程度上脱离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实际”。因此，他所说的“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就是要结合苏联的建设，特别是要研究和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了阐述他的这些思想，在这里，他又一次批判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前者，他说：“个别工作人员在言论中竟错误地认为，似乎我们直到现在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断定说我们只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就会使党员和苏联全体人民，在关于我国的发展前景这样紧要的问题上迷失方向。”关于后者，他说：“居然有一些聪明人把轻工业同重工业对立起来，硬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苏联经济发展的初期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只要加速发展轻工业就行了。”“党对这种想贬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的企图给予了应有的打击”。赫鲁晓夫还批评个别工作人员企图把和平共处应用到思想意识方面。“我们主张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但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放松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人们思想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①

总之，赫鲁晓夫在报告的这一部分，把死去的斯大林从党的领袖地位一笔勾销，又批判了斯大林之后的新领导人马林科夫和作为三朝元老的莫洛托夫，不言而喻，只有赫鲁晓夫自己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人”。

在讨论赫鲁晓夫报告时，有95人报名要求发言。大会的发言稿事先经过审查，绝大多数发言者都回避了斯大林的名字。大部分发言者都是对报告表示肯定和赞颂，最多联系本人所在的部门或地区的情况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和说明，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只有文学家肖洛霍夫别出心裁，批评了苏联作家协会，特别是它的领导人法捷耶夫。最引人注意的是米高扬的发言，不仅时间长，而且涉及了赫鲁晓夫报告的方方面面，几乎等于一个副报告。他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高度评价，说报告“研究了人

①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125、126、130～131页。

类历史当前时期的情况和事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阐明了这些新的情况和事件”，“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米高扬赞扬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近3年来的工作说：“我们党内的集体领导经过长期的间断之后又建立起来了”，这个“领导集体遵循着列宁的思想、列宁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原则，在短期内自上而下地恢复了列宁党的生活准则”。“大约二十年内我们没有集体领导”。他先用这样一些比较含混的语言把批评矛头指向斯大林，后来就公开点了斯大林的名。他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谈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时候说，在世界市场瓦解以后，这些国家的生产将要萎缩，未必正确。他批评党的宣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照例仅仅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简明教程》“是包括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财富的”，《简明教程》及一些被作为范本的历史书歪曲事实，有些人被推崇备至，而对另一些人则干脆不提。次要的事情被提到不应有的高度，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却没有受到重视。他提议，找一些档案和历史文件，从列宁主义立场来阐明《简明教程》中所叙述的许多事实和事件。米高扬还要求哲学家、法学家也要创造新东西，而不是重弹老调。[①] 米高扬的发言实际上是在会上公开放出的一个试探性的气球。马林科夫在发言中谈到了苏联电力和电站的发展计划，同时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遵循着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列宁的指示，始终不渝地执行着把苏联变成先进的、更加强大的工业国的政策。我们获得的成就的确是巨大的。我们应当把这些成就归功于我们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对尽力发展重工业的经常关心，而重工业乃是发展国民经济一切部门和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物质和文化福利的基础的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总路线。”[②] 莫洛托夫在发言中也承认：“执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大胆计划，有着特别重大意义。”[③] 同时他也检讨说：“还在战争时期，我国人民就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现在正在实现从社会

① 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25、426、453、457页。

② 马林科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48页。

③ 莫洛托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89页。

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逐渐过渡。”许多外国代表团的成员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诧异，摸不透大会组织者的用意。据来自的里亚斯特的共产党代表维·维达利《苏共二十大日记》记载，外国代表的发言稿同样事先受到审查，所以，绝大多数的发言也没有出现斯大林的名字，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朱德在宣读毛泽东主席的贺信中说道：“苏联共产党愈益巩固，苏联在各方面的胜利愈益辉煌，就愈益证明列宁所缔造的、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所共同培育的苏联共产党是坚强而无坚不摧的。”另一个是法共领导人多列士，在发言中几乎以挑战的姿态提到斯大林的名字。[①]

到了2月20日，大会主席苏斯洛夫宣布，对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讨论已有51人发言，主席团收到建议，主张停止讨论。赫鲁晓夫不再作结束性的发言，因为全体发言人都完全同意报告的观点和结论。在科兹洛夫等的建议下，代表大会当即通过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而苏斯洛夫又说，有代表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起草决议草案，接着大会又选举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在2月24日的大会上又通过了一项同名决议。这项24页长的新决议，除了重复前一决议的那句结论，又一次概括和重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基本内容。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集》中就收集了两个同名决议。

从2月21日到24日，大会听取并讨论了布尔加宁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公开大会的最后一个程序就是进行新的中央委员的选举。赫鲁晓夫在自己报告中多次提到要发扬党内民主，而这次大会的选举进程则是赫鲁晓夫党内民主的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根据大会的速记记录记载，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大会上，先由苏斯洛夫宣读了赫鲁晓夫交给他的大会主席团确定的候选人名单：133名中央委员和122名中央候补委员无差额候选人名单以及63名中央监察委员无差额候选人名单。作为主持人的赫鲁晓夫问大会代表：“同志们有异议吗？谁有异议？”大厅里高喊：“没有！”（鼓掌）赫鲁晓夫总结：“没有人对哪一个候选人有异议。”他又问：“有没有对候选人补充提名？”大厅里发出喊声：“没有。”赫鲁晓夫再问一次：“有没有提名其他候选人？”大厅里重新高喊：“没有。”（暴

① 维·维达利：《苏共二十大日记》，王德树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08页。

风雨般持续不断的掌声)赫鲁晓夫总结说:“这就是说大家接受了选举中央委员会组成的候选人。”然后选出由33人组成的计票委员会,休会两小时后进行了投票。经过计票委员会的清点和统计,共发出1341张选票全部投入票箱,并且有效。其中有11张选票勾掉了其中某位候选人,得到反对票的是:赫鲁晓夫、阿里斯托夫、福尔采娃、拉普捷夫、科涅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各1张,朱可夫2张,马林科夫3张。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1/3是新人,候补中央委员一半是新人。1952年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有1/3无影无踪地消逝了。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准备过程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报告是在没有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做的,因而被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报告文本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外界长时间得不到真实的文本,也不知道报告的准备过程。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散布了这样的说法:“大会快要结束了。要通过决议。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东西。以后怎么办?我们还要对数十万受到处决的人们,包括十七大选出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负责。幸免于难者寥寥无几,几乎党的全部骨干均受到了处决或者迫害。走运者、幸存下来的人是凤毛麟角。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在一次会间休息,主席团房间里只有中央主席团委员在场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的报告怎么办?过去处决、逮捕的事情可怎么办?大会要闭幕了,我们没做交待代表就要分赴全国各地了,我们可是已经知道遭到清洗的人清白无辜,他们并不是‘人民公敌’,他们都是好人,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人们要从流放地返回。我们现在不会再关押他们了。要考虑一下如何遣送他们回去。”赫鲁晓夫说,他的话音未落,大家就群起而攻之。经过几番激烈的辩论,最后才同意由赫鲁晓夫在会上做这个报告。[①] 这一说法曾使许多历史学家对秘密报告出笼

①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149页。

的过程做了不准确的记述。已公布的苏共二十大档案证明，赫鲁晓夫说的确定做报告的时间不对头，对主席团内的辩论情况的介绍也有很大的随意性。

苏共新领导对斯大林的批判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斯大林逝世以后，马林科夫就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贝利亚很快重新审查和平反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案件。贝利亚被逮捕后，马林科夫在中央 7 月全会的报告中，继续批评个人崇拜。7 月会议之后，苏共中央在向东欧国家共产党通报会议的情况时，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解释性发言中也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告诫，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1954 年，赫鲁晓夫重新审查了列宁格勒等案件，并对其他一些案件也进行了平反。但是，直到这次大会之前不久，在媒体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并没有把个人崇拜、非法镇压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掌握的舆论工具还一直宣传和颂扬斯大林。在 1954 年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真理报》发表的纪念性文章，实际上就是他生前出版的《斯大林传略》的缩写本。同年 12 月，为斯大林诞辰 75 周年举行了广泛的庆祝活动，《真理报》开辟了专栏，刊登纪念逝世领袖的文章，列宁图书馆举办了纪念性的展览，有的地方举行了群众集会，还颁发了“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在 1953 年 7 月会议以后，赫鲁晓夫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把大镇压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在 1955 年 6 月准备苏联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的文件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坚持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为此他们同莫洛托夫之间还发生过争论。

看来，只是在准备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经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思考和讨论，才把“非斯大林化”列为大会的主旨。根据档案：在 1955 年 11 月 5 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关于 12 月 21 日，即斯大林诞辰纪念日，赫鲁晓夫提出，只在报纸上刊登这个日期，不举行集会。卡冈诺维奇认为，应该在工厂里集会。伏罗希洛夫也说，如果不举行集会，人们将会反感。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不主张集会，理由是“要显示同以前的区别”，“不用束缚自己”。米高扬还提出：我们“有斯大林奖金，而列宁却没有。应该认真想一下，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卡冈诺维奇针对赫鲁晓夫反驳说：“从这一立场攻击我没有理由。我支持中央反

对个人崇拜的路线。我同你，赫鲁晓夫，没有差别。但有一些微小差异。没有反对你的斗争意图。我建议形成决议——怎样纪念斯大林的生日？”萨布罗夫说：“赫鲁晓夫提出的问题正确。”[①] 根据会议记录，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莫洛托夫这时正在日内瓦参加四国外长会议，马林科夫缺席的原因不详。这是代表大会之前在主席团内围绕斯大林问题发生的第一次争论。

大约就在这前后，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开始找一些恢复了名誉的知情人交谈大镇压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据现有资料可知：赫鲁晓夫找过 A. B. 斯涅戈夫，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早年在乌克兰作过赫鲁晓夫的领导，30 年代初，曾担任过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党的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同贝利亚共过事，也认识米高扬。1937 年、1939 年两度被捕，被监禁 15 年。1953 年审判贝利亚时把他从监禁地提出来作证。1954 年被召回莫斯科，得到平反并恢复党籍，被派到内务部作政委。米高扬同 O. Г. 沙图诺夫斯卡娅谈过话，她是 1916 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莫斯科做组织工作，赫鲁晓夫认识她，后来遭流放，1953 年被释放，恢复了党籍，分配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

这期间，米高扬曾单独向赫鲁晓夫报告过根据后者的指示由 Л. С. 邵武勉准备的联共（布）十七次代表大会大部分代表以及由他们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被镇压情况的调查资料。米高扬告诉赫鲁晓夫，将向主席团提出建议：建立有威望的委员会研究内务部、监察机关、最高法院全部文件以及仔细准备向代表大会报告关于镇压的全部案件。鉴于问题的重要，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组成（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及其他人）。赫鲁晓夫同意，但提出了一些修正：第一，我们的负担很重，实际上仔细研究所有问题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第二，这个委员会应由有威望的同志组成，但不应该包括同斯大林工作上很接近的政治局委员。他提出组织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П. Н. 波斯佩洛夫作为负责人的委员会的建议。尽管米高扬说，全部委托他不可能，因为他过去和现在都保留有很深的斯大林的情结，但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米高扬后来回

①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 – 1964，Том I，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с. 57.

忆说，赫鲁晓夫“想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想法，提在中央主席团会上讨论。”[1]

在1955年12月3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与平反有关的问题”时，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其成员包括阿里斯托夫、什维尔尼克、科马罗夫，“委托他们翻阅所有资料。”[2] 据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在后来的报告中说：主席团成立委员会的“宗旨是调查关于对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举出来的联共（布）中央绝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是如何完成的问题”。委员会还吸收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多布罗霍夫、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统计处负责人普列特涅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机关负责人卡里斯托夫和苏联检察机关的副军事总检察长捷列霍夫。[3]

会前，米高扬收到沙图诺夫斯卡娅给他的一封信。沙图诺夫斯卡娅在信中说，这封信是根据米高扬的请求，“再次阐述一下，有一次我曾经对您说过的事情”。她说，她从阿尔曼水产工业企业监狱医院医生基尔恰科夫、护士杜霞·特鲁尼娜那里得知，原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梅德韦季曾告诉他们，基洛夫被杀害以后，斯大林到列宁格勒亲自审问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当场交待，是国家政治保安局迫使他干的。尼古拉耶夫刚说完这些话，立即有几支纳甘手枪击打他的头部，他被拖了出去。[4] 赫鲁晓夫十分重视沙图诺夫斯卡娅提供的材料，决定在这次主席团会上宣读。布尔加宁还没有读完信，伏罗希洛夫就大喊起来——“撒谎!”，接着表达自己的看法：这说明契卡分子（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参与了谋杀的事实。莫洛托夫说：“事情牵连到老契卡人员”。但他订正说：“三个人一起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斯大林是当着我们的面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没有打他。”米高扬则说：“当事件发生时，斯大林被激怒了。契卡人员插手了这件事。”赫鲁晓夫说：“如果追查下去，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应该找来医生、司机和库普利亚诺夫。对司机进行审查。”别尔乌辛、萨布罗夫、

---

①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 – 1964 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4, с. 155.

②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 – 1964, Том I, с. 79.

③ АП РФ, ф. 3, оп. 24, д. 489, л. 89.

④ АПРФ, ф. 3, оп. 24, д. 446, л. 19 – 20.

基里琴科、马林科夫提议：审查雅戈达、叶若夫以及内务部列宁格勒管理局长梅德韦季审判的案件。[1]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成立后就对委托他们的事情全力以赴，不只审阅内务部、监察机关和最高法院的档案，而且由委员会成员、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指示地区安全部门向委员会报告 1937 ~ 1938 年地方的逮捕情况。地方上的镇压情况十分惊人，仅在切列亚宾斯克州这两年内就逮捕了 2.5 万人，其中 1.3 万多人受到最高惩处。这些逮捕有多少证据？在重新审查的 1943 个被控审判案件的侦讯档案中，当时只有两个人承认对他们指控的罪行是真实的。[2] 委员会不断向赫鲁晓夫报告对案件审阅的情况。

1 月份，赫鲁晓夫一方面主持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总结报告的修改稿和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发展指标，另一方面认真思考和筹划对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如何处理。1 月 20 日，他收到 A. B. 斯涅戈夫的来信说："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到十七次代表大会，我参加了所有的代表大会，由于你所知道的原因，我没有参加第十八和十九次代表大会。我请求发给我通用来宾票，使我能够出席二十次代表大会。"当天，赫鲁晓夫就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3] 之后，在会上出现了"邀请恢复了名誉的老布尔什维克出席大会"的抄件及包括沙图诺夫斯卡娅、斯涅戈夫和米尔恰科夫在内的 12 人名单。后来又增加一个人——第 13 个——首都一个区的前书记也是赫鲁晓夫以前的助手。赫鲁晓夫邀请这些人参加代表大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有助于对斯大林问题的讨论。1 月 30 日，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建议，做出了《关于被判刑人员和在监狱里服刑人员》的决议，成立了苏共中央的专门委员会，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的名义，前往各地的监狱，审理那些因政治性质和职务犯罪而被判刑的人员的案件，以便就地做出释放他们的决定。[4]

2 月 1 日，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行动，把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特别案件调查局副局长罗多斯叫到主席团会议上进行

---

①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 – 1964，Том Ⅰ，с. 79 – 80.

②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 – 1964 гг.，с. 156.

③ РГАНИ，ф. 1，оп. 2，д. 1，л. 44 – 45.

④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 – 1964，Том Ⅰ，с. 94.

审问。赫鲁晓夫要求他："讲一下波斯蒂舍夫、柯秀尔的情况，你们为什么宣布他们是敌人?"罗多斯回答说："这是上面的错误。对轻微刑事犯罪的人们，都是按照这种类型的案件追究责任的。斯大林有过错。"主席团会议的讨论由此转到大镇压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上。阿里斯托夫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呢?"赫鲁晓夫冒出了一句话："大概叶若夫也没有罪，一个老实人。"米高扬提起了1934年12月1日与恐怖活动作斗争的法令。波斯佩洛夫说："还规定了被逮捕人员的指标。"谢罗夫说："有这样的规定。"赫鲁晓夫提出，"也可能对报告要进行一些补充。""责成谢罗夫、鲁坚科和委员会调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以及贝奈斯在1936~1937年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集团给斯大林写的信。"这时，莫洛托夫提出："应该承认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米高扬立即反击莫洛托夫说："而你，莫洛托夫，曾支持他。"卡冈诺维奇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终究还是当了30年的领袖。"莫洛托夫接着又说："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我坚持这一点。"米高扬则说："就历史问题来说，简直令人发疯。"萨布罗夫也说："如果事实是准确的，难道这是共产主义？这是不应该得到宽恕的。"马林科夫没有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那样表示反对，他说："应该正确地看待事实。正确地提出问题。应该向党说明。"布尔加宁明确表示："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我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不同意伟大继承者的说法。"苏斯洛夫也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不能以任何理由宽恕这一点。不能再吹嘘了，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这样的形势下，伏罗希洛夫表示："党应该了解真相，但是，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要求来报告。应该考虑周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莫洛托夫又说："我同意伏罗希洛夫的观点。""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对不正确的事情应该进行衡量，可耻的事情也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能搞清楚。"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表述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了党的利益应该做出决定。斯大林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但是，他又宣布，"在代表大会

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应该制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①] 历史学家对赫鲁晓夫在波斯佩洛夫发言后所说的"也可能对报告要进行一些补充"，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报告"是指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因为"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时还没有提出来。这个理解有道理。那么，又怎么解释赫鲁晓夫在最后所说的"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的话呢？笔者认为，这前后两句话反映了赫鲁晓夫思想的变化。说前一句话时赫鲁晓夫还想在总结报告中作一些补充，而说后面一句话时，他已开始考虑应该另作一个报告，专门谈镇压等问题，所以在总结报告中就不谈恐怖问题了。

这一天，赫鲁晓夫向主席团散发了 A. B. 斯涅戈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演说草稿。这时距大会开幕还有近半个月时间，斯涅戈夫怎么就把自己的大会发言稿寄给了赫鲁晓夫？而后者为什么要把这篇发言稿发给主席团委员？斯涅戈夫在寄发言稿时附了一封给赫鲁晓夫的短信，其中说："正如您认为需要的那样，我把自己即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演说的草稿转呈给您，请您审阅。"原来这一演说稿是作者根据赫鲁晓夫的要求写的，内容主要是论述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之后所采取的方针的正确性和所取得的成就。发言稿引用了列宁的多段语录论述："在每一次重要的政治转折时期，列宁式政治活动家的责任在于：能勇敢的思考昨天，以及昨天的缺点和错误。""不怕正视现实，在党面前展示过去的错误和失败，并果断地、坚定的和顽强的着手改正它们。""有人认为，分析和揭露错误和失败，可能会被我们的国内外敌人所利用。这是不正确的。""最可怕的就是顽固地坚持错误、虚伪的羞于承认和改正错误。""应该与抓住昨天不放的那些人进行坚决的斗争。"[②] 显然，赫鲁晓夫是要利用这一演说稿来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施加压力，为在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的种种问题做思想准备。

从 2 月 3 日开始，斯大林的名字被从官方文件中取掉。这一天最高苏维埃授予伏罗希洛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

①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 – 1964, Том I, с. 95 – 97.

② РГАНИ, ф. 1, оп. 2, д. 15, л. 2 – 13,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с. 177 – 185.

其贺信中称伏罗希洛夫为“伟大列宁忠诚的学生、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杰出的活动家之一”，没有依照惯例提到斯大林。

2月9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长达70页的《苏共中央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报告》。这份报告限于国家在1935～1940年间进行镇压的情况，没有涉及20年代到30年代初对“社会异己分子”的镇压以及1940～1950年的镇压。报告说，在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的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而1937～1938年两年被逮捕的就有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962人。这两年镇压浪潮波及党务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以及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指挥人员。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被逮捕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城市和地区组织的领导干部。有的机关2/3领导干部遭到逮捕。十七大选举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1966名代表被逮捕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用了以下7个题目说明这期间的大镇压对苏联法律的粗暴践踏及其手段的残暴：①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开展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命令。报告指出：1937年年中，叶若夫下达了镇压带有民族特征，或以前在国外居住过，与外国有联系的没有任何罪行的人的命令；1937年7月25日，叶若夫签署在5天内逮捕所有德国公民，包括在军队和工厂工作的人；1937年7月30日签署命令，从8月5日起，镇压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原富农分子、反苏维埃分子和犯罪分子。命令成立三人小组，被逮捕人员划分两类，一类立即枪决，二类监禁8～10年。简化逮捕和审讯的方法，内务部机关首长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只按名单逮捕。被逮捕者包括：波兰人和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连斯基－列辛斯基、温什利赫特、奥尔斯基、普鲁赫尼亚克、贝斯特科夫斯基等；从中东路返回的所有苏联公民；朝鲜人和拉脱维亚人；住在苏联的外国职业革命家和兄弟党的领导人。到1938年9月10日，审理各民族和外国人227986人，枪决172830人，其他惩罚46912人，返回补充调查的只有5124人。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命令逮捕叛国者的妻子，以及15岁以上的子女，剥夺自由5～8年。②人为制造的反苏维埃组织、集团和各种中心。报告说，除了要求揭露哥萨克暴动组织、间谍分子和破坏分子集团以及波兰军事组织外，还制造了右倾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颠覆破坏分子和各种组织和中心。在

西伯利亚揭露了33个反苏维埃组织。凡揭露的这些组织都以当地党政领导为中心。基辅州揭露了87个暴动组织，365个破坏小组。内务部虚构了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局长扎科夫斯基要求被捕的老干部罗森布吕姆按照他的要求交待中心机构。该中心有4～5名领导人丘多夫、乌加洛夫、斯莫罗金、波泽金，每个分支机构2～3人。③关于在审判过程中对法治的粗暴践踏。报告揭露的践踏手法有，肉体惩罚和严刑拷打，极其消耗体力的连续数小时的审讯、恐吓和诱供。强逼出来的供词不进行调查。三人小组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做出判决。审讯记录是被告不在场的情况下制造的。在这部分列举了波斯特舍夫、柯秀尔、艾赫、鲁祖塔克、邱巴尔、叶夫多基莫夫、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温施利希特、布柳赫尔、科马罗夫等10个重要领导人的冤案。④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的“阴谋”。报告说，由于内务部机关人员不够，就调来其他部门的党员，这些人对非法行为感到气愤，结果遭逮捕，叶若夫承认，逮捕了1.4万名契卡人员。内务部管理局长绝大多数遭逮捕，边疆区和州的管理局干部2/3遭逮捕。绝大多数被指责参加右倾托洛茨基集团和内务部内部的阴谋活动。⑤在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工作方面检察机关对苏维埃法制的破坏。报告指出，检察机关纵容并直接参与破坏法制。检察院只在审讯材料上盖章，确认起诉书和向法院寄发卷宗材料。苏联副检察长罗金斯基在被告没有按刑法典58—8条提出指控的情况下也把这条罪状写进起诉书。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在一天之内就制造出几百份死亡判决书。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司法专横。报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案件交给军事法庭时提前规定了惩罚措施。叶若夫1937～1938年给斯大林提交了383份名单，共涉及44465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事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其中绝大部分被枪毙。军事法庭根本不审理，开庭只用15～29分钟就判决了。对军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梅日劳克、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乌克兰中央书记波波夫、苏共中央副部长斯捷茨基等许多人都在20分钟内宣判。⑦关于非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报告揭露，1938年11月之前绝大多数囚犯由内务部管理局三人小组判罪。后来便由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组成的两人小组判罪，1937年12月29日一天他们两人就审理1000名囚犯名单，判处992名死刑。1938年1月10日两人审理了1667人的名单，1月14日1569人，1月15日1884人，1月16日

1286人，1月21日2164人。内务部一个原负责人沙皮罗交待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名单都是由采萨尔斯基和米纳耶夫准备的。一个晚上审理200～300份材料，实际上只盖章而已。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或弗里诺夫斯基、检察院领导人维辛斯基或罗金斯基对这些文件不作任何核查，就在上面签字。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认为，以下两个文件对大规模镇压起了决定作用：基洛夫被暗杀后，1934年1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为普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开辟了可能性；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直接推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普遍逮捕和枪决的行动。同时，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会议上提出的与“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和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断为普遍镇压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937年被枪决的人数与1936年相比，几乎扩大了3倍。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在1935～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镇压。1937年大规模镇压的是党和苏维埃干部。报告说：“病态怀疑的心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在党组织中撒下了相互不信任的种子。”对囚犯采取肉体惩罚是以斯大林的名义批准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中央委员会，作为集体机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影响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仅仅是为了讨好一个人。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①

主席团当天讨论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赫鲁晓夫说：“揭露的情况表明，斯大林已经无法再作为一名领袖了。如果所有的人他都想消灭的话，他还算什么领袖呢？应该有勇气说明真相。意见是：一定要向党的代表大会说明，需要考虑的是应该怎样说明，由谁说明？如果不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对党的代表大会不诚实了。也可能，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说明一切。理由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集中在不诚实的人手中。在什么地方说？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对于赫鲁晓夫的建议，莫洛托夫表示：“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说。同时不仅仅说这些内容。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

① АПРФ，ф.3，оп.24，д.489，л.23－91．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74～215页。

化。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谈论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说：“历史是无法欺骗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赫鲁晓夫的建议是正确的，报告是要听取的。”但他又说：“我赞成莫洛托夫的意见，要冷静行事。报告最好从政治角度去起草，不能使30年代历史含糊不清。”伏罗希洛夫认为，“应该做更充分的准备”，“任何闪失都将招致不好的后果”。他们三位虽同意在代表大会上说明情况，但是要求全面评价斯大林。而其他人则持不同的态度。布尔加宁认为，赫鲁晓夫的意见正确。“党员们已经看到，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起了变化。如果不向代表大会说明的话，人们将会说我们胆怯。应该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说明斯大林与党的关系。”米高扬说：“我们不能不向代表大会说明。在1934年以前，表现坚决果断，而在1934年以后，暴露了许多可怕的东西。篡夺了政权，把一切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别尔乌辛说：“在报告里，不要求谈正面的东西。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害。篡夺了政权，取缔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枪毙干部使我们在重工业方面已经丧失了速度。”马林科夫同意向代表大会说明情况，但他显然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体验到一种欣慰——我们替同志们辩护了。不说明斯大林的作用，就不能为同志辩护。”阿里斯托夫表示不赞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谈话里出现的“不应该说”。他说：“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所有人热衷的是讨好斯大林。党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①]

赫鲁晓夫最后作结论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应该进行说明，这一点已经没有了分歧。存在细微的差别，需要考虑。我们大家都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然而这不应该束缚我们。不应该无所作为，也不应该犹豫不决。应该彻底的揭露所谓的个人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应该作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另做一个说明斯大林时期大镇压情况的报告，将由谁来做报告——应该思考。”会议最后做出两项决定：①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①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c. 99－103. 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18～221页。

有关的问题。②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全体书记分发未发表的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以及《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件，并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介绍这些文件。[①]

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报告的决定是在2月13日主席团会上做出的。这已是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会上讨论了大会的一系列组织问题。在会议记录中“关于（个人崇拜）”报告人问题的议题下，列了米高扬、苏斯洛夫、别尔乌辛、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基里琴科、莫洛托夫、波诺马连科和波斯佩洛夫的名字，没有发言内容，接着就是“通过由赫鲁晓夫作报告”。[②] 关于报告人的确定，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应当由谁来作报告？我建议由波斯佩洛夫来做。理由是他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是委员会主任，我们大家正用着的报告就是他起草的。因此他无需准备：他可以把这份报告改成大会报告，在大会上一念就行了。其他人纷纷表示反对，建议报告由我来作。我感到难为情：我在总结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接着再作第二个报告？我推辞了。然而他们反驳我说：‘要是现在不由你来做，让也是中央书记之一的波斯佩洛夫同志来做，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字未提，波斯佩洛夫却在发言中谈到这么重要的问题。赫鲁晓夫不会不知道或者说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说，也许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波斯佩洛夫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论据占了上风，于是我就同意了。决定由我来就此作报告。”[③] 赫鲁晓夫所说的也许是这次会上的讨论情况，但无记录可查。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上次主席团会议已决定中央全会（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在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央委员们已经集合在会议厅里等候，所以没有怎么讨论就做出了决定。[④]

2月13日做出了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上作“关于个人崇

---

① 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21页。

②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 – 1964，Том I，с. 195. 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22页。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第1152页。

④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 – 1964 гг.，с. 156.

拜”的报告。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也报告了这一决定。他告诉与会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死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对一些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感到并认为有必要在非公开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主席团决定由我、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作这个报告。”他还问与会者：“有没有反对意见?”与会者高喊：“没有!”[①] 但是，直到这时还没有报告的文本。由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稿直到2月18日才写完。这个报告稿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为基础，增加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谴责个人崇拜、用列宁的“政治遗嘱”批评斯大林的内容。报告稿指出：“约·维·斯大林的怀疑心到了病态地步”，“导致出现大灾难，导致在1937~1938年对许多无辜的人进行大规模镇压，导致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犯罪团伙制造‘列宁格勒案’，导致产生屈辱的‘医生谋杀案’”。这份报告稿详细讲述了联共(布)十七大代表的命运，列举了30年代对一系列党和国务活动家进行镇压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实。但是报告稿小心翼翼地回避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所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把所有罪责推到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摆脱了党的监督”。此外，报告稿没有涉及1940年的镇压，没有对40年代到50年代发生的事件提出看法和评论。[②]

赫鲁晓夫看了这个报告稿感到不满意，2月19日把一名女速记员叫到他那里去，亲自口授了他自己的报告稿方案。赫鲁晓夫强调了一些方面，改变了按先后顺序叙述的方式和构思框架。他首先回答了一个必然会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专横听之任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一点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不是通过说服和做细致的工作……而是采用压服、强加于人和要求别人采纳他的意见的方式，如果谁表示反对或者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谁就可能被清除出领导集体，并随后被立即消灭。”赫鲁晓夫援引了波斯佩洛夫起草的报告稿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话指出：“我党进行的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残酷而有益的斗争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

① 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150页。

②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151页。

到值得肯定的作用。”但是，赫鲁晓夫对党内斗争方法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他回忆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过尖锐批评，但是十月革命后仍然让他们当了政治领导人。赫鲁晓夫说：“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周围也有不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人……他们中许多人积极参加过革命和巩固革命成果，为什么非要把他们消灭？我相信，如果列宁还活着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补充了战后的列宁格勒案、医生谋杀案、米格列尔案，同样把这些案件的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他说：“医生谋杀案，这可能吗？这不是医生谋杀案，而是斯大林制造的案件，因为根本就没有医生谋杀案。”赫鲁晓夫认为，评价斯大林在战争和战后事件中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他给战争年代的斯大林画了一幅丑恶的肖像画。他认为，战争初期，斯大林看来毫无领导军队和国家的能力，整整一年没有签署命令。赫鲁晓夫问道：“这一段时间总司令在何处呢？他胆怯了，害怕了。我们国家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这是斯大林领导无力的结果。”赫鲁晓夫强调说：“老实说，我和其他同志从战争一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负责任的，我们承担了战争的重负，我们当然知道斯大林在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不是斯大林的作用，而是我们党发挥了作用，是党培养的人发挥了作用。”他把战争毫无准备的责任推到了斯大林身上。说到哈尔科夫战役，赫鲁晓夫回忆说：“我把电话打到斯大林的别墅，但是接电话的不是斯大林，而是马林科夫。我对马林科夫说，我想向斯大林本人报告，斯大林让马林科夫告诉我，让我对马林科夫讲。我再次请求说，我想给斯大林报告严重局势……斯大林居然不移大驾接电话……还是让我同马林科夫讲。”这样，赫鲁晓夫实际上把部分责任也推到马林科夫身上。赫鲁晓夫在口授中列举一些事实时常常即兴发挥，流露出对不久前的过去惶恐不安，对斯大林诚惶诚恐，对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苏联领导人相互角逐的局面心有余悸。赫鲁晓夫往往一个问题还没有说完又说起另一个问题，常常不按先后顺序讲述。但是赫鲁晓夫有自己的逻辑，那就是尽量把往昔所有不好的东西的责任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从而恢复共产党的威信，恢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誉。[1] 赫鲁晓夫的

① 关于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的介绍参见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151～153页。

口授稿和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稿成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基础。至于这两份稿子是怎样变成赫鲁晓夫正式报告稿的，没有找到直接证明。有一种说法：在宣读“秘密报告”的前两天，赫鲁晓夫曾经和谢皮洛夫一起对他的口述报告稿进行了加工。①

按照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上届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和书记处就失去全权，这个时间发生的所有问题应当或者由大会解决，或者由大会主席团解决。但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一规则，2 月 22 日又召开了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召开来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问题，同时审查了宣读“秘密报告”的一些问题，决定报告的宣读在选举之后的秘密会议上进行。可能赫鲁晓夫当时做了一个让步，保证不翻腾 1936 ~ 1938 年公开审判的案件。当时还通过了一个决定：莫洛托夫在 1957 年的中央全会上回忆说，在二十大，我们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决定不就这个问题讲话。②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2 月 25 日上午，苏共二十大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代表们只能凭特别请柬与会。没有邀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却邀请了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布尔加宁宣布由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从形式上看，这项内容似乎是追加的，实际上是经过了精心的安排。用俄罗斯史学家皮霍亚的话说，就“非斯大林化”的宗旨而言，秘密报告是“最高潮”。

这个报告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不同看法和评论。中国共产党在后来与苏共展开大论战时，将这个秘密报告的性质概括为：“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③ 直到现在，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仍然重复着这些看法，甚至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作导致苏联垮台的重要起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已成为一份历史资料，要比较客观地、历史地评论这一报告，首先应该知道赫鲁晓夫到底

---

①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 ~ 1991）》，第 154 页。
②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 183 页。
③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第 57 页。

讲了些什么。

赫鲁晓夫在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斯大林去世后，党的中央委员会严格地、一贯地执行这样的方针：绝不容许那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对个人的吹捧，绝不容许把他变成像神灵一样的具有超自然品质的某种超人，这个人俨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举一动永远正确。"① 报告点明，许多年来，关于斯大林就灌输这种概念。接着，赫鲁晓夫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有关斯大林的功绩，早在他生前即有人撰写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尽人皆知。人人都清楚。现在要说的是对于党的今天和明天都有着巨大意义的问题，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在一定阶段成了对于党的原则、党内民主、革命法制的许多极其严重的巨大的歪曲的根源。""鉴于并非人人都清楚个人崇拜在实际生活中曾引起了怎样的后果……已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汇报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在阐明了报告的宗旨和任务后，报告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段语录以及列宁关于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的论述，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严厉谴责个人崇拜的表现的"。报告特别引出列宁1922年12月给下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评论斯大林的两段话，以及克鲁普斯卡娅因斯大林对她粗暴无礼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就此事给斯大林最后通牒式的信，说明列宁生前就对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等缺点十分"担心"，并希望把他调离这个岗位。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身上的缺点在列宁生前尚处于萌芽状态，近年来即发展成为斯大林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这给我们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些说法表

① 苏联官方当时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是当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本子。直到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才根据苏共档案中的稿子予以公布。据公布者说，当时没有速记记录，所公布的是根据赫鲁晓夫1956年3月1日提供给主席团的修订本。这里所用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附录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56年2月25日）》。文中引文较多，不一一注明页码。

明，赫鲁晓夫的报告并不是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而是集中论述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对斯大林的批判是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录，是以他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为依据。

赫鲁晓夫指出，列宁历来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和意义，指出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的重大责任，号召严格遵守党内的一切生活准则，实行集体领导。他说，革命后，在十分严峻和困难的条件下列宁一直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党的中央委员会，一切重大问题都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解决，从不搞独断专行。在列宁刚去世的那几年，斯大林还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后来就愈来愈滥用权力，这些原则就受到粗暴的违反。从十八大到十九大 13 年不召开党代会，"中央全会几乎没有开过"。"对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 1934 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更是暴露无遗"。赫鲁晓夫还强调，列宁在对人的处理、进行干部工作中的"英明"，对人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善于通过整个集体从坚持思想原则立场出发对人施加影响，而不是通过强制的办法率领人们前进，即使对犯了错误的人也主张宽容和有耐心。他说："斯大林则同列宁这些特点格格不入"，"抛弃了列宁的说服教育方法，从思想斗争的立场转而走向行政压制的道路、大规模镇压的道路、恐怖的道路"。对于斯大林的功绩，除了在说明主题时作的明确表述外，他还特别肯定了斯大林在 20 年代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派、资产阶民族主义者斗争中的"积极的作用"。他说：这是"党同自己队伍中那些反对列宁主义的原理的人、同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重大政治斗争。这是一场顽强、艰苦却必不可少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他说，如果没有这场斗争，"我们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的包围面前解除武装，束手无策。"这就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既不否定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否定斯大林在 20 年代进行的党内斗争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否定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和路线。

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确实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鲜为人知的、使人触目惊心的错误事实，甚至可以称为"罪行"。

报告的第二部分主要揭露1934年以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镇压情况，说明“个人崇拜给党的利益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不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镇压情况的揭露作了严格限制：时间限于1934年以后，范围只涉及对党内的干部的迫害和镇压。他指责说，当时“社会主义已在我国基本胜利，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苏联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党派、政治派别和团体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党在思想上的敌人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斯大林却提出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对那些没有犯下反党反苏罪行的人进行镇压，使“许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杰出活动家和普通工作人员成了斯大林专横的受害者。”赫鲁晓夫甚至批评了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的镇压。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许多足以证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粗暴的恣意妄为的事实，成立中央主席团下设的党的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给自己加上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报告引用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超过一半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70%被镇压的数字后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完全不可思议“会选举产生一个大多数为敌人的中央委员会”。“当选大会代表的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建设者，其中许多人曾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和内战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忘我的斗争，他们勇敢地同敌人搏斗，不止一次的视死如归，面不改色。怎么能够相信这样一些人竟然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已经被粉碎、社会主义也已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充当起两面派，投入社会主义敌人阵营呢?”报告说：“这是斯大林滥用权力的结果，他开始对党的干部搞大规模的恐怖。”赫鲁晓夫解释，为什么在党的十七大之后，针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变本加厉了呢？“因为斯大林当时已经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他已经根本不把中央委员会和党放在眼里了。”斯大林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其他人只能起统计员的作用。赫鲁晓夫重述了波斯佩洛夫报告中指出的发动大规模镇压的三个文件，证明大规模镇压应

由斯大林负责。

赫鲁晓夫特别提出对谋杀基洛夫的案件的怀疑。他说，“应当说，同基洛夫同志遇刺有关的情况中，至今仍有许多令人费解和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进行最仔细的调查。有理由认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经受到负责保护基洛夫安全的人员中什么人的帮助。在刺杀的一个半月以前，尼古拉耶夫曾因为可疑而被捕，但是放掉了，甚至没有对他进行搜查。最令人生疑的是，1934 年 12 月 2 日基洛夫的贴身警卫被带去审问时，却因‘车祸’死亡，而陪同人员无一人受伤。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均被撤职和受到很轻的处罚，却在 1937 年被处决了。不妨认为，处决他们是为了销毁策划刺杀基洛夫的罪证。”赫鲁晓夫还举出了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在遭诬陷和残酷折磨中给斯大林的申诉信，原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鲁祖塔克在军事法庭上的无罪申述，以及罗森布吕姆在法庭上揭露内务部审判官员用严刑拷打迫使他炮制列宁格勒暗害总部等案件的过程，指责斯大林不仅不同他们谈话，也不改变这些案子。报告揭露，当时形成了一种恶劣的做法，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其案件由军事法庭审理的人员名单，事先就定好了这些人判刑轻重。报告说，1937～1938 年斯大林收到 383 份名单，涉及成千上万人，全都得到他的批准。赫鲁晓夫说，大规模镇压对党的政治与道德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助长了病态的疑神疑鬼心理蔓延，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根本不顾忌什么党纪和苏维埃法律的准则。使用肉刑，通过拷打，让犯人失去知觉，丧失理智，丧失尊严，提供假供词。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一切都任凭一个人恣意妄为。

报告的第三部分揭露“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导致了卫国战争过程中特别严重的后果”。赫鲁晓夫批评许多小说和学术著作把斯大林描写为“料事如神”，说“苏军几乎是按照斯大林事先拟定的战略计划使用了所谓的‘积极防御’策略”，“把德军放进来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才转入进攻并打败敌人”，从而把苏联军队和人民取得的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全都归功于斯大林的统帅天才”。报告批驳了苏联在战争初期的悲惨遭遇是所谓德国对苏联袭击的“突然性”结果的论点，指出斯大林不相信、不理睬战争爆发前丘吉尔、苏联外交官和军方提出的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许多警告，“并未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使全国做好防御准

备并排除突然袭击的因素”。他说，战争初期就暴露出军队装备很差，缺少反击敌军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火炮、坦克和飞机。敌人入侵苏联领土时，无论换下来的旧武器还是打算采用的新武器都不够，高射炮的情况很糟，没有安排打坦克的穿甲弹的生产。许多筑垒区旧武器换下来了，新武器还没有装上，连应召服现役的军人使用的步枪都不够。赫鲁晓夫说：“说到这里，不能不提起下面这件事。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久，当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向布格河畔开进，正加紧进攻准备。他建议在边境构筑牢固防御阵地，迁出30万居民，建立几个强大的筑垒带，挖反坦克壕沟、修战士的掩体等等。莫斯科回答说：这是挑衅，不必给德国人提供向我们开始军事行动的口实。”赫鲁晓夫说，甚至法西斯军队已经开始进攻以后，莫斯科还下令不要还击。“这种粗心大意，这种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的置若罔闻”，导致“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和头几天，敌军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大量飞机、火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大量我军干部，打乱了军队的指挥系统，使我们无法阻止敌军进入我国腹地”。报告还批评斯大林1937～1941年根据诬陷材料，除掉了为数众多的军队指挥干部和政工人员，致使战争初期缺少合格的指挥官。赫鲁晓夫说：“我国在战争初期面临可怕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斯大林对国家和党的错误领导方法造成的。”不然，“我们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的伤亡就会少得多。”报告还批评：“斯大林在干预军事作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过敏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损失惨重。”赫鲁晓夫重述了口授报告稿中1942年红军在哈尔科夫地区遭受失败损失几十万军队的情况，说“这是斯大林坚持错误作战计划造成的。”赫鲁晓夫甚至指责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战争”。报告还批评说，从1941年底开始，斯大林就不再采取从敌人两翼迂回到敌人背后的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术，而是要求不断地正面进攻，以夺取一个又一个村庄。我们因此伤亡很大。报告还指责，斯大林有意贬低甚至诬蔑朱可夫等著名指挥人员。赫鲁晓夫批评电影《攻克柏林》，说里面只有斯大林一人活动，“斯大林顶了所有的人”。报告下结论说：“保证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是我们英雄的军队，我军天才的统帅和勇敢的士兵，是全体苏联人民。”

报告的第四部分是讲斯大林粗暴地践踏列宁民族政策，战后制造列宁

格勒等案件，以及在与南斯拉夫关系上的错误行为。报告说，当卫国战争在各条战线上都出现有利于苏联的转折时，斯大林却强迫一些民族大规模迁离自己的家园。1943年末，将全体卡拉恰耶夫人从居住地强制迁出。12月末，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也遭此厄运。1944年3月，全体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强制迁离家园，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不复存在。1944年4月，全体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强制迁往遥远的地方。赫鲁晓夫说："乌克兰人免遭这场厄运，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无处可迁。否则斯大林连他们也要强制迁出的。"他说："怎么能够把个别人或者个别集团的敌对行为的责任推到整个民族身上，连妇女、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放过，使他们遭受大规模的迫害、困苦和磨难呢？"接着，赫鲁晓夫讲到使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昂诺夫、波普科夫等遇害的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现已查明，这是一起假案"。他说，战后"斯大林变得更加任性、更爱发火、更加粗暴了，他的猜疑心变得尤其严重，迫害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列宁格勒案件是斯大林对党的干部恣意妄为的结果"。赫鲁晓夫解释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贝利亚加以巧妙利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全部情况"。赫鲁晓夫还讲了米格列尔民族主义案件。他说："格鲁吉亚不曾有过任何民族主义组织，数以千计清白无辜的苏联人成了牺牲品。"报告人又转到"医生谋杀案"说："其实什么案件也谈不上"，斯大林仅凭季马舒克的一封信，"就得出苏联有从事暗害活动的医生的结论，下令逮捕医学界一批著名的专家"。他说：斯大林亲自指示怎样进行审查，怎样审问犯人，给犯人戴上镣铐，进行拷打。他还揭露，斯大林对原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说："你如果弄不到医生的口供，就要你脑袋。"赫鲁晓夫认为，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贝利亚起了卑劣的作用。他说，早在1937年，卫生部长卡明斯基就揭露贝利亚曾替木沙瓦特间谍机构卖过命。因为斯大林相信贝利亚，卡明斯基因而丧命。赫鲁晓夫又举出斯涅戈夫给党中央关于贝利亚迫害外高加索党委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信，说在1931年斯大林要让贝利亚担任外高加索第二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不同意，后者因此而受到迫害，并说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可以证明。他还讲了贝利亚迫害凯德罗夫的过程，尽管军事法庭根据凯德罗夫的申诉已宣告其无罪，贝利亚还是枪决了他。赫鲁晓夫还揭露，贝利亚曾迫害奥尔忠尼启则兄

弟。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的恣意妄为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内部发生的问题解决上面，而且在苏联的国际关系领域也有所表现。在“南斯拉夫事件”中，“斯大林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赫鲁晓夫说：“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斯大林就南斯拉夫问题对我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消失。”

报告的第五部分揭露说：“个人崇拜能够有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斯大林千方百计的鼓励和支持对他的个人颂扬。”赫鲁晓夫举出了斯大林亲手写进《斯大林传略》一书中的7段自我吹嘘的文字。比如，对列宁之后自己的活动自我评价说：“在这场同不坚定分子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同布哈林一伙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列宁去世后我党的领导核心……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使党团结在列宁遗训的周围并带领苏联人民走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在这本书的样本中原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斯大林觉得这句话不够有力，便亲自改成：“斯大林是列宁事业当之无愧的继承人，或者照我们党内的说法，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在书中特别加上了论述自己军事天才的文字：“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阐明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规律、关于现代条件下各兵种和武器协同作战、关于坦克集群和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关于作为最强有力的兵种的炮兵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天才的斯大林都能做出完全估计到形势特点的正确决定。”“无论在防御还是在进攻中都表现出斯大林的作战艺术。斯大林同志以天才的洞察力识破了敌人的计划，并予以反击。在斯大林同志指挥苏军的战役中，无不体现了军事作战艺术的光辉典范。”报告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党中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编写的，《斯大林传略》的原稿中写道：“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在他亲自直接参与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觉得不满意，在出版时就改成：“1938年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该书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的赞同。”赫鲁晓夫说，这本书把党的一切活动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报告人问道：“难道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来写自己，可以把对自己个

人崇拜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吗？”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列宁不尊重，把一切都说成是斯大林起了主要作用。赫鲁晓夫还批评，斯大林亲自批准以自己的名字为大企业和城市命名，特别指出，斯大林于1951年7月2日亲自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伏尔加—顿河上建造斯大林纪念塑像的决定。

报告的第六部分指责：“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工作中错误方法的泛滥，导致了对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粗暴践踏，导致了单纯行政命令、各种畸形现象、对缺点的掩盖和对现实的粉饰。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阿谀奉承者、好吹捧者和骗子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几十年如一日，从不外出，只有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的情况。凡是稍微关心国内情况的人都看到了农业的严峻形势，斯大林却毫无觉察。“他仅仅从电影上去研究国内和农业情况。”他特别指责，斯大林1953年建议向集体农庄庄员加征400亿卢布税款。赫鲁晓夫说：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向国家交售的全部产品才得到262.8亿卢布。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七部分说：“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要归功于党及其为数众多的地方组织的组织工作，归功于我国伟大人民的忘我劳动。”“决非如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所试图描绘的那样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结果。”他说：“斯大林晚年所形成的领导实践已成为苏联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接下来他又转变话题说：“有些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初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站出来反对个人崇拜，直到最近才这样做？”赫鲁晓夫解释说：“首先应该考虑到，政治局委员对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最初他们许多人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一……可是后来，斯大林愈来愈滥用权力，开始迫害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正直的苏联人。”那时“试图站出来反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指控的做法，只会使反对者惨遭迫害”。为了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赫鲁晓夫举出布尔加宁一次在汽车里对他说的话：“有时候去见斯大林，他把你当成朋友叫去，你在斯大林那里坐着，却不知道过后会把你送到哪里去：是回你家还是进监狱。”赫鲁晓夫辩解说：“这种气氛使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都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他又说，斯大林晚年用各种小组代替政治局，许多事情不经政治局讨论。斯大林荒唐地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奸细，多年来伏罗希洛

夫事实上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权利。安德烈耶夫也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斯大林有一套整治老政治局委员的计划。十九大以后成立了由25名委员组成的主席团，目的就是要搞掉老政治局委员。在十九大以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斯大林在讲话中就给莫洛托夫、米高扬作了鉴定，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断言："不排除这种可能：假如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多待几个月，那么本次代表大会就不会有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发言了。"

在报告的第八部分提出了克服个人崇拜的几项措施：第一，从思想理论上根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第二，坚持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遵守党的生活准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恢复苏联宪法中体现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告诉与会者："我们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泄露到党外，更不能上报纸。"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讲了将近5个小时。一位与会者回忆道："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坐椅的嘎吱声，没有咳嗽声，更没有窃窃私语声。大家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吭声——或许是因为意外，或许是出于惊慌和恐惧。所有人都深感震惊。"[①] 报告结束后没有热烈的掌声，克里姆林宫的报告大厅里只有寥寥的掌声响起。赫鲁晓夫讲完以后，主持会的布尔加宁建议不要对报告进行讨论，也不要提问题。接着，根据布尔加宁的提议通过了如下决议："听取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赞成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论点，并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继续采取措施，确保完全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消除其在党务、国务和思想工作的一切领域里所造成的后果，严格执行党的生活准则和由伟大列宁制定的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最后，布尔加宁强调："目前还不能公布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但是，这些材料将寄发给各级党组织。"[②]

应当怎样看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怎样看待他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

① 亚历山大·多布罗沃利斯基：《震惊世界的代表大会》，2006年2月22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

② РГАНИ, ф. 1, оп. 2. д. 17, л. 89－90. 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27页。

与批判呢？

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的亲信，是斯大林领导圈子的人，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问题不向大会代表做出说明和交待，作为后继者就得不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就站不住脚。只有以斯大林为戒，避免重蹈覆辙，才能提高自己的威信，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一般都是后一个朝代编修前一个朝代的历史，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汲取前朝衰落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新王朝代替旧王朝的理由，从而树立新王朝的权威。在实行领袖政治的苏联，却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列宁和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袖都是在激烈的争夺和斗争中产生。列宁领导党和国家的时间比较短，苏联的社会主义处于开创阶段，他去世后，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竞相发表演说和论著来阐释列宁的理论和策略，以表示自己对列宁事业的忠贞。最后，斯大林以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与路线战胜了其他领导人，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达30年，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国防力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大量的严重问题。斯大林之后，他的继承者则竞相批判斯大林，清理斯大林时期的各种案件，以表示他们与斯大林之不同。赫鲁晓夫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先搞掉着手清理斯大林政治案件的贝利亚，接着又解除了最先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然后才把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同斯大林时期的大镇压等问题统一在一个题目下，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虽然上面说到的这两种情况在性质和表现方法上不一样，但目的却有相似之处。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惊世骇俗的行动首先是出于维护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立和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的需要。

要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做出客观公允的评论，就要对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和材料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核实。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的事实和材料大体上来自几个方面：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报告；一些知情者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赫鲁晓夫及其亲近者的亲身感受。报告中确实有未经核实的事实，如关于对基洛夫谋杀案的怀疑与推测；也有明显带着主观情绪的地方，如说斯大林按照地球仪指挥战争、依靠电影指导农业等；也有为自己进行辩解的说词，如关于哈尔科夫战役失利原因的解释等。不过，经过苏联共产党对有关案件的复

查，包括二十大以后继续审理各种案件，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大镇压的复查，以及学者对斯大林时代历史的研究（包括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填补历史空白点），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根据档案进行核对，证明赫鲁晓夫的报告揭出的事实大部分有根据，完全没有根据的很少。而且，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出的事实只是斯大林时期实际存在的一部分。大镇压是赫鲁晓夫揭露的头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已报告了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和处决的总人数、1937～1938两年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数，赫鲁晓夫报告并没有引用这些数字，只讲了1934年以后对党的干部的镇压，举出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遭到镇压的数字。十七大一半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70%遭到镇压，这个数字确实惊人，但同1935～1940年镇压总人数比较，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根据戈尔巴乔夫时期对30～40年代及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复查证明，实际镇压的人数要比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的数字更大。苏共中央政治局1988年12月25日的《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说："现已重新审查了涉及1586104人的1002617件具有镇压性质的刑事案件。根据这些案件1354902人获得平反，其中包括非执法机关案件的1182825人。""研究国家安全机关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尚未重新审理的有1575958件，涉及2192130人，其中非执法机关受理的738866件，判处1097293人（其中枪决395125人）。"报告说："所有非法院判决的受害者将自动恢复名誉。"① 这个报告既说明了斯大林时期镇压的巨大规模，也说明镇压严重的非法性。赫鲁晓夫报告没有涉及大镇压总人数，也没谈到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以工业党、劳动农民党等名义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镇压，也没谈到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对广大农民的残酷镇压。据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核实，1929～1933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被划为富农的51.9万人，追究刑

① 《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624～635页。

事责任；1930～1931年间将356500农户、总人数168万人从苏联欧洲部分强制迁往北部地区和西伯利亚。[1] 事实表明，对斯大林时期的大恐怖、大镇压决不能用“肃反扩大化”给以简单化的概括。关于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种种错误，是按照赫鲁晓夫自己的思路加进去的，是赫鲁晓夫揭露的第二个大问题。而就在这一部分讲到战前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镇压时只是笼统一提，并没有涉及镇压的具体情况。实际上那次镇压对苏联红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具有摧毁性，30年代的5位元帅3人被枪杀，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15人被枪杀，67名军长中60人被枪杀，199名师长中136人被枪杀，4名海军高级将领全被枪杀，6名海军上将全被枪杀，15名海军中将9名被枪杀。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副政委及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名牺牲。这一镇压与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有直接关系。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赫鲁晓夫也只是说，如果没有那些错误苏联在战争中的牺牲会少得多，并没有指明苏联损失了多少人。在赫鲁晓夫时期，已经知道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共牺牲了2100万人（斯大林时期宣布苏联战争中死亡700万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数字增加到2700万。相比之下，德国在那次战争中总共死亡600万人，胜利者比战败者牺牲的人数要多好几倍。这就涉及关于评价战争胜否的标准问题，从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战争基本原则来说，斯大林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的代价不是太惨重了么?! 关于战争后期强迫迁徙少数民族问题，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提到5个民族，而实际上全体被迫迁徙的有13个民族，如果包括部分迁徙的在内，则涉及23个民族。所以，斯大林的错误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他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比拟的。如果不深入研究事实，不顾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仅仅以“功大于过”、“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等概念进行评论，难免曲解问题的本质。

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并不违背共产党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律原则和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要求。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严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赫鲁晓夫不站出来进行揭露，以后还会有其他人起来揭露。作为历史学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如

[1]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26页。

果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往赫鲁晓夫身上推，就太缺乏历史意识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这一行动包含着很大的潜在的积极的启迪意义。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赫鲁晓夫第一次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史，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予以揭露与批判，这就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我们知道，在此之前，苏联官方的舆论工具一直给人民灌输这样的观念：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苏联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事业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同时还宣传，党的领袖代表和体现着党的意志，是真理的化身。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被尊崇为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尤其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和宣传，把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说成唯一正确的理论，把斯大林在特殊的条件下为苏联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路。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一切敌人，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不仅斯大林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经赫鲁晓夫对苏联实际存在的严重负面现象这么一揭露，不仅破除了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也使人们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比较实际的认识。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推动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探索符合本国情况的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报告不可否定的启迪意义。

不可否认，赫鲁晓夫的报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问题。他把斯大林的错误概括为“滥用权力”、“专横暴虐”、“恣意妄为”，“践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苏维埃法制”，把它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并没有认真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仅仅把造成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的个性和“病态的疑神疑鬼”、“迫害狂”心理以及“自大狂”、“不容异见”、“贪权”、“残暴”等不良品质。而且他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加以巧妙地利用。”人的性格、品德、心

理状态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会影响大人物做出的决策和选择。但是，有这些缺点和毛病的斯大林怎么就做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什么就接受他并容忍他的执政达30年？这里当然既有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在俄国历史上不只产生一个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俄罗斯人崇拜皇权，追求大俄罗斯的强国主义，他们迷信超凡脱俗的个人，缺乏个体的主体意识，缺乏民主的素养。这乃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从社会制度上说，布尔什维克在建党初期就放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原则，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集中主义的原则，党的领袖就是党的意志和权威的体现。斯大林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后，党和国家制度进一步极权化，斯大林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是在这样基础上形成的。

赫鲁晓夫在口授报告稿和做秘密报告的时候，极力想解释清楚：政治局委员们为什么没有阻止斯大林错误的发生？但是，他解释得很蹩脚、很费力，因为在他的头脑中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门槛，那就是既要批判斯大林，又不能触动党和国家的制度，还要为政治局委员、为他自己开脱和辩护，所以只能千方百计地把一切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推到贝利亚身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欲盖弥彰。有句名言说得好：德国皇帝的不好，要在德国臣民身上找原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崇拜者有责任，崇拜者也有责任。斯大林时代发生的这一切严重错误和罪行，斯大林要负主要责任，但领导集团的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当年他们唯斯大林之命是从，不仅积极拥护，而且竭力颂扬，他们实际上都是斯大林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在上面提到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关于大镇压复查报告中就罗列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安德烈耶夫、柯秀尔、苏斯洛夫等12人参与大镇压的具体活动及其罪行。这些人中，不仅有现在对揭露大镇压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也有对揭露持积极态度的，也有被斯大林镇压或者被排挤的。作为斯大林当年的亲信，现在有所觉悟站出来对他进行揭露和批评，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把一切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政治家。正因为赫鲁晓夫采取这样的不正确态度，他也就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又重蹈覆辙，犯唯意志论错误，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上面讲到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生前、在他的领导下、经他同意搞起来的，而且他深信这是为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使之免遭敌人的暗算和免遭帝国主义阵营的攻击。他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立场出发看待一切的。不能说这是刚愎自用者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需要这样，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这段话充分表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评论的基本态度，他没有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对斯大林的批判留有余地，预示着在未来的反复。

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

关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人回忆说，他是照本宣读的，有人则说，他登上讲台后便抛开讲稿"自由发挥"。据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说法，这次报告没有录音也没有速记记录，因此，无法辨析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在苏共中央档案中有一份《可以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名单》，列入名单的有参加二十大的 11 个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和法、意两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朱德、陶里亚蒂等。文件说："应在 1956 年 2 月 27 日将文件交给中央对外联络部切尔诺夫，并由其转交给上述名单中指定的同志们。"文件指明："文本在他们离开莫斯科之前收回。"文件注明："打印 30 份"。[①] 这表明，名单上的这 13 个人是最先看到秘密报告的外国人；从时间上推测，他们看到的可能是按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宣读的原稿打印的。赫鲁晓夫 3 月 1 日向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分送了拟下发各级党组织的报告文本。这个文本在文字上做了润色和加工修改：注明摘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和其他著作语录的出处以及某些文件通过日期，加入了报告人离开报告稿的插话，并指出代表们对报告某些论点的反应。1989 年《苏共中央通报》第 3 期公布的就是这个修订本。[②]

3 月 5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向下传达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决定：

---

① РГАНИ, ф. 1, оп. 2, д. 18, л. 116,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с. 252 - 253.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第 418 页。

①建议各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无党派积极分子，了解尼·谢·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②向各级党组织分发的报告文本加上“非刊登用”，同时取消“绝密”标志。[①]

就在决定向下传达赫鲁晓夫报告的当天，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首先产生反响。3月5日，正是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一批学生举着斯大林的画像和花圈，号召人们为斯大林致哀，沿中央大道到列宁广场，向斯大林纪念碑献花圈。第二天，群众性的纪念活动继续出现。格鲁吉亚共产党的领导人面临十分尴尬而难措手足的局面：既要按中央要求传达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又要面对悼念斯大林的群众活动。3月6日下午4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开会，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在简短的讲话中号召与会人员贯彻二十大决议，然后由中央书记姆切得利什维利传达“关于个人崇拜”的文件。3月7日，国立大学学生开始停课，其他学院的学生也表示支持，部分中学生也参加进来。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仍然沿中央大道向列宁广场前进，高呼“光荣属于斯大林”等口号，中途在市苏维埃大楼附近停留，朗诵了关于斯大林的诗歌，高唱颂扬斯大林的歌曲。3月8日，游行队伍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出现了满载人的卡车。斯大林纪念碑前摆满了花圈，广场上开始有人发表演说。示威者要求市苏维埃门前重新挂出不久前撤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也要求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楼挂出列宁、斯大林画像。广场上安装了麦克风和扩音器，一些人上台轮流发表演说，邀请诗人朗诵颂扬斯大林的诗歌。群众运动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把反对的矛头指向赫鲁晓夫。据赫鲁晓夫1956年7月10日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说：第三天，人群中喊出了“为斯大林和贝利亚平反”、“打倒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组成莫洛托夫政府”等口号。[②] 3月9日，参加活动的不仅是青年，也有成年人，一些工人也停工参加进来。大街上的一些大楼门前挂上了列宁、斯大林画像，还出现了降半旗的做法。共和国报纸《共产党人》和《东方曙光》都发表了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的社论，刊登了

---

①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传达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决议》（1956年3月1日），РГАНИ，ф. 3，оп. 14，д. 4，л. 66，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с. 253。

②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503页。

斯大林和列宁的照片。各企业、机关、学校召开了纪念大会。其他城市哥里、库塔伊西也召开了大会。中午1时，姆扎瓦纳泽在列宁广场发表了讲话，宣布人们的“请愿”会给予研究并得到答复。与此同时，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党政方面发出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的告居民书》，用大功率的扩音器在全市播放。告居民书说：这几天是第比利斯劳动人民缅怀和哀悼斯大林的日子，“劳动者们前往广场斯大林纪念碑前寄托哀思，这种感情是完全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是，竟出现了一些破坏分子和挑唆者企图利用格鲁吉亚人民的儿女的哀伤之情，胡作非为，破坏社会秩序，破坏正常生活。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爱国和珍惜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立即恢复秩序，制止破坏分子的破坏和挑唆活动。就在这天晚上11时，发生了军队同部分活动参加者之间的冲突，后来当局用坦克驱散列宁广场上的人群。部队包围了公园，并动用了武力，有人被打死。10日早晨，第比利斯市贴出了《第比利斯市卫戍司令部的命令》：“近日来第比利斯市内有人破坏公共秩序，破坏企业学校的正常工作和第比利斯市的城市生活”。为此，“特命令第比利斯市警备长马库舍夫中校自1956年3月9日24时起实行军队巡逻。”①

在其他地方传达赫鲁晓夫报告的时候也出现了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1956年3月23日，苏联科学院热工学研究所召开非公开的党员大会，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些科技知识分子在讨论中指出，秘密报告是一个对党、二十大、中央委员及其领导人进行诬蔑诽谤的报告。也有发言者根据秘密报告尖锐地指责苏联的制度。初级研究员Р.Г.阿瓦洛夫说：“人民的力量太弱，所以一小撮人得以建立起自己的专政……只有人民拿起武器，才是消除我们生活中的这些有害现象的根本措施。”技术员Г.И.谢德林说：“我们总是说党的力量和人民的权力，过去没有过，现在也没有。我们跟着斯大林一起走向法西斯主义……我们现在还在重复个人崇拜，吹捧赫鲁晓夫。代表大会上没有讨论他的关于‘合理崇拜’的报告……赫鲁晓夫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实强加于我们，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代表大会上没有把这一切搞清楚。”初级研究员斯莫利亚金说：“真是让人困惑

① 格鲁吉亚事件过后，苏联《劳动报》记者斯特尼科夫就他在第比利斯对事件的目睹和了解的事件过程给他的上级发了一封密信。这封信保存在苏联档案中。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201～212页。

莫解，为什么在代表大会上不讨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也许我说得不对，不少党员丧失了独立性和党性……对于许多人来说，党票是得到生活中好位置的手段。”初级研究员 Ю. Ф. 奥尔洛夫的发言成了这次党员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他说：“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不能同奴隶社会进行比较呢？……我们这里出现了这种情况，所有制属于人民，而政权却属于一小撮坏蛋。……我们的党奴才性十足，大部分党员看风使舵，二十大就是这样。……最高苏维埃会议给人的印象是可怜巴巴的。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让人觉得好笑。我们党还是那老样子：阿谀奉承，拍马屁，我们的国家和党的机关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办报刊的是一些骗子和看风使舵的人，国家安全机关培养了一些打手。”许多与会者发言，对奥尔洛夫的发言表示支持。主持会议的人试图扭转话题没有成功。会议参加者的发言被立即报送中央委员会。奥尔洛夫被叫到热工学研究所政治处，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说他在 1946 年就有这些想法。会议的情况引起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注意，为此专门通过了《关于苏联科学院热工学研究所某些人在讨论二十大总结报告的党员大会上进行恶意攻击的决定》，Р. Г. 阿瓦洛夫、Ю. Ф. 奥尔洛夫、В. Е. 涅斯捷洛夫、Г. И. 谢德林被指控“鼓吹虚假的资产阶级自由”，攻击党和苏维埃机关，犯了自由主义。他们被开除党籍、责令该研究所的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研究所政治处主任被撤职。这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契卡洛夫、基辅、萨哈林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实际上全国都有类似的“自由主义”议论。[①]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在 2 月底或 3 月初就在国外开始传播。据南斯拉夫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回忆：“将近 2 月底的一天夜晚，铁托临时召集了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成员，向我们宣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3 月 10 日，美国驻苏大使查理·波伦第一次听说有这份报告，传闻来自英国共产党《工人日报》的通讯记者。第二天，一位美国教授也证实了这一传闻。他刚去探望过他的苏联父亲，他父亲曾给苏共中央一名成员治过病。几天后，在外国新闻记者和外交官那里工作的苏联人员开始谈论他们在党

①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 159～160 页。

的积极分子会上听到的消息。在西方报纸上，第一篇关于秘密报告的报道出现在3月16日的《纽约时报》上，由该报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写的，有好些材料还不准确。第二天，一篇由路透社发出的波恩快讯则更准确的勾勒出报告的粗线条。[①] 3月14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共的一个文艺性刊物《新主题》上就苏共二十大发表了长篇谈话。他反驳了那些指望苏共二十大所开辟的民主发展进程将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苏联东山再起的谬论。同时，他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评论说，对今天受到谴责的那些错误不仅仅是个人事情，而且和苏联生活的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把斯大林的缺点当作所有问题的根子加以抨击，而且局限于"个人崇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看问题。陶里亚蒂把个人崇拜现象的存在看作苏联制度的某种"蜕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共产党要求做出解释：在苏联制度下为什么会产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犯错误时现在揭发他的领导人干了些什么？3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这篇公开宣传苏共二十大精神的文章，实际上等于承认了秘密报告的存在。4月15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而撰写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看来赫鲁晓夫等事先并没有预料到秘密报告会引起国内外如此强烈的反响，也没有作好应对的准备。开始，赫鲁晓夫对国内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一下处理，在大的方向上仍然按照大会的决议，采取继续克服个人崇拜后果的措施。3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了《关于审理因政治、职务和经济犯罪服刑人员的案件》的决议。决议说："在监禁地至今仍然关押着大量的人员，他们是被毫无根据地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和依据虚构的案件被判有罪的人员。还有一部分被关押的人员，把他们与社会隔离开并不是因为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利益，尽管他们犯了政治性质的罪行，以及职务和经济罪行。"决议认为，以普通的方式，通过司法机关审理上述人员的案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为了从监禁地尽快释放上述人员，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专门委员会，其任务是：与犯人进行私下接触，审查各监禁地现有的案卷和其他能够证明罪犯在被逮捕前

① 布兰科·拉齐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夏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14～16页。

和在监狱中行为表现的材料，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索取并审理调查和诉讼案卷。委员会可以当场做出释放那些被错误判罪，以及没有必要继续关押的人员的最终决定；做出关于缩减那些被判不相称的处罚的监禁期限的决定，或者在由罪犯的亲属个人和社会组织担保的情况下做出释放他们的决定。苏共中央委员会还委托上述委员会审理关押在劳动教养院里的所有未成年人案卷，在必要的情况下决定关于释放他们，或者把那些没有必要继续关押在劳动教养院里的未成年人交给其父母或者亲友托管。该委员会审理案卷是一次性措施，应该在 1956 年 10 月 1 日前结束这项工作。允许委员会吸收各地方内务部机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参加提交委员会审理的材料的准备工作。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确保为那些从监禁地释放出来的人员及时地安排工作，并为他们创造生产、日常生活和居住条件。决议规定：祖国的叛徒、从事恐怖行动的人员、破坏分子、从事间谍活动和敌对活动的人员、反革命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以及因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杀害和残酷折磨苏联公民而被判有罪的讨伐队员，不属于被释放人员之列。不属于被释放之列的还有如下人员：因土匪活动和蓄意谋杀被判有罪的人员、抢掠犯、惯贼、凶恶的流氓分子、社会主义财产的重大盗窃分子以及因捏造虚假的刑事案件被判有罪的人员和其他特别危险的罪犯。为了贯彻执行这一决议，决定由 А. Б. 阿里斯托夫（委员会主席）、Н. М. 别戈夫、Р. А. 鲁坚科、Н. П. 杜多罗夫、И. А. 谢罗夫、К. П. 戈尔舍宁、В. В. 佐洛图欣和 З. А. 博尔德列夫组成苏共中央的委员会，对审理因政治、职务和经济犯罪服刑的人员案件的工作实行监督，并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会提供帮助。[①]

在 4 月 5 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在 6 月 4 日召开中央全会，由谢皮洛夫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改善思想工作的任务》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可以看出，这次中央全会是要清除贯彻二十大决议的思想障碍。[②] 40 年后，人们在苏共中央档案中发现一份朱可夫元帅题为《军事思

① ГАРНИИ, ф. 3, оп. 14, д. 11, л. 13 – 16、62 – 66,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с. 270 – 275.

② РГАНИ, ф. 2, оп. 1, д. 188, л. 1,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с. 287 – 288.

想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言稿，签注的日期是1956年5月19日。朱可夫在给赫鲁晓夫的短信中说："现向您呈送我在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稿，请审阅并提出自己的意见。"[①] 显然发言稿是根据赫鲁晓夫的布置准备的。发言稿的开头就说："在某些同志中有关于不宜继续和深入重提与个人崇拜有关问题的意见，因为按他们的意见，深入批评与个人崇拜有联系的问题会给党的事业、给我们的武装力量带来危害，会降低苏联人民的威望，等等。""我认为，类似的情绪是不同意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段话表明，在领导集团内对继续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存在着不同意见。朱可夫在发言稿中说："个人崇拜的广泛蔓延是在与卫国战争有联系的许多问题上开始的。""直到最近，我们国家的军事思想工作依然是个人崇拜盛行"。朱可夫是卫国战争中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任红军总参谋长，后来担任方面军司令员、副最高统帅，组织和指挥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攻克柏林等重大战役，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卓绝功勋。赫鲁晓夫让他在中央全会上就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作一次系统发言，这将比赫鲁晓夫自己在这方面的讲话更具权威性，显然要进一步推动对个人崇拜的揭露与批判。

朱可夫的发言稿对斯大林在战争前夕和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他的军事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评论。虽然这个发言稿是应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准备的，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未得到发言机会，但它对研究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思路变化是一份重要资料，而且发言稿对研究苏联卫国战争史也有重要价值，不妨作如下引证。

朱可夫说："在对斯大林的功绩、毅力和组织工作给予应有的评价的同时，我应该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解释战争方面导致的结果是：我国人民的作用、党和政府的作用、我们武装力量的作用都被降低了，斯大林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为了赞扬斯大林，粗暴的歪曲一系列历史事实，隐瞒失败、错误、缺点及其原因"。朱可夫首先从战争初期遭受的重大失败和巨大损失及其原因说起。他说，战前一直宣传"我们的国家始终不渝地准备给任何侵略者以毁灭性的回击"。"但是我国的国防准备的实际情况距离这些夸耀却相差甚远"。战争前夕，部队的组织和装备都没有达到应

① 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215~232页。

有的高度：组建机械化军为时过晚；空军的质量比德国低得多，缺乏机场，飞机极其密集地停放在容易遭受攻击的边界地区；炮兵和高射炮缺少牵引力，致使军队退却时抛弃了很多火炮；“总参谋部没有最终的和经政府批准的作战及动员计划”。他也谈到，斯大林对军事干部的怀疑态度给武装力量带来巨大的危害。“在苏芬战争和远东事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我国和我军的战备薄弱方面，不仅没有克服，而且更为严重”。“斯大林轻视法西斯德国对苏联进攻的明显威胁”。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通报的资料外，朱可夫举出了总参谋部向政府提供的德国军队在边界附近集结情况的报告。他有意地特别引用了总参谋长给政府首脑莫洛托夫的一份报告，他说：“政府没有对这一报告采取任何切实可行的措施”。朱可夫还批评了战争爆发前一周，也就是6月14日塔斯社公告中所宣布的：“根据苏联资料，德国如同苏联一样始终不渝的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和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把苏联人民、党和军队引入迷途。朱可夫甚至提供了这样的事实：6月22日3点15分，德国人在全线开始了军事行动，3点25分，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重要情况，并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请求批准向军队发出实施相应抵抗行动的命令，斯大林竟以“这是德国军人的挑衅”，不许开火，到6点30分还不允许采取反击行动，结果使敌人“把主动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部队在战略方向上遭到失败、退却和在许多地区被包围”。朱可夫指责：“从战争发生第一分钟起，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表现了对国土防御指挥的完全张皇失措。”他批驳所谓的“积极防御战略”说，“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决定。”“积极防御理论”是为掩盖战争开始阶段失败的真正原因而提出的。接着，在“斯大林对待我们武装力量人员的态度”的标题下，朱可夫批评斯大林竭力把战争初期的失利的所有罪过推到武装力量人员身上。他认为，组织对西方方面军指挥人员的审判，枪毙方面军司令员帕夫洛夫、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通信兵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和其他一些将领，以及毫无根据的指控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向敌人投降，其目的就是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和转移人民对没有做好国土防御准备、错误指挥而遭受的失败的不满情绪。朱可夫指出，在战争初期，尽管军队处于独立作战的境地，士兵和军官总的来说，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他认为，战争的第一阶段不应称作“苏联武装力量的积极防御时期”，

应该正确地叫做“退却和破坏法西斯‘闪击战’计划的时期”。

接下来，朱可夫发言稿批评了所谓“斯大林战役”和“斯大林的军事科学”的不实宣传。他指出，由各兵种在辽阔的国土上进行的现代化方面军战役或方面军群战役，不是一个人能够考虑、盘算、计划和实施的，而后来却把许多战役都命名为“斯大林战役”。朱可夫不否认斯大林曾设计并坚持了一些战役，但“这些战役都造成严重后果”。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说到的，朱可夫举了几个实例：一个是损失严重的波罗的海沿岸利耶帕亚地区的战役，由于战役失败，斯大林撤换了3个方面军司令员；一个是华沙北部战役，由于盲目进攻造成成千上万人员死亡。他还举出在敌人向莫斯科扑来的严重时刻，斯大林硬是命令正在担任指挥任务的朱可夫和布尔加宁分别去夺回杰多沃村和红波利亚纳两个小据点，结果造成敌人从另外地区突破、向莫斯科猛攻的危险局面。朱可夫批评“为了迎合个人崇拜，我们这里根深蒂固的风行一种认识，认为苏联军事科学是斯大林重新制定的。”在《军事科学百科词典》中，把前人的格言和人所共知论点说成斯大林的天才发现。另外，把战争初期证明是错误的“反攻”奉为神明确立为未来进行战争的可能方法。朱可夫指出，苏联的军事科学是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军事活动家、军事科学工作者集体创建的。“迄今在军事工作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方面都打上了个人崇拜烙印”，战争已经过去11年，还没有一部能历史地、真实地总结卫国战争的书。个人崇拜实际上束缚了军事干部创造性的思想，应当使我们的军事科学首先面向现代化和远景发展的任务。他提出，应当重新出版伏龙芝和其他军事理论家的著作，还要重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外国的军事思想、军事技术的研究。

朱可夫发言稿的最后一个标题是“关于消除对从法西斯俘虏营返回祖国的前战俘的不正确态度”。朱可夫第一次提出斯大林时代这一重大问题。战争初期由于上面提到的情况，相当数量的苏联军人陷入包围，违心的当了俘虏。斯大林既不考虑被俘时的情况和当俘虏时的表现，也不考虑从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事实，不分青红皂白，未经法庭审判，把这些人一律送往惩戒营。战后返回祖国的绝大多数被俘人员都受到从流放到特殊居住地到处以极刑的各种惩罚。这样的做法当然是很不人道的。

朱可夫的发言稿送上去了，而中央全会的日期却一改再改。在5月7

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鉴于在1956年5～6月计划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经互会会议和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委托苏共中央书记处重新确定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召开的日期。6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定：将苏共中央全会推迟到秋季举行，认为必须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名义起草一封总结党组织对苏共二十大决议讨论情况的信函，发给党的全体基层组织。信函委托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牵头起草。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也就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发言稿便在党中央的档案库中搁置了40年。

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情况，主要是国内外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反应越来越强烈。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同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份秘密报告的全文。苏联当局调查发现，是华沙一名记者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那里拿到这个小册子。赫鲁晓夫怀疑是波兰共产党中央书记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泄露出去的。这名记者意识到，这是一份轰动性材料。他用了几个小时，将小册子复印，然后将复印材料寄给了住在以色列的亲戚。随后报告又从那里转到美国记者的手里。秘密报告立即引起了全世界各国媒体的转载和评论。共产主义营垒出现极大的疑惑与混乱。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透露的有关苏联的内部消息或负面材料，苏联官方一般都会予以批驳，称作“诬蔑”或“谣言”。各国共产党也都会跟着苏联的调子为其辩护。现在，竟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口中说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学者便把这些事实同苏联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分析，指出其社会制度的固有缺陷。国际共产主义营垒中的一些大党，如中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或机关报先后发表重要的评论，对苏共的做法和斯大林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有些党还派出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一些国内力量比较弱的党，由于一直跟着苏联的舆论走，现在感到很尴尬，遭到很大压力，要求苏共做出解释。在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保存着各驻外使馆关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反应报告。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和决议。苏联国内也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意见日趋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改变了方针，由“放”转到“收”，由继续批判斯大林转变到全面评价斯大林和纠正国内出现的一些危

险倾向。为此采取了两项新举措，一项是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另一项是发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于6月30日通过，7月2日在《真理报》公布。[①] 这是一份主要对外宣传的文件，充分体现了赫鲁晓夫所处的时代特征及其思想和文风，竭尽自我宣扬和自我辩解。决议首先对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进行了夸张的宣扬，说：二十大“标志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为一切工人阶级政党共同努力防止新战争威胁、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开辟了新的远景”；决议“得到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劳动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千百万人的完全拥护和热烈支持”，“引起了蓬勃的热情、新的旺盛的创造性主动性和革命毅力”；“苏联人民在执行二十大的决议中，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取得了新的卓越的成绩”。党的二十大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创议，大胆公开的说明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和斯大林生平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再一次表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巩固性。“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一个执政党决不敢这样做”。文件说，大会的决议引起了帝国主义营垒“惊慌失措”。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围绕着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而大肆叫嚣，广泛进行诬蔑性的反苏宣传，企图把水搅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混乱。决议强调，不管有多么痛心，引起暂时困难，相信将会有巨大的良好的结果。

决议的第二部分解释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现在的领导人为什么当年没有公开反对斯大林、没有解除他的领导职务两个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文件的作者显然费了很大心思，企图说出一些能够说服人的道理来。决议认为“应该既考虑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具体的客观历史条件，也考虑到同斯大林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主观因素”。决议强调，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25年时间里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下，曾经有东西方敌人的武装干涉、十字军讨伐、法西斯的战争威胁，苏维埃国家必须竭尽全力加强国防，同敌对的资本主义的阴谋进行斗争；而在国内进

① 1956年7月6日《新华社新闻稿》全文刊登了这个决议。本书的引文根据当年人民出版社的《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一卷所收译文。

行着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斯大林领导党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采取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方针。“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需要有铁的纪律，需要不懈的提高警惕性，需要有极其严格的集中领导，不得不对民主做一些限制”。决议承认，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家和大组织家，在这些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获得了绝大的威信和声望。“但是，我们一切伟大的胜利从此被不正确地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斯大林的颂扬，使他冲昏了头脑。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决议说，斯大林的一些个人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列宁就曾批评过他，后来，“斯大林过分的高估了自己的功绩，相信自己不会犯错误”，他把特殊情况下对民主的限制变成党内和国内的生活的准则，粗暴的践踏列宁的领导原则。决议指出，斯大林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公式，也起了很坏的作用。在严酷的斗争条件下形成了国家保安机关变为由斯大林个人监督，在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窃取了保安机关的领导职务后，苏维埃法制遭到破坏，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非党苏联人无辜受难。关于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作者同样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强调，“不能说没有反对过那些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不良现象”。比如，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独断独行曾经受到大大的限制，违法和专横等等不良现象曾经大大地减弱。另一方面又辩解说，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目中是一个始终保护苏联、反对敌人的阴谋、始终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人，反对斯大林就会被看作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为。这一切也使反对当时发生违法现象的斗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的危险行动。

决议的第三部分集中反驳了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观点。决议说：“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做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者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将是严重的错误。”尽管决议不得不一再承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党的事业和苏维埃社会造成严重损失”，“给党和人民造成很大祸害”，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创造性，但还是硬着头皮声明，它“不能改变而且也没有改变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任何个人崇拜都不能

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议不仅反驳了那些认为个人崇拜是由于这一制度不民主的议论，把这种说法统统归诸敌对言论，而且也批评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提出苏联社会是否已经走向某种"蜕化"形式的疑问，说他没有事实根据。决议提出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本质。苏联的生产资料属于人民，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手中。认为个别人物，包括像斯大林这样的大人物在内，能够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那就是完全违反事实、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真理，陷入唯心主义境地。决议坚决否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由于苏联不民主。

应该说，这个决议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要站得高些，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比较全面，对于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不只指出斯大林个性和个人品质方面的原因，也分析了客观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但是，由于决议的作者既要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同苏联共产党、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分割开来，既要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不能损害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既要指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又不能否定苏联在他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既说个人崇拜限制了苏联的民主，破坏了法制，又要为苏联的民主与法制制度进行辩护，因而便导致了逻辑上的一系列混乱，矛盾百出，往往不能自圆其说。

决议发表后，虽然得到一些兄弟党的赞扬与支持，但是，许多党却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突然揭露"，提出了一系列疑问。7 月 10 日，赫鲁晓夫同到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意共中央书记贾恩卡洛·巴耶塔谈到，意共对揭露个人崇拜"没有准备"，"经历了一个混乱时期"，在工作中引起"休克"。赫鲁晓夫辩解说："做出这个问题的决定不是在筹备代表大会时，而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因此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兄弟党协商，并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使肯定和否定的两个方面保持足够的平衡。"[①] 原来，赫鲁晓夫把做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决定的时间有意推迟到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是为了对付各国共产党对这件事的指责。为了保持对外宣传的口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就继续采

① 《赫鲁晓夫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会谈记录》(1956 年 7 月 10 日)，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第 495、501 页。

用这一说法。

苏共中央主席团7月6日通过了勃列日涅夫起草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讨论情况和对代表大会决议执行进程》的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①] 如果说6月30日的“决议”主要是对外宣传的，那么，这封发给全国各级党组织的信函则主要是对内的，针对二十大决议讨论中出现的一些激烈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一切怀疑和反对二十大精神的思想行动进行斗争。和“决议”一样，信函首先对二十大的意义进行了一番自我宣扬，指出其“伟大历史意义”和“巨大的影响力”：“就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定这一点”，然后才说，“与此同时，不应该避而不谈在一系列党组织会议上出现的反党演说，在这些演说中打着谴责个人崇拜的幌子，把党的政策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正确性置于怀疑的境地，对党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进行诽谤和中伤，不加区分地贬责和破坏党和国家机关。”信函点出了东方学研究所和莫斯科故事影片厂党组织以及其他党组织里某些共产党员在自己的演说中建议对整个党和国家机关进行清洗；在某个单位党组织的会议上，出现了旨在破坏苏联各民族友谊的充满民族主义性质的发言，并发表了蛊惑性的声明，提出了具有挑衅性质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把党员的注意力从讨论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上转移开，在党员群众中播撒对领导干部不信任的种子；在作家和艺术家的一些党组织会议上，出现了反对党关于思想问题的决议的言论。决议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存在着那样一些共产党员，他们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不应该把个人崇拜视为苏联社会一种固有的现象，为此所传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苏维埃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可能改变党的总路线以及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不可动摇的忠诚。

信函说，发表这样演说的都是一些肆无忌惮的单干者，绝大多数人是平庸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部分人的意识中还没有完全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时候，偶然混入党内和钻进党的队伍里的异己分子。信函提出，对于那些因不成熟和没有经历过足够思想锻炼而发表了错误言论的共产

① РГАНИ，ф. 1，оп. 2，д. 1，л. 119－130、140，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с. 378－385.

党员们，应该耐心地说明他们的错误。那些心怀恶意的批评者，他们为了修正党的政策基础，千方百计地利用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地讨论党内生活问题的自由，对于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两种意见：党不需要这样的"共产党员"。信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要对党内的一些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和处罚。

历史研究，首先要弄清事实，然后才能进行评论。笔者想通过对苏共二十大的基本内容和整个进程的追述来揭示这次大会性质及其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就指出，苏联实行的是领袖政治。每一个新上台的最高领导人都要根据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估计，确立自己的思想路线，因此，每个时代都会形成鲜明的历史特点。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的以避免世界大战为目的的和平外交路线和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与批判，这两大主要内容无疑同斯大林的政治遗产拉开了距离。此后，虽然苏联仍然同美国继续进行冷战，但是热战的危险大为降低；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大规模镇压，缓和了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从此完全进入了赫鲁晓夫的"解冻"与开始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同斯大林时代比较起来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无论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还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都表现出赫鲁晓夫及其时代的局限性。赫鲁晓夫所继承的基本上仍然是斯大林的思想理论，他批判斯大林并不否定斯大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理论，并不否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否定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继续维护斯大林的国有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因此，他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在斯大林的思想理论框架下，既没有意识到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意识到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赫鲁晓夫思想路线上的种种局限性，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在国内外强烈反响的压力下，他很快又改变自己的路线。实际上，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整个时代，他的"非斯大林化"，他的改革一直处于反复与曲折之中。这也是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在党的领导方面，虽然恢复了按时召开代表大会

和中央全会的制度，强调集体领导原则，但赫鲁晓夫却坚持由党具体领导一切经济部门，而且他自己仍以领袖自居，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排斥异己。所以，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的改革并没有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文学的“解冻”

——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

陕西师范大学　柳植

1954年5月，苏联著名犹太人文学家、新闻记者伊利亚·爱伦堡在《旗》杂志发表了题名《解冻》的中篇小说，作家试图通过自己的小说揭示斯大林去世后一段时间苏联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后来，人们不仅把斯大林之后到60年代这一时间段苏联文学的复苏和变化称为文学的“解冻”，而且“解冻”一词也被用来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标志。近年，俄国不少历史学家已把这一名称纳入自己的学术著作，甚至作为著作的名称。

既然“解冻”已经成为时代的代名词，就应该对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考察“解冻”的时代背景、原因、发展过程及其在苏联历史和整个俄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决不能曲解甚至篡改这段历史，或者对它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

笔者正在研究和写作《“解冻”和开始改革的时代》，为了深入理解这一问题，这里先就“解冻”的源头——文学的“解冻”作一些论述，以就教各位专家和同行。

一 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的再辉煌

文学艺术虽然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和整个意识形态、文化一样也有自己本身的发展逻辑和规律。18～19世纪，德国的经济、政治在欧洲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但德国的哲学却十分发达，“演奏着第一把小提琴”。[1] 同样，19世纪上半叶，俄国尚处于落后的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下，而文学艺术却得到高度发展，以普希金为代表，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后来通过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的小说和戏剧，对全世界产生了惊人的影响。他们的作品成为世界经典名著。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曾深受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7年10月，俄国文学艺术再次出现了辉煌发展的时期，人们称这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白银时代”。“白银时代”仍然是诗歌打头阵，出现了亚·勃洛克、A. 别雷、И. 安宁斯基、安·阿赫玛托娃、奥·曼德尔斯塔姆等著名的大诗人。而革命文学的领军人物马·高尔基也是这个时期登上舞台的。在他主持的“星期三”文学组织及《知识》出版社内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家。“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群星荟萃，个性鲜明，不仅作家数量和作品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在审美立场和创作技巧上有了质的变化。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主要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那么，到世纪之交，审美观念则多元化，艺术流派与思潮发生了大的改变，出现了多层面的文学现实。

这时候，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股最大的文学思潮平行发展，互相竞争和斗争，又互相影响与吸收。两种思潮的审美分野，最重要的前提在于对人在世界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引出的对艺术本质与任务的不同评价。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在契诃夫开创的容纳各式各样人物、注重人的个性、发觉人与人之间互不理解原因的新审美视觉的基础上，把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新现实主义阶

① 恩格斯：《致康·施密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04页。

段。高尔基及其继承者把大写的人、大地的主人、革命者推到首位。在他们的作品中，人是世界的主人，人是胜利者，是自由的斗士。他们否定 Ф.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列夫·托尔斯泰关于痛苦与道德净化的基督教思想。高尔基认为，改造世界的革命会改变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高尔基之外，新现实主义还有许多才华出众的著名作家，如列·安德烈耶夫、伊·蒲宁、B. 韦列萨耶夫、H. 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A. 库普林、И. 什梅廖夫等。列·安德烈耶夫（1871～1919）被高尔基称为"具有罕见的特殊性、罕见的才能"的艺术家，他在"白银时代"的文学史上写下了最光辉、最奇妙、最独特的一页。他的个性鲜明，作品富于哲理，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根基，充满反抗精神和对人的命运的深刻思考。从 1898 年开始，他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和戏剧。《大满贯》和《人的一生》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前者哭诉人的痛苦，小说的主人公热衷于玩牌，但他不像其他牌友只从游戏过程得到满足，却幻想玩一把没有王牌的大满贯。当他梦寐以求的好牌——大满贯到手时，死亡却突然降临。高尔基读了《大满贯》以后说："一个天才诞生了"，"小说写得非常好"。[①]《人的一生》是一部哲理话剧。勃洛克说，自己简直被《人的一生》所震撼。全剧的艺术特点就在人和命运的关系中揭示整个人类的悲剧。可以看出，安德烈耶夫并不局限于现实主义，而进入了更深的思考，在艺术上已经率先显露出表现主义戏剧的典型特征。由于他在文学的党性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苏维埃时代便不大宣传他的作品。伊·蒲宁（1870～1953）既是现实主义的大诗人，又是才华横溢的散文作家和翻译家。高尔基认为，他是同时代作家中最杰出的天才。在 20 世纪的最初 10 年，他发表大量作品，1920 年告别祖国侨居国外，继续创作。在国内，他往往写国外的题材，而在国外全写的俄罗斯的题材。杰作《旧金山来的先生》被俄罗斯文学史家誉为"缎子般"的作品。1930 年，巴黎的俄文报纸《最新消息》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蚁道》，仅由 64 个词组成，极为精练，包含了深不可窥的意义。1933 年，蒲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是俄罗斯第一个

① 符·阿格诺索夫主编的《20 世纪俄罗斯文学》是近年俄罗斯出版的比较好的文学史，其中评介了从白银时代到苏联时代的主要作家及其主要作品。中译本由凌建侯等翻译，白春仁教授校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处高尔基等的话引自这本书。本文对一些作家及作品的评论也参考了此书。

获此荣誉的作家。

现代主义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文学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源于西班牙和墨西哥等国家，而这一新的文学运动几乎同时在俄国很快发展起来。现代主义文学否定现实主义美学中严格的因果决定论，否定现实主义认定的社会或历史环境对人的必然决定论。现代主义维护人的个性，维护人不受历史时间因素束缚的权利。俄国的现代主义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流派：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新农民”文学及部分未来主义者。象征主义在诸流派中居于首位。它兴起于法国，但在俄国很快得到强劲的发展。它不认为艺术是对世界的认知，而要在创作的过程中建构世界。它不接受艺术的功利主义，认为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象征主义运用暗示、隐喻、联想和烘托增强表现力。它追求言外之意，象征是多义的，不要求有唯一的共同理解，如果有两种或更多的理解，或者不能完全理解而只是感受，而后自己在脑海里补足，这才是它的迷人之处。这个流派的辉煌主要表现在诗人辈出，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勃洛克、别雷、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外，还有К. 巴尔蒙特、В. 布留索夫、М. 库兹明、Д. 梅列日科夫斯基、З. 吉皮乌斯、Ф. 索洛古勃和维·伊万诺夫等。亚历山大·勃洛克（1880～1921），是世纪之交最负盛名的大诗人，可以列入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一类俄罗斯伟大诗人的行列。在高尔基的记忆里，“勃洛克不论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作为一种个性，都是美丽得惊人。”[1]勃洛克早期是象征派，1905～1907年革命以后，他越来越关注周围的日常生活、“被侮辱者和被欺凌者”的生活，确信革命可以净化一切。他曾出版了自己的三卷诗选，被俄罗斯的研究者称为“人化三部曲”。象征主义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在任何一个文学创作的领域，象征主义者们都有创新的贡献。它丰富了俄罗斯的诗歌文化，赋予诗歌语言以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多义性，在诗歌的音韵方面的探索也成就卓著。象征主义也使小说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艺术变成个性的艺术”。[2] 象征主义的遗产对俄罗斯文化是一座真正的艺术宝库。

阿克梅派是从象征主义中产生的一个新流派。一些曾接近象征主义的

---

① В. 科瓦廖夫：《苏联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第101页。

② 符·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25页。

年轻诗人聚集在维·伊万诺夫的住所，听取老诗人的讲课，讨论创作的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学组织，1912 年宣布流派产生，选用希腊语中的“阿克梅”（顶峰）作为名称。其成员包括 H. 古米廖夫、安·阿赫玛托娃、C. 戈罗杰茨夫、奥·曼德尔斯塔姆、M. 津克维奇和 B. 纳尔布特等。古米廖夫是领导人。这一派希望克服象征主义的抽象性与空想主义，主张“优美的明晰性”，要求严格的创作规范。不过，阿克梅派来自象征主义，古米廖夫称象征派为“当之无愧的父亲”，所以他们还是继承了象征派的成果，却消解了后者的极端性。按照古米廖夫的观点，阿克梅派就是尝试重新揭示人生价值，放弃了象征派企图认识无法认识之物的追求目标。阿克梅派曾联合了不少诗人，但后来这些人都有了个人的创作追求。阿克梅派最大的三位诗人：H. 古米廖夫颇具浪漫主义，有时追求诗歌的精雕细琢，有时向玄想方面发展；安·阿赫玛托娃初期与俄罗斯古典传统有密切的联系，后来追求心理主义和道德求索；奥·曼德尔施塔姆则充满了对世界文化的眷念，着重于历史哲学的思考。

未来主义几乎与阿克梅派同时存在，一般认为它产生于 1910 年，其主要成员有：Д. 布尔留克、B. 赫列勃尼科夫和 A. 卡缅斯基。很快，这几位同弗·马雅可夫斯基和 A. 克鲁乔内赫一起组成了新流派中影响最大的立体未来主义小组，称“吉列亚”。未来主义还有另外三个团体：自我未来主义派（И. 谢韦里亚宁、И. 伊格纳季耶夫等），“诗歌顶楼”（B. 舍尔舍涅维奇、赫里桑夫等），“离心机”（鲍·帕斯捷尔纳克、H. 阿谢耶夫等）。

总之，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不仅继承和发展了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且几乎同世界的最新美学思潮同步，把俄罗斯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

1917 年的俄国革命，不只推翻了沙皇政权，而且紧接着又打倒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连续不断的革命风暴在荡涤旧制度“污泥浊水”的同时，也打断了在多种审美思想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文学大潮。托洛茨基在他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中说：“十月革命似乎以自己的直接

行动扼杀了文学。诗人和艺术家沉默了。"[①] 革命与文学发生了冲突。一方面，坚持单一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的布尔什维克，把信仰其他世界观的知识分子看作潜在的敌人，把世纪之交的多数文学家归诸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另一方面，大部分知识分子被革命暴力和革命后国家的残破、社会的分裂、文化的凋零和生活的艰难等现象所震撼。文学家的队伍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为了生存消失在民间，后来从事了各种具体的事务；相当一批作家对革命和新政权抱怀疑和批判态度，内战中倒向白军，后来移居国外。到 1922 年，逃到欧洲国家的作家有蒲宁、吉皮乌斯、巴尔蒙特、雷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安德烈耶夫、什梅廖夫、阿·托尔斯泰、胡达塞维奇、茨维塔耶娃、维·伊万诺夫、谢维里亚宁以及其他数百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记者。俄罗斯的文学中心几乎转移到国外，只有一部分文学家留在国内。

国内的文学活动是逐渐恢复的，而且一开始就面临着抉择：是重新创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学，还是让文学在已有的基础上发展？当时有三种主要力量影响着文学恢复的取向。首先是执政党的立场和主张：为了巩固自己的新政权，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希望能表达革命意识并描绘新社会秩序的文学作品尽快出台，以教育群众；另一方面，列宁在 1905 年就提出，文学"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是一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②] 的重要论断。革命后，党的领导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决定把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工作交由教育人民委员会领导。

在国内的白银时代的文学家是文学恢复和发展的现实存在。他们当中最早投向革命、为革命歌唱的是少数倾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农民意向的作家和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部分未来主义者。他们用自己的意识诠释这场革命。象征派大诗人勃洛克 1918 年写了长诗《十二个》，是革命后第一部重要作品、"个人艺术的天鹅之歌"。[③] 作者把革命描绘为一场农民的暴动。在彼得格勒被大雪封困的 12 个行凶抢劫的红军士兵，他们仇恨旧

---

①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第 554 页。

② 列宁：《党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 13 页。虽然这一版把原来的"党的文学"改成现在的译法更精确了，但是，列宁所说的"党的出版物"显然也包括党的文学著作。在斯大林时代一直把本文在文中所引的话作为党对文学进行政治监控的依据。

③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 104 页。

世界，梦想美好的生活，最后以基督出现象征革命和未来。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是20世纪头10年显露头角的农民诗人。他从农民的立场欢迎革命，歌颂革命。他所向往的是，革命能够导致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回到原始民主的农民村社生活去。弗·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把自己的未来主义看成共产主义的先锋，组成"左派文化阵线（列夫）"，以高昂的热情，为革命写诗、写戏，放声歌唱。这些作家受到革命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本人也是文学评论家和诗人）的热情支持，而列宁并不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其他许多作家是在克服了革命初期的震惊和疑虑以后，在20年代初相继开始了文学活动的。

在国内存在的另一种力量是：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的群众性文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由亚·波格丹诺夫领导的组织，主张建立"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派"。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继续活动，而且大力组建和争取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文化组织，力争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少领导人也倾向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1920年10月初，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①] 接着在给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②] 无产阶级文化派在1920年10月成立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1923年成立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伐普"，并出版《在岗位上》杂志，形成一个文学批评流派。他们坚持：任何艺术反映的仅仅是阶级的经验和世界观。要严格地按照阶级界限划分文学，划分整个艺术，对包括19世纪俄罗斯文学在内的一切过去的文学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都抱否定态度，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拉普"是20年代初最大的文学团体。他们的主要文学批评家是C. 罗多夫、Г. 列列维奇、Л. 阿韦尔巴赫，加入联盟的

①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99页。

②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全集》第39卷，第330页。

著名作家有 A. 法捷耶夫、Д. 福尔曼诺夫、Ю. 李别金斯基等。

1921 年 2 月，在高尔基的支持下，在彼得格勒成立了“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小组，参加该小组的有：弗·伊万诺夫、M. 斯洛尼姆斯基、M. 左琴科、B. 卡维林、Л. 隆茨、H. 尼基京、K. 费定，还有诗人 E. 波隆斯卡娅和 H. 吉洪诺夫，批评家 И. 格鲁茨杰夫。和这个小组接近的还有：叶·扎米亚京、B. 什克洛夫斯基。他们欢迎革命，描写革命，但要求捍卫传统的艺术观和文学创作的自我价值，文学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而不是狭隘的阶级意义。“谢拉皮翁兄弟”还影响了尤·奥利夏、叶·佐祖利亚、列·列昂诺夫、米·布尔加科夫、彼·巴甫连柯、瓦·卡达尔等一些著名的作家。在国内活动的相当部分的作家当时都与“谢拉皮翁兄弟”小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 20 年代与“拉普”针锋相对的是围绕在《红色处女地》杂志周围的文学团体“山隘”，1924 年这个团体定名为全苏工农作家联合会。《红色处女地》是文学评论家 A. 沃龙斯基创办的一份大型杂志。沃龙斯基针对“列夫”、“拉普”的一系列文学主张，进行文化问题的讨论和批评。沃龙斯基承认艺术的认知功能，坚持艺术具有人道主义的传统观点。在沃龙斯基及其追随者看来，古典遗产，过去的一切真正的文化，不能不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

在列宁生病及其逝世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怎样看待跨入新时代的“旧文学家”发生了争论。相当一批领导人仍然歧视和反对白银时代的作家，热衷于支持和赞扬杰米扬·别德内依、李别金斯基、别济缅斯基等几个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托洛茨基借用了一个“同路人”的概念，称呼那些不反对新政权而又对“共产主义目标陌生”的文学家，其中包括“谢拉皮翁兄弟”小组及受其影响的作家，也包括勃洛克、克留耶夫、叶赛宁、皮利亚尼克等。他还说：“如果我们消灭了皮利亚尼克、谢拉皮翁兄弟、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除了一些得不到兑现的空头支票外，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还能剩下什么呢？”[①] 托洛茨基并未放弃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理想，只是认为，无产阶级文学队伍要在“同路人”的帮助、影响下成长。布哈林也发表了应当慎重对待农民作家和“同路人”、不应该干预文化和文学领域的专门性问题等方面的意见。1925 年 6 月，布尔什

①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 203 页。

维克党通过了放宽对文学家政策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要正确对待"同路人"、"应当鼓励各个团体或文学组织和思潮之间的自由竞争"。[①]

从1921年到1928年，苏联文学由恢复而达到一定的复兴。托洛茨基对20年代文学运动的恢复做了一个著名的概括："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复活后，它立即被涂上了同路人的色彩。"[②]我们先撇开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仅就他对20年代苏联文学复活的看法来说，不能不承认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应该说，这个时期是整个苏维埃年代文学最为兴旺繁荣的时期。白银时代的老作家跨进新时代，不同的美学思想和流派继续存在，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小组，一批数量可观的新作家成长起来，创办了一些新的杂志和文学期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学成果：在诗歌方面，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都有脍炙人口而且流传至今的作品，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在20年代中期的两部长诗《列宁》、《好》，一直被作为苏维埃诗歌的经典。另外，像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也都有新的作品问世。应该指出的是，20年代文学复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诗歌转向散文，散文作家和作品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诗歌。作为苏联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大都产生于这个时期。其中包括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和《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早年译为《夏伯阳》）、费定的《城与年》、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早年译为《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列昂诺夫的《獾》、李别金斯基的《一周》等。苏联文学史上几部光辉的长篇史诗：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基本上或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还有一大批曾遭受压制或镇压的作家的作品，中国读者过去不大熟悉。如：犹太人作家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1，有的人译为巴贝尔），是20年代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

① 转引自马·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49页。

② 十月革命以后，托洛茨基曾是党内仅次于列宁的领导人。在1922～1923年，他写了一系列探讨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提出了"同路人"的概念。《文学与革命》就是这些论文的结集。这本书中还收了1924年他在党的领导层讨论文艺政策时的讲话，上面的引语就出自那篇讲话稿。托洛茨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跨入革命时代的旧作家对恢复文学培养新作家的作用，但他只是把他们看作"同路人"，并非发展苏维埃文学的主体，而且还明确地说，以后还会在两大派文学家中发生一次内战，那时才会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学。

家。他的代表作《红色骑兵旅》，描写内战时期布琼尼哥萨克骑兵进攻波兰的故事，是一部刻画骑兵军内在形象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环境的冲突。他的自传体回忆录《敖德萨故事》，严谨精练，常常使人想起莫泊桑和契诃夫。叶甫盖尼·扎米亚京（1884～1937），是一位追求表现主义的作家，是内战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最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之一。他于1917年写的《岛民》引起很大争论，在1922～1928年之间写的《北方》、《马麦》和《最重要的故事》，严谨和完美的结构，意味深长的细节，曾是新文学写作的典范。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是20世纪第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鲍里斯·皮利亚尼克（1894～1938），在1921～1923年写的《荒年》，是一部划时代的长篇小说。对20年代文学有贡献的还有长于歌颂自然的米·普里什文和下面将要提到的普拉东诺夫。

20年代，苏联文学之所以能够比较快的复兴主要是文学还没有达到强制化的思想一律，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还在起作用。当时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进行着有关文学发展的激烈争论，这对文学的恢复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因为，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艺术见解越多姿多彩，文学就越丰富，展现在它面前的前景也就越广阔。文学获得发展的自然源泉，就在于文学的多声。而且，20年代文学的复兴是在白银时代开辟的道路上的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在白银时代的文学传统影响下的复兴。白银时代的美学思想和流派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A. 绥拉菲莫维奇那样的老作家以及整个高尔基一派继续坚持新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主流，对一大批新作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些作家继续坚持现代主义，老作家布留索夫和索洛古勃继续忠实于象征主义，曼德尔施塔姆和库兹明，在诗歌中仍然坚持尽善尽美或“清澈的美”的原则。尤其要提到象征主义大师A. 别雷，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是象征主义散文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在20年代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在皮利亚尼克形象复杂、具有韵律风格的不连贯和充满激情的作品中，在亚·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对克里米亚内战中的描述中，在李别金斯基的《一周》革命斗争的场面里，以及后来在阿·维谢奥利《我的祖国》和《血洗的俄国》的松散的场景中，都能看出别雷对这些作家的影响。”[①] 即使比较次要的作品

① 美国学者马可·斯洛宁是一位长期从事苏联文学研究的专家。他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于80年代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位作者坚持20年代文学复兴的观点，对苏联各个时期的文学家及其作品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独到的评论。以上引语出自该书第52页。

也带有别雷的特征。象征主义的散文这个时期曾红极一时。叶·扎米亚京也对20年代的文学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在苏维埃初期通过给彼得格勒的文学班讲授散文技巧、在赫尔岑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课，传播雷米佐夫的新现实主义和他自己的表现主义。许多"谢拉皮翁兄弟"文学组织的成员都以他为师。至于未来主义的马雅可夫斯基、象征主义的勃洛克以及受其影响的叶赛宁，对20年代诗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虽然在发表诗作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他们仍然影响了许多新作家。

因此，在20年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都得到了发展。高尔基的4卷本《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体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革新，承认个性具有改造世界的权利，也承认个性拥有对这个世界实行强制的权利，即使以暴力的手段实施也是出于良好的目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列昂诺夫、费定等的一些长篇小说也属于这种新现实主义作品。当然，在这里应当提到，这种新现实主义为后来的范式主义提供了基础。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把现实主义同范式主义统一起来的作品。李别金斯基的《一周》绝对属于范式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传统。

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是扎米亚京和皮利亚尼克。扎米亚京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描写了一群把自己的个性在生理上实现了完全同一化的人物。他向读者展现的是：如果社会消灭了个性、个体因素，并将他们变成完全可以互换的"号码"，那么社会将成什么样子。他把大一统国度内人们划一的生活想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不仅人人平等，而且按号码分配对象。皮利亚尼克是一个象征主义者，拒绝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和决定论。他的长篇小说《荒年》用丰富多样的视觉，强调该书所呈现的世界总图景的破碎性，不仅情节失去现实主义传统中的组织作用，而且叙述的片断也是万花筒式的，更替似乎毫无逻辑。

20年代的文艺界还形成一种潮流，或者说暗流，继承果戈理的传统，不正面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而用荒诞、夸张、幻想的手法写作，表示对现实的一种批判。像高尔基的《英雄的故事》、《卡拉莫拉》，卡维林的《爱惹事的人》、《瓦西里岛上的夜晚》，布尔加科夫的《魔障》、《狗心》、《不祥的蛋》，特尼亚诺夫的《腊人》、《基热少尉》，格林的《绳索》、《克

雷索洛夫》、《灰汽车》等都属于这类作品。奥廖莎的长篇小说《羡慕》揭示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塑造人物上的原则性区别。总之，20年代苏联的文学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

遗憾的是，20年代文学恢复和复兴的势头没有能维持下去。到了20年代的后期，随着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不同派别斗争的胜利，文学发展的机遇也被逐步取消。1926年，《新世界》杂志刊登了皮利亚尼克的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这篇小说是以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国防人民委员伏龙芝死在手术台上为背景写的。作家通过自己的小说揭示个人的强权政治会破坏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自然规律。当局却认为小说影射斯大林，刊登小说的《新世界》杂志被迫停止发行，皮利亚尼克被迫多次检讨和认罪，仍未得到宽恕，30年代终于被镇压。对20年代文学恢复有很大贡献的扎米亚京的遭遇也很悲惨。他在20年代初就因对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忧心忡忡，1922年被彼得格勒的契卡人员逮捕，一度被投入牢房。他的长篇小说《我们》不能在国内发表，1929年在布拉格出版后，又一次遭到迫害，1937年只得出国。阿赫玛托娃不仅是诗歌方面，而且也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一面旗帜。她的作品展现了女性多方面的抒情性格。她在其《黄昏》诗集面世以后就被归入俄罗斯第一流诗人之列。但在2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新诗就被停止出版，以前的诗也不再重印。另一位著名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革命后未参加任何政治派别和集团，开始还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诗作，后来逐渐不为新政权所欢迎，结果流离失所，30年代遭镇压。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是革命后由一名军医成长为果戈理式的讽刺文学家，长篇小说《白卫军》被莫斯科艺术剧院改编为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为布尔加科夫和剧院带来荣誉，也使他们遭受灾难，时而被禁演，时而又开禁。布尔加科夫被扣上一顶十恶不赦的罪人的帽子，他所写的大量戏剧都未得到上演的机会。绝望中的布尔加科夫1930年给斯大林写信，诉说批评他的文章达到298篇之多。后来，布尔加科夫在艺术剧院觅得一项工作，就埋头写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安·普拉东诺夫（1899～1951）是革命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在20年代中期成为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主编的《文学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起疑心的马卡尔》，受到当局的指责，从此就遭厄运。后来他的很有价值的作品《地槽》、《切文古尔镇》，都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

不只是这些因审美观点的不同、作品不被当局接受的作家受到了压制与打击，像马雅可夫斯基这样一直对革命饱含热情，不仅为革命写诗、歌唱，而且到通讯社和宣传部门工作，甚至为宣传画作题词、为商业做广告的人，也遭到极不公平的待遇。由于对国家社会生活中一些腐败现象的担忧，他在 1928、1929 年写了讽刺剧《臭虫》和《澡堂》，便得罪了当局。"左派文化阵线（列夫）"被解散，杂志被停刊，已准备好在报刊上刊登的肖像被撤下来，正在上演的《澡堂》一剧也被停演。马雅可夫斯基遭到一系列打击，加上本人在爱情上遇到挫折，1930 年 4 月 14 日拔枪自尽。

20 年代初出现的文学团体和小组逐渐遭到打击，文学自由讨论的风气被扼杀。1926 年"拉普"发生分裂。1927 年，沃龙斯基被逐出文学战场。1930 年 4 月，在共产主义学院举行了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讨论会，"山隘"小组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化身遭到毁灭性的批判，尤其指责他们所坚持的人道主义，说"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既然高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然就离不开'人道主义'口号"。[①] 在文学批评战线上坚持文学的人道主义和正确对待传统的"山隘"受到致命的打击。1932 年 4 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议。决议声明："几年以前，当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在文学界具有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队伍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经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②] 这段话表明，党又回到革命初期的立场上，重新把大批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活跃"而"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家作为"异己分子"，而且强调领导一直"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根据这项决议："拉普"、"伐普"之类无产阶级作家团体被取消，"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党团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③] 决定之所以没有宣布取消其他作家团体和组织，是因为这些组织实际上已经消失或名存实亡了。从此，苏联作家被统一在共产党专门组织的管理下，各个文学团体和组织并存的时代结束了。

---

① 转引自符·阿格诺索夫主编《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第 144 页。

②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3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 2 页。

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3 卷，第 3 页。作协主席团的决定附录在政治局决定的后面。

斯大林不仅要作家在组织上统一，而且还要在思想上统一，在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上统一。经过反复的思考与研究，苏联提出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或者说理论。1934年8月21~31日在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领导下举行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作家协会章程对这一理论作了这样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们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的、历史的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①] 从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尊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理论和方法，此前所存在的其他所有审美思想和方法都被罢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要作为一种审美观来理解，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要求。艺术变成创造艺术神话的工具。人被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要被改造、教育、塑造成适合社会主义的“新人”，即标准环境中具有标准个性的人。结果人失去了自我价值。文学的研究和认知功能退到第二、第三位，主要功能变为进行宣传教育。现在，俄罗斯的学者用“норматизм”来表达这种“美学思想”。中国学者有的译为“范式主义”，也有译为“规范主义”。这种“范式主义”在实践中曾严重地影响了俄罗斯文学在国内的健康发展。

作家协会一开始就成为限制作家自由、打击迫害作家的工具。1936年2月，老作家玛·沙吉尼扬写信给联共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要求退出“无益”的作协。谢尔巴科夫给高尔基写信，要作协“狠狠地打击她，好让别人不敢再这么做。”[②] 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因此谴责沙吉尼扬的“举动与每一个苏维埃集体对其成员的基本要求尖锐对立，是严重反社会的”。1936年8月25、26日，作协党组召开讨论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判决。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会议。由于托洛茨基在20年代初曾发表过文学问题的意见，在作家中有一定影响。这次会议借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名义打击了许多所谓的“异己”作家。文学和戏剧评论家皮凯利被定为“匪徒”，把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利万诺夫斯基、格鲁茨卡娅、特罗

① 引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出版社，1959，第21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2、14页。

钦科、塔拉索夫－罗季昂诺夫等作家打成“两面派”和“叛徒”。“山隘”是打击的重点，《红色处女地》杂志的主编、“山隘”的实际领导人沃龙斯基被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和他有联系的伊万·卡达耶夫就成为这次揭露的重点，还牵涉他和皮利亚尼克的关系。伊万·卡达耶夫被开除党籍。《红色处女地》杂志的新主编叶尔米洛夫也被点名，说他“维护与卡达雷诺夫有联系的已被逮捕的马兹尼”。[①] 其他几种文学杂志也没有逃脱指责。《新世界》被指责刊登皮凯利的作品，《十月》被指责刊登谢列布里亚科娃的作品，《文学报》被指责不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还吹捧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阿戈尔。会上还指责了拉普的领导人阿韦尔巴赫、马卡里耶夫等。会议还揭露作协党委书记马尔钦科同谢列布里亚科娃有联系，变成她的“文学走狗”。接着，还召开了作协主席团会议。安加罗夫在会后的报告中，竟诬指奥廖莎等一批作家被托洛茨基恐怖分子施密特灌醉，准备暗杀伏罗希洛夫，还涉及巴别尔、马雷什金等。[②] 后来，又发动揭发与布哈林有联系的作家。整个30年代被枪杀或死在集中营中的作家有诗人 H. 克留耶夫、奥·曼德尔施塔德、Б. 科尔尼洛夫；小说家伊万·卡达耶夫、Б. 皮利亚尼克、马雷什金；政论讽刺作家 M. 克利佐夫；批评家 A. 沃龙斯基和其他许多文学家。被捕入狱服刑的有 H. 扎博洛茨基、Л. 马尔登诺夫、Я. 斯梅里亚科夫、Б. 鲁契约夫和其他数十名作家。[③] 对作家的镇压造成文学队伍中的告密风，有些人不断向中央机关写告密信、在报刊上发表斥责文章，严重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活动，有些作家虽然没有被抓走，只能沉默，坚持写作的作家，像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还有战前回国的茨维塔耶娃、克鲁乔内赫等只能把作品藏进抽屉。

30年代后期，党的领导对文学的控制更加严厉，政治干涉越来越具体。肖洛霍夫在写作《静静的顿河》的同时还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他写信给斯大林，反映干部在粮食收购中对集体农庄庄员进行折磨与凌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8页。

② 《安加罗夫、基尔波京关于作协理事会党组会议情况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7～23页。

③ 这里的数字是根据一本文学史上的估计，据索尔仁尼琴在1967年的一封信里说，在苏联时期共有600多名作家遭镇压。

辱，斯大林指责他“庇护怠工分子”。《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出版时被删去了反映集体化存在问题的章节。1937年竟有人污蔑他要在顿河流域搞反革命叛乱，经他亲自去莫斯科进行辨明才得解脱。老作家玛·沙吉尼扬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入场券》，第一部《乌里扬诺夫一家》是写乌里扬诺夫一家生活及列宁童年和少年的纪实性传记。小说得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首肯，但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却做出专门决定，指责其“是一部政治上有害的、思想上敌对的作品”。[①] 在全国大镇压已经过去以后，1939年5月；巴别尔却在自己的别墅被捕，诬指“进行恐怖活动”，并于1940年1月被枪决。这年8月，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赫拉普钦科批准上演列昂诺夫的剧本《暴风雪》。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却向日丹诺夫报告，该剧“意识形态上有害”。库兹涅佐夫向中央报告说：“剧本就其思想内容来说体现了最坏意义上的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主题没有现实意义，没有提供能够反映我们现实的典型，充满了模棱两可和虚假的论点。”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剧本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是对苏联现实的恶毒诽谤，禁止在剧院演出。”[②] 1940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阿赫玛托娃一本作品选，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门决定，不只查封了出版物，而且还处分了出版者和审查者。

在1941～1945年的苏德战争时期，1000名作家参军上前线担任随军记者、战士报编辑等职务，其余2/3没有上前线的作家，相当一部分人被疏散到边远地区。不论在前线还是后方，绝大部分作家都为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就在这个时期，政权对作家的监督与控制并未减弱，甚至还进一步强化了。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的威信降低，便由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事宜。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和两名副部长负责向中央书记报告文学战线的情况。1941年12月中，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创办《文学和艺术报》，宣传部规定，报纸的大样应该在出版的前一天印出来送宣传部审查。在1942年6月，亚历山德罗夫就给谢尔巴科夫报告了因该报21期的错误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召开编委会分析错误，撤销皮斯马尼克的主编职务，召开中央一级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43页。

② 关于《暴风雪》一剧的报告与处理决定，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60～66页。

报纸责任主编会议，还给宣传部工作人员别列杰夫、叶戈林、奥尔洛夫警告处分。[①] 乌克兰著名作家、电影导演亚·多夫仁科写了两部反映乌克兰人民反抗法西斯斗争的作品：中篇小说《胜利》和电影脚本《战火中的乌克兰》。亚历山德罗夫在1943年7月和11月两次给谢尔巴科夫打报告，严厉地指责作家犯了“民族主义”和“攻击党的各项政策”的错误。党的领导下令，非经宣传部的批准不得刊登多夫仁科的作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撤销多夫仁科斯拉夫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委员、《乌克兰》杂志编辑和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等多项职务的决定”。[②] 在战争期间，联共（布）对许多作家进行了谴责与批判。比如，中央书记处做出的《关于谢尔文斯基创作中错误的决定》说：“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谢尔文斯基的诗《献给俄罗斯》、《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和《插曲》包含着严重的政治错误。”联共（布）中央警告谢尔文斯基，“他如重复类似的错误，必将被清除出苏联文学界。”[③] 尼·阿谢耶夫是一名老作家，他写的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事曾获得斯大林文学一等奖。作者把自己一部分写战争年代生活的诗编成一本《雷鸣年代》，交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亚历山德罗夫收到出版社签署付印的书稿后，1943年11月26日向谢尔巴科夫报告，指责作者把苏联后方生活写成“庸俗的生活”，“是亚洲式的野蛮愚昧”，要求必须禁止这本书的出版。[④]

1943年12月2日，亚历山德罗夫及其两位副部长普京、叶戈林给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一份很长的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文学杂志《十月》、《旗》等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发表了一些反艺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其中举了谢尔文斯基的诗和普拉东诺夫等10名作家的小说和特写，重点指责左琴科的哲理小说《日出之前》，是“卑鄙下流的反艺术和政治上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03、104页。

②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处理中篇小说《战火中的乌克兰》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谢尔巴科夫关于多夫仁科问题给谢尔比纳的指示、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多夫仁科职务的决定，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在苏联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关于电影故事“战火中的乌克兰”批判发言》，有的研究者说是斯大林的讲话，虽然至今得不到有关材料的证实，但讲话稿的内容表明对多夫仁科问题看重的程度。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16页。

④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19~215页。

有害的。"① 并严厉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主席团的领导工作。在他们的建议下，这一天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对文学杂志进行监督的决定》，责成亚历山德罗夫和普京组织对杂志内容进行监督，杜绝可疑和反艺术的作品在杂志上出现；同时指令宣传部对杂志实行分工负责监督：亚历山德罗夫负责《新世界》、普京负责《旗》、费多谢耶夫负责《十月》。第二天，中央书记处还做出《关于提高文学杂志责任书记责任感的决定》，责成各文学杂志责任书记提高作品质量，杜绝杂志上出现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警告他们在领导杂志以及杂志的政治思想方向和内容上要对中央承担个人责任。在这样严厉的监督之下，杂志编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旗》副主编说，有无数的主管部门负责对杂志进行监督。清样要寄给书刊总局4份，由他们的全权代表和高级首长审阅，但他们无权批准付印，要等宣传部叶戈林、奥尔洛夫提出意见。苏联作家协会责任书记也要审阅。除此，涉及军事问题的，要送军事书刊审查机关签署意见，与国外题材有关，要送外交人民委员部书刊处签署意见。一部作品经军事机关通过了，却被书刊总局给撤下来，得到外交人民委员部肯定了，却引起宣传鼓动部门的反对，往往期刊已经印出，却被责令撤掉一些作品。对于出版事务也进行了严厉监督，1943年一年就撤销了432种书籍和小册子出版。许多书稿被查禁。

战后，从文学界开始整肃知识分子的"日丹诺夫运动"，表面上是因为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刊登了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几首诗和左琴科童话小说《猴子奇遇记》引起的，而实际背景是，在苏、美开始冷战的大环境下，斯大林要在国内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统治，敏感而活跃的文学界首当其冲。尽管已经对作家从组织上、政治上以及创作思想和方法上进行了严格控制，但是，由于战争激发了作家的民族自信心和创作自由的诉求，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公开批评党的文艺方针。Ю. 尤佐夫斯基在他的《批评日记》一文中提出："是应该思考一下的时候了，战争实际上带来什么，在哪些方面使我们比战前更聪明和更精明了，以便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的观点和某些经验。"他还说：战前占统治地位的"描述和反映标准"，在文学中"产生了粉饰现实和盲目乐观的现象"。② 谢尔文斯基在一次会议上提出：

① 该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28~143页。

② 《叶戈林、约夫丘克关于文学杂志〈旗〉的文章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80页。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目前艺术面临的任务之间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框束缚着当代艺术，因此应当用社会主义象征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能力。”[①] 连《旗》的主编维什涅夫斯基在作协会议上也发言说：“我在这个冬季和春季在莫斯科各种会议上作了数次发言，发言中涉及对我们大家来说很现实的言论自由。”他甚至说：“我们战斗过，我们斗争过，给我们言论自由吧。”[②] 在战争中因《日出之前》受到严厉批判的左琴科在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仍然毫不隐讳地说：“我认为目前苏联文学情况很可怜。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公式化，大家都按照一定的公式写作。因此，甚至一些有才华的作家都写得很不好，枯燥乏味。”当安全工作人员问他今后的态度时，他说：“我需要等待。很快，战争结束以后，文学环境就会改变，为我设置的一切障碍都将消除。到那时我又能出版作品了。目前我在哪方面都没有变化，我将保持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因为读者了解我喜欢我。”他认为战后“将会要求文学更尖锐和更无情地写我们的缺点。”[③]

针对作家队伍存在的情况，联共（布）选择了向来以思想自由著称的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两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突破口。左琴科是一位幽默和讽刺作家，他又是 20 年代“谢拉皮翁兄弟”成员；阿赫玛托娃是一位抒情诗人、白银时代象征主义的代表，在列宁格勒青年中有很大影响。对这场运动，主管思想工作的宣传部和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全力以赴，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也插手其间。1946 年 8 月 9 日，召开了中央组织局会议，出席会议的不只是组织局的成员，还包括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和部分著名作家。斯大林亲自参加。尽管《旗》和《列宁格勒》杂志的主编和列宁格勒作协负责人、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都从自己职责上作了检讨，进行了自我批评，但仍受到严厉的谴责。斯大林不断插话，驳斥对被批评者的任何说明与辩解。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指责说：“对外国作家阿谀奉承”，“卑躬屈

① 《叶戈林关于战时苏联文学状况致马林科夫的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3 卷，第 238 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3 卷，第 252、253 页。

③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关于〈日出之前〉等问题与左琴科的谈话情况》，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3 卷，第 201 页。

膝"，"是个大罪过"。马林科夫追问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批准左琴科为杂志的编委？日丹诺夫则表示："到时候列宁格勒人会让左琴科彻底完蛋。"[1] 8月1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做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决议指责"阿赫玛托娃是那种与我们人民格格不入、空虚无聊而又缺乏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审美情趣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是对苏联生活的下流诋毁"。决定：禁止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之流的作品进入杂志；停止《列宁格勒》，给杂志主编利哈廖夫警告处分；任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戈林为《星》的新主编，解除列宁格勒党委管理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希罗科夫的职务；给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警告处分。[2]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批判与镇压的序幕。会后，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左琴科曾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并把这个团体定性为"有害集团"；不只强调阿赫玛托娃是"资产阶级—贵族阶级诗歌的代表"，还批判了白银时代的"高峰派"（即阿梅克派），并表示"绝不允许推广阿赫玛托娃"，"毒化意识"，甚至还指责"1907～1917年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最卑鄙可耻的十年"。[3] 随后广泛地开展了对"现代主义"、"颓废主义"、"形式主文"、特别是"无根基、无国家的世界主义"的批判。这充分表示要彻底否定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和20年代文学复兴时期的各文学流派和小组，要坚持同西方的思想意识和美学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久，中央又做出一系列决议，批判了爱森斯坦的电影《伊凡雷帝》和作曲家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还批判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同时，还在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中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随着思想批判的开展又对知识分子及作家进行新的逮捕，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又出现了文学家第三次流亡国外的情况。

30～50年代对文学采取的这一系列严厉监控和政治高压政策，除去牺牲了一批著名作家，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20年代复兴后出现的波

---

① 关于这次会议的速记记录载《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91～313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收集了有关"日丹诺夫运动"的主要文件，这项决议也在其中。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91～313页。

浪汹涌的文学大潮，分成了几条支流：侨民文学队伍，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和公开活动的文学队伍。

20年代初迁居国外的侨民文学家，后来有人回国，有人死亡，人数在减少，而在30年代和50年代的镇压中又有新成员补充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远离祖国，处于特殊环境下，保持着独立的创作态度，结合国家和社会的变迁继续思考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包含两种情况：一些人完全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只能在隐蔽状态下埋头创作；另外一些人部分作品被剥夺了发表的机会。这两部分作家忍受着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却不愿放弃自己的美学信念，以极大的勇气继续创作。侨民文学家和国内的潜流作家实际上属于体制外的文学力量，其中集中了比较多的文学精华，他们也更多地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留下不少不朽之作。在侨民文学家队伍中，除了已经提到的蒲宁外，还有被誉为“引导人从黑暗历经苦难和不幸走向光明”的伊万·什梅廖夫（1873～1950），代表作有《死人的太阳》、《一个老妇人的故事》和《禧年》，都是影响很大的名作。弗·纳博科夫（1899～1977），曾侨居德国，后来居住美国，被誉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他是诗人，又是小说家，还是研究文学史的权威。最著名的作品有《玛什卡》、《死刑邀请》、《洛丽塔》。虽然也用英、法等文字发表作品，被列入美国文学史，但“纳博科夫的创作保证了俄罗斯当代文学与20世纪初文学的连续性”。[1] 伊万·叶拉金（1918～1987），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基辅后被赶到德国，1950年迁居美国，是第二批侨民中的头号诗人。他的不少诗作被传抄到国内流传。在国内进行隐蔽创作的文学作品，像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写了12年、阿赫玛托娃的《没有主人公的长诗》写了22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从1947年写到1955年。在国内未得到发表和出版机会的，像扎米亚京的《我们》，普拉东诺夫的《地槽》、《切文古尔镇》，还有皮利亚尼克的《红木》等。这些作品后来都成为俄国和世界的文学名著。

在国内公开活动的文学家队伍人数相对多些，也有相当多的名作家，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不少，其中不乏名著。但是，文学活动的环境不正常、

① 符·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第320页。

不健康，作家经常被置于尴尬和难堪的境地。首先，一些作家只能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态度来摆脱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束缚。肖洛霍夫 1940 年完成了《静静的顿河》的最后一卷。这部长篇史诗是苏维埃时代引以为骄傲的文学成就之一。这部作品并不全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成的。作家通过葛利高里的生活、劳动、爱情和战斗历程，倾诉了哥萨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结束的 9 年时间中所遭受的苦难，从而揭示了俄罗斯人民的悲剧命运。特瓦尔多夫斯基是 20 世纪中期苏联杰出的诗人。他的《瓦西里·焦尔金》是战争诗歌的代表。这部歌颂一名普通战士的勇敢、机智、尊严、自主、克服一切困难、取得胜利的战士之歌，打破了官方的程式和框框，诗中既没有最高统帅的名字，也没有对他进行颂扬，专注地塑造富有俄罗斯性格的民族英雄形象。从主题的选择与发挥、感情的抒发、语言的通俗流畅，都表现了作家追求自由、摆脱庸俗政治化窠臼的强烈愿望。列昂诺夫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心理、哲理小说家。30 年代以后，他的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暴风雪》之外，一般能够得到发表，剧作《进攻》被长期上演。表面上看，他写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科学实验和研究，也写战争和人民对法西斯的斗争，但这位被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门徒的作家，在人物和结构上狠下功夫，常常用高度浪漫的、华丽和象征主义手法塑造悲剧式的人物。在复杂的故事情节里隐藏着哲学意义——俄国的本质和命运、它的传统和希望。其实，像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B. 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战争小说的成功都在于作者恢复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写作手法。

其次，作家随时都有受到指责和批判的可能性，即使是一再受到表彰和紧跟政治路线的作家也不能幸免。法捷耶夫一直紧跟斯大林，长期担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1947 年发表了反映敌占区克拉斯诺顿青年同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斗争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普遍赞扬，但领导当局却批评作家没有反映地下党的领导。法捷耶夫花了四年时间进行了修改。修改本党的领导有了，而文学的价值则大大降低了。[①]《新

① 西蒙诺夫 1956 年在《新世界》第 12 期发表了《谈谈文学》一文，其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批判和修改的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的《关于“解冻”及其思潮》一书编入了该文的主要部分。

世界》杂志刊载了瓦·格罗斯曼用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描绘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第一卷，立即遭到指责，作者被指责“过多地描写心理活动，渗透着敌对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杂志被迫检查，第二卷一写出，即被没收。[①]

再次，1946～1948年党中央的一系列决议以及因此而开展的一系列批判，把相当一部分作家推上了“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道路。这些作家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进行写作，结果出现两类作品，一类是极力宣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另一类不顾事实地歌颂升平，虚构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只考虑意识形态，根本不顾及美学要求，往往千篇一律，脱离现实。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不断搬用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情节，即一位革新者和一位保守者的冲突，或者一个落后的集体农庄转变为先进的集体农庄。凡是写了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写了各种利益之间、抱负之间的各种矛盾或感情之间的冲突，就被指责为“诽谤者”或“潜在的敌人”。戏剧遭到的打击尤为沉重，纳扎洛夫、格里德涅娃在195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36年，全部艺术领导工作集中在全苏艺术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相继停演了肖斯塔科维奇等的一系列戏剧，关闭与合并了许多剧院，在两三年内就使戏剧艺术的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灰色的、千篇一律的“陈规旧套和刻板公式”以及“矫揉造作”占了统治地位。在领导方法上，谢尔巴科夫“对艺术工作委员会的要求：如果有人要写一个苏维埃新歌剧，那么请费心对这一工作进行帮助和监督，并要经常了解工作的进程”。在实际工作中，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从剧本的写作到允许排练、导演选择、演员挑选、舞台设计都要经过剧目委员会的审批。文章举了列宁格勒一位剧院院长雅·库尔丁诺夫的说法，这样监督的结果，“最后决定一个剧本命运的是剧目委员会的某一个人。一个人武断地给集体的工作提出评价，指出导演应该怎样处理剧本，演员应该怎样扮演角色，美术家应该怎样进行舞台设计，甚至说明怎样管理灯光。”“个人的兴趣代替了观众的要求。”艺术创作的自由完全被取消。个别领导个人的审美好恶变为领导思想。“领导”的概念越来越相等于“命令”的概念。于是行政命令和广泛

① 《为了正义的事业》幸存下来的章节和后来作者揭露乌克兰大饥荒和大恐怖情况的《万事如意》在国外出版。

运用各种各样的压制办法就成为影响艺术的主要方法。[1]

所以，到斯大林去世前，苏联的文学处于危机和畸形发展之中，形象地说就是“结冻”状态。对于国内文学艺术方面存在的这种情况，甚至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平庸乏味的灰色作品，有时简直是歪曲苏联现实的粗制滥造的作品。”[2]

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的去世开始了苏联历史的新时期。文学家首先感受到社会气候的变化。这年 4 月，列宁格勒女诗人 O. 别尔戈丽茨在《文学报》发表的《谈谈抒情诗》一文中就说：作家“不可能没有个人表现”，呼吁诗歌中“多一些真诚和解放”。她批评：在“很多抒情作品中缺乏主要的东西：没有人情味，没有人”。一些诗人“一听到个性这个词”竟“不寒而栗”。这是文学界发出的最早呼声，要求文学回到它的主题，即人和人的感情上来。5 月 1 日，《文学报》打破了多年来官方庆典的传统，在第一版刊登了整整一栏爱情诗。

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回忆，他决定写一本中篇小说并立即写下书名《解冻》的时候，曾想到 1953 年的 4 月。这年 4 月，对俄罗斯来说不只意味着春天的即将来临，而且还是一个难忘的特殊时期。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月，国内的政治生活已经发生变化：“医生案件”平反、公布了苏联人民演员米霍埃尔斯被谋杀的消息。[3]

6 月 23 日，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决定重新吸收 1946 年被开除的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为作协成员。作家兼评论家 K. 丘科夫斯基得知这一消息以及《鳄鱼》杂志有可能发表左琴科沉默时写的短篇小说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包括绝大多数文学家和艺术家将获得新的生命！”[4]

---

① 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第 61 页。

② 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3，第 70 页。

③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第 481、483 页。

④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 - 1964 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с. 81.

7月25日，作家谢尔文斯基因非党诗人谢赫捷尔的诗集被出版社拒绝而给马林科夫写信。信中说：作为作协会员的专业作家不去找作协，而找自己的文友，说明"他对作协已不寄希望"。他接着批评，笼罩在作协内部的"恶劣气氛"，"距社会主义艺术家自由创造、自由争鸣的纯洁气氛太远了"。写信人还批评党中央宣传鼓动部，早在战争时期，为了把作家协会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中，在作家中选拔了几十名"有关系"的文学工作者，把他们安插到文学界各个部门，正是这些人占据了领导岗位，进而成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各杂志、丛刊、出版社编委会，甚至斯大林文学奖金评选委员会的头目。他们拥有无限权力，官官相护，相互纵容，充分肯定自己，清除竞争对手，最终脱离作家，成了广大作家所深恶痛绝的帮派。[①]

8月22日《文学报》以И. 沙米亚金《幸福时刻》小说的命运为例，批评"一些编辑和评论家不正确地帮助作家，却促使他们伪造和通过不妥当的方法粉饰现实"，号召作家在那种情况下应勇敢地对抗批评者的非难。

诗人瓦·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在文学的"解冻"时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杂志的8、9月号上连载了费·潘菲洛夫的《伏尔加河——母亲》。小说主人公大声疾呼："忘掉规划，想想人民的需要吧！"[②] 潘洛娃的《一年四季》揭露了一个利己主义者和投机家的上层人物。作曲家阿·哈哈图良说："创作问题不能用官僚主义方法来解决。"[③] 爱伦堡在《旗》杂志10月号上也提醒读者：艺术上的统计和工业上的统计完全是两码事，契诃夫和高尔基，他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而不受行政官员和作家协会的监督。

《新世界》杂志12月号发表了弗·波梅兰采夫《论文学的真诚》一文，作者大胆而激烈地批评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他认为，创作需要才华，首先要有真诚。有些作品之所以"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人物和环境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就是因为作者缺乏"真诚"。他指出，"一切公式化，一切非出自作者本意的，都是不真诚的。"而最坏的乃是"粉饰现实"。"粉饰现实"源远流长，表现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凭空杜撰

① 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91~92页。
② 马·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338页。
③ 马·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337页。

永庆升平的景象”；掩盖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丑事和坏事”；回避矛盾和斗争。他告诫作家：“你如果总是要看某人脸色行事，你就是个坏作家。”千万不要干“估价行情”的蠢事。他还批评一些评论家“发出的不是声音，而是回声，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只是四处散播别人授予他的东西。”他甚至说：“那些追随斯大林奖金的颁发而写的文章，一般说来只是点胡椒面，而不是文学的概述。”[①] 波梅兰采夫的这些言论，立即引起了共鸣。古比雪夫的一位读者在信中写道：“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这种丑恶的现象，并且愤恨至极，作家替老百姓说出了“大胆、实在而又公正的话”。这位读者还表示：“所有有头脑、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②] 作家B. 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说：“我认为，波梅兰采夫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因循成习的不诚实，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③]

12 月 5 日，丘科夫斯基同费定会见了文化部长波诺马连科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波诺马连科向他们叙述了自己朴实的自由主义新纲领，并告诉他们，他给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说了，今后演出从首长的监督下解放了。[④] 12 月 6 日，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被停演了 1/4 世纪之后，经过重新排练，在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不过，就在 1954 年初，波诺马连科却被调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而文化部长改由原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担任。这里已经包含某种玄机。

《新世界》杂志在 1954 年的 3 月号上发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的一部分。这是诗人对时代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的叙事诗，表达了“人的自我独立——是他伟大的保证”。“解冻”文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强烈要求表现过去被压制了的人的个性，它的内在自由，他的尊严，它的责任感。在这首长诗中有“伟大列宁从不是神/也没有叫人造神”

---

①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 254 ~ 270 页。

② 俄罗斯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第 1702 库，第 6 卷宗，第 72 分卷，第 69 页，转引自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 294 页。

③ 俄罗斯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第 1702 库，第 6 卷宗，第 77 分卷，第 52 页，转引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第 294 页。

④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 – 1964 гг., с. 81.

的诗句。[1] 4 月号刊登了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 Φ. 阿布拉莫夫《战后散文中的集体农村人》评论文章。作者大胆触及了"最神圣的东西"——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作品，批评了巴巴耶夫斯基、马尔采夫、尼古拉耶娃及其他作家的"模范作品"，说他们不惜用粉红色油彩把平日集体农庄生活描绘成光辉灿烂的节日景象，嘲笑了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千篇一律的主人公、互相雷同的俊男靓女。这一年，阿布拉莫夫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兄弟姐妹》。这是"解冻"时期头一部比较成功的描写北方农村生活的作品。

就在这个时候，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在《旗》5 月号与读者见面。这部小说打破了苏联文学的"常规"，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问题上，没有着力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而是把眼光移到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普通人及其道德伦理冲突上，即普通人的爱情、对职业的态度和个人幸福等问题上。小说中几对从强制和镇压时代过来的男女，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冷漠呆板，唯恐自己变得直率和随和，生活并不幸福。在春寒之后，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追求。小说揭露厂长茹拉甫廖夫，为了取得上级的信任，只抓生产和技术革新，不顾职工生活，结果职工居住的简易房倒塌，造成灾难。玩世不恭的画家沃洛佳只画能捞到好处的宣传画，画技衰退，而他的同学萨布罗夫甘于寂寞和忍受生活的贫困，坚持创作，精益求精，取得了很大成绩。作者告诉人们要真诚对待一切。这部小说不算杰作，但它却打动了成千上万的人竞相阅读。9 月 23 日在莫斯科发行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

也就在这个时候，特瓦尔多夫斯基把自己的新诗《焦尔金在阴曹》交给《新世界》编辑部征求意见。对这部作品，有的编辑赞扬，有的则表示担心。K. 西蒙诺夫从《阴曹》的话语中看到对政治局明显的暗示，正式反映到党中央。中央书记 П. 波斯佩洛夫转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被其中一节——"山鼠"士兵压迫国王——激怒，开始对文学家采取行动。作家协会的实际首脑、理事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A. 苏尔科夫在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讲话时指责了《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5 月 25 日，《真理报》刊登了苏尔科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① 符・阿格诺索夫：《20 世界俄罗斯文学》，第 495 页。

旗帜下》的文章，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波梅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指责该文“有害”，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文学原则”。他还批评了其他杂志和作家。批评佐林的剧本《客人》攻击党的传统。结果这个剧在耶尔莫罗夫剧院公演的第二天就被文化部勒令停演。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最后的遗言》里写道：“爱伦堡把他的一部小说命名为《解冻》，从而创造了一个用来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可是，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完全同意他用‘解冻’来表示那个时期的特征。”“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我们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所有堤坝的浪潮。”[①] 赫鲁晓夫的话表明，新领导集团对于知识分子的“解冻”要求虽然赞成但又害怕它变成冲破一切堤坝的洪水，因此便采取批判的态度。

6月6日，《共青团真理报》发了一篇《肯定生活——这是我们文学的力量所在》的专论。文章说：“共产党对我们的作家关怀备至”，希望他们用“鲜明的艺术形式”把“先进的思想灌输到广大读者中间”。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作家“匆匆忙忙制造了不少作品，其中的主人公是些骗子、无赖、政治上道德上蜕化分子”。文章点名批判了佐林的《客人》等作品，对于爱伦堡的《解冻》的评论是：“乍一看来，好像如实地描绘了生活，勇敢地激烈地提出了当代许多尖锐问题。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主要强调了生活的阴暗面，这样就歪曲了生活的真实。”[②] 作协书记苏尔科夫在6月15日《文学报》刊登的《改进对作家思想教育工作》一文中，也有一段专门说到爱伦堡及其小说《解冻》的文字。其中说道：“我们必须严肃地、有原则地批评他的中篇小说的一些缺点。”[③]

7月17日和20日《文学报》发表了主编西蒙诺夫的《伊·爱伦堡新的中篇小说》长篇评论文章。这位作协负责人继续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原则，对小说的内容和所描写的人物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苏联社会中“少见的”，“在他们的生活里看见的坏事

①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第38页。
②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143页。
③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147页。

多，好事少”，把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小说中就造成一幅阴暗的背景”。西蒙诺夫用了多半篇幅通过对小说中的几个艺术家形象的分析和批评，指责作家歪曲了苏联文艺界的状况。他分析说，由于作者“观察的草率和肤浅”不仅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性”，而且“对作品的艺术性也有不良影响”。在他看来，“这篇小说比起伊利亚·爱伦堡最近十五年来所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坏”。他的结论是：“这篇小说虽然有好的篇页，但整个小说，对我们文学来说，却是作者的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①

7月17日，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赫鲁晓夫写信，为讨论《新世界》杂志工作的相关问题和自己未发表的长诗，请求接见。赫鲁晓夫在党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指责《新世界》发表了有争论的作品及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在阴曹》。他认为应当从这样的立场来批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缺点：“敌人指望，斯大林死后党的路线将修正。但是他们错了。”赫鲁晓夫承认，这类“偏向”的部分责任应当由党的领导来负。“我本人有过错，对个人崇拜阐明不够，使知识分子产生幻想。”他明确表示：“现在，我们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是此前党的工作所创造的所有经验的路线。我们是列宁主义者，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② 8月3日，决定解除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杂志主编的职务。

尽管赫鲁晓夫和文学界的领导人对爱伦堡等的“解冻”和《新世界》杂志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但是，这些作家的行动却引起了相当大的共鸣。爱伦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西蒙诺夫等所进行的批评和评论反而引发了“要不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文学如何表现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以及正面人物该不该有缺点？”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普罗托波波娃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坚持日丹诺夫“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人物”的观点，认为“塑造理想人物的形象目前已成为当代苏联文学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③ 多数作家不同意这种意见。别里阿什维利在《文学报》上发表的《现实人物和臆想人物》一文中指出，普罗托波波娃等主张写理想中正面人物的人，实际上对社会“阴暗面视而不见”，“硬要把主人

① 西蒙诺夫的文章原载《文学报》，中文本见《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148～179页。

②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 – 1964 гг. , с. 86.

③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88页。

公内心斗争抹煞掉”。他们所谓的正面人物是“某种特殊类型的人”，是“无罪的天使”，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他认为，正是主张写理想人物的人把作家拖进“无冲突论”的泥坑。[1] 凯特琳斯卡娅说，醉心于塑造“理想”人物，势必导致说教气味。“最糟糕的莫过于编写那些早在自己脑袋里构思好的纯属正面人物了。”这些人物“完全成熟”，“无所不知”，“一贯正确”，可惜缺少了生命力。[2] 留里科夫说，这一争论是与蛮横的简单化和公式主义的争论。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是强迫文学接受一种“伪善要求”。作家塑造自己的形象不是从配方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用玫瑰色来描绘天使的圣像，这些圣像绝不能代替生动的形象。“假如引向无冲突、引向粉饰现实、引向歪曲生活真实性的‘理想人物’这一概念占了优势，那么文学就将遭到毁灭。”[3]

为了把文学界出现的这种要求“解冻”的情绪和行为及时控制在党的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苏共中央决定召开作家代表大会，统一思想。但在会前，卡维林、卡扎凯维奇等7名作家发表了《致同事们的公开信》，表达了作家对作协组织的不满和改组作协的具体建议。信中说：在各种刊物、各种座谈会和代表会议上，“年年可以听到对作协的责备”。“它的工作徒劳无益”，“这一庞大臃肿的机构无法弄清我们文学中的复杂现象”，“作协领导很少了解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很少考虑他们的真正的创作兴趣”。“作协已经由创作组织变为某种管理文化事业的行政机构。”公开信建议，撤销作协的各种委员会，由一些著名作家通过杂志、出版社、报刊组织创作，培养青年作家，把作协变为集体的创作组织。[4]

在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协书记苏尔科夫作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与任务》的主旨报告。他仍然认为，在党的路线指导下，20年来文学的发展状况是“好”或甚至比“好”还多一些。报告人不好直接反对作家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因为新领导正用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黑暗面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所以，便使用了一个听起来与“社会主义现实主

①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90~291页。
②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96页。
③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00~301页。
④ 卡维林、卡扎凯维奇等7人《致同事们的公开信》，见《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02~304页。

义”不相容的名词“心灵状态”，说：“一个作家如果陷入了狭小的‘心灵状态’，就必然要遭受失败。”“一些很有经验的作家，如伊·爱伦堡在中篇小说《解冻》中和维·潘诺娃在长篇小说《一年四季》中的失败，完全不是这些作者集中注意去批评生活中黑暗的现象而造成的。批评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糟糕的是在于他们违反了方法上的客观法则，站在抽象的‘心灵状态’的不牢固的基础上，将作者对于苏联人的任意的主观的看法与社会的人之个性发展的规律对立起来。”① 西蒙诺夫比苏尔科夫要实际一些，他在《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报告中，不得不从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来检查苏联文学中之所以存在“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等现象。他认为，该定义的第二句，即“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会使人们产生“并不是任何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错觉。因此，战后“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常常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个公式”，“他们竭力‘改善’现实，其借口就是要在发展的趋势中表现现实”。他又说：“最近几十年来在我们各个艺术领域滋长起来的热衷于伟大人物和宏伟事件的倾向，无论怎么说都是和‘个人崇拜’和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任务有关的。”② 西蒙诺夫建议删除章程中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第二句。大会的前7天很沉闷，只是在作家奥维奇金发言以后才活跃起来。奥维奇金不同意苏尔科夫对文学现状的估计。他说：“近年来文学里出现了许多灰色的、平庸的、粗糙的东西，不仅出现了，而且混到最高地位，混到了所谓带头地位，或者说得激烈些，混到了文学的代表地位”，成为“看齐的目标”。③ 他批评颁发文学奖金的制度不对头，不民主，没有估计到读者的意见，没有估计到公正的批评意见。他还批评西蒙诺夫作为《文学报》主编发表了不少论文，搅乱了一切标准，把平庸拙劣的东西捧上了天。肖洛霍夫也说：“近年来杂志上和书市上充塞着许多灰色平庸的文学作品，这股潮流泛滥成灾。”④ 虽

①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03页。
②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2~25页。
③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06页。
④ 《肖洛霍夫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发言》（节录），见《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10~313页。

然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试图把文学的“解冻”引向新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大会对作家协会的章程作了某些修改，同时，把曾受到批评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潘诺娃、格罗斯曼等都选入作家协会新的执行委员会，恢复了阿赫玛托娃作协成员的资格。但是，文学“解冻”的势头并没有被压下去，广大作家坚决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反对用政治来压制文学。上层领导不得不答应，今后不再随意逮捕或监禁作家。

1955 年 1 月，赫鲁晓夫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虽不能看作文学“解冻”的直接结果，但苏共领导层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无疑会影响文学的“解冻”运动。这一年，文学“解冻”开始涉及对斯大林时代某些历史的讨论。5 月 7 日的《文学报》发表了《苏联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专论。文章指责在某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中，个人崇拜的影响起了不好的作用。“对战争初期的困境常常轻描淡写。”[①] 接着沙季诺夫中将在《伟大崇高的题材》一文中说：“战争初期常常被理想化”，臆造出来一个“积极防御”的神话。[②] 同时，开始对斯大林时期遭到清洗的作家恢复名誉，先后被恢复名誉的有巴别尔、布尔加科夫、梅耶霍德、维谢奥利和基尔雄；还包括“山隘”派的伊万·卡达耶夫；“锻冶场”的诗人基里洛夫、格拉西莫夫、巴赫米季耶夫；犹太诗人戈洛德内和别尔格森；还有共产党员作家考尔左夫、雅申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娃等。为了出版被迫害者的作品设立了专门编辑委员会，有选择地出版了一些作品，如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巴·瓦西里耶夫的诗歌和阿·维谢奥利的小说；对帕乌斯托夫斯基、李金和卡达耶夫的短篇小说作了修改后提供给读者。此后，官方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经典作家。阿赫玛托娃被《文学报》誉为“俄罗斯诗坛上天才和崇高的作家”。革命后在国内首次出版了蒲宁的作品集，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了前言。普拉东诺夫的一些作品也开始发表。而新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逐渐冲破官方的模式，出现了更多不同风格的、情节更加新颖的、故事内容的展开更加自由的作品。

1956 年 2 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把苏联自 30～40 年代以来出现

①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 34 页。
②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 36 页。

的种种严重问题，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后果。代表苏联作家协会在会上发言的苏尔科夫仍大谈苏联文学的成就，既没有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政策及其后的“解冻”做出正确评论，也没有对作家协会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在他后面发言的肖洛霍夫则谈到苏联文学的落后问题。他不同意苏尔科夫以出版了多少书来夸耀文学的成绩，他说苏联有3773人参加作家协会，但大都是“死灵魂”。“在近20年当中，我们出版的富有智慧的好书是有数的”。肖洛霍夫在分析“文学落后的原因”时，一方面批评了大部分作家不同人民交往，不了解生活。在莫斯科大约住着1200个作家，他们生活在“三角形的迷魂阵里：莫斯科——别墅——疗养地”，不到工厂，不到农庄，“白白地浪费生命和才华”。另一方面，他尖锐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作家协会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创作集体，却蜕化成一个行政机构，由利欲熏心的法捷耶夫把持着，他什么都干，就是不帮助作家从事写作。”“为什么过去的十五年中，竟没有人告诉他，作家协会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更不是一座监狱，没有一个作家再想在总书记法捷耶夫面前立正。”[①] 法捷耶夫没有得到在大会上发言的殊荣，而且从原来的中央委员被降为候补委员。

苏共二十大以后的第三个月，也就是5月13日，法捷耶夫留下一封给苏共中央的信后自杀身亡。法捷耶夫在信中说：“我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断送”，“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子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被称为‘党性’。”“我被变成一匹拉重车的马”，从事“官僚主义的事务”，“落到头上多少吆喝、训斥、教训，还加上众多的纯粹思想意识罪过。”法捷耶夫终于对斯大林时期文学和他自己的处境做了如此刻骨铭心的哭诉。他悔恨交加，感到“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失去任何意义”。[②] 法

① 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第734~748页。汇编中的译文同其他人的记述有出入，这里的引证参考了其他记述。

② 《法捷耶夫临终前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108~109页。

捷耶夫的自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法捷耶夫死后，西蒙诺夫在一篇文章中，用相当篇幅叙述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批判的经过，以及作者痛苦的修改过程。应该说，法捷耶夫实际上是斯大林制度及其文学政策的牺牲品。

苏共二十大对文学的“解冻”无疑是一次大的推动。对于斯大林及其功过的评价，首先涉及对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1956 年，肖洛霍夫写了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叙述了一个普通战士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的遭遇。他诚实地打过仗，曾被法西斯俘虏，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胜利之后，迎接他的仍是残酷的现实。作家以极大的同情描写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注。在那样的年代，索科洛夫的遭遇每一个俄国人都可能碰上。肖洛霍夫的小说对苏联的战争文学产生很大影响。此后许多此类作品，如库罗奇金的《战争就是战争》、沃罗比约夫的《牺牲在莫斯科郊外》和西蒙诺夫后来写的《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等，都把注意力转向对战争的全面深入的分析，不只叙述战争的胜利进军，而且也反映出现过的严重失利，特别注意分析战争和人民、战争和民族命运的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所触及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斯大林时期大镇压情况的揭露。1956 年秋季，《新世界》杂志发表了弗·杜金采夫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就涉及这一题材。小说叙述了一个叫做洛帕特金的人的遭遇。他是一名物理教师，从事一项铁质排水管的离心铸造机的设计，屡遭失败，后来引起军方的兴趣，但却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捕，被送到北极地区的集中营。斯大林之后恢复名誉，发明的机器被采用。但当年和他对立的人物没有受到惩罚却做了副部长。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简单，结构松散，记叙冗长，从美学的角度看，并没有很高的价值，但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解冻》一样，它表达了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涉及当年镇压和集中营情况的作品还有加·尼古拉耶娃的《征途中的战斗》、尤里·邦达列夫的《寂静》、维·涅克拉索夫的《吉拉·格奥尔基耶夫娜》、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还有一批作品，像达·格拉宁的《个人的意见》、尼·日丹诺夫的《回乡途中》、亚·雅申的《杠杆》等，针砭了苏联官僚制度。

苏共二十大以后，文学的“解冻”仍然受赫鲁晓夫个人意志的左右。

在发生了国内的第比利斯事件和国外匈牙利事件以后，赫鲁晓夫退缩了。在1957年的春夏，几次召开文学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会议，他亲自发表讲话，要求知识分子正确对待斯大林的成绩与错误，继续为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反对异己思想的影响渗入文学艺术。他点名批评了杜金采夫和在《莫斯科文艺》季刊上发表诗作《最重要的》的阿利格尔。他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满怀偏见的引用了一些反面的事实，对我们的立场作了歪曲的叙述，被国外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我们。"[①] 此后不久，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向第三次全体会议提供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不仅批评了杜金采夫，还批评了西蒙诺夫不久前在《新世界》杂志发表的《谈谈文学》和克朗在《莫斯科文艺》发表的《作家随笔》，指责他们"给那些需要阐明的问题造成混乱"。这个报告几乎重新肯定了30年代以来包括1946～1948年的一系列决议在内的党的文学路线，重新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唯一方法。报告竟然指责兄弟国家波兰的扬·科特、普希博斯和托埃普里茨以及匈牙利的卢卡奇、南斯拉夫的维德马尔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②] 这是向文学"解冻"刮来的一次强烈的寒流。

就在这次寒流中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曾属未来派，20年代成为先锋派诗歌的大师和领袖，却被扣上"虔诚的唯心主义"的帽子，一直受压制和打击。战后10年，帕斯捷尔纳克埋头写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医生，又是一名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年代的历史变乱中，他虽尽职尽责，救死扶伤，却历尽苦难。作者没有否定革命，也没有赞扬革命，只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人与历史"的这一重要主题。作者还写了《日瓦戈诗作》作为小说的最后一章。1955年底小说完成后，作者就把书稿寄给了《新世界》和《旗》杂志。《新世界》退回小说，并在退稿信中表明，不能发表。1956年5月，意大利电台驻莫斯科记者、共产党员谢尔捷奥·安杰洛在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帕斯捷尔纳克家做客。帕斯捷尔纳克把自己的小说手稿给了他一份。安杰洛把它交给了米兰出版商菲尔特里内

① 《赫鲁晓夫言论集》第7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145～146页。
②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一书（第124～139页）编入了这个报告的节录，引文见该节录。

利。1957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还同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西方其他国家相继也有译本出版。这部小说受到西方著名作家的称赞。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以其“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国小说的传统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5年前他就曾获这项奖金的提名）。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立即向中央打了一份要求采取严厉措施的报告。主席团在当天就做出决定，指示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批判小说的内容、揭露“国际反动派煽动冷战的手段”；通过西蒙诺夫劝告作家发表拒绝奖金的声明；组织并公布一批作家的表态文章。在上面的政治导向下，国内很快掀起了一场声讨作家的狂潮。克格勃领导人竟以驱逐作家出国相要挟。帕斯捷尔纳克被迫给赫鲁晓夫写信，并向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声明放弃奖金。这期间，克格勃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监控，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还传讯作家，并建议褫夺帕斯捷尔纳克国籍，驱逐出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准备了文件，只是在国际压力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才决定放弃这一措施。[①] 虽然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被驱逐出国，但却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偏僻处所，在克格勃的监控下生活。作者曾写了一首《诺贝尔奖金》表达自己忧愤心情的讽刺诗，又一次受到威胁。1960年5月帕斯捷尔纳克离开了人世。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当年没有读《日瓦戈医生》，如果读了，可能就不会那么处理。其实，当时跟着政治指挥棒批判和声讨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家和群众，大都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因为作品还没在国内出版。对待一部重要文学作品的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这个制度的不严肃和领导人的主观随意性。

同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相比，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赫鲁晓夫时期的境遇要幸运得多。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年，是革命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1941年10月，他参加了卫国战争，曾获得过二级勋章和红星勋章，担任炮兵上尉。因在通信中同战友交流自己心中的疑虑，他被捕、判刑8年，后来又流放哈萨克斯坦。在服刑期间，他深入思考了国家悲惨命运的根源，后来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在创作大型史诗作品的同时，1959年他完成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编入了苏共中央和苏联国家机关因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做出的决定和采取措施的文件。

了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普通农民，战争期间参了军，诚实的打过仗，负伤后还没彻底好，就又返回前线，被俘虏后逃出来，又与成千上万的被包围者一道进了自己的劳改营。小说通过犯人杰尼索维奇一天的劳改营生活，揭露苏联劳改营的暴虐，刻画主人公的内心尊严、勤劳勇敢、有良心、向往自由的品质。一天浓缩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这篇小说能够在《新世界》1962 年第 11 期发表，是因为特瓦尔多夫斯基通过第一书记的助手请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读了以后坚持发表。这篇小说开拓了斯大林时期历史的又一个主题——劳改营生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索尔仁尼琴是一位文学奇才，他还写了《第一圈》和《癌病房》等著名小说，后来还写了揭露苏联镇压和集中营实情的《古拉格群岛》以及描写 1916 到 1917 年 2 月俄罗斯历史史诗的《红轮》。

有的学者把苏联文学的“解冻”仅仅看作一种“思潮”，甚或是赫鲁晓夫等导向下的“自由化的思潮”，对于文学“解冻”的作用和意义因而也作了不恰当的估计。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文学“解冻”是斯大林之后苏联作家们通过自己的文字、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给有关领导写信等合法方式自发地批评斯大林时期的文学政策，要求结束对文学的政治高压政策，恢复作家独立自主的创作权。先是少数作家勇敢地站出来说话，发表创新的作品，逐渐相当多的作家参加进来。如果把作家们在不同场合的言论集中起来，那就是，要求独立地自由地从文学的角度反映和描述社会生活的权利，反对政治对文学的粗暴干预，反对通过作家协会对作家进行严厉的行政管理，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作为政治标准的所谓“根本审美方法”，反对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不容许再对作家滥施镇压。这些针对斯大林时期文学现实的要求，对于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并不过分，对于苏联，也是保证其文学跨越险阻、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斯大林的继承者却害怕文学“解冻”成为“泛滥的洪水”，因而对这一运动不是因势利导，而是采取堵截、控制、有时甚至谴责与反对的态度。而苏联的作家不怕威胁利诱，再接再厉，坚持斗争。因此，文学“解冻”成为一场连续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文学“解冻”代表着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种历史趋势，是俄罗斯文学发展规律的反映。虽然，赫鲁晓夫并没有完全放弃斯大林的基本理论和路线，使文学“解冻”运动反反复复，拖泥带水，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发

生过驱逐索尔仁尼琴和审判一些作家的严重事件，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学“解冻”在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以及在苏联的改革中的作用和意义。第一，文学“解冻”实际上是苏联时期又一次文学的复兴运动。文学“解冻”运动冲击和批判了斯大林的文学政策，对被镇压的作家恢复了名誉，解除或放宽了某些禁令，推动了作家自身的解放。国内作家开始思考革命以来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种种苦难，许多作家扭转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开阔了题材，吸纳了多种美学思维和方法。在文学“解冻”时期，苏联文学出现了新的复兴和创作高潮，从而产生了一批美学价值很高的作品。第二，文学“解冻”开了斯大林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斯大林之后，文学家最先站出来批评文学领域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要求打破陈旧的规章制度，创作真实反映人民生活、劳动和感情的作品。这些作家的行动受到广大读者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后来，“解冻”也逐渐波及其他思想理论领域。这样，在苏联就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苏联改革。第三，文学“解冻”使俄罗斯文学逐渐又恢复了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随着对斯大林文学路线的清理与批判，国内崭新的作品不断出现，被镇压作家的作品逐渐同读者见面，藏于抽屉的作品逐渐开禁，就使苏联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时期的文学有了新的认识，除了官方原来推崇和传布的作品外，原来还有不少更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存在，苏联文学并非一片灰色。加上侨民文学家作品的“回归”，被人为分割的三支队伍又逐渐汇合成统一的文学阵容。随着同世界沟通与交流的恢复，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又显现出来。在 1958 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1965 年肖洛霍夫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70 年索尔仁尼琴又得此奖，1987 年布罗茨基也获得此奖。虽然，索尔仁尼琴因获此奖而被驱逐出国，布罗茨基也是移居美国后获奖的。但他们都是文学“解冻”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其成就应该算进“解冻”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成绩之内。

四　文学“解冻”的原因与苏共文学政策的教训

只有把文学的“解冻”放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总进程中去研究，才能比较清楚地看明白文学“解冻”的原因以及它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地

位。同样，只有弄清了文学"解冻"的原因及其意义，也才能使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更深切的认识。这就是笔者给本文加上一个"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副标题的原因。

俄罗斯文学为什么能得到高度发展，而且在苏联时代经历了那么大的曲折，迄今又能站到世界文学发展的前列？一个国家文学艺术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丰富创作素材；有独立的文学家队伍。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素材，而没有独立的、成熟的文学家队伍，没有他们深入地思考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而用文学的手段加以反映和表现，也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同样，有了文学家的队伍，如果国家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不紧迫、客观条件不典型，或者作家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也写不出有代表性的、有震撼力的典型作品。

19世纪，俄罗斯处在不断的大变动当中。一方面，统治俄国人民的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已成为阻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桎梏。从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开始，革命运动接连不断，几乎每过20年革命就跨入一个新阶段；另一方面，随着俄罗斯不断地向外扩张，国家的领土占了地球陆地的1/6，统治了100多个民族。国内的民族矛盾和国际上同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也常常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连沙皇也感到不能照常统治下去了，1861年进行了农奴制度的改革，试图通过由上而下的改革使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沙皇政府进行农奴制度改革，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自己政权的基础，对取得土地的农民规定了极为苛刻的条件，社会基本矛盾并未得到很好解决，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增加了新的社会矛盾。这种大变动及其引起的社会变迁和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就为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思考和创作的素材。这就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客观条件。

国家和社会的大变革是以社会思想的进步为先导。从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开始，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为解放祖国、摆脱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而呼号。在19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上半叶，先后活跃在俄国思想战线上的几位伟大的民主革命思想家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们同时又是文学家、文学评论家，不仅进行了民主革命的启蒙运动，而且还接受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为俄国的社会主义提供

了一定的思想资料，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普希金之后，俄罗斯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著名文学家：尼·瓦·果戈理、米·尤·莱蒙托夫、伊·屠格涅夫、尼·阿·涅克拉索夫、列·尼·托尔斯泰、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米·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以及安·帕·契诃夫、弗·加·柯罗连柯等。这些文学家的思想、艺术风格各有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站在反对现存制度的立场上，对现实持批判主义的美学观。普希金的诗歌表达了青年一代渴望自由的心情，辛辣地讽刺了沙皇制度的反动与腐朽。果戈理用自己天才的幽默才能鞭打和讽刺了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莱蒙托夫的诗歌富有反抗情绪和浪漫主义倾向。屠格涅夫是对俄罗斯心脏的跳动最为敏感的作家。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气势磅礴，同情农民，为人民的自由歌唱。托尔斯泰被称作“俄国革命的镜子”[①]，他的作品对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对国家、对统治阶级、对官办的教会、对黩武主义，均表示深恶痛绝。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天才的描写心理的作家。他敏锐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揭露了人们在金钱势力支配下复杂而痛苦的感受，同情那些生活上毫无保障、受尽压迫的人们，热烈向往道德高尚而美好的生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天才的讽刺作家。知识分子摆脱统治者的控制，坚决站在反对沙皇政权和现存制度的立场上，证明他们已经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俄罗斯文学家是组成独立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部分。独立知识分子队伍的产生是俄罗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开始转变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家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每个作家才能独立自主地深入思考国家和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创作出许多不朽的伟大作品。

19世纪90年代初到1917年10月这大约1/4世纪，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一方面，这时候俄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另一方面，俄国政治、经济却面临重重危机。国内的各种矛盾，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各少数民族和大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和沙皇政府之间的矛盾，加上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俄国同欧洲资本主义大国以及日本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成为世界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日、俄战争中，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69页。

罗斯的失败立即引发了1905年的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产生了各种政党和团体。沙皇政府被迫发表了建立国家杜马的宣言。但是，革命运动最终失败。革命失败后，国内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和激化。知识界围绕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围绕革命还是改革、继续采取激进斗争还是改行社会改良和人的精神革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世纪产生的各种思想和政治流派：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立宪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俄罗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宗教哲学及其神秘主义等，这个时候都在宣传自己的主张，企图影响俄国的政治走向。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寄希望于工业的发展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主张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斗争，直至用暴力推翻旧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立宪民主党则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主张渐进，先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实践已经证明，改革和革命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由上而下的改革总是要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会使劳动人民付出长期沉重的代价。激进的革命运动必然引起暴力冲突，不仅人民会付出血的代价，而且革命后由于人民群众的民主素养差，能否建立起民主和文明的社会，是一个现实问题。另一些文化人士在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特别是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深信革命途径的不人道，提出了精神革命的思想，认为重要的是完善人的内心世界。对于这些争论，普列汉诺夫曾感慨地说：俄国一直处于启蒙还是革命的两难之中，鉴于人民的觉悟和文化水平低下，就应该先进行启蒙，但这却受到统治者的阻挠；为了排除启蒙的阻力，只能先推翻专制政权，但旧政权推翻后，又因为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文化水平低下，建立不起真正的民主政权。各种思想同时存在并进行激烈的争论，正是俄罗斯面临的问题复杂、历史抉择困难的表现，也是知识分子有了独立地位的表现。所有这些困扰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文学家。对文学家来说，同这些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如何看待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建立在因果决定论基础上的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理论显然遇到新的挑战，现实促使文学家寻求新的思维方法。世纪之交，西方先进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意识上发生新的变化。量子力学的产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白银时代文学的多元美学思维以及在这些美学思维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产生的。布尔什维克站在自己单一的革命意识的立场上，把这个时期看作知识分子思

想上的混乱，甚至是“知识分子的卑鄙可耻的时期”，显然是对这种多元思想争论一种简单化的“唯我独革”的看法。如果认真研究一下20世纪的俄国历史和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当时，以H. 别尔嘉耶夫、C. 布尔加科夫等为核心的宗教哲学家和政论家出版了《路标》文集。他们指出：狂热信奉任何理论纲领都带有危险性，轻信某种社会理论具有普遍价值是没有道理的，并批判了激进主义者自身固有的弱点。《路标》派的观点当时受到革命派的批判，而在今天看来，他们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了白银时代的文学热，人们希望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汲取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益的营养，就是一个证明。

1914年，俄国最早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短暂的胜利后就陷入了失败与战争造成的无穷灾难之中。接着发生了二月民主革命，俄国的民主政权没有站稳脚跟，布尔什维克党又用武力夺取政权。国家和社会大分裂，经历了几年的国内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实践，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的激进政策。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在高度集权政治的基础上，实行高速度以发展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和用强迫和阶级斗争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对知识分子采取简单化的单一意识形态统治，对不同政见者进行残酷镇压。在20世纪40年代，苏联又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代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斯大林去世的这几十年中，俄罗斯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虽然有光辉灿烂的一面：苏维埃革命是震撼世界的伟大事变，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开创性和试验性的意义，战胜希特勒法西斯则是“世界性的丰功伟绩”；但不可否认还有另外一面，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俄国人民遭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沉重灾难，付出了5000万以上的生命代价和巨大的物质损失，而且，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社会文明化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拖延。苏维埃年代的历史和现实无疑为文学家提供了最为广阔的题材。有着“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文学传统的苏联文学家必然会关注、思考和表现这些问题。20世纪20年代文学的复兴和发展就是明证。作家的审美视角不同，表达的方式方法各异，但作家共同关注和反映的基本上是战争、革命、内战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一系列政策在国内激起的各种波澜，引起各种人群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人们思想和心灵

的起伏与震颤……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曾说到他为什么不用诗歌而改用小说来表现这个时代的原因时解释说：用语言展开剧情的形式，不是戏剧而正是散文，诗歌是文学里的大素描。这个解释可以帮助人们理解20年代散文作品大量出现的原因。因为，革命以来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变化十分复杂，只有小说才能比较好地表达。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虽然苏联文学被迫走上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但苏联作家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仍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过文学的“解冻”，又恢复了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同样是文学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的相结合的结果。

除了以上两个基本原因，当然还要提到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底蕴。和许多曾出现过文学辉煌的国家一样，俄罗斯文学也带着强烈的民族文化的特点。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不是很长，却拥有丰富的文学艺术资源，俄罗斯辽阔独特的自然风貌，俄罗斯人勤劳、勇敢、擅长诙谐、幽默、向往国家强大和统一的民族性格，俄罗斯丰富的民谣、民歌、民间传说，优美而富于表达的语言，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雄伟壮丽的教堂、宗教神话、宗教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深入人心，等等。这些都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源泉。凡是喜欢俄罗斯文学的人都会被俄罗斯作家深邃的思想、丰富而多彩的表现形式、歌颂自然和抒发感情的精湛技巧、优美而丰富的语言所打动，所折服。提起俄罗斯文学不能不想到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讽刺和幽默的大师。诗歌在俄罗斯文学中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象征主义对俄国的诗歌影响很大。读俄罗斯象征主义的诗，就像欣赏中国的大写意画一样，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往往感到深不可测。而俄罗斯的普通大众却喜欢诵读，能够接受，这大约就是宗教神秘主义哲学的影响。还有一层，俄罗斯人喜欢读书，凡是到过俄罗斯的人对这一点会有很深的印象。在交通工具上，在博物馆前的排队中，许多人都抱着一本书认真阅读。作家经常会把自己的作品拿到露天广场上和朋友的集会中去朗诵。许多不能公开出版的作品，常常先以手抄本流传。作品首先要有读者，读者的广泛兴趣是文学发展、经久不息的一个重要条件。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生产、社会经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政治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和进行管理，社会文化是社会文明和社会精神的体现。这三大部分虽互有联系、互相影响，但各有分工，不能相互

代替。社会文化既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会影响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发展与变化，而且往往是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与变化的先导。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和进步尤其具有自己的特殊作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要标志是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文明。人的解放是社会文明的基础，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高尔基有一经典名言：“文学就是人学”。文学的主要效应就在于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文学遵循的是美的思维，宣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性情，丰富人的思维和想象力，从而提高人的精神素质。文学家以不同的视角解剖社会，剖析人的不同追求、不同性格、各种感情纠葛以及人的生、长、婚、嫁、病、死等生命的进程，而且分析和表现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历史的关系，促使人们正确认识自己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地位。文学是社会的解剖刀，是社会的警世钟，是社会的名医良药。文学通过提高人的自觉性来协调人们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不断走向文明。文学对人的解放和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苏联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混淆了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三者的关系，把社会政治置于其他两者之上，从而也曲解了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特殊作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抓住了马克思“暴力革命”的理论，把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但是，布尔什维克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把暴力、政权绝对化，把维护政权的政治看作最高原则，处处从政治着眼。在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上从政治出发，违反经济生活的客观法则，而且动不动就使用暴力，伤害了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造成许多严重而无法挽回的损失。在对待文学问题上，忽视了它的独立存在的特性，把文学作为政权的“齿轮和螺丝钉”，忽视了文学的历史继承性，曲解了文学对人和社会的特殊作用。到了斯大林时期，把文学完全作为政治的附属品，“罢黜百家”，自我独尊，为作家规定统一的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对作家实行政治高压政策，甚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不惜用暴力镇压作家，不仅使文学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蹒跚前进，而且也延误了人的解放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斯大林之后，文学家掀起了文学的“解冻”运动，斯大林的继承者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斯大林的思想理论。这是苏联没有经过改革走出困境的原因之一，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沉痛教训！



发出不同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　郭永胜

伴随着现代政治生活而产生，具有西方语言色彩，最初西方媒体频繁使用，后来也出现于苏联报刊的“持不同政见者”一词，俄语为диссидент，英语为dissident。该词源自拉丁文（dissidens），含义为“脱离国教者”，它的俄文同义词是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由其辞源可以看出，该词最初只具有宗教教派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异端”、“歧见者”，但今天它已经没有指称宗教派别的意思，它成为“对那些公开反对苏联政府的行动或者表现出其他为政府所不容的社会积极性的苏联公民而采用的一个术语。”[①] 一个古老词汇已被赋予新的生命，但它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含义却因其辞源而更加具有象征意味。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一贯宣称政治生活高度民主，言论自由，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性是苏维埃新社会的基本特征。然而，正是在追求这种目标的苏联出现了经久不息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尤其是在政治敏感度相对弱一些的自然科学界大量涌现持不同政

① Универсаль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Диссиденты в СССР” 辞条，www.yandex.ru。

见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情况，其中的历史启示是什么？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80年代初期，曾经在一些内部和公开发行的刊物上翻译和编译了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文章、观点。例如1979年出版的《苏联问题译丛》第三辑刊登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流派及其目标》。[①] 1980年《编译参考》编辑部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②] 这些文章大都是介绍与资料性的，对国内初步了解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起了一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也陆续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③]，若·麦德维杰夫的《苏联科学》[④]，以及二人合著的《谁是疯子?》[⑤]、《政治日记》[⑥]，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⑦] 等作品。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尤其是2002年沈志华任执行总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本）的出版，为研究这一课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限于国内的条件，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暂时尚未展开。

在西方，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1972～1978年在西德慕尼黑城编辑出版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文献集》30卷[⑧]；1977～1984年在纽约出版了《苏联协助执行赫尔辛基协议小组文献集》9卷。[⑨] 这些文献集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

---

① 海因茨·布拉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流派及其目标》，姜兆年译，《苏联问题译丛》第三辑，三联书店，1979。

② 罗·麦德维杰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林英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

③ Roy Medvedev, *On Soviet Diss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④ Zhores A. Medvedev, *Soviet Scien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8.

⑤ 若·麦德维杰夫、罗·麦德维杰夫：《谁是疯子?》，钱诚译，群众出版社，1979。

⑥ *Медведев Р. А.*, *Медведев Ж. 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невник, Амстердам: Фонд им. Герцена, 1972. Т. 1; 1975. Т. 2.

⑦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 Новый мир, 1962, № 11.

⑧ Собр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амиздата. Мюнхен: RL/RFE Research Institute, 1972 – 1978. Т. 1 – 30.

⑨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группы содействия выполнению хельсинских соглашений в СССР. Нью-Йорк: Хроника, 1977 – 1984, Вып. 1 – 9.

资料。像 П. 叶戈洛夫的《什么是民主共产主义》[1]，С. 左林的《列宁格勒提纲》[2]，关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的《白皮书》[3] 和 А. 金兹伯格等人案件的《四个人诉讼程序》[4]，揭示 1968 年苏联知识分子反对政府出兵镇压捷克游行真实情况的《中午：1968 年 8 月 25 日红场上的游行事件》[5] 等资料，大都保存在这些文献集中。此外，流亡国外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出版了许多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 Л. М. 阿列克谢耶娃 1984 年在美国出版，1992 年俄罗斯再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史》[6] 一书，作者利用大量翔实可靠的原始资料，结合自己持不同政见者的亲身经历披露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以及党和政府镇压它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而且，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很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苏联，由于种种原因直到苏联解体后，学者们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近年来出版和重印了一大批这方面的文章和论著，尤其是几年前纪念碑网站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最为著名的私下出版物——《时事纪事》65 期刊物[7]，全部在自己网站上发表，其中有两期竟是当时已经编辑打印就绪，但由于克格勃的压力而没有面世的珍本。1968 ~ 1983 年一直坚持出版的《时事纪事》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历史提供了基础，正如网站建立者评述的那样："《时事纪事》从来没有失去自己作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编年史的地位。"[8]

1998 年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发表了萨维利耶夫《苏联 1950 年到 1970 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治特点》一文，作者利用大量的档案

---

① 罗·麦德维杰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

② 罗·麦德维杰夫、若·麦德维杰夫：《政治日记》。

③ *Гинзбург А.* Белая книга по делу А. Синявского и Ю. Даниэля, Франкфурт-на-Майне: Посев, 1967.

④ *Литвинов П.* Процесс четырех.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о суде над А. Гинзбургом, Ю. Галансковым, А. Добровольским, В. Лашковой, Франкфурт-на-Майне: Посев, 1968.

⑤ *Горбаневская Н. Е.* Полдень. Дело о демонстрации 25 августа 1968 года на Красной площади. Франкфурт-на-Майне: Посев, 1970.

⑥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Вильнюс-М: Весть-ВИМО, 1992.

⑦ Хроника текущих событий. Амстердам: Фонд им. Герцена, 1979. Т. 1 (Вып. 1 – 15); Т. 2. (Вып. 16 – 27); Нью-Йорк: Хроника, 1974 – 1983, Вып. 28 – 64.

⑧ Хроника текущих событий. http://www.memo.ru/history/diss/chr/index.htm.

资料，从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视角出发，通过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图书馆学多角度、全方位地透视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亚文化的特点，以及私下出版物创作和流传的特征。[①] 2002 年第 3 期和第 4 期《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发表了科兹洛夫根据苏联最高检察院和法院审判文件写成的长文《造反：苏联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作者通过档案文献材料认真分析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进程，以及克格勃利用各种手段分化瓦解，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所造成的后果。论文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法庭审判档案资料，对了解 1965～1984 年苏联司法部门审判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作用。[②] 1989 年第 5 期《青春》杂志发表的西尼亚夫斯基《我的持不同政见者经历》[③]，1990 年第 2 期和第 3 期《星》杂志刊登的萨哈罗夫的《和平、进步和人权》、《苏联和东欧人权运动的宗旨、意义、困难》等文章[④]，也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

苏联解体后，一些在西方出版的关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内容的书籍开始在俄罗斯重版。例如 Л. М. 阿列克谢耶娃的《苏联持不同政见史》、萨哈罗夫的《论国家与世界》[⑤]、罗·麦德维杰夫的《论社会主义民主》[⑥]、阿马利里克的《苏联能生存到 1984 年吗?》[⑦] 等书都属这一类型。这些著作为解读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本质，了解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派政治主张，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展变化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值

---

① *Савелье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диссиден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СССР 50-х-70-х г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4.

② *Козлов В. А.* Крамола: инакомыслие в СССР во времена Н. Хрущева и Л. Брежнев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и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Статья 2//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2, №4.

③ *Синявский А.* 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о как личный опыт // Юность, 1989, №5.

④ *Сахаров А. Д.* Движение за права человнка в СССР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не цели, значение, трудности// Звезда, 1990, № 3.

⑤ *Сахаров А. Д.* О стране и мире, Нью-Йорк: Хроника, 1976.

⑥ *Медведев Р.* Книга 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Амстердам / Париж: Фонд им. Герцена, 1972.

⑦ *Амальрик А. А.* Просуществует л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до 1984 года? Амстердам: Фонд им. Герцена, 1969.

得一提的是马尔钦科的《我的证词》[1]，它是第一本揭露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监狱和流放地虐待政治犯的著作。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开始出版持不同政见者以及研究者撰写的关于1965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兴起的著作。1995年莫斯科出版了科斯金柯等人主编的《参加者回忆录文献，私下出版物、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资料，以及克格勃给苏共中央报告中的1965年12月5日》[2]一书。该书收集了参加者的回忆录，私下出版物，党团组织和克格勃给苏共中央报告等大量资料，并深入地剖析了1965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这一天发生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的游行示威事件。提出这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活动，不仅拉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运动的序幕，而且开创了持续近20年之久的宪法日示威游行活动先河的观点。

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有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档案文件集不断问世。1994年科罗特科夫等人编辑的《克里姆林宫的私刑：政治局关于作家亚·索尔仁尼琴的秘密文件》[3]一书在莫斯科出版。文件集有600多页，收集了苏共中央和政府各个部门，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于索尔仁尼琴各个时期的报告、会议讨论记录和决定，以及索尔仁尼琴的声明、公开信等文献，是研究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最为重要的档案资料之一。

然而，苏联解体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动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萎缩。另外，关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档案性文件有的已被销毁，而有的至今仍未彻底开放，这就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不便。因此，对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缘起、经过、特点以及对苏联社会发展变化影响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① *Марчеко А. Т.* Мои показания; От Тарусы до Чуны; Живи как все. Вильнюс — М.: Весть-ВИМО, 1993.

② *Костенко Н.* Пятое декабря 1965 года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обытий, материалах Самиздата, документах партийных и комсомоль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и в записках Комите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ЦК КПСС. НИПЦ, Мемориал, 1995 г.

③ *Коротков А.* Кремлевский самосуд: 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литбюро о писателе А. Солженицыне. Москва: Родина, 1994.

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解冻”背景下出现的，不过，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种社会思潮，并没有成为一种运动，参加者基本上局限于某些个别的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逐渐成形，它几经起伏，成为勃列日涅夫任期内苏联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为什么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它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基础等问题成为研究者争论的内容。有人强调其历史原因：“说到持不同政见者，必须说的是，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现象的独特之处有其一定的传统与根源。”[①] 也有人认为：“苏联经济的衰退现象，苏共远非热爱和平的外交政策，以及受到自上而下控制的科学与文化的停滞，这一切反映在社会意识中，乃是政治解冻年代出现诸如持不同政见运动这样的独特社会现象的根源。”[②] 当然，也有的人特别强调西方敌对势力的煽动和支持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延续不断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是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几十年来积弊沉淀，各种矛盾和纷争未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引起的。同时，亦是苏联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党内外民主制度遭到破坏，政治思想工作僵化教条，不允许任何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存在，人民没有切实和通畅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造成的。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讲的那样：“不同政见者最初的想法和意图非常简单，无非是想比较深刻地研究一下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原理，分析一下现实生活中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作出某些可以付诸实践的建议。”[③] 当然，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有关。

---

① *Сахаров А. Н.* Россия в 20 веке. Историки мира спорят.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4, с. 615.

② *Савельев А.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диссиден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СССР 50-х-70-х г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4, с. 109.

③ *Яковлев А. Н.* Горькая чаша: Большевизм и Рефориация России. Ярославль: Верхне-Волжкр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94, с. 179.

（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和精神自由的追求激励其不断地去探索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权势，批评和质疑占统治地位官方意识形态和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在俄国有着与西方不尽相同的特定内涵。在俄罗斯传统的知识分子不仅是指那些封闭于书斋和学院象牙塔内，专心研究学问的学者和专家，而更偏重于精神性，即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追求社会正义，献身革命事业，关心民众，作为公理和正义及弱势群体与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是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见解，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特征。“俄国知识分子信仰的标志则是民众的幸福，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服务于这一目标对于他们来说是人的最高的、总体上说是唯一的义务……这种情感存在于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①]

在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向来以道德纯洁、理想崇高和富于牺牲精神而著称。同时，他们多具有“经世”的作风，总认为知识是实现社会正义、公道和自由的手段。被别尔嘉耶夫誉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始祖的拉吉舍夫就表现出如此的特征，他不仅同情苦难深重的人民，号召有识之士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农奴制度。同时，他还主张良心和美德至高无上，认为履行美德不应受到任何阻碍。“假使法律或国君或世界上某一个政权怂恿你违背真理，破坏美德，你要坚定不移地维护美德。嘲笑不要怕，折磨不要怕，病痛不要怕，坐牢不要怕。连死也不要怕。你的心要像惊涛骇浪中的中流砥柱一样坚定。你的迫害者的狂暴终将为你的坚定所粉碎；如果他们处死你，侮辱你，那你将千秋万代活在高尚人们的心中。”[②] 拉吉舍夫的可贵之处不在于独创的新颖思想，而在于他对现实主义、自由和改变社会不公正的不懈追求。他的思想影响了俄罗斯几代人。

俄罗斯知识分子酷爱真理，许多人都是满怀激情的“真理追求者”，然而，他们追求的真理（Правда）概念也有特定含义，它不仅仅是纯理论认识上的真理（Истина），而且包含了“公正、正义、合乎道德”的意

① 基斯嘉科夫斯基等著《路标集》，彭甄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166页。
② 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汤毓强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第95页。

义。俄罗斯知识分子所苦苦追求的真理，一方面是对世界所做的理论解释和说明，而另一方面要使“社会公正、自由、民众幸福”成为生命的真谛，使生命变得圣洁。斯拉夫派是这样，西方派亦是如此，双方都是理想主义者。正如赫尔岑所讲的那样：“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即都在为社会公正、自由和人道而奋斗。[①]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以及他们发起的民粹派运动，把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理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怀着对人民的负罪感走向农村，发动农民进行争取幸福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一事业，有多少知识分子甘愿放弃了家庭、事业，乃至自我牺牲。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即“真理追求者”正是憧憬着这样的理想和抱负，义无返顾地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走向刑场，走向绞刑架。也正是这种可贵的生命价值观，使俄国知识分子获得社会“良心”的称号。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采用镇压和改造的手段解决了对新政权持消极态度的旧知识分子。“红色恐怖”使“旧知识分子的命运极为悲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侨居国外，一部分人在集中营和流放地死去，只有很小一部分人靠拢新政权。革命前许多代知识分子忠诚地服务的事业完成了，人民从沙皇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下解放出来，然而，知识分子却陷入悲剧性的境地。”[②] 新政权在打击不服从的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开始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培养新知识分子。从1917年12月开始，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把所有教育机构收归国家管理，并使宗教教育和宗教仪式同学校教育彻底脱离。此后，又陆续制定了全国各类学校统一执行的教学大纲，并把教育与社会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劳动者作为指导思想，大批劳动者子女和工农干部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即精神自由的追求、正义感、社会责任感是很难因其出身和教育思想的变化而被人为地割断。被称为“二十大产儿”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在革命后接受的教育，即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①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143页。

② *Межуев В.*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демократия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2, №16, с. 38.

总的来看，持不同政见者是斯大林以后苏联社会的产物，这是一些在苏联社会里成长的知识分子，他们陷入了与父辈的心理和理想的抵触之中，“政治评价在持不同政见者中完全是被忽略的，而提到第一位的是精神和道德的使命。”① 以“俄罗斯民族精神”作为自己不同政见纲领的索尔仁尼琴，其身上处处充斥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而自命为“苏联知识分子良心”的安德烈·萨哈罗夫，同样也不例外。他更是把道德准则和精神自由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赫鲁晓夫曾经把反对他进行氢弹试验的萨哈罗夫称为“道德的水晶”，“他是我们科学家之中的圣人”。② 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者时以下的话是非常典型的：“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不！”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一部分最活跃和最具进步思想的苏联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着沙皇俄国时期旧知识分子的困境，“知识分子崇拜的，至今无限信仰的东西完结了，丧失殆尽了。在革命后形成的新形势下，知识分子不能够保存自己作为社会的真正民主力量，不能够深刻地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为自由而采取什么斗争方法和手段。”③

（二）斯大林时代的遗产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几代俄罗斯革命者奋斗的目标实现了，人民摆脱了沙皇和地主的奴役，成为国家的主人。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自由、权力和所有权》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辈那一代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父亲保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在那上面写到：‘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④ 而1972年作者本人不得不离开祖国时，心里想着如果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一定是：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在

① *Синявский А.* 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о как личный опыт, с. 89.

②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123页。

③ *Межуев В.*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демократия, с. 38.

④ 瓦·别洛策尔科夫斯基：《自由、权力和所有权》，林英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第1页。

那里促进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满怀着对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理想憧憬的一部分俄罗斯人会出现这种巨大转折而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呢？这无疑同斯大林把暴力作为达到政治目标的工具，压制民主，大搞个人崇拜等专制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24 年 1 月列宁去世后，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战胜了对手成为胜利者，同时也成为列宁主义唯一的解释者，“真理”的代言人。斯大林执政时期（1924～1953）在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指导下，对政治反对派、老布尔什维克以及具有不同思想，甚至仅仅是怀疑其行为的人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清洗。接连不断的迫害和镇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以至于一提到斯大林，在许多人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悲惨的 1937 年，是目无法纪的政治迫害，成千上百万人的死亡，人人感到畏惧甚至恐怖的社会。

“斯大林遗产的首要成分是人们的不自由”。[①] 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尽管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名义上的“国家主人”，然而，伴随着禁止、限制和强制等一整套精心设计的统治措施的日益强化，人的本性被严重扭曲，民主自由发生异化，出现了哲人别尔嘉耶夫在世纪初担心的情况。“没有被任何东西限制的抽象的民主制，轻易地就走到了敌视人的精神、敌视个性的精神本性的地步，而另一种精神、人类的真正精神、个性的精神和民族的精神，应该断然与抽象——形式的民主制的精神相对立”。[②] 成为国家主人后的苏维埃人民，在革命激情逐渐消退后，社会意识形态中漠不关心、因循守旧和教条僵化心理越来越占了上风。政府为了纯洁共产主义信念，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任何“异己”念头和思想都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人民非但不能要求自由，即使是谈论和想象也是对理想的背叛。国家安全机构培植的巨大告密网，更使人际关系始终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之中。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不自由演变为一种自然状态。当许多人希望用纯洁的手段建设纯洁而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时，个人自由、公民社

①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下册，张慕良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 1423 页。

②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 192 页。

会的幼芽和人道主义的历史传统都被集权国家连根铲除。结果陷入一个难以逾越的怪圈。“我们为自己提出的历史目标越高，向未来跃进的计划定得越紧，要求进入无限幸福和无限进步的社会的心情越是迫不及待，那么，对法制的要求就越低，那么牵引着社会主义进步的驳船前进的人们的权利和生活福利就越少”。[①] 为了满足追求那个整齐划一的神秘目标，许许多多人的幸福甚至生命都被用作无谓的牺牲，到头来，共产主义的幸福目标对大多数人仍是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和社会现实严重背离，促使一些不安现状的人开始思索和探求。

斯大林一上台很快就开始了造神运动，在2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斯大林的颂扬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的名字事实上已变成国家、人民、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的同义词，仿佛全国的一切成就都与他的关怀和指导密不可分。他要人们相信“我们是特别的人民，是特别的国家，我们被创造出来为的是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奇迹，为的是把童话变为现实”。[②] 而他正是作为万能的全才带领大家奔向美好的未来。斯大林不仅自认为是伟大的政治家，同时还是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在百忙之中还不忘亲自审核《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样一本明显伪造历史的书，来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斯大林多次指出：对知识分子政治教育不够导致“把一部分知识分子教坏了，被外国间谍机关所收罗……我们首先要把这本书献给我们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使他们有可能在政治上得到深造”。[③]

从上述文字可以发现，“所有斯大林的‘遗产’就实质而言，不管它涉及的是国家、社会还是思想领域，都同使用暴力的可能或必要性有关。斯大林终身维护他参与建立的各种制度，支持和灌输最正统的观点，即相信运动没有他的革命推动就具有社会惰性的观点。”[④] 然而，谎言总归是谎言，迷信亦一样，它们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但作为政治遗产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社会总要为其付出沉重的代价的。

① *Ципко. А.* Истоки сталинизма // 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 1989, №1, с. 54.

② *Ципко. А.* Истоки сталинизма, с. 46.

③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0，卷宗313，卷张15。转引自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第877页。

④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下册，第1426页。

（三）赫鲁晓夫解冻思潮与知识界人道主义潜流的萌动

清除个人迷信、平反冤假错案和大规模释放无辜受迫害的苏联公民，是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的当务之急。在他上任主持的第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1953 年 9 月），赫鲁晓夫就大胆地号召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对官僚主义。随着苏共领导层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松动，人们在内心深处已明显感到政治气候变暖，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开始出现所谓的“解冻”思潮。

1953 年波梅兰采夫在《新世界》杂志第 12 号上发表了《论文学的真诚》一文，呼吁作家在创作中要体现文学的“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此文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著名作家杜金采夫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我认为，波梅兰采夫同志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①] 文学的诚实和社会良知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创作问题，它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反映，即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影响的社会通病。1954 年作家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一经刊出，一个以冰河解冻来隐喻斯大林时代结束的思潮就开始了。

伴随着文学创作“真诚和真实性”讨论的不断深入发展，一种重新认识社会和全人类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公平、历史真实、道德理想，追求个人生活权利和一切以人为中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共鸣，因为“即使在战争当中，人首先仍然是人，只不过战争给正常人的生活作了非人道的矫正”。[②] 这样就开始了一个内心精神世界解放的进程。正像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论述的那样：“持不同政见是以重新评价那些具有重要价值的东西的形式开始的。”[③]

在解冻文学思潮流行的同时，哲学和社会科学也开始了解冻的进程。1953 ~ 1956 年，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展开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讨论。随着论争的不断深化，一种认为社会主义矛盾具有客观性，并不是所有矛盾都是阶级敌人和外国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某些矛盾的激化，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政策错误或者是违反客观规律而

---

① РГАЛИ（俄罗斯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1702 库，6 卷宗，77 分卷，第 52 页。

② *Зубкова Е. Ю.* Общественоиреформа 1945 – 1964，Москва，1993，с. 123.

③ *Синявский А.* 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о как личный опыт，с. 89.

造成的观点越来越深入人心，而且，革命和暴力的问题也引起社会学家的普遍反思。哲学和社会科学富有逻辑思维的特征和哲理性，为深入分析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时期惨无人道的恐怖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和人性的复归，以及摒弃“建立无产阶级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本身就是法令和法律”[1] 的信念奠定了基础。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的形式，揭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严重错误，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个人崇拜，但同时对一个领导苏联党和国家近30年，受到千百万人热情拥戴，也曾给苏联千百万家庭带来巨大伤害的政治领袖的复杂行为，只是简单地归结为斯大林个人品质和个性的缺陷，并没有把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现象放在俄国的具体环境中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认真反思，从而找出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土壤。这导致苏联知识界和社会上逐渐出现一股强调民主与法制，强调人道主义，否定苏共一党专制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无形力量，这就是苏联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在论述持不同政见者产生与苏共二十大的关系时说：“并不是因为直到那时（1956年苏共二十大）他们才看清了过去不计其数的犯罪，而是因为揭开犯罪中的某一部分之后，二十大及以后的苏联意识形态没有作出也无法作出任何严肃的、历史性的解释。”[2]

综观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解冻思潮兴起和曲折发展的历程，我们会发现虽然赫鲁晓夫力图使解冻思潮朝着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既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又不要触及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不要触及执政党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解冻思潮、人道主义思想在后斯大林时代出现有其深层原因和现实条件，仅凭一纸文件或一个决议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即使它暂时销声匿迹了，但其并未彻底消失，只是作为一种潜流蛰伏下来，一有时机又会复活。加之，深受斯大林时代熏陶的赫鲁晓夫工作作风粗暴，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观念浓厚，当大权在握后，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恶习重新复活，“反个人迷信的斗士自己反倒成了个人迷信的牺牲品”。[3] 随着对斯大林惨无人道大清洗揭露的不断

① *Ципко А.* Истоки сталинизма, с. 43.

② *Синявский А.* 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о как личный опыт, с. 89.

③ 尤·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李树柏译，东方出版社，1990，第19页。

深入，一种怀疑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强调“神圣的不是社会，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人”的人道主义思潮潜流逐渐凸显。[①]虽然这种力量当时还很弱小，但它却是在不断壮大和发展的。可以这样说，当时的这股潜流就是日后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先驱。

（四）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意识形态与领导体制的僵化

1964年10月14日，通过一次宫廷政变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第五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不同，在他执政的18年间（1964～1982）刻意求稳，尽量避免赫鲁晓夫时期大起大落局面的出现，稳定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最大的特点。正是这种不求上进的稳定，使惰性和停滞不前风气逐渐滋生、蔓延，导致社会结构凝固与意识形态全面僵化，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后是越积累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各种问题。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坚持解冻方针还是全面倒退，重新恢复斯大林地位的争论相当激烈。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了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后，意识形态的保守思潮开始泛滥。“1968年年底，在文化领域里保守势力的进攻加强了……1969年国家文化生活出现了转折”。[②]1969年3月，苏共中央几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一批历史学家背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原理，主张加强思想领域反自由化的斗争，很快代表改革思潮的《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迫辞职，斯大林主义开始全面回潮。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在政治局讨论意识形态的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尽快编写一部由党中央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党史教科书，必须“加强对发表的东西、出版的东西进行监督，应当加强对我们工作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监督”。[③] 为了落实勃列日涅夫的指示，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对不同于官方的异己思想进行斗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专门成立负责知识分子工作，以及“组织反间谍工作去与境内的

① 尼·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第106页。

② *Медведев Р.* Личность и эпох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Л. Брежнева, Москва, 1991, с. 230－231.

③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26页。

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的第五局。[①] 在强化国家安全部门权力的同时，政府还积极发挥那些长期延续下来的行政机构的监控职能，扩大保密范围，不断加大书报检查力度。这样一来，使任何新的思想和不同于政府的主张都很难面世。

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我国建成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②] 此后，在1970年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和二十四大上，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被一再重申，甚至还把“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内容写入1977年的苏联新宪法之中。在大力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勃列日涅夫还为苏共制定了新时期奋斗的主要目标，即在苏联建立“无阶级社会或称不分阶级”的社会。

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体制日趋僵化，官僚主义盛行，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风气愈演愈烈。1977年勃列日涅夫打破党政职位不得一人担任的规定，以总书记的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时，根据新宪法增加的条款，他又成为当然的国防委员会主席，一人兼任三个职务，独揽了党、政、军大权。同时，勃列日涅夫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逐渐导致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尤其是高级干部表现最为明显。中央委员重新当选率不断升高，“二十三大——79.4%；二十四大——76.5%；二十五大——83.4%；二十六大——89%”。[③] 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除了与勃列日涅夫有矛盾的人之外，基本上是连选连任。伴随着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泛滥，苏联开始出现老人政治现象。“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52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④] 老龄化干部固守原来的观念和作风，安于现状，对时代和社会发展视而不见，无论思想上还是工作上都已失去应有的活力和进取精神，社会死气沉沉，许多正常工作很难

① *Кокурин А, Петров Н.* КГБ：структура，функции，кадры（Архив）//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8，№ 2，с. 123.

②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190页。

③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四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335页。

④ 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第601页。

有效开展。

领导体制僵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个人崇拜再度复兴和特权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尚能坚持集体领导，国家内政和外交重大问题都在政治局会议上集体讨论决定。但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和勃列日涅夫个人地位的进一步稳固，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后，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体制弊病再度升温。① 1976年底勃列日涅夫70岁诞辰时，颂扬总书记的宣传高潮迭起，《真理报》连续开辟7天专栏，专门刊登吹捧勃列日涅夫的文章。二十六大勃列日涅夫的报告，竟然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这种盛况比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赫鲁晓夫改革一度冲击的干部特权现象重又死灰复燃，而且发展速度之快，特权阶层呈现稳定化和扩大化的趋势，甚至在共和国、州、区也形成了自己的小特权阶层。西方学者估计特权阶层人数大约为25万人，约占苏联人口的千分之一。②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最近的估计为50万～70万人。③ 特权阶层享有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等。这一方面使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愈来愈脱离人民群众，与社会其他阶层鸿沟不断加深，形成一个尽情地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高高在上的社会集团。他们拉帮结派，互相包庇，贪污腐化，反对任何动摇现存体制的变革。另一方面成为领导人控制党政干部，保持集权统治的有效工具，因为失去职位就意味着失去特权。特权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疏远了党群关系，而且严重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人们极度不相信党和政府，对党所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景失去信心，他们的工作热情普遍消退，“到处都弥漫着虚无主义。青年学生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我国过去的历史传统不感兴趣，冷漠和玩世不恭，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下批评政府”。④

①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330～331页。

② 参见赫·史密斯《苏联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香港朝阳出版社，1976，第8页。

③ *Сахаров А. Н.* Россия в 20 веке. Историки мира спорят, с. 571.

④ *Козлов В. А.* Крамола: инакомыслие в СССР во времена Н. Хрущева и Л. Брежнева（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и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Статья 2, с. 68.

总的说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远不像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描述的那样美好和完满，“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不仅脱离了当时苏联社会实际状况，而且相去甚远。事实上，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在稳定表象的背后是特权横行，僵化教条的官僚统治；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各种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连年大幅下滑，科学技术同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而苏共中央却视而不见，用一种鼓舞人们向往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形态来掩饰因停滞而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弊病和危机，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正如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人民虔诚地相信共产主义即将到来，这种宗教性质的信仰激发了人们最初的热情和感情的高潮，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幸福对许多人来说仍像以前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与现实发生了冲突。结果就重演了大家都熟悉的基督教历史上的一幕：神职人员和牧师表面上仍留在教堂里，但其内心已放弃信仰”。[①] 正是这种理论与实际、现实生活与期待的巨大反差和脱节，导致怀疑和不满社会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一部分不满者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就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五）国际背景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际方面的背景，西方的影响和苏联霸权主义政策促使某些人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较之其他社会成员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感受到苏联与西方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一切为了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像宣传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僵化的政治体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苏联人民虽然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但高度集权和一党专制统治模式很难为主人们提供民主表达的渠道和途径，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并非像苏联各种传媒所报道的那样，到处都是“贫民区，游行示威，与警察的冲突”[②]，以及工人阶级毫无权利可言，时时处处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等。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比苏联人民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民

① 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88页。

②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49页。

主，以及更丰富的物质财富，这种强烈的反差使那些思想较为活跃和开放的科技人员、作家、艺术家首先冲破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藩篱，开始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思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逐渐明白外国人也是人，资本主义也有许多值得苏联学习的东西。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极力向苏联传播西方的自由思想。在现代通讯技术日渐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已经不可能被完全隔绝和封闭。外面的书进来了，里面的稿子寄出去被印成书送回来，西方的"自由"电台，不断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宣传和渗透。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报苏共中央的材料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内容，"仅仅在美国，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任务，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包括青年进行思想影响的就有大约80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现在从资本主义本土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41个无线电台，一昼夜播音253小时，其中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是针对青年听众的"。[①]由于政府停止了干扰，使收听西方广播成为合法的事情。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人权公约签署国的增加，原本是一项道义权利的人权也越来越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尤其是1975年苏联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后，一些维护人权的国际组织乘机在苏联成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如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等。这些组织甚至专门组建了"萨哈罗夫国际听证会"，每年听取有关苏联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积极支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难怪持不同政见者动辄找西方媒体和组织发布公开信息，甚至直接写信给美国总统和联合国呼吁对苏联施加压力。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推行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特别是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和出兵阿富汗的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持不同政见者的发展和成长。镇压"布拉格之春"使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追求的通过改革、多元化、民主、权利、言论自由改变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1968年对捷克的人侵摧毁了人们对'更富人情的社会主义'的希望，使许多赞成二十大的知识分子放弃了政治乃至社会活动"，走上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②] 例如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都是在1968年积极参加

①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92～193页。

② 亚历山大·阿德勒：《苏联和我们》（苏联问题译丛第6辑），北京三联书店，1980，第270页。

到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之中的。

总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苏联国内的产生既有内部的原因，亦有外部的作用，但社会基础和政治体制弊病等内部原因是第一位的，正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著名代表人物西尼亚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产生是完全有机的、自然的现象，并不如苏联政府想让人相信的那样，是所谓‘颠覆思想’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产物。持不同政见者不是阶级敌人，也不是苏联社会的异己分子，而是这个衰败体系的产物。”①

二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及经过

1965 年 12 月 5 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示威活动，从此，以“维护苏联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要求公开性、民主和自由”为宗旨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地下浮出水面，成为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而且影响巨大的政治问题。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俄罗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却发现宪法赋予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可望而不可及。斯大林时期苏共关于民主的论述不比列宁时期少，但这并不能改变斯大林实行专制统治的现实，任何流露不同思想的人都可能被扣上“人民敌人”的帽子，流放逮捕直至肉体消灭。赫鲁晓夫尽管严厉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任意践踏人性的丑恶行径，但对宪法给予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也很少给予保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虽然自称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信访制度，公民监察制度一应俱全，人民依然感到很难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后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控制熄灭了赫鲁晓夫改革和柯西金“新经济体制”带来的最后一点活力，导致共产主义信仰悄然下降，党群关系严重疏远，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缘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叶，结束于 80 年代中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由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

① 西尼亚夫斯基：《苏维埃文化：一部文化史》，薛君智编译《笑话里的笑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第 376 页。

派、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构成。各派主张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但在反对复活"个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即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是一致的"。[①]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这说明它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社会病态的自然产物，并不像苏联当局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结果。尽管西方的宣传和支持确实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起过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

1956 年 2 月 24 日午夜，当赫鲁晓夫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中讲到：斯大林滥用权力，违背了列宁处理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把党内的正常争论看成是对敌斗争，走上了大规模镇压和清洗的道路。1936 ~ 1939 年期间有许许多多的无辜者遭到残酷迫害和屠杀。以胜利者大会著称的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有超过半数多的代表在 1937 ~ 1938 年间因为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而十七大的 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竟有 98 人被逮捕和枪决。军队干部队伍也难逃厄运，近 3.5 万多人成了大清洗的牺牲品，其中包括 3 名元帅、集团军司令级干部 13 名、军级干部 57 名、师级干部 110 名、旅级干部 220 名，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 80 名成员中的 75 人。赫鲁晓夫指出："事实很明显，很多在 1937 至 1938 年被诬蔑为'敌人'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经济活动家，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而始终是忠实的共产党员。"[②] 尤其恶劣的是，这些冤假错案大多是安全部门通过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不仅不制止这种严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而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敬若神明的领导人竟然犯下如此暴行，在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正如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指出的那样："如果对制度过分信任的话，革命会带来血腥、残酷的后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试图改造世界，但对于那些亲身经历革命、

① *Амальрик А.* Просуществует л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до 1984 года? с. 10.

②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王德树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 15 页。

知道革命代价的人来说，很难接受这个目标。所以，持不同政见者认为，说话比做事本身更重要。他们又重操知识分子的旧业：思索、辩论、写作。”[①]

与此同时，1956年苏共中央开始全面清查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大规模释放政治犯。许多人从集中营重返社会，成千上万无辜者死后得以昭雪。这些人的悲惨遭遇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为了搞清楚所有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及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劫后余生的许多人坐下来撰写回忆录。于是“文学作品、回忆录、那一时代的历史等等，大量地涌现出来”。[②] 这类作品很多都以手稿的形式在私下出版物上流传，像E. 金兹堡的《严峻的历程》，加扎里扬的《这事不应再重演》等等。1962年，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曾经引起一时的轰动，从此一种被称为集中营的文学体裁开始在苏联文坛流行。初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正是在这种揭露斯大林专制统治，深入思考斯大林悲剧发生的原因和要求创作自由的过程中出现的，也即脱胎于最早的文化反对派。因写《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阿马利里克为此写道：“文化反对派内部涌现出一股新的势力，这股势力已经不仅是反对官方文化，而且也反对当局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的许多方面。”[③]

早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间，莫斯科就出现了规模不大的大学生小组，他们在共青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散发传单，同情匈牙利民族民主运动。1958年夏天，一些大学生和青年诗人开始定期在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举行文学集会，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和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经常在会上朗诵诗歌，发表演说。“朗诵会一般是在周六和周日晚上举行，每次参加者平均数百人。”[④] 伴随着这种露天聚会的频繁举行，在一些年轻参加者的圈子里逐渐产生了一些类似于俱乐部的非正式文学组织。他们相互交流信息，收集和阅读自己打印的刊物——私下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参加集会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但以大学生居多。共青团曾经尝试把马雅可夫斯

① 西尼亚夫斯基：《苏维埃文化：一部文化史》，第380页。
② 罗·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刘明等译，群众出版社，1984，第62页。
③ *Амальрик А.* Просуществует л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до 1984 года? с. 5.
④ *Алексеева Л.*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с. 197.

基广场学生的革命浪漫主义活动纳入自己的轨道中，但没有成功。从此政府有关机构开始限制集会，安全部门对经常参加集会的积极分子定期搜查，没收他们保存的各种诗集和私下出版物。

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在对待改革和批判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开始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书报检查制度，暗中推进重新斯大林化的进程。1965年秋苏联安全部门逮捕了安德烈·西尼雅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两名作家，他们分别以笔名"阿勃拉姆·特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在国外发表所谓破坏和削弱苏维埃政权的作品。"拘捕作家被理解领会为是不祥的重大转变的序幕。想必，新的苏联领导人会以两位作家被逮捕向私下出版物宣战——向它的作者、传播者和读者宣战。"[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要求"遵守宪法"和"公开审判两位作家"的示威活动，觉醒了的知识界终于开始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抗争，从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浮出水面，成为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阶段划分和各阶段特征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在苏联出现，但这时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些个别现象，而且大多是在暗中活动，还不能称为一种运动。1965年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要求"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从此，追求民主、自由、维护个人权利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开始形成，并一直持续到1984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夕才告结束。此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征。

1. 萌芽时期（1956～1965年）

1956～1965年在苏联社会开始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现象，然而，这一阶段的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思潮和单个的人，还没有以"运动"形式呈现出来，因此，1956～1965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萌芽时期，或者酝酿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个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就是1956年苏共

---

① *Алексеева Л.*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с. 202.

二十大的召开以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斯大林的与世长辞使其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专制集权体制出现松动，赫鲁晓夫推行的解冻方针，以及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社会开始了多元化的进程，领袖思想和行为一贯正确的观念有所淡化；另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使斯大林的形象由人民的慈父转变为滥杀无辜的暴君，急剧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普遍的混乱，人们一时无所适从。饱尝迫害之苦，其儿子 1956 年才从监狱获释的著名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指出："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一种是坐过牢房的人，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遭受集中营迫害的人和一部分不甘于像父辈那样生活的年轻人开始对历史进行思考，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逐渐萌发，解冻思潮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形式基本上都是在暗中进行，他们并不公开自己的活动。无论是莫斯科大学生小组，抑或是因为从事所谓"削弱苏维埃政权宣传"而被判刑的 A. 金兹伯格，当时都不大为人所知。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阿列克谢耶娃通过研究后发现：持不同政见者"最初的组织形式是地下组织，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由青年人组成……正如后来查明的，他们多半是持马克思主义说教的地下小组，其目的是'恢复社会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以及类似的东西。"[②]

2. 缘起与发展时期（1965～1968 年）

1965 年 12 月 5 日是苏联的宪法日。为了抗议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和迫害，著名诗人亚·叶赛宁·沃尔平组织了示威游行，要求遵守宪法，公开审判两位作家，还布科夫斯基以自由。这是苏联国内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的首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被认为是苏联维护权利运动的开端，因为它首次提出了维护人权的口号。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发起了为捍卫苏联公民权利而进行的"书信运动"、"请愿签名运动"。书信、请愿、签名成为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主要手段，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书信题材的革命"（Эпистоля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与此同时，持不同政见的活动形式也由地下发展为公开进行，而且，

---

① 斯蒂芬·科恩：《苏联经验初探》，陈伟译，东方出版社，1987，第 109 页。

② Л. 阿列克谢耶娃：《关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组织形式》，《苏联问题译丛》第 2 辑，三联书店，1979，第 252 页。

大家有统一的目标和追求，即批评政治压制和重新斯大林化的倾向，要求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60年代下半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各种各样的思潮、派别组成，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复活‘个人崇拜’，反对完全或者部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反对破坏法制、滥用权力，主张言论自由，实行公开性，维护信息传播自由，抗议对持不同政见者强制施行精神治疗等等。”[①] 知识界不断抗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反对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并且开始“直接诉求社会舆论的支持”。[②]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A. 萨哈罗夫加入保护权利运动行列以后，以及他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士气。此外，这一时期政府不仅加强了国家安全部门的职能，组建第五局并使之成为一个专门监视知识分子的机构，而且强化了社会秩序控制，在俄罗斯联邦刑法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刑法中，加入190条有关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的条文，加大对印刷和传播私下出版物和所谓危害社会秩序活动的打击力度。

3. 高涨时期（1969～1971年）

这一阶段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第一批维护权利的小组和团体开始出现，运动进入有组织时期。同时，以维护权利为核心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提出了自己完整明确的政治主张。1969年，第一个公开的协会“苏联维护人权发起小组”成立，“他们的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保护权利，在保护权利的旗帜下，每一个派别都提出自己奋斗的目标和任务。参加者也学会利用各种手段和工具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③] 这一时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图拉、弗拉基米尔、鄂木斯克、喀山、秋明、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等地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小组。运动的参加者扩展到社会的所有阶层：工人、军人、作家、艺术家、科技工作者，甚至包括了通常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的农民——国营农场的工人。各地运动的联系明显增强，基本上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维护权利组织。此外，维护权利运动的目标进一步深化，既涉及全国的问题，也涉及地方的或者是非官方的问

① *Медведев Р.* Личность и эпох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Л. Брежнева, с. 258.

② Этапы истории инакомыслия, http://www.memo.ru/history/diss/hronvved.htm

③ Этапы истории инакомыслия, http://www.memo.ru/history/diss/hronvved.htm

题，而且维护权利的层面也有所扩大。

私下出版物内容也出现了明显的嬗变，由以前主要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等题材转变为持不同政见者有关政治、经济和政论等纲领性内容。1970 年 12 月 21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安德罗波夫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通过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收集到的私下出版物分析研究后发现，“‘私下出版物’最近几年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 5 年前流传的主要是思想上有害的艺术作品的话，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质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 1965 年以来出现了 400 多种有关经济、政治和这些问题的各种研究报告和文章，它们从各个方面批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议论苏共的内外政策，提出各种反对派的活动纲领。”①

同时，伴随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不断发展，持不同政见者表面上的统一性被打破，形成了以罗·麦德维杰夫、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为首的各个主要流派。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内部分歧逐渐加剧，争论日趋激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成熟，因为“不同政见的各个流派和各个集团终于认识到，单是抗议还不够，必须更深入地重新思考他们的‘积极的政纲’。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出现分歧，有时甚至导致彻底的决裂”。②

4. 危机时期（1972～1974 年）

1972 年夏天到 1974 年，这一时期是持不同政见运动遭到极大困难甚至是某种危机的时期。随着政府放宽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制，国家安全部门也开始允许甚至是不断施加压力迫使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跟随这股浪潮移居西方。强迫持不同政见者移民西方不仅可以削弱反对者营垒的力量，同时也能败坏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声。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国家对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抛弃祖国向往资本主义世界即意味着背叛。正像罗·麦德维杰夫指出的那样，“西方派和人权保卫者中的许多犹太族持不同政见者也加入到这个移民潮。同时，许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的作家、剧作家和画家在当局的默许下，或相反，是在当局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也凭以色列签证移居西方了。”③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力度，大量持不同政见者被捕，许多小组和

---

① *Медведев Р.* Личность и эпох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Л. Брежнева, с. 173 – 174.

② 罗·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第 74 页。

③ *Медведев Р.*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Андропов, Москва: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1999, с. 173 – 174.

团体被破获，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西方，报纸掀起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运动几乎难以为继。特别是 П. 雅基尔和 В. 克拉辛被捕并供认出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叛变行为，导致大批维权运动参加者被捕，维权运动几乎崩溃。

5. 赫尔辛基时期（1975～1979 年）

1975 年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苏联同西方国家签署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是文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仅为濒临崩溃的维权运动重新高涨注人活力，同时开始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赫尔辛基时期。赫尔辛基时期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又一个高峰阶段。这一时期在苏联国内建立了以奥尔罗夫为首的独立公开的“苏联协助完成赫尔辛基协议小组”。小组的主要活动是收集和分析他们所能得到的关于苏联违反赫尔辛基协议条款以及签约国有关其报道的资料，并通报给西方。在维护权利的共同基础上，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与起初互不相干的民族宗教运动建立了联系。1976 年底到 1977 年初在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成立了赫尔辛基小组。1977 年还在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的下面设立了“研究把精神病学用于政治目的的工人委员会”，甚至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小组。各小组参加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而且出现某种联合的趋势。这一阶段“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无论在目的，还是在国家社会生活，保护人权问题等方面都具有了明显的国际意义”。[①]

私下出版物这一阶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政论性的文章成了其主要内容。大量的私下出版物文集在西方由侨民团体印刷后，通过秘密渠道运回国内，在苏联各地流传。不仅莫斯科能看到这样的文集，而且在列宁格勒、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地也随处可见。

6. 衰落时期（1980～1984 年）

1979 年苏军出兵阿富汗之后，苏联政府再一次加大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压制的力度。萨哈罗夫因发表公开信，反对苏联对阿富汗的战争而被流放到与外界隔绝的高尔基城，期待着获释的持不同政见者继续被关在监狱。同时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判决也更为严厉，一般刑期都在 10～15

① Этапы истории инакомыслия, http://www.memo.ru/history/diss/hronvved.htm

年。此外，克格勃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视也更加严密起来，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通信、亲友会面，甚至日常生活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政府的严厉措施取得了效果，在短时期内，由于500多位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积极分子被逮捕，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时群龙无首。加之，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被迫移居国外，而为运动补充新鲜血液的知识界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激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趋势。

此外，国外舆论对苏联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反应也不像从前那样激烈，因为苏联人侵阿富汗，特别是击落韩国民航客机后，被美国总统里根称为邪恶帝国的苏联有许多更值得世界舆论关注的事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重要性下降了，这一切使留在苏联和移居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普遍感到运动没有出路和前途无望，对苏联统治者最后一点希望也消失了，政权已完全蜕变为代表一小部分人利益的保守的官僚机构。

然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它传播的民主、自由，维护人权的思想意识已经悄然深入苏联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已经深入到国家政权的支柱部门：军队、内务部、安全委员会。从1985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情况通报中可以看到如下的材料："早在60年代时期一些警员就因涉嫌参加反苏鼓动和宣传活动而被判刑，而当时这种情况只是偶尔的事件……而80年代初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内务部就预先揭露出334个从事对国家有害的和不健康政治行为活动的工作人员。制止了内务部审判监督员创立反苏维埃青年组织，以及制定宪章和纲领违法行为的案件，以及滨海边疆区内务机关联络处的一位处长系统地把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违禁作品介绍给自己的同事的案件。国家安全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对西方生活方式非常感兴趣，有的人甚至公然发表支持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违法言论。"①

（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派别、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流派纷呈，比较重要的派别主要有罗·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方派和索尔仁尼琴为

① *Козлов В. А.* Крамола: инакомыслие в СССР во времена Н. Хрущева и Л. Брежнева, Статья 2, с. 76.

首的新斯拉夫派。各个派别的政治主张既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民主社会主义派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认为苏联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在苏联建立一个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和多元的社会是他们的追求。以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又称法制派，他们以民主、自由、法制和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为自己的不同政见纲领，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通过改革，相互吸收各自的长处，最后走向趋同。新斯拉夫派又称基督教民族派，他们既否定社会主义，又否定资本主义，认为东正教、专制制度，村社和自治是俄罗斯文化的精华，只有发扬光大它才能拯救俄罗斯。

1. 罗·麦德维杰夫与民主社会主义派

民主社会主义派西方一般认为其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左派，有时称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派，或者改良共产主义者，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称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派，有时也称党内民主派，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人是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和若·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此外，还有彼·格里戈连柯和П. 叶戈洛夫等人。

麦德维杰夫兄弟并不是因为其积极参加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各种活动，而是因为他们撰写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分析苏联社会性质的著作、杂志和文章，并系统地提出自己改革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而闻名于西方。

（1）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坚信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但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违背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精髓，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民主社会主义派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或称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的，只不过应该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叶戈洛夫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经过科学的论证确信，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是社会的更高形式，它符合人类的本质，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1] 进而他又提出：时至今日，人类历史实际上还没有给世界提供一个社会主义具体范例，社会主义还处于探索阶段。

① 叶戈洛夫：《什么是民主共产主义》，罗·麦德维杰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326页。

民主社会主义派经过认真分析苏联60多年（截止到70年代晚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得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最起码列宁以后苏联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今天的苏联是“官僚化的社会主义”，“专制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的变种”。

（2）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财产社会所有制（公有制）和民主完美的结合。苏联的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高级权贵们不仅掌握了全国财产的支配权，而且不对任何人负责。庞大的官僚主义阶层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主人。在作为私下出版物广泛流传的《列宁格勒提纲》中，C. 佐林和 H. 阿列克谢耶夫写道：“必须以全民所有制取代垄断的国家所有制”，只有财富的所有者能够支配这一财富时才是全民所有制。[①] 同时，只有社会所有制与民主的有机结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所有制，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官僚主义和官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敌人，防止国家政权官僚主义化的重要保证在于政治民主化。

（3）多党制、党内反对派、社会多元化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的一个重要主张，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康发展。

罗·麦德维杰夫认为多党制与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有关系。每一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都会保留多种社会经济成分，而多种经济成分造成了多党制存在的基础。至于共产党同其他政党合作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革命变革的性质，取决于这一革命是和平的进行还是非和平的进行。至于党内是否允许反对派存在，在民主社会主义派看来，共产党内存在反对派是正常现象，如果没有真正的政治斗争，没有反对派，任何政治组织都会衰败。他们坚信“党的统一任何时候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排除各种争论和斗争，这对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乃是基本的原理”。[②] 多元化是人们对社会认识差异的反映，即使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后，也仍然会有看法不同的情况存在。

---

① C. 佐林、H. 阿列克谢耶夫：《时不待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历史的转折时期》，麦德维杰夫：《政治日记》，贾连义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574页。

② 罗·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史正苏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62页。

（4）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民主社会主义派主张应该同一切民族主义派别进行公开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克服长期积累下来的民族矛盾，必须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责任，尊重所有大小民族的合法权利。为了履行民族自决的权利，他们甚至建议“在每个加盟共和国每十年必须举行一次关于该共和国是否保留在苏联的公民投票……每一个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有权宣布举行这种公民投票”，决定自己是否继续留在苏联境内。[①]

（5）民主社会主义派反对苏联推行的扩张主义政策，认为苏联直接出兵捷克和阿富汗，败坏了社会主义形象，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应有这种行为。格里戈连柯指出：“苏联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应该是营造一个能成为对所有兄弟党具有鼓舞榜样的社会秩序”[②]，而不是直接出兵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更何况捷克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是苏联的某个地区。

总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并不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只不过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列宁既定方针，异化为官僚主义体制。因此，他们主张在维护苏联现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化改革，实行社会多元化，允许反对党和不同政见者存在，同时，在苏联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全面推进民主政治，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 萨哈罗夫与西方派（法制派）

1921 年萨哈罗夫出生在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军工企业工程师。1945 年萨哈罗夫进入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由于在苏联研究氢弹工作中的卓越贡献，被西方称为苏联氢弹之父。1953 年 32 岁时他就成为苏联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并很快出任国家原子能委员会首席顾问。萨哈罗夫曾三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获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从 1957 年起，他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尤其关心他所从事的核武器研究造成的社会后果，多次上书赫鲁晓夫，建议停止大气层核试验，但未获成功。1968 年，萨哈罗夫完

① 罗·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第 317 ~ 318 页。

② 《格里戈连柯就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问题致卡达尔、罗歇、隆哥的信》，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188 页。

成了《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1] 一文，呼吁苏美停止军备竞赛，实行真正的和平共处，从此，开始了他的持不同政见者生涯。1970 年年末，他和查理泽等人成立"苏联人权委员会"，以后又多次上书勃列日涅夫，继续要求实行民主化。1975 年萨哈罗夫因为"捍卫人权、裁军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进行的斗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平"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苏联政府拒绝他出境领奖。1980 年，由于强烈抗议苏联出兵阿富汗，萨哈罗夫被放逐到小城高尔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恢复了自由后的萨哈罗夫曾经当选为苏联首届人民选举的苏维埃代表。

以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方派积极参加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他们的主要思想如下：

第一，萨哈罗夫认为苏联社会发展远不像宣传的那样美好，官僚主义成风，特权阶层贪污腐败，政治上缺乏民主，社会公正远未实现，当今苏联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萨哈罗夫在《论国家与世界》一书中写到：苏联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最简洁地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它和西方类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在经济以及文化，思想和其他主要生活领域内实行全盘国家化，党和政府的全部垄断。"[2] 官僚政党特权阶层自成一体，他们掌握着国家财产分配权，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主人。我们没有世界上最高的劳动生产率，甚至没有希望在可见的未来按这种指标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存在着不断军国主义化的倾向。人民生活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大部分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仍然很差。

第二，苏联必须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自由化和公开性，加强法制，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推行社会改革，通过和平的手段最终使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互相接近、趋同，形成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多元社会，从而消除当今时代悲剧性的对抗和热核战争的危险。

西方派认为社会应该摒弃单一体制，实现多元化，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共存，并给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正是这种自由，而不是来自教条、

---

① *Сахаров А. Д.* О стране и мире, Нью-Йорк: Хроника, 1976.

② *Сахаров А. Д.* О стране и мире, с. 25.

权威、国家的传统或政权抑或舆论的压力，才能够保证那些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个人，社会，文化和其他许多社会现象中的无限复杂和矛盾的问题得到合理与公正的解决，只有这种自由会给人带来直接的个人幸福，这种幸福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意义。"①

第三，在经济方面继续深入进行1965年的经济改革政策，扩大所有生产单位的经营自主权，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实行有利于农民的税收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在服务行业、医疗、小宗商业、教育等方面扩大发挥私人主动精神的可能性和有利性。

第四，在法律方面要保证司法部门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加快立法步伐，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确立司法公开和透明的原则，停止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

西方派认为法制观念水平很低是苏联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此，他们主张只要不违背公民的基本权利，诉讼程序都要公开。"采取一些改进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措施，应使这些机构不受行政当局和地方势力、偏见和人事关系的干预。大赦政治犯。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必须全文公布政治性案件审讯速记记录"②，停止对政治犯的司法迫害。

第五，切实履行宪法保证公民言论、信仰、集会、选择居住地自由的权利，保证少数民族应享有的权利和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权利。

萨哈罗夫指出："党和国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垄断，其后果特别有害。思想统一化经常地——从学校课桌到教授讲坛——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奇怪，艺术和人文科学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完全消失"③，应该取消出版审查机构，言论自由，鼓励各种思潮自由竞争。同时，应当制定允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实施细则，以便使宪法自由脱离的条款能够真正实行。

第六，在对外交往中应加强国际合作，"主动宣布或者重申不首先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在签订裁军或部分限制某种武器协定的情况下，允许

① *Сахаров А. Д.* Движение за права человнка в СССР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не цели, эначение, трудности// Звезда, 1990, № 3, с. 26.

② *Сахаров А. Д.*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осква: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1996, с. 668.

③ *Сахаров А. Д.* О стране и мире, с. 37 – 38.

调查团进入我国境内，以便有效监督裁减军备”。[①] 国家主要精力应该用在内部和谐发展上，这是国家强大和繁荣的基础。国家和人民并不需要把对外政策作为取得国内政治稳定或者扩大势力范围，输出自己思想的手段。那种认为自己的道路是唯一正确，并有独特优点的看法是错误的，应该尊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总的来说，从上述可以看出西方派（法制派）要求民主和自由，加强法制，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他们认为维护权利的主张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各个派别和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标，它不仅可以为那些被没有给人们带来起码幸福的僵化教条说教搞得筋疲力尽，并且对任何理论和信仰都不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一种现实的支撑，而且随着维护权利的思想深入人心，有助于民主与法制在苏联的不断推进，这也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互接近、趋同提供具体的促进作用。

3. 索尔仁尼琴和新斯拉夫派（基督教民族主义派）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1918 年 12 月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服役，在他出生前就已战死在德国，母亲是中学教员。童年的他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41 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 年 2 月，因在信中批评斯大林而在前线被捕，被判处 8 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 年恢复名誉后的他定居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担任数学教员。同时，索尔仁尼琴积极从事文学创作。1962 年 11 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他的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小说一经问世，在文艺界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被西方称之为“集中营文学”的现象在苏联产生。1967 年 5 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②] 其后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

---

① *Сахаров А. Д.* Памятная за писка: Генеральном секретарю ЦК КПСС тов. Л. И. Брежневу, с. 15.

②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Письмо Ⅳ-му всесоюзному сьезду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ей//*Коротков А.* Кремлевский самосуд: 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литбюро о писателе А. Солженицыне, с. 43.

学奖金。由于在国外出版披露苏联监狱与集中营内幕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以及积极参与持不同政见者活动，1974 年 2 月 14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 10 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在美国组织了“全俄罗斯回忆录文库”，在苏联成立了“俄罗斯援助政治犯社会基金会”，继续从事持不同政见活动。1994 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归离别十年后的祖国，他的作品也得以在俄罗斯正式出版。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很多，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一文集中反映了他的主要政治主张。

首先，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基督教民族主义派）脱胎于伦理社会主义派别，他们不仅反对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的理论，而且也反对西方文明，并认为二者有共同之处；同时，认为当今的俄罗斯主要有两大危险，即同中国发生战争和西方文明面临绝境的前景，俄罗斯只有发扬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才能摆脱两大威胁所带来的破坏。

索尔仁尼琴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公开宣称，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今天，这种意识形态只能使你们变得更软弱和捆住你们的手脚，这种意识形态充斥社会的全部生活中：在人们的头脑中、讲话中、广播和报刊上全都是谎话……这种强迫人人说谎话的情况在我国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令人最痛苦的事，比任何物资生活的凄苦和公民不自由都要痛苦得多”。[①] 然而，索尔仁尼琴也并不主张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强制取消措施，只有国家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支持，让它自行存在好了。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明具有同源性，都以工业发展为基础，然而，经济无止境的发展，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再过 20 到 30 年西方文明必将衰落。属于西方文明的俄罗斯应早作打算，防止灾难突然降临到自己的面前。索尔仁尼琴还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如果 20 世纪的人类获取了什么教训，那是我们提供给西方的，而不是西方赐予我们的，

---

①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Письмо 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Л. Брежневу//*Коротков А.* Кремлевский самосуд：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литбюро о писателе А. Солженицыне，с. 283.

由于事事如意的西方人意志和理智都减弱了。"①

其次，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只有开发东北部地区，并把民族活动中心和生活中心迁移到此地，在保持经常稳定的经济基础上，放弃不断发展经济的道路，恢复农业社会，同时，放弃对外扩张的政策，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开上述两种威胁的影响，使俄罗斯不至于在西方文明毁灭以及同中国人的战争中瓦解。"越是尽快转移我国注意中心和民族活动中心，从遥远的大陆、甚至从欧洲、从我国南部向东北部地区转移，越是能尽快得到挽救"。②

再次，索尔仁尼琴不赞成任何急剧的社会变革，认为民主制度并不适宜俄罗斯民族的现状，自由只能是精神上的。俄罗斯只能实行专制制度，即建立在古老东正教人类互爱道德基础上的专制制度，也只有这种制度才是拯救俄国最现实和最好的办法。

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索尔仁尼琴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大规模的流血革命只能是对人民的摧残，自由必须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而且更应该侧重于精神层面。至于民主并不适合俄国。知识分子 100 多年来同专制制度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决定还是不决定，反正俄罗斯要实行专制制度……一切在于，下一步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专制制度，难以忍受的不是专制主义本身，而是强制的经常散布的意识形态谎言。不可忍受的不是专制主义，而是专横和目无法纪……专制制度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法律，或者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或者不应反映人民的思想和意志。专制制度也并不意味着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没有独立性。"③

最后，索尔仁尼琴主张开展诚实的思想竞赛。这样一来，大量的哲学、道德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著作就会涌现，这不仅会促使科学研究深入发展，而且也能丰富伟大的俄罗斯文化。索尔仁尼琴最后特别强调指出："今天，除了基督教可以医治俄罗斯的灵魂以外，我自己也看不到任何有生气的精神力量"，也只有大力发扬俄罗斯民族精神，包括村社、家

---

① 索尔仁尼琴：《牛犊抵橡树：索尔仁尼琴自传》，陈淑贤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第 146 页。

②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Письмо 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Л. Брежневу, с. 271.

③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Письмо вождя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Диалог, 1990, № 4, с. 95.

庭、自治、东正教、专制传统才能使俄罗斯强大。[①]

总的来说，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人数并不是很多，他们虽然不承认自己同19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的斯拉夫派思想具有联系，但其政治主张却明显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精神”之中。他们既反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认为二者的根基都是工业文明。俄罗斯民族并不适宜于民主，只有专制制度、东正教、村社、自治、农业社会才是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私下出版物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和组织采用独特的“萨米兹达特”（самиздат）和“塔米兹达特”（тамиздат）的形式传播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交流和分享信息。中国学者将самиздат翻译为“私下出版物”或“独立出版物”；тамиздат译为那边出版物。私下出版物一般是指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些个人和组织编辑印刷的定期的和不定期刊物、文集，同时包括那些政府不允许出版或者不能出版，却在私下里互相传抄和复印，并广为传播的各种文章、手稿、打印稿等。那边出版物是指苏联公民及其一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个人或者组织把自己的作品和刊物在国外出版，而后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回苏联国内私下传播，这种形式的出版物严格上说不能称作私下出版物，因为它在国外是公开出版发行的，只不过是苏联出版审查机构不允许它在苏联发行。私下出版物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和组织的各种公开信、纲领，主张和思想以及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法庭审判记录、判决书、精神病院等情况都在上面有所记载，它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同苏联党和国家斗争的重要工具。“如果没有私下出版物的话，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不可能存在，因为文字是后者的唯一武器”。[②] 私下出版物不仅打破了苏联党和政府高度垄断信息传播工具的局面，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个派别和社会思潮宣传自己的思想，发动社会各界参加和声援持不同政见者活动，以及

①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Письмо вождя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95.

② 西尼亚夫斯基：《苏维埃文化：一部文化史》，第383页。

传播民主、自由、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文化的宝库。

（一）私下出版物的由来及概况

在俄罗斯历史上一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书报检查导致被禁止的出版物总是以私下印刷的小册子形式到处传播。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私下出版物”成为苏联社会自我意识表现的一种独特的现象。

私下出版物是从翻印和复制买不到或被禁止的诗集开始的。语言简洁而寓意含蓄深刻的诗歌承担起了思想解放，冲破党和政府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的初期任务，因为传播私下出版物而被政府最早判刑的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在《风又回来了》中回忆道：“那是个难忘的岁月，整个莫斯科的各个机构中，打印机的运转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有谁为自己和朋友印制了一些东西，那一定是诗，诗，还是诗。年轻人的圈子产生了，而他们的秘密口令是源自于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古米列夫的诗句。”[①] 初期的私下出版物并不仅仅局限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而是涉及所有不能出版的东西，包括以往和当今的一切作品。

60年代中期，私下出版物逐渐成熟了，并且开始政治化。1964年罗·麦德维杰夫开始定期发行一种被西方称之为《政治日记》的私下刊物。1965年因为在国外出版著作而被克格勃逮捕，随后又被政府重判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发生后，在苏联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与政府斗争的主要工具——私下出版物开始了它的蓬勃发展时期。新的私下出版物不断涌现，大量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的回忆录、签名人数众多的抗议信件、请愿书、声明、批评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处理方法的文章，以及法庭审判的各种法律文件和被告人的辩护词在私下出版物上广为传播。政府为了遏止这种危险的局面，加大了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私下出版物的打击力度，对编辑并在苏联国内外出版发行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诉讼材料《白皮书》的A. 金兹伯格和加兰斯科夫等人再一次判刑。这样，每一次审判后都会有人在苏联和西方出版审判诉讼材

① *Буковский В.* И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ветер, Нью-Йорк: изд-во Хроника, 1978, с. 124.

料集，每一次这样的出版又会招致政府的压制和审判。从而，导致私下出版物愈来愈多，政治性质也越来越浓厚。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政府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逐渐深入发展，以及各种维护权利组织的出现，私下出版物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种刊载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和政府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信息、通报形式的定期刊物开始大量涌现，像《时事纪事》、《自由思想》、《乌克兰通报》、《移居》、《立陶宛天主教纪事》等等，而且私下出版物也由以前主要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集中营迫害，公开信和请愿书，各种被禁文学作品以及回忆录等题材嬗变为有关政治、经济和政论等内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个派别的纲领开始在其上面广泛流传。

此外，大批在国外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和政府不允许流入苏联的外国作者的书籍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苏联，被翻印或者以手稿的形式在暗中流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1970年12月21日就“私下出版物”问题他给苏共中央发了一个绝密报告，其中说道：“对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传播的所谓‘私下出版物’进行分析表明，‘私下出版物’的内容近几年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流传的主要是一些思想上有问题的文艺作品，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1965年至今这一段时期内已出现400多种有关经济、政治和哲学问题的各种学术著作和文章，这些出版物从各个方面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苏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议论，提出了各种不同于苏共政策的行动纲领。……在许多主张苏联社会‘民主化’的方案中都提出要‘限制或消除苏共的垄断权力，在国内建立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反对党’。”[1]

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有关民族和宗教的私下出版物，像《土地》、《莫斯科文集》等刊物，同时鞑靼人争取回归故乡的材料，乌克兰、亚美尼亚维护民族权利和爱沙尼亚宗教徒的内容也不断地出现在私下出版物上。赫尔辛基协议签署后，通报苏联违反赫尔辛基协议和要求维护权利的内容一度成为私下出版物关注的中心。此外，7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持

---

① Источник, 1984, № 2, с. 77－78.

不同政见者积极分子流亡国外，一些私下出版物开始在国外印刷，而后偷运回苏联传播。

总之，私下出版物出现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初期它同文学解冻思潮密切相关，后来逐渐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宣传自己主张和反对政府镇压他们的舆论工具，在国家严格控制一切信息传播途径的苏联，提倡用和平手段维护民主、言论自由、多元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者们也只能依靠这种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手段，去追求自己的权利。

（二）私下出版物分类及主要作品①

苏联私下出版物种类繁多，为了避免政府的打击，一般都是在熟人之间秘密流传。私下出版物虽然在苏联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流传，但都未得到官方许可，因此是非法的，不断受到苏联当局的追究。私下出版物没有固定模式，大体上可以把它分为各种类型的期刊；在西方出版并在苏联私下流传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各种类型的手稿、信件和司法文件等几种形式。

1. 在国内和西方发行的各种类型的期刊

（1）政治类：

《时事纪事》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运动”的固定刊物，1968 年开始发行，1983 年停刊，共出版了 65 期。西方研究者认为这一刊物是所有非官方刊物的始祖。15 年来，该刊物曾几次被政府勒令停止发行，编辑者们被捕、监禁，甚至被送到精神病院，但不久复刊又继续出版。査理泽曾经在美国打印、发行过《时事纪事》国外版。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运动还曾先后出版过《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思想》等私下出版物。

《政治日记》是由麦德维杰夫兄弟主编，专门揭露苏联政治内幕的固定刊物，被西方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左派”的代表刊物。1964 年开

①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私下出版物种类繁多，大都保存在以下的私下出版物文集中：Материалы самиздата. Мюнхен：RL/RFE Research Institute. 1971 – 1991；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группы содействия выполнению хельсинских соглашений в СССР. Нью-Йорк：Хроника，1977 – 1984. Вып. 1 – 9.；Собр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амиздата. Мюнхен：RL/RFE Research Institute，1972 – 1978. Т. 1 – 30。

始出版，到1971年停刊时共发行了82期，在西方出版发行19期。

此外，有关这类刊物还有《二十世纪》、《钟声》、《播种者》、《探索》，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同时出现的《纪念》，立陶宛的《黎明》，里加的《犹太人在苏联》，格鲁吉亚的《金羊毛》等，这些杂志有的存在时间比较长，有的很快就被政府取缔。

（2）民族宗教类：

1970年，一种关于乌克兰民族文化运动信息的《乌克兰通报》定期私下出版物开始出现，从此，该刊物不断刊登乌克兰民族人士反对苏联政府大俄罗斯主义政策的文章，成为乌克兰民族维护自己权利的阵地。尽管克格勃几次搜查和逮捕编辑者，但其一直坚持出版。1974年第七、八两期合刊的《乌克兰通报》发表了长篇文章，从乌克兰人口统计、对乌克兰文化灭绝等几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变本加厉地推行全盘俄罗斯化的情况，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此外，B. 奥西波夫编辑的《市民大会》和《土地》，以及《莫斯科文集》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刊物。《立陶宛天主教纪事》是有关于立陶宛民族宗教运动信息通报的私下出版物。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认为本民族文化受到损害。

（3）在国外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主要刊物：

7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被驱逐到国外，在西方出现了一部分这些人办的期刊，这种刊物一般是在国外出版后，再私自运回苏联传播。这类刊物主要有马克西莫夫在西德出版的《大陆》杂志、格列杰尔在法国出版的《第三浪潮》、马拉姆津主编的《回声》和西尼亚夫斯基主编的《句法》等，这几种刊物均为季刊。

2. 在西方出版并在苏联私下流传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公开出版发行自己的著作，而后以禁书的形式私自流回苏联国内直接发行或者翻印传播，这种类型的私下出版物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称为私下出版物，但由于政府明确限制这种作品在苏联发行，最后，这些著作只能以非法的形式在苏联读者手中私下流传，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种。

（1）持不同政见者剖析有关于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历史、科技、文艺等方面的理论书籍。这方面的书籍很多，主要有罗·麦德

维杰夫的《论社会主义民主》、《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①]；若·麦德维杰夫的《苏联科学》；格里戈连柯的《疯人的思想》；萨哈罗夫的《祖国与世界》；阿马利里克的《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查里泽的《苏联的工人运动》[②] 等。

（2）披露苏联高层内幕，维护民主与人权，揭发苏联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迫害和镇压等内容的书籍。披露高层内幕的作品主要有斯大林女儿阿利卢耶娃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③]，阿夫托尔哈诺夫的《权力学》[④]，米亚科夫的《克格勃内幕》[⑤] 等。揭发苏联当局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积极维护言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关于苏联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白皮书》，揭发苏联当局审判加兰斯科夫等人的《四个人的诉讼程序》，记载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政府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各种抗争活动的《中午：1968年8月25日红场上的游行事件》，以及《萨哈罗夫国际听证会文件集》、麦德维杰夫兄弟合写的《谁是疯子?》、阿马利里克《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⑥]、马尔钦科《我的证词》、鲍得拉比涅克《惩罚性医疗》等。[⑦]

（3）批评苏联政府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政策，利用俄罗斯文化的优势地位有意识地消亡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迫害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少数民族反抗政府斗争的有关书籍。

1970年伊凡·久巴在英国出版了《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⑧] 一书，系统地揭露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民族政策，抨击了政府对乌克兰实现残酷民族压迫、同化以及迫害持不同政见民族人士的政策。涅克里奇关于反映鞑靼民族争取回归故乡斗争的著作《被惩罚的民族》和涅克拉索夫《旁观者随笔》[⑨] 等书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

① *Медведев Р.* К суду истории: генезис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сталинизма. Нью-Йорк, 1974.

② *Чалидзе В. Н.* СССР-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Нью-Йорк: Хроника, 1978.

③ 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刘白岚译，外文出版局，1980。

④ 阿夫托尔哈诺夫：《权力学》，张开等译，新华出版社，1980。

⑤ 米亚科夫：《克格勃内幕》，英石译，群众出版社，1979。

⑥ *Амальрик А. А.* Нежелан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Сибирь,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⑦ *Подрабинек А. П.* Карательная медицина, Нью-Йорк: Хроника, 1979.

⑧ 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辛华译，商务印书馆，1972。

⑨ 涅克拉索夫：《旁观者随笔》，谷启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4）探讨有关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历史、现状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自己在苏联经历方面的著作。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有 1982 年阿列克谢耶娃在美国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史》、布科夫斯基的《风又回来了》、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艾凯德的《不是阴谋家的记述》[1]、列维京的《可爱的自由：民主运动》[2] 等。

（5）被西方称之为“集中营文学”类型的私下出版物，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也极为丰富，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

3. 各种类型的手稿和信件

除了上述各种类型的刊物，以及在西方公开出版而后在苏联非法传播的书籍之外，在苏联国内私下里还流传着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的手稿、公开信、请愿书以及一些纲领性文件。例如被西方称为《列宁格勒提纲》的《时不待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历史的转折时期》；萨哈罗夫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苏共老党员、经济学家叶·瓦尔加的《瓦尔加遗言》；叶戈洛夫的《什么是民主共产主义》；索尔仁尼琴的《致全苏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信》和《致苏联领导人的信》；罗·麦德维杰夫《关于我国若干社会政治思潮》；捷克知识分子的《两千字宣言》；卡皮查的《科学与现代社会》等。这些文稿有的是以作者真实姓名传播的，有的是以化名扩散的，但这些打字文稿在苏联社会广为传播，影响巨大。它们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全方位透视了苏联社会，并提出在苏联建立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以公有制为主并允许私有经济存在，两种经济相互竞争，以及多党制国家的不同于政府主张的改革方案。

从上述文字来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种类繁杂，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通过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垄断了信息传播的所有渠道，持不同政见者要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得采取特殊的手段。正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研究者 A. 萨维利耶夫指出的那样：“他们发明了两种出版和发行私下出版物的方法。一种是把作者和出版者合二为一：手稿。自己打印出来，然后通过熟人散发出去，如

[1] *Эткинд Е.* Записки незаговорщика, London: Overseas Publ. Int, 1977.

[2] *Левитин А. Э.* Родной простор.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Франкфурт-на-Майне: Посев, 1981.

果读者感兴趣，就大量复制。另一种就是通过外国记者和旅行者把作品带出国外出版，变成那边出版物，在苏联私下传播。"①

（三）苏联政府对私下出版物的政策

私下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和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冲击着苏联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和严格审查出版物的体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论性的文章以及各种政治主张成为私下出版物的主要内容后，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到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中后，对苏联官僚主义政治体制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政府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的绝密报告中不无忧虑地谈到："在创作和散布'私下出版物'的基础上，志同道合者正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联合起来，明显地看出建立类似反对党的组织的企图。大约在1968年末至1969年初，由一些具有反对党思想的人员组成了一个名为'民主运动'的政治核心，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个核心具有反对党的三个特征，即'有领导人、积极分子并依靠人数可观的同情者；不采用明确的组织形式，为自己提出明确的目标并选择明确的策略；争取合法地位'。"②

苏共中央政治局高度重视安德罗波夫的报告，责成政治局几位负责人会同相关部门进行研究，并制定出具体措施。此后，政府要求克格勃利用"以文学形式，或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散布诋毁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谣言"③ 的刑法第190条，加大对私下出版物取缔和打击的力度。"1971年初，一个内部信息传到维护权利运动人士耳中，苏共中央下达了专门指示，命令结束《时事纪事》和其他私下出版物在苏联和国外传播的状况。1月14日克格勃在莫斯科进行了八次大搜查，其中包括对莫斯科维权运动主要人物亚基尔和其女儿伊莉娜·亚基尔寓所的搜查。尽管这些搜查的借口是各种各样的，但实际上是为了出版第二十四期《时事纪事》的问题。这一搜查行动还在维尔纽斯、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基辅和乌克兰其他

① *Савельев А.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диссиден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СССР 50-х-70-х годов, с. 114 – 115.

② Источник, 1984, № 2, с. 77.

③ ЦХСД, ф. 4, оп. 20, д. 82, л. 50.

城市同时进行……全部的搜查、拘捕和审讯目的都很明确，详细询问私下出版物第二十四期《时事纪事》制作和传播的情况。"[①] 克格勃还千方百计提高侦察和破获各种私下出版物印刷和流传的手段，甚至用特殊的材料喷洒在查获的私下出版物上，通过线人散发出去，而后利用无线电技术跟踪查获其流传渠道。

与此同时，书报审查机构与克格勃一起，加强了对寄往国外邮件以及出国回国人员的检查，监视持不同政见者与外国人的一切交往，力图截断各种手稿与文件流往国外和那边出版物流入苏联国内的渠道。西尼亚夫斯基不无讽刺地指出："最好到海关去考察俄罗斯文学的新高涨。他们寻找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手稿……在进口的东西方面，他们寻找最多最好的又是什么呢？是书籍。是用俄语印刷的书籍，亦即出口转内销的俄罗斯文学。"[②]

阻止私下出版物在国外出版后变成那边出版物流回苏联的做法，使苏联加入世界著作权公约的谈判陷入绝境，为了实现它的功能，1973 年苏联更改了关于著作权的法律条文，并建立了全苏著作权代理处。代理处名义上是保护苏联作者的权益，但"它的实质是要求在国外出版书籍必须经过这个机构，从而确立党和国家对那边出版物的控制。按照代理处成立的附加决议，著作权的交易将包括文艺作品的手稿以及其他各种相关的文献。"[③] 克格勃不仅限制"那边出版物"和报纸向苏联的渗透，而且对广播节目的有关内容也进行干扰，千方百计杜绝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渗透。

此外，对违反政府规定，私自在国内外制作、传播和出版私下出版物者政府则严惩不贷，逮捕审判了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加兰斯科夫、金兹伯格、拉什科娃、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等人。"从 70 年代开始，克格勃解决私下出版物的办法更倾向于将这些积极分子赶出国外，从而克服国内不好控制他们的压力。1972 年布罗茨基和西尼亚夫斯基流亡国外，1973 年马克西莫夫离开了苏联，1974 年驱逐了索尔仁尼琴……"[④] 这一行列的排名还在不断增加，以至于在西方形成了俄罗斯亚文化这一奇特的现象。

---

① *Алексеева Л.*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с. 231 – 232.

② *Синявский А.* Континент, № 1, 1974, с. 144 – 145.

③ *Алексеева Л.*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с. 238.

④ *Алексеева Л.*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с. 238.

从上述可以看出，政府对私下出版物的政策主要是限制、堵截、打击，对制作者和出版人则是搜查、审讯、判刑，最后强迫其移居国外。当局并没有认真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

（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现象分析

总的来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种类繁多，今天仅“纪念碑”机构一家收集到的就有6000多册[①]，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数字。被迫流亡国外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列克谢耶娃曾经对这种状况进行研究，她指出因在国外出版书籍就被政府审判，驱逐到国外，这对俄罗斯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害是无法估量的。政府本来应该积极支持知识分子在国外出版自己的著作，扩大俄罗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她认为“国外出版的作品是现代俄罗斯图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优秀的部分，但政府却千方百计阻碍它的出版和发行”。[②] 为什么会在十月革命胜利50年后的苏联，并且是以追求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所有向往和平、民主、发展和进步的人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已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个自由受到排斥，——自由的存在注定要成为泡影，而不自由究竟在什么领域内占绝对统治地位，将取决于纯粹的偶然性。不自由成为常规，而自由成为反常的例外，成为偶然和任性的事情。”[③] 也正是不断强化的书报检查和意识形态的强求一致，使得许多无法倾诉自己心声的苏联知识分子重新步19世纪他们前辈的后尘，走上用“自己创作自己发行的手稿方法”去传播自己思想的途径，只不过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比前辈有了很大的改进。

当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得知，A. 金兹伯格因为在私下出版物上刊载阿赫玛托娃诗集《安魂曲》而被逮捕的消息后，他无可奈何地

---

① http://www.memo.ru/history/index.htm

② *Алексеева Л.*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с 238.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94~95页。

抱怨道："连初学写作者一类的大学生的笔记都不能通过……这就是'私下出版物'的曙光，这就是连接俄罗斯文学的未来与其英雄的过去的生命线。"[①] 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代表人罗·麦德维杰夫认为，私下出版物既然所涉及的是作者的信念和主张，又不是行动，政府就不应该采用政治高压的政策。强化书刊检查制止不了私下出版物的出现和流传。"对出版自由的各种禁令与限制，不仅妨碍而且歪曲了未经检查的出版物的流通，而且将导致它们背离马克思主义，败坏马克思主义声誉，因为现今许多检查机关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那里自行其是。"[②] 他还进一步论述到，书报检查者对所谓"言论自由"的畏惧，流露出的不是一般地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畏惧，而恰恰是对说真话和写真实的恐惧。然而，每个人内心真实的流露和真理是不可能被检查官限制住的，高压政策可能一时使人们不去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它毕竟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

回顾私下出版物发展的历程，早期的私下出版物主要是被禁止的诗人的诗集，斯大林时代遭受迫害的一些人的回忆录，各种类型的公开信、请愿书等，而从60年代后期开始，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政治纲领和政论性文章成为私下出版物的重要内容。而70年代中期以来各个民族共和国和各种维护权利组织的情况在私下出版物中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大量有关论述社会问题的文集在各地流行。私下出版物的广泛传播不仅打破了苏联党和国家垄断信息，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性的局面，许多志同道合者聚集在一起阅读私下出版物的方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人人自危，人们之间很少交往的社会风气，而且，私下出版物还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追求的政治民主、公开性、言论自由、保障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为8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　党和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和措施

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甚至是危机，然而，苏联党和政府

① *Синявский А.* Континент, № 1, 1974, с. 145.

② 罗·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第220页。

却把这些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当作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声，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方面不断加强正面思想灌输和青年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千方百计防止持不同政见者的产生，另一方面组建专门负责知识分子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增补俄罗斯刑法第190条，利用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和逮捕判刑等方法，甚至不惜采用特种精神病院和驱逐出境措施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不仅严重挫伤了一部分公民的社会积极性，导致苏联共产党威信和社会主义吸引力悄然下降，为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和苏联解体埋下祸根，同时损害了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声誉，为西方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侵犯人权提供了口实。

（一）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渐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方针，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加强控制的进程。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看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他所发动的政治、经济改革削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导致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萌生，因而，加强政治思想宣传工作和高度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成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在十月全会前的十年以来，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并不比其他领域少，甚至还多些……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应该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①

为了落实政治局会议强化思想工作的精神，苏共中央和政府的宣传部、科学和学校部、文化部等职能机构拟定了新时期强化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措施，除了要求全社会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之外，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后都要展开强大的宣传活动。一向受到特别重视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时期，宣传部门和一切有关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从各个角度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在学生

①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15页。

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甚至连怎样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政治教育都有人写书论证。五年大学生活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向世人宣传和证明马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方针的正确性，力图在全国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气氛。政府不断新建各种纪念馆和纪念碑，勋章和奖状满天飞，庆祝会和纪念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更把这种粉饰太平的举动推向高潮。

在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政府加大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开始实行"拧紧螺帽"的方针，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上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能够明显地感到这一点。

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就向政治局报告说："尽管苏联国内还不存在对现制度不满和建立有组织的反政府地下组织的现象，但一些'反苏分子'和社会大众及创作知识分子的联系大大加强了。反叛者在广大的知识分子当中获得了同情和道德上的支持，出现了有利于反叛者发展的环境，很难把他们完全隔绝或利用沉默的人墙包围起来。"[①] 报告还进一步强调这些人不像以前的地下活动者，他们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呈报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通过监控发现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史课程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在他们眼中高校党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学无术，只会对学生进行监督的人。1976年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进一步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年来监控高校学生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三年之内发生了324次不良表现，参加的人有4406人……发表诽谤性的、蛊惑性的、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作为不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数量上和参与的人数方面都是最普遍的。"[②] 报告提出应该继续加强揭露并取缔对青年企图施加影响的各种组织，加大预防政治上有害的不良行为发生的力度。

① 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 5，оп. 30，д. 462，л. 231。

②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96页。

与此同时，政府还利用自己领导的各种文化团体和协会以及出版检查机构来强化社会监控的职能。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团体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社团逐渐演化为党和政府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由于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与党的机构一起控制着大多数出版、评奖、出国以及晋升的途径，它的权力很大。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表自己的作品，那他就无以为生。正因为这样，索尔仁尼琴才在《致全苏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强烈要求“在作协章程的22款中应该明确表述，作协将保证为自己的遭受诽谤和不公正迫害的会员提供所有的保护，保证杜绝违法现象的再度发生”。①

从上述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中央相当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希望通过正面宣传和控制来削弱持不同政见者产生的土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强化思想宣传的措施和政策，但收效甚微。尽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次次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对社会形势和人们价值观念趋向的变化却视而不见，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举措，即使是通过的决议和措施大多也没有得到执行。“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决议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实际执行的决定不超过十分之一。”②

（二）“思想颠覆”罪名与建立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一个久拖不决的重要政治问题，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它费尽心机，在强化思想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的同时，积极开展所谓的“思想斗争”，即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

尽管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明确宣布，苏联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党和政府总是把为完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看作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绝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内容：“‘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同

① *Коротков А.* Кремлевский самосуд: 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литбюро о писателе А. Солженицыне, с. 46.

② 布尔拉茨基：《勃列日涅夫与解冻的破灭》，《苏联问题译丛》1989年第4期，第26页。

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①

60 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和安全部门迫切需要利用法律措施来打击日益高涨的要求民主、言论自由与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联邦增补了刑法关于反社会秩序罪第 190 条。其中第 1 项规定："经常口头散布虚假谣言，诽谤苏联国家和社会机构；制作和传播书面和其他形式具有那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自由三年或者强制劳动一年，或者罚金 100 卢布"；第 3 项规定："组织并积极参加有组织活动，粗暴违反社会秩序或者有明显不服从政府代表人员的合理要求，或者引起干扰交通运输、国家、企业正常工作后果的，处以剥夺自由三年，或者强制劳动一年，或者罚金 100 卢布"。②

新增加的俄罗斯联邦刑法第 190 条内容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模糊性，而且，判罪的依据更侧重于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方面，这样一来为执法机构随意解释法律条文，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留下很大的空间。"思想颠覆"这一概念正是在说明上述法律条文的苏联法律文献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刑法典中出现的。"思想颠覆是指那些用于人们的思想感情的手段，其目的在于破坏、损害和削弱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在于削弱和分裂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利用诽谤性的、伪造的、或者是带有倾向性材料去实现，以造成意识形态方面的损失。"③

1967 年安德罗波夫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为了加强同所谓的思想颠覆活动进行斗争，反对持续不断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经过苏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其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和去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④ 第五局主要有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问题、大学生和无组织青年、侦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动策划者，以及专门负责同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等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打交道的处室构成。

---

①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1 卷，第 504 页。

② ЦХСД（现代文献保存中心），ф. 4，оп. 20，д. 82，л. 50。

③ *Михайлов М. П.*，*Назаров В. В.*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диверсия-оружие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Москва，1969，с. 16.

④ *Кокури А.*，*Петров Н.* КГБ：структура，функции，кадры//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8，№ 2，с. 123.

克格勃第五局初期大约有200多人，但随着与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扩大，第五局不断招募新成员，组织机构不断膨胀。“1967年克格勃强化了自己侦察机构的工作，在一年当中招募了24952个新的情报员，占全部情报员的15%，并超过当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二倍还多。”① 为了监督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党的领导愈来愈经常求助于用特殊手段进行这种调查工作的专门机关，这一方面造成了国家安全机构不正常的膨胀，另一方面又使缺乏民主的现象持续存在下去。

思想颠覆罪名的设立和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的增补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的成立，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政府与持不同政见者作斗争的重要举措之一，它不仅为国家安全机构惩罚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为强力机关迫害不顺从的公民大开方便之门。

（三）政治施压、分化瓦解和逮捕关押

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活动从法理上讲并不违背苏联宪法的要求，这给执法机构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增加了难度，特别是70年代中期赫尔辛基协议签署后，还面临着国际社会保护人权的压力，因此，国家安全机关在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问题时，力图通过行政手段和一些其他措施，尽量减少公开审判，避免激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

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是政府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经常使用的办法。持不同政见者首先面临的是开除党籍，开除各种专业协会，开除工作的危险。“凡是在要求审判加兰斯科夫和金兹伯格时遵守法律的各种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在一个月内就有15%的人被单位解雇，而且所有的苏共党员都被开除出党。”②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公开表示反对政府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并在要求为两位作家减刑的公开信上签名，从此，她的作品出版遭到限制，甚至她的名字都很难在刊物上出现，直到最后被作协开除。尤为严重的是，一些因为不同政见而被开除公职的人，很难再找到工作，他们只能靠家庭和朋友资助，以及干私活为生。因此，尽管许多人对政府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的政策不满，但真正敢于站出来公开自己

① РГАНИ, ф. 89, п. 51, д. 3, л. 7.

② *Амальрик А.* Просуществует л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до 1984 года? с. 23.

主张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至于到莫斯科红场游行示威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除了开除党籍、公职之外，收回住房，取消莫斯科居住的权利，甚至可以用"寄生虫"生活方式（不劳而获）的名义把不同政见者遣送到边远地区管制劳动二到五年。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就曾以"寄生虫生活方式"的罪名，被列宁格勒法庭判处到边远地区强制改造劳动五年。寄生虫惩罚措施"既可以消灭失业，补充边远地区的劳动力，又可以清除城市中的'反社会分子'。这个命令也是一种方便的手段，可以用来镇压不合心意的知识分子"。[①]

对萨哈罗夫的迫害就是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最具代表的案例。1968年，当萨哈罗夫《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开始在私下出版物上刊发，并且在西方广为传播后，尤其是萨哈罗夫明确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布拉格之春"的知识分子的游行后，他就被禁止参与原子能实验计划了。1970年萨哈罗夫等人创建苏联人权委员会后，政府加大了对萨哈罗夫的政治压力。

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反社会的活动"的长篇通报，并很快传达到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从此，苏联掀起大规模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在政府压力下，40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发表公开信批判萨哈罗夫，"萨哈罗夫近年来不再积极参与科学工作，并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政府及内外政策的声明……萨哈罗夫的言论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②]

1975年10月初，当萨哈罗夫因为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苏联政府再一次掀起写信和发表文章批判萨哈罗夫的浪潮。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一份有关"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政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文件，要求克格勃在国外加紧散布西方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是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论。

1980年初，由于萨哈罗夫公开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了萨哈罗夫的问题，决定将其流放到不向外国记者开放的高尔基市。直到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才允许他重回莫斯科。

---

① *Амальрик А.* Нежелан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Сибирь, с. 16.

② Правда, 29 августа 1993.

逮捕审判和关押是政府惩罚持不同政见者最常用的另一种方法，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初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希望通过这一措施起到震慑作用。

1965 年 9 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12 月 5 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发生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请尊重苏联宪法"的示威游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 12 月 11 日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宣称："12 月 5 日的游行是政治上有害的反苏行为，事情有时发展到这样的关头。例如在莫斯科，一些青年人走上街头散发所谓的'告公民宣言书'；一些小组在广场上喊出了煽动性的口号。形式上讲这些活动没有犯罪成分，但不果断制止这些过激行为，可能产生追究刑事责任的局势。"[①]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966 年 2 月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二人 7 年和 5 年徒刑。1967 年又因为编辑并在西方出版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诉讼材料《白皮书》，逮捕审判了 A. 金兹伯格、加兰斯科夫、薇拉·拉什科娃和多勃罗沃里斯基。而后又逮捕并审判了发起声援支持 A. 金兹伯格等人的 Л. 鲍戈拉兹和 П. 李维诺夫，以及反对苏联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而游行示威的人。这样每一次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总会激起新的一轮抗议，引发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反响。

一批哲学家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作家因撰写和出版（在国内外）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判的情况……此外，就我们所知，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和欧、美、亚、非各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因在本国或国外撰写和出版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国家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讯的情况。"[②]

即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最成功的一次审判，效果其实也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么好。1972 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雅基尔和克拉辛，雅基尔曾经被苏联监狱长期关押，其父是著名的苏联基辅军区司令雅基尔，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期望很大。然而，二人在克格

①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462, л. 250.

② 罗·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第 174 页。

勃种种压力下屈服了，他们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供出了近60名持不同政见者和《时事纪事》的一些秘密。

1973年夏天，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有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被告都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承认自己有罪，并呼吁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放弃行动。为了这场表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出马，威胁利诱雅基尔和克拉辛，让他们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配合克格勃工作。据后来移居西方的克拉辛在其自白书《法庭》中透露：安德罗波夫要求他们"是否考虑一下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外国记者面前讲讲话？他们写了多少关于你们案件的谎言。应该洗一洗他们的脑子。要让西方知道，你们在法庭上讲的话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只是不要以为，我是在收买你们"。[①]

然而，尽管这场戏一切进展都很顺利，克格勃的目的达到了，苏联的报刊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报道，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少有人相信雅基尔和克拉辛的悔过是真诚的，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二人和政府在道德与政治上的肮脏性，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二人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此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被削弱了，参加的人数明显减少。

（四）精神病院和驱逐出境

利用精神病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一幕，它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把一些对政府不满或者是一些对社会没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实际的人，直接宣布为精神病患者，不顾本人和家属的反对强行关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从而迫使受害者放弃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不去进行所谓的反社会活动。

第二，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捕，宣布他们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或第190条的规定（诋毁苏维埃国家和制度；扰乱社会秩序；不服从国家管理人员），而后由法院起诉并立即进行精神病学鉴定。通过精神病鉴定宣布该人为无责任能力的人，这样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不公开审理，判决将其送入精神病医院

① *Красин В. А.* Суд, Нью-Йорк: Chalidze Publ., 1983, с. 72.

强行治疗，从而，避免以前多次政治案件审判中所面临的被动局面。

苏军退役少将格里戈连柯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格里戈连柯曾在第18集团军服役，1964年因为组织“为恢复列宁主义而斗争联盟”被关入精神病医院。1965年出院后，格里戈连柯以搬运工为生，拒绝领取战士养老金，并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不仅积极支持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家园的斗争，而且，还筹划成立人权组织。1969年4月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的通报中说：“反社会行为的策划者格里戈连柯和克拉辛继续寻找可能的途径，激活持不同政见者的破坏活动并想扩大参加者的人数。在开始阶段他们想在知识分子中间散布必须建立维护权利协会的思想。该协会设想的任务是对苏联内务部监狱管理总局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保证法庭公开审判政治案件……格里戈连柯和克拉辛积极筹备协会成立事项并向有关部门递交了批准成立上述协会的申请书。他们还没有等到答复，就向社会各界宣布在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成立‘组委会’的消息。”①正是为此，1969年5月7日格里戈连柯在塔什干被捕，谢尔比茨基法医研究所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宣布其为精神错乱症，送往专门的神经病医院接受“治疗”。后经劝说到美国治病。

若·麦德维杰夫因为在国外出版了几本有关批判李森科的书，并对苏联生物学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970年5月29日就被从奥布宁斯克市家里强行抓到卡卢加精神病院，准备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主治医师利甫希茨认为若·麦德维杰夫有二重人格现象，“他是个生物学家，可同时他又总是做许多和他的直接责任完全无关的事情。再说，他总是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满，总想对某些事情进行斗争。”② 但由于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抗议，20天后若·麦德维杰夫被释放。

驱逐出境乃是政府制裁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谈判期间，苏联开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伴随着犹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马克西莫夫、戈尔巴涅夫斯卡娅、阿马利里克、金兹伯格、西尼亚夫斯基、图尔钦、布科夫斯基、格里戈连柯、若·麦德维杰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移居西方，以至于在西方的苏联

①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462, л. 58 – 60.

② 若·麦德维杰夫、罗·麦德维杰夫：《谁是疯子?》，第33页。

持不同政见者远远多于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一些不愿离开祖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甚至不惜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强行将其递解出国，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被赶出苏联的。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不久，就开始了对索尔仁尼琴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批评。1969年因为在国外出版长篇小说《癌病房》[①] 和《第一圈》[②]，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开除了索尔仁尼琴的会员资格。

1970年10月初，当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积极介入对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处理，并准备在他出国领奖时将其驱逐出境。然而，索尔仁尼琴却决定不出国领奖，打乱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

此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索尔仁尼琴问题，但都没有作出明确结论。1973年秋天，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列宁格勒搜查到《古拉格群岛》[③] 一书的大批手稿，当时国外报纸也不断报道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一书将要在国外出版的情况。同时，索尔仁尼琴则频繁会见西方记者，介绍《古拉格群岛》一书的内容。

1974年2月1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驱逐索尔仁尼琴的建议，12月14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刊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的命令"，宣布"由于索尔仁尼琴系统地从事与苏联公民身份不相符合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已经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造成危害，根据1938年8月19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籍法》第7条规定，兹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④] 随后，索尔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总的来说，苏联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和措施是一贯的，那就是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千方百计削弱持不同政见者产生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就是进行思想斗争，即采取各种措

①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М: Азбука, 2007.

②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 М.: Наука, 2006.

③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 YMCA-PRESS, Paris, 1973.

④ *Коротков А.* Кремлевский самосуд: 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литбюро о писателе А. Солженицыне, с. 447.

施去压制和打击这些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人，包括政治上施加各种压力、监督劳动、逮捕审判、关押判刑，甚至不惜采取精神病疗法和驱逐出境的方法来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前期政府更倾向于公开镇压，1956～1980 年因为从事反苏宣传与散布“攻击苏联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故意造谣诽谤罪行”而被判刑的人数统计，可以看出这一趋势。“1956～1960 年因政治原因而被判罪的苏联公民共有 4676 人。1961～1965 年被判罪的为 1072 人。1966 年为 48 人，1967 年为 103 人，1968 年为 129 人，1969 年为 195 人，1970 年为 204 人。1976～1980 年总共为 347 人。”[①] 当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所公布的数字可能与实际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有很大的出入，因为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按刑法一般条款审判的，而且，被判处送精神病院或驱逐出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远不都是经过法律手续的。此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通过行政、党或别的渠道施加压制的形式处理的。但是，通过这一材料最起码能够说明 70 年代以来，政府尽量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审判，而采取其他各种方式了。

结　语

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夕才告结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性质问题，是一个歧见纷呈而值得深入分析研究的课题。

由于政府的封锁消息和片面报道，在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历史知之甚少。在普通人心目中，提到持不同政见者，立刻就会想到诸如罗·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布科夫斯基等这样一些当年敢于直面政府强权，不畏惧各种迫害，有的甚至以在牢房里度过十几年的代价，也要公开自己不同于苏联党和政府主张的政治明星。然而，对于他们的思想、主张、反抗政府的行动，苏联政府压制他们的措施则只是一些影影绰绰的传闻，一段发黄的岁月，一串冰冷的数字，以及保存在某些秘密机关档案里有关于销毁萨哈罗夫 550 卷档案和索尔仁尼琴 105 卷档案的决定。[②] 依据史实搞清楚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真相，对我

① Вестник Архив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 Источник，1995，№6，с. 153.

② 参见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 136～137 页。

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苏联解体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977年苏共中央在《致法共中央非公开信》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所有宣传机器都在不怀好意地高谈什么'保护苏联的人权'，并且积极利用逃出苏联或者被驱逐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准确地讲就是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公开的敌人）……'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① 同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纪念捷尔仁斯基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名称是西方资产阶级出于宣传目的的精明创造，是意在迷惑社会舆论……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动员西方的报刊、外交机构，以及情报机构和其他特工机构参与其中。"②

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大部分人并不明白，什么是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但是只要将此词译成俄语就大体明白无误了。那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和'有不同思想的现象'。"③

既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者，又是运动研究者的罗·麦德维杰夫认为："1965年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持不同政见者绝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他们大都是在苏维埃制度下成长起来并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他们要求的不过是要当局尊重宪法、尊重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后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④

萨维利耶夫在《苏联1950年到1970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治特点》一文中指出："总的来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研究人员眼里就像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确定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概念时就可能产生困难。很明显，它的组织性和策略性是多种多样的，持不同政见者所举行的某些行动与过激主义有区别。"⑤ 为什么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

---

①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502～504页。

② Правда, 10 сентября 1977.

③ *Яковлев А. Н.* Горькая чаша: Большевизм и Реформация России, с. 177.

④ 罗·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第57页。

⑤ *Савелье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диссиден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СССР 50－х－70－х годов, с. 118.

这只能通过考察运动参加者的主张和行动来具体分析。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参加者成分相当复杂，既有斯大林时期冤狱受害者，也有要求民主、民族和宗教权利的各种人物，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即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他们称为“二十大的产儿”。这些人大多是50年代大学毕业，在批评斯大林和宣扬人道主义的矛盾氛围中思想逐渐成熟，并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人。他们身上既有传统观念的痕迹，同时也深深打上了新思潮的烙印，他们经受了赫鲁晓夫时代急剧变化的洗礼，同时又面临着勃列日涅夫时代思想僵化，官僚主义横行，特权阶层贪污腐化，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现实。这些人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关注祖国乃至全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深切地感受到了自由、民主、尊重个人权利在苏联的重要性，从而掀起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在现代社会，民主、自由和权利三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像著名学者瓦·梅茹耶夫在《知识分子与民主》一文中分析的那样：“自由与其说是集体的，不如说是个人存在的价值。政权本身（即使是人民政权）并不自动表明自由的状况。民主，尤其是人民政权理解的民主，可能变成较之专制政体更厉害的不自由。当缺乏防御政权对人的侵犯，缺乏对人的法律保护，当个人完全从属于大多数人、从属于集体意志的时候，便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民主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极权主义，大多数对少数、集体对个人、共性对个性的绝对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政权，包括民主的、人民的政权，如果不受法律限制，不捍卫个人的权利，那么，都是对自由的威胁。”[1] 正是出于这一理念，一些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知识分子甘冒失去工作和自由的风险，不惜采取一些政府禁止的非常手段也要表明自己的不同政见，从而来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例如用私下出版物、请愿书、声明、公开信等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阿马利里克在《持不同政见者札记》一书中写道：“政府毁灭了许多人的良知理解力，持不同政见者必须恢复它，发挥不用社会批准的精神。”[2] 因为在国外出版书籍，宣传异端思想被政府第一个判刑7年的如西

① *Межуев В.*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демократия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2, №16., с. 40.

② *Амальрик А.* Записки диссидента, М: СП《Слово》, 1991, с. 45–46.

尼亚夫斯基在《我的持不同政见者经历》一文中认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价值就在于此，这不同见解不是新教会或新的统一的反苏维埃国家的胚胎，而是多元化的社会。"①

以罗·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民主社会主义派明确宣称："我们深信，即使社会主义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学说，既没有陈旧过时，也非奄奄一息。但是，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还不是十全十美的。"② 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主要强调民主、自由，加强法制，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能够真正实现。萨哈罗夫因向西方记者发表如下谈话而成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我们的社会沾染上了这样一些风气：冷漠、伪善、市侩的利己主义、毫不掩饰的残酷无情。社会最上层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即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一帆风顺的最上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代表顽强抓住自己或明或暗的特权，对违反人权、进步、安全、人类未来利益漠不关心。"③

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虽然要求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实行专制制度，但他也只是主张"国家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支持，让它自行存在好了，谁愿意宣传、保卫和贯彻它都不应受到阻碍。"④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像政府所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抹黑者，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走狗，他们满怀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满足现状，敢于直面权势，发出内心的呼声，是社会公正和良知的捍卫者。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主张只不过是对人类固有的理想——民主、自由、权利的向往，希望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能够顺应和平、民主、进步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给苏联社会造成的伤痛，回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法制的多元社会。他们的"不同政见"主要是对党和国家体制、方针、内外政策方面存在的弊病，以及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提出强烈批评，要求公正处理斯大林时代

① *Синявский А.* 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о как личный опыт, с. 90.

② 罗·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第142页。

③ Московская правда, 29 июля 1992.

④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Письмо 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Л. Брежневу, с. 284.

遗留下来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些人甚至称不上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反对恢复斯大林模式的专制统治，反对一党专制，希望通过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以人为本等宪法条文真正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运动的前期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不然的话，无以解释“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发布取缔共产党的命令时，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的不是党的大人物，不是当时执政的党的领袖，而是遭受克格勃多年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的反常现象。

因为在西方出版自己不同政见书籍，1978 年被政府驱逐到国外的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并不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党，只不过对苏联社会的一些现象不满。他认为，“像其他社会一样，共产主义社会也有自己的缺点——理想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①] 同样，因为在西方发表文章而失去 7 年自由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在 1993 年发表的谴责俄罗斯政府炮轰议会的公开信中高声疾呼：“在每个人的生活里有这样一些珍贵的东西，对他来说，它们高于他自己本身，高于他的不眠之夜，高于他所受的巨大的委屈和苦闷，这些珍贵的东西就是祖国和自由。”[②] 即使以反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著称的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也承认：“十月革命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但是它成了推动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而且包括西方社会在内。”[③] 可以这样说，上述的现象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下出版物的发展历程也能清楚地看到其追求和平、民主、自由、权利，以及忧国忧民的宗旨。60 年代私下出版物的主要内容是各种回忆录、请愿书、公开信。70 年代，特别是 70 年代中期以后，大量论述有关苏联社会问题和维护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内容占据了私下出版物大部分版面。例如维护政治犯的权利，获释人员的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移民和回国的权利，维护残疾人的权利，甚至 1979

① 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第 37 ~ 38 页。

②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6 октября 1993.

③ Правда, 16 февраля 1994.

年10月在列宁格勒、诺沃西比尔斯克等几个城市出现了一份女权运动的杂志——《妇女与俄国》。

《妇女与俄国》在发刊词中大声呼吁："苏联妇女强烈地要求独立自主，她们向往斗争，其中有些人已参加了持不同政见运动，但多数只是作为她们的丈夫或父兄的追随者而斗争的。"[①] 主要编辑者达吉亚娜认为，在苏联已不能指望通过官方渠道讨论和解决妇女的地位与权利问题，因为书报检查人员对"女权"一词都不让使用，这就使她产生了开辟一个不受官方审查的妇女论坛的决心。

当然，任何思潮或运动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泥沙俱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不可避免。运动参加者中不乏追求权力和政治之人，他们热衷于同西方媒体和外国记者联系，幻想能够在一夜之间成为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那样的英雄。应该说，这样的社会成员在任何时代都不是社会的有益成分。也有极少数人坚决反苏反共，但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和平的，主要是思想和道义上的，真正力图颠覆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仅仅是个别的。

如何对待来自社会的不同呼声抑或是反对者的声音，尤其是代表社会先进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声音，这是摆在每一个执政党面前的重大课题，苏联党和政府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和措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埋下了祸根，它留给世人太多的教训。

持续不断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社会结构整齐划一的社会表层下涌动着的一股潜流，是苏联国家由极盛时期走向衰亡的先兆。同时，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也是俄罗斯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回响和折射。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表明苏联国内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存在着问题与危机，尤其是与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和国家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和错误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官僚集团贪污腐化，因循守旧，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统治集团却千方百计恢复斯大林

① 陈一筠编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所进行的女权运动》，《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1期，第39页。

时期的集权统治，固执己见。特权集团把不受人民批评、严格的保密性和封闭性看作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神圣的东西，特权阶层“常常依靠自己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实行有利于利益集团而有损于国家的决策”[①]，人民群众对此意见极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日渐凸显，到了70年代后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危机的边缘。一方面政权不得不反复强调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原则，这是政权性质的自我认定，但另一方面，一党专制、高度中央集权、群众组织国家化、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反对任何批评党和政府行为的体制严重遏制了党内外民主，难以为人民不断高涨的民主意识提供足够的表达渠道和途径。在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下，通过私下出版物以及其他形式来表达公民意愿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和持续不断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僵化保守，政治思想工作粗暴简单，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成风，回避矛盾，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说教不仅削弱了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使党和国家极力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了乌托邦。一方面是宣传中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却是西方国家远远高于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以及党和政府官员正在悄悄享用的不亚于西方的生活水准，这使一些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西方腐朽生活价值观念侵蚀了人们的斗志，而是现有的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巨大反差导致人们不得不如此反思。罗·麦德维杰夫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一个很准确的原则，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原则，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说，只有时间和生活本身才能确定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哪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只有人和社会实践才能检验真理。”[②] 70年代后期莫斯科一位党内的知识分子曾经不无忧虑地谈到：“如果你透过表面现象深入的看看，那么你就会发现党员中真正具有信仰的只占百分之一、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如果能脱离党的话，就不会甘心情愿地留在党内。不过，他们又害怕脱党。”[③]

然而，面对久拖不决的持不同政见者追求民主、言论自由和维护权利

---

① *Дмитренко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20 век, Москва: АСТ, 1996, c. 572.

② 罗·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第43～44页。

③ 克雷格·惠特尼：《苏联意识形态的危机》，《编译参考》1981年第5期，第59页。

以及公开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且，这些追求大多是苏联宪法明文规定的，党和政府却不是从自身工作和体制中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并通过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区别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因势利导，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克服消极因素，而是一味地限制、堵截、镇压，甚至增补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创造“思想颠覆”社会主义的罪名，组建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克格勃第五局，不遗余力地“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不少资金花费在与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上……花费在一场对付本国人民，特别是对付知识分子的秘密战场上。”[1] 难怪有人开玩笑地讲：“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抗争苏维埃政权的人，而是苏维埃政权所抗争的人”，是政权千方百计希望其放弃离经叛道思想，回归苏维埃意识形态并与之保持一致的人。[2]

强化书报检查制度，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迫使人们闭口不言，然而，却不能改变人们的思想，相反矛盾会越积累越严重。雅科夫列夫在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现象时指出：“正是他们理由充足的论断和正确可行的建议被宣布为反苏主义……那些痛苦地对所有一切考虑周详之后，冒着对本人和家庭带来灾难的风险，说出了自己想法的人，也许他们做法有点古怪，但毫无疑问，他们是祖国真正的爱护者。”[3] 而这些祖国的爱护者在同政权对立与对抗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被流放、监禁甚至送进精神病院。一般来说持不同政见者大多是社会的精英，因为表现出某种积极性的社会成员往往是社会中的优秀分子或者是不满现状，具有创新意识并且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如果这一先进的群体被排除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外，他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性遭到压制甚至是迫害，这不应该是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因为它扼杀了自己肌体的活力。况且，“知识分子处在反对不民主政权立场的时候，用文学创作、社会政治思想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影响自己时代的社会意识，他的肯定作用是不会被人怀疑的”[4]，也不应该被人怀疑，他们批评社会制度的缺陷和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以此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夺取政权的企

---

① *Яковлев А. Н.* Горькая чаша: Большевизм и Рефориация России, с. 145.

② 安·西尼亚夫斯基：《苏维埃文化：一部文化史》，第387页。

③ *Яковлев А. Н.* Горькая чаша: Большевизм и Рефориация России, с. 178.

④ *Межуев В.*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демократия, с. 40.

图，只不过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并且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尤为敏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追求的是社会公平、正义。

镇压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尽管直接涉及的人并不是很多，但却严重毒化了政治气氛，“为了查清和迫害他们，就需要动用全部‘秘密警察’机关。这就意味着要更多地监视人，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这些事不可能完全隐蔽地进行：所有的人，包括地位很高的人，都害怕偷听、监视、告密。在这种场合事情是不是完全有根有据已经不怎么重要。”[①] 同时，政府迫使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签名，公开谴责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做法，不仅给持不同政见者本人带来巨大的伤害，而对其他有关的人士也是一种伤害，使一部分被迫签名者陷入两难的困境。拒绝签名意味着对国家的不忠诚，工作和其他方面将面临各种压力甚至是处分；同意签名则会遭到国内外同行的蔑视，亲朋责备，名誉扫地。这样的精神折磨和精神损耗导致许多人意志消沉，知识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严重扭曲变形。从而，导致冷漠无情、不问政治和消极情绪不断增长，双重道德标准开始泛滥，社会维系力开始瓦解。

为了反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党和政府越来越借助强力部门的力量，尤其是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机构日渐膨胀，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公民的监控不断加强，对居民群众的搜查、逮捕、审判经常发生，把持不同政见者许多正常探讨社会主义制度弊病和揭露社会问题的批评列入敌对行动，这一方面掩盖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弊病越积累越严重，进一步窒息了社会最后一点积极探索精神，粉饰现实，弄虚作假风气泛滥成灾；另一方面为党和政府一些官员不受监督和约束，恣意妄为，随意报复提意见者大开绿灯，结果导致贪污腐败风气愈演愈烈，党和政府威信严重下降，这不仅造成物质上的巨大损失，“道德的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②]，这无疑对苏联解体

①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17页。
②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41页。

和苏共丧失执政党地位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此外，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流追求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是人类千百年来的共同理想，执政党应该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不断扩大和充实它的内容，让它为自己所用。适度的民主和自由不仅不会削弱党和政府的领导，反而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有利于了解社会各界的呼声，缓解社会的各种矛盾，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防止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的根本保证和途径，而苏联党和政府却对大部分同自己执政理念并不矛盾的行为严加镇压，结果非但没能解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反映出的深层问题，反倒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绵延不断，支持者越来越多，削弱了民众对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向往。同时，也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尤其是武装出兵干涉捷克和侵占阿富汗，更使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走向寻求国外支持的道路，他们也逐渐改变了对政府和社会主义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同国际反苏势力联合，为西方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自由提供了难得的借口。

总的来说，无论是多么先进的社会制度，总有许多有待纠正与清除的缺陷和阴暗面，能够听取和采纳各种不同意见，甚至反对者的建议是一个社会富有活力的标志，在极为复杂的现代社会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当今社会每一个重要的决定都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虑和提出独立的见解，需要兼顾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及时调整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资源占有格局，需要对执政者加以批评监督以防止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一个企图限制和打击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社会，只会使自己陷入到山穷水尽的困难境地。实际上，一个社会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者正是这个社会生气勃勃、富有活力的象征。正如当代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尔所讲的那样："被抛弃的人民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未来。被建筑师丢掉的石头可以成为新世界的奠基石。而一个没有持异见和不满分子的民族，通常都是有纪律、有礼貌、安宁与和谐的，但却没有一粒可以产生出伟大的未来的种子。"①

① 转引自罗·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第122页。

勃列日涅夫主义与苏联侵捷

上海师范大学　叶书宗

1968年8月苏联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顺利控制了捷首都和首脑机构，同时全线出击，占领捷全境，随后迫使捷共和政府更换领导人，放弃改革方针，终于将“布拉格之春”扼杀在摇篮中。这一震惊世界的武装入侵事件，对东欧各国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冷战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起点。本文拟利用解密的俄国档案及当事人回忆录，揭示这一事件的背景、起因和发展过程。

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出现

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年代，人类社会和世界局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次科技革命迅猛地展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更为明朗起来，这些又反过来促使人类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新的变化。斯大林创导、苏联一贯坚持的关于世界已形成“两个平行市场”的论断，从理论到实践，越来越难以立足。勃列日涅夫虽然也看到“我们生活在科学技术革命的

时代"[1]，但是，他并没有从客观世界的这一大变动中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调整苏联对东欧，乃至对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各国的政策，而是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也即"勃列日涅夫主义"，作为苏联在新形势下推行霸权主义的理论依据。

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勃列日涅夫认为，在当前新的形势下，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已把破坏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赌注，押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上，因此，各国共产党的最高国际主义义务就是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谁如果不维护这种团结，谁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从1965年至1968年的4年里，勃列日涅夫在对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东欧各国党和人民的十几次讲话中，在苏共党内以及在苏联国内各种场合的几十次讲话中，总是不断地重复："我们的时代是革命风暴的时代……巩固作为全世界一切革命力量和解放力量的堡垒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2] 既然组成"社会主义大家庭"，自然少不了"家长"；这个"体系"当然要有"中心"；"社会主义大家庭"要完善技术装备和武装力量，也要有"组织者"。于是，勃列日涅夫自信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把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看成是首要义务，然而就我们信仰的实质，就我们所受的教育和心灵的要求而言，我们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世界上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漠不关心的态度。"[3] 勃列日涅夫曾在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人民宣称："我们把全面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防务看成是自己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4]

第二，勃列日涅夫认为，新技术革命的进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

① 《在全苏教师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7月4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80页。

② 《在布拉迪斯拉发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2集，第223页。

③ 《在克里姆林宫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7月3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第74～75页。

④ 《在布达佩斯苏匈人民友好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9月7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第151页。

求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国际范围内的分工、生产专业和协作。因此，勃列日涅夫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分工”看作新科学技术革命形势下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时代要求”，要求在新的形势下“更要利用兄弟国家合作的优越性”。勃列日涅夫在布拉迪斯拉发的群众大会上说：“生活越来越坚决地向我们各个国家提出发展和改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任务。我们各国拥有不同的自然资源，不同的生产能力，运用集体过去所创造的一切后备力量有助于更顺利地解决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所面临的任务。”[①]

在西欧法、意、联邦德国、比、荷、卢等六国在原有联营的基础上筹建“欧洲共同体”的刺激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口号。1965 年 9 月，勃列日涅夫甚至说，“社会主义共同体”早就建立起来了，勃列日涅夫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越需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改善分工、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这些过程已经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进行着，而且大家知道，进行得不坏。经济互助委员会积累了大量的有益的经验。”[②]

勃列日涅夫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是一个“国际合作共同体”，苏联理应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分工，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为此，勃列日涅夫要求东欧各国“对华沙条约坚定不移的忠诚”。勃列日涅夫将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的优越性概括为：“实行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生产协作化和专业化，可以更加有效得多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迅速地发展我们各国的国民经济，争取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获得新的成就。”[③] 勃列日涅夫进而把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看作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律”。[④] 苏共二十五大的决议还指出，实行社会主义

---

① 《在布拉迪斯拉发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6 年 6 月 2 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2 集，第 223 页。

② 《在克里姆林宫苏捷友好大会上的讲话（1965 年 9 月 14 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1 集，第 274 页。

③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8 年 11 月 12 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4 集，第 188 页。

④ 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耶拿市卡尔·蔡司·耶拿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7 年 4 月 20 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3 集，第 78 页。

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共同开发自然资源以供共同的需要，共同建设大型工业综合体以满足所有参加者的需要，为我们这些国家的企业和整个工业部门之间在今后许多年里的协作制定规划”。[①]

第三，勃列日涅夫认为，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国际主义越来越成为检验各国共产党是否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可靠尺度。

勃列日涅夫几乎是“国际主义”不离口的，他要求东欧各国的“国际主义”是什么呢？1966 年 11 月 15 日，勃列日涅夫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有一个稍为明白一些的解释。勃列日涅夫说：在这里，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不能不说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制定出把每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正确结合起来的政策。“现在，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成为决定人类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认为，自己最主要的职责是不倦地关心和提高它联合起来的威力，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协调它们的行动。”[②]

此外，勃列日涅夫还要求华沙条约组织在保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方面，实现最紧密的配合；在军事政治合作的同时，在经济方面也必须紧密合作。勃列日涅夫甚至傲然地宣布：“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世界上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漠不关心的态度。”[③] 勃列日涅夫这是明白地宣布，要以苏联的武装力量来保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并把这作为苏联履行“国际主义”的最高义务。勃列日涅夫对此还作了一个补充：“当然，向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这样的行动是一种非常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只有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直接行动，只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造成威胁的行动，才会导致采取那样的措施。”[④] 这一补充，恰好把勃列日

① 见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7，第 9 页。

② 《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6 年 11 月 15 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2 集，第 304 ~ 305 页。

③ 《在克里姆林宫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1965 年 7 月 3 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4 集，第 75 页。

④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8 年 11 月 12 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4 集，第 186 页。

涅夫的意思表现得更加暴露，即只要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就可以采取直接的军事措施。

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武装入侵和占领，就是在“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指导下发生的。

冷战格局下的东欧及其变化

“勃列日涅夫主义”实际上是在冷战进入60年代的新形势下，　　领导人对“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新诠释。

20世纪后半期，整个世界一直处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格局之下。冷战格局的形成与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分不开的。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冷战格局得以形成的前提，但是冷战格局的出现并不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直接结果，冷战也不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而开始的。

历史告诉人们冷战格局的出现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从苏联一方来说就是：苏联确立了斯大林模式，综合国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即能够牢牢地控制东欧和其他周边国家，形成以苏联为核心的集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只有到这时，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出现了冷战格局。

冷战年代的国际格局基本上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而东欧自始至终都在冷战格局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东欧之所以成为1947年以后的东欧，本身就是冷战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1947年以后的东欧，冷战格局也就不存在了。1958年，戴高乐出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之后，冲破美国的限制，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力量。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美国也只好听之任之。相比之下，在华沙条约组织内，苏联是绝对不能容许东欧国家出现任何离心倾向的，更不必说类似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这样的事情了。

东欧各国成为冷战格局中的特殊地盘，并不是东欧各国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而是被苏联强行拉进去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各国在纷纷复国和独立的同时，共产党也先后成立，开始了各自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东欧各国的国情和历史

传统有着很大差异，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也各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各国有的被德国法西斯直接占领，有的成为它的附庸。东欧各国共产党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力量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同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贡献，致力于本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起，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当政；东欧各国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对于东欧各国的发展方向问题，无论是在战争期间或者是战后初期，斯大林都不止一次地承诺：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更不要求学习苏联的经验，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和国情。1945 年底，捷共中央主席哥特瓦尔德在一次捷共党员干部会上作报告时也说："不是要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以后形势又有了变化。再说，我们的传统和需要也不同于苏联。一天，我走在莫斯科的一条大街上掉了一只鞋后跟，但我找不到修鞋的鞋匠，因为在苏联所有手工业者被消灭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消灭我国大批的小手工业者呢？让他们继续工作要好得多。"捷共中央领导人也一再向参加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的其他政党表示："我们绝不成立集体农庄！我们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全部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是反对一党制，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你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我们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①] 1946 年，捷克举行战后第一次选举，共产党在捷克地区得票为 40%，在斯洛伐克地区得票为 15%；在全国得票为 38%。基于这种现实情况，无论是哥特瓦尔德还是捷共的其他领导人，都真诚地努力在《科希策纲领》[②] 的基础上，从捷克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出发，"按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政策"，走向社会主义。

可惜这种祥和的发展局面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947 年，美苏对抗的冷战开始了。接着，潜伏着的苏南矛盾很快浮出水面，终于导致 1948 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局。国际局势风云突变，苏联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指挥东欧各国共产党发动了一

① 见伊日·贝利康《永无尽头的春天——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邹福兴、赵其昌译，北京出版社，1983，第 53 页。

② 《科希策纲领》是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捷共在莫斯科制定的捷民族民主革命纲领。1945 年 3 月经其他反法西斯政党同意后宣布，作为在东斯洛伐克的科希策成立的第一届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

场普遍的暴力夺权运动。从此，东欧各国被强制移植斯大林模式：或者像苏联一样直接实行一党专制，或者在形式上保留多党制，而实际上还是共产党独掌政权；消灭了发育到不同程度的市场经济，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上一律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推动农业集体化。东欧各国在1948年前后的“第二次夺权运动”，表面看是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胜利，实际上是东欧各国党付出了独立自主的代价，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完全和苏联绑在一起。东欧国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难，原以为在消灭了法西斯国家以后，可以走上真正独立、民主的发展道路，但历史又一次出现曲折，东欧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发展再次被阻碍。

冷战格局育造了东欧，东欧则是冷战的受害者，为冷战承受了牺牲。

冷战格局下的苏美对抗，就苏联来说，虽然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力量已大大膨胀起来，并在欧洲占据有利的战略态势，足以和美国抗衡；但是，就综合国力而论，苏联则远远比不上美国。从综合实力来说，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远远超过了苏联统率的华沙条约组织。1954年，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北约有15个成员国，土地总面积约221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3900万。1955年华沙条约签订时，拥有8个成员国，土地总面积为234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2260万。就是说，北约和华沙相比较，土地的面积相当，人口超过华约的60%，而国民生产总值则高出华约3倍。从地域上说，北约的15个成员国家，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祥地和心脏地带，是近代以来世界的先进地区。那么，在综合实力相差悬殊的条件下，苏联统率的华约集团能够和美国统率的北约集团抗衡，靠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使得苏联统率的华约集团在综合实力方面的明显劣势得以弥补？

苏联和华约集团弥补自身综合实力不足的是政治因素。首先是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苏联及其华约集团虽然在综合实力上落后，但在发展军事工业和国防军事拨款方面，能够和美国及北约集团竞赛。其次，华约组织是一个以苏联为核心的跨国界紧密型综合体，它不仅是一个国际军事同盟集团，更是一个内向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一体化的紧密实体。在这方面，华沙条约可以说是不同于任何国际同盟条约。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正是华沙条约组织这种特性的“理论”

升华。华沙条约在政治方面的这些特点，在一定时段里能发挥出实际效能，弥补它在和北约抗衡中的综合实力的不足。但是，从长远来说，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华沙条约集团在冷战对抗中最终失败的结局。

苏联和华约集团在冷战对抗中最终失败，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发展一系列因素的结果。其中，1956年纳吉在匈牙利的改革，虽然十分短暂，毕竟是对冷战格局的挑战。1968年杜布切克在捷克的改革，明确地表示要摆脱苏联的控制，无疑也是对冷战格局的冲击。苏联纠集华约其他国家，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说明苏联除了出动军队之外，其他措施已难以维护华约的整体性了。在这前后，苏联凭借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和科技资本，乘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里无力他顾之机，在核军备竞赛上取得某些单项的优势，达到自己在霸权主义道路上的巅峰状态。同时，苏联以武力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强化对东欧的军事控制，对美国和北约集团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巅峰状态往往是下滑的开始，70年代成为苏联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酝酿经济体制改革。1964年10月，捷共中央公布了由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原则草案》（以下简称《原则草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原则草案》的基本内容是：国家除保存制订中央长期规划的机构外，逐步把国家机器的有关部分变成企业和超企业组合的行政机构，同政治性的国家机构分开；党机关活动中免除其指挥经济的工作，把党的职能集中于政治工作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工作；企业应当成为尊重市场规律和生产效果的经济活动独立实体；提高专业干部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解决工会、工人、企业行政干部在工厂和企业管理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问题，让企业的全体员工通过奖金（利润提成）直接感觉到管理不善的恶果，为此，必须让他们对管理拥有某种形式的发言权（建立某种形式的自治机构）。

看得出，《原则草案》并未从根本上触动计划经济体制，仅仅是想逐步使政企分离，党政各司其职，使企业从原来的完全面对计划转变为“一

只眼睛盯着国家计划，另一只眼睛瞄向市场”。捷共中央虽然公布了《原则草案》，但是规定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讨论”，到1966年以后才启动运行。

1966年5月31日至6月4日，捷共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在总结报告中，既未对经济、政治的严峻形势做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分析，更未对今后采取的应对措施做出明晰的决策，空谈“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十三大还制订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规定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全面巩固国民经济和创造经济储备”，至于经济改革则只字未提。这就意味着，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将停止尚未真正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加强计划经济。

1967年，全国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第一季度，日用商品的批发价格上涨20%，市场日用商品价格更是猛涨。物价上涨，外贸出口减少，劳动生产率低下，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改善。这方面的矛盾，突出地反映在住房短缺上。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俄斯特拉发、科希策等大、中城市，很多成年男女因为没有住房而不能结婚；而很多已婚夫妇因为没有住房，只能分别住在集体宿舍里，不能有孩子。全国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责难：“我们忙着建设社会主义，结果把建造住房给忘了。”经济的恶化还促使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的矛盾表面化。这些矛盾，又综合成对诺沃提尼当政的不满。

1968年1月4日，诺沃提尼被撤销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1月6日，勃列日涅夫给杜布切克发去贺电。勃列日涅夫在贺电中说：“真诚地希望您在……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全面合作、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队伍的团结这一伟大事业的活动中取得成就。”[①] 3月22日，诺沃提尼向国民议会正式提出：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当天下午，国民议会主席团投票表决通过，接受诺沃提尼的辞职。3月30日，斯沃博达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在1968年初的几个月里，重大的人事调整是以切尔尼克取代

① 《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贺电（1968年1月6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第1页。

纳列尔特出任政府总理；为备受迫害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彻底平反，并任命他为国民议会主席。

在实行这些新的领导人员调整的同时，杜布切克还调集部分党政领导人、各学科高级专家、学者，成立“政治委员会”，起草捷共当前时期的行动纲领，作为改革的政纲。经反复讨论，1968 年 4 月 5 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题为《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政纲，即《行动纲领》。《行动纲领》的俄文本全文刊登在捷共中央委员会的专门新闻简报上，全文共 63 页。《行动纲领》的内容分为：捷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领导作用；发扬社会民主，建设新的政治管理体制；国民经济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等五个部分。《行动纲领》的基本精神正如该文件最后所说的，是“坚持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纲领宣称：“我们将进行试验，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捷克斯洛伐克有责任总结和利用自己比较先进的物质生产基础、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和无可置疑的民族传统，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承担起捷克斯洛伐克对国际命运负有的使命。”“我们要创造一种条件，使每一个关心社会主义事业和各族人民事业的真正的公民都能感觉到，他们是自己国家命运的主宰，是必不可少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为此，行动纲领应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复兴的纲领”。①

《行动纲领》还具体地规定了恢复新闻自由，保障迁徙自由，非集中化和企业领导独立，私营企业合法化等措施。《行动纲领》的公布，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跨进了被称作“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阶段。杜布切克曾这样评价《行动纲领》：“行动纲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的文件”，“我们的纲领是逐步回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计划”。《行动纲领》没有触及对外政策，对此，杜布切克解释说：这是因为“东欧集团的所有共产党通过强大而善于钻营的各级效忠者和代理人之网，同苏联党绑在一起。当这些党是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力量时，苏联人不仅钻进每个党的正式机构，而且控制了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外事部门等关键职位。这种实际情况造成，任何搞独立活动的尝试，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至少是

① *Медведев Ж. 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невник 1964 – 1970，Амстердам фонд имени герцена，1972，с. 331.

非常困难的。"[①]

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对《行动纲领》的态度，对业已开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的态度，在196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1968年的"五一"节游行，不再是"导演游行"，也不再是把人们按单位组织起来，而是人们自己聚集起来，带着他们自己愿意举起的并能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思想和愿望的横幅标语。这些标语是多元的：有表示愉快心情的，有批评性的，有幽默讽喻的，连色彩也不再是单一的红色。杜布切克感动地说："人群自然流露的同情和支持之情征服了我。"在游行的人群中，还出现了两个组织："非党人士俱乐部"和"231俱乐部"，苏共和勃列日涅夫以后死抓住这两个组织，斥责捷克斯洛伐克"公开成立反革命组织"。其实，"231俱乐部"是1968年3月31日经捷内务部批准而宣布成立的。该俱乐部的成员基本上是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老干部和社会名流，该俱乐部的基本主张是"按照捷克斯洛伐克刑法第231条，对那些专稿迫害的人处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予以惩处"。因此，该俱乐部只是在平反昭雪过程中有情绪性的言辞，属一般群众性结社。"非党人士俱乐部"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主张自由化，被捷政府取缔。

苏联对捷改革的反应和干预

苏联一直关注着以复兴社会主义为号召，以摆脱斯大林模式、建设捷式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进程。

在当时，除罗马尼亚之外，东欧各国不要说是党中央第一书记，即使是政府部长和地方相应级别的首长人选，也须经克里姆林宫认可。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之所以接受杜布切克，是因为杜布切克和苏联有着特殊的情结，不过杜布切克上台后的作为，却大出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的意料。

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杜布切克生于1921年11月27日，斯洛伐

①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杜布切克回忆录》，黄英尚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172～173页。

克族，其父曾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杜布切克的父母于1912年移居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1年全家又返回斯洛伐克，杜布切克就在其父母回国几个月后出生。杜布切克曾戏称：如果我早几个月出生，就成为美国人了（其父母回国时仍持美国护照）。

1921年，应列宁“援助饥荒受害者”的号召，捷克的工人成立了“国际援助合作社”。杜布切克的父亲是工人领袖之一，积极参加了这一组织，并于1925年春，变卖了全部家产，购买机械设备，随“国际援助合作社”来到苏联中亚的吉尔吉斯定居，援助苏联的经济恢复工作。杜布切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苏联度过的，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杜布切克的父母加入了苏联国籍，参加了高尔基汽车厂的建设，后因无法忍受大清洗的恐怖，于1938年11月回到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杜布切克加入了捷共，参加了著名的斯洛伐克民族反法西斯占领大起义，他的哥哥就在这次武装起义中牺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布切克先后担任过工厂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州委第一书记等职务。1955年，他被选送到苏联，进入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58年，杜布切克从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学习成绩优等，获得红色毕业证书。1958年9月，他被任命为捷共西斯洛伐克州委第一书记，并当选捷共中央委员；1963年4月，当选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8年1月，接替诺沃提尼，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在勃列日涅夫看来，杜布切克是一位久经革命考验，由苏联培养起来的干部。因此，杜布切克的上台，是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支持的。杜布切克上台后，举行中央全会，在没有事先征得苏联同意的情况下，重组了捷共中央主席团、书记处、国民议会和共和国政府等整套党、政领导班子，撤换了军队、保安部队、司法、监察等国家要害机构的领导人，特别是4月4日通过了实施复兴社会主义改革的《行动纲领》。以此为分界，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对杜布切克和捷共，由支持、观察、斥责，转为施加压力，直至采取武装行动。

杜布切克上台以后，苏联驻捷克大使契尔沃年科和使馆不断将捷共中央和杜布切克的举动，以及捷克社会的各方面动态，详细报告苏共中央。勃列日涅夫多次主持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捷克的形势和苏联的对策措施。1968年3月15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对杜布切克的期望不要太大，他可能飞走，因为他控制不了正在发生的事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提出：应当由苏共中央政治局直接致函捷共中央主席团，“指出他们那里发生在报纸、广播、电视上的猖狂叫嚣，指出这一切的目的在于使捷克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脱离苏联”。波诺马廖夫还特别强调，信中应当明确地提醒捷共中央领导人：“他们是与联邦德国为邻的。……形势的确很严重。现在捷克的局势和1956年10月匈牙利的形势非常相似。当年的匈牙利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根据波诺马廖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起草了给捷共中央的措词严厉的信函。由于杜布切克的请求，这封信没有发出。1968年4月9日和10日两天，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中的迫切问题和苏联共产党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奋斗》的报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根据苏联收集来的“实际材料”，评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表示当苏联感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决不能漠然置之。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还鼓动东欧的其他一些国家，共同对捷克施加压力。

1968年5月3日晚上，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比拉克等捷共领导人，被苏共中央“邀请”去莫斯科“谈一谈”。5月4日，苏共中央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诺夫、卡图谢夫等领导人，与捷共中央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勃列日涅夫根据苏联得到的情报，提出一大堆责难：允许公开成立反革命组织；宣传舆论阵地失控；党不能控制局势；允许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军队不听指挥；等等。勃列日涅夫还念了很多“材料”：一些县的报纸写了什么文章；哪些地方开了什么会；哪些人在会上讲了什么；等等。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在会谈中尽可能地作了解释。杜布切克说：党不仅没有失去在社会中领导作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赢得各社会集团和各民族更多的支持；至于说到大众媒体，政府已不对报纸的内容负责，报纸上大多支持党的政策，有些批评也是多样性和自由的表现；经济改革是保障广泛的非集中化和经营者的主动性，激励对更好的效率给予更高的报酬；允许小企业合法化是为了改善市场状况和方便人们生活，不会导致在小企业中形成敌对的、反国家的基础。对此，勃列日涅夫进行了反驳，还责问捷共中央“要复兴什么？究竟要把捷克引向何方？”会谈中，切尔尼克以政府总理的身份提出，

捷克需要进行加工工业现代化，逐步改革工业结构和布局，这样就需要4亿~5亿卢布，希望从苏联得到这笔贷款。柯西金对这个要求只是含糊其辞地说“研究、研究”，然后明确地说：“你们究竟想为谁生产消费品？是不是为了出口？西方现在不需要、将来也不会需要；想拿到社会主义国家去，首先拿到苏联市场去？社会主义国家也不需要。我们要的是你们的机器设备。”实际上是拒绝了捷克的要求。第一次会谈就持续了9小时，实际上是争辩了9小时。会谈公报只是冷淡地说：会议在“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①]

5月6日，勃列日涅夫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了5月4日与捷共代表团会谈的情况。勃列日涅夫说：“杜布切克给人的印象是，嘴上说的是一回事，而行动上绝对是另一回事。杜布切克使捷共成了一个群龙无首的党。”勃列日涅夫还指出：《行动纲领》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葛罗米柯支持勃列日涅夫的意见，说捷克的状况，说得好听点，是第二个罗马尼亚，实际上将会使华沙条约组织彻底完蛋。马祖罗夫、勃利扬斯基甚至说到要“放开手脚地干”，提出“有必要调动华沙条约国的军队”。勃列日涅夫说：“在今天的军事会议上我们也研究了这个问题，讨论了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所采取的实际措施的具体计划。”政治局会议还指出了捷共中央的“健康力量”：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的比拉克、科尔德，捷共中央书记英德拉等，都被作为“健康力量”。

5月8日，苏共中央还背着捷共，将保共中央第一书记、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匈牙利国务委员会主席卡达尔，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哥穆尔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主席乌布利希召集到莫斯科，举行高级会谈，协商集体制裁捷共问题。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力主对捷克采取“及时的警察行动，以便在杜布切克这个‘毒瘤’还没有扩散之前就予以切除”。日夫科夫也赞成这样做，并表示保加利亚可以派出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可是，卡达尔不赞成由经互会出面对捷克实行经济制裁，更不赞成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鉴于卡达尔的态度，

① 转引自《杜布切克回忆录》，第174、186页。另见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斯姆尔科夫斯基回忆录——苏联侵捷前后》，钟杰译，商务印书馆，1975，第23、26页。

勃列日涅夫只好声明：这次会晤仅仅是交换意见，目的是寻找帮助捷克渡过危机的更好途径。

勃列日涅夫仍然希望同杜布切克再进行一次秘密会晤。6 月 11 日，苏共中央决定，勃列日涅夫同杜布切克秘密会晤，指示苏联驻捷大使向杜布切克转述勃列日涅夫的口头函。其中说：捷共的处境已到了“特别重要的时期”，“你们的敌人将对共产党内及其领导层中的健康力量发动更猛烈的攻击，并为此不惜利用欺诈、造谣和挑拨离间，借口同‘保守派’作斗争来危害忠于事业的正直的共产党人。”[①] 勃列日涅夫还让契尔沃年科大使告诉杜布切克：“捷克的大多数宣传机构，仍然从右派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有时还公然从反革命立场发表意见，根本不顾捷共中央五月全会通过的决议。”[②] 勃列日涅夫提出，让杜布切克挑选“最亲近的志同道合者”，在 6 月 15、16 日，与之秘密会晤。所谓“最亲近的志同道合者”，勃列日涅夫替杜布切克开列的名单是：切尔尼克、比拉克、英德拉、列纳尔特、科尔德。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三位：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是苏共中央认定的“健康力量”。双方商定，将于 7 月 29 日在紧贴苏联边境的蒂萨河畔小镇切尔纳举行会谈。

6 月上旬，斯姆尔科夫斯基率捷克国民议会代表团访问苏联。6 月 14 日，勃列日涅夫与捷克国民议会代表团举行“座谈”。“座谈”会上，勃列日涅夫曾 8 次讲话。从“座谈会”的记录来看，都是捷方的某个人说了几句话，勃列日涅夫就抢过去讲上一大通。这次名曰“座谈会”，实际上是勃列日涅夫的“训话会”。勃列日涅夫先教育捷方人员：不要忘记苏联对捷克的帮助；接着谴责捷克“有些人”居然把苏联说成是“干涉内政”；继之告诫捷方不要忘记西德复仇主义势力和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威胁，捷克是紧邻西德的；最后暗藏杀机地说：“我国人民，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准备重新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为了贵国的独立而并肩作战。”[③]

---

①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致杜布切克口头信函的决定（1968 年 6 月 11 日）》，沈志华执行总主编、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1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 278 页。

②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致杜布切克口头信函的决定（1968 年 6 月 11 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1 卷，第 278 页。

③ 《勃列日涅夫与斯姆尔科夫斯基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成员的座谈记录（1968 年 6 月 14 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1 卷，第 289 页。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座谈会”结束后，勃列日涅夫请斯姆尔科夫斯基“留下来单独谈一谈”。谈话中，勃列日涅夫再次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发展表示担心，然后谈到杜布切克的个人经历和工作，说“杜布切克不适宜担任这一职务”；又说：苏共中央在这几个月中对斯姆尔科夫斯基不很了解，请求原谅。“你是个老人了，献身于党已经快40年了。”斯姆尔科夫斯基后来回忆说：“这些话使我非常吃惊，因为我知道他在向我建议什么。”“我采取既适当而明确的方式对此加以拒绝，我保卫了杜布切克。我不仅捍卫了我们的政策，而且也保护了杜布切克”。①

6月18日，华沙条约缔约国武装力量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军事演习，有苏、波、匈、捷克等四国武装部队参加。1.6万名装备精良的苏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在此之前，捷共中央曾一再反对在捷境内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军事演习，软磨硬拖，但最终无法阻止苏军进入捷境。捷共中央担心的是，苏军进入捷境之后就不走了。事情果然如捷共中央所料，演习结束后，苏军赖着不走。后经捷共中央一再交涉，苏军也只是撤至捷苏边境。这样，就为日后可能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条件。

对捷克究竟是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还是实行军事制裁，从苏联驻捷大使馆到苏共中央政治局，都存在着不同意见。苏联驻捷大使馆，以公使衔参赞乌达利佐夫为代表的一些官员，极力主张对捷采用军事手段。以契尔沃年科大使为代表的一些官员，认为捷克局势十分复杂，只有杜布切克能稳定局势；不要把捷共的路线和别人的言论混为一谈，尤其不要同党外人士的言论混为一谈。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内，谢列斯特、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马祖罗夫等，都力主对捷实行军事制裁。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张政治解决。勃列日涅夫对实行军事制裁有两大疑虑：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华约组织内部，卡达尔仍持反对立场。

7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上确定了对捷克实行军事制裁的方针。不过，在冷战对峙的紧张局面下，苏联决定试探一下美国的可能反应。7月22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探询如果苏联对捷采取极端措施，美国将作何反应？腊斯克表示，美国不想干涉捷克的事务。腊斯克说：“美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评论力求保

① 《斯姆尔科夫斯基回忆录——苏联侵捷前后》，第40、41页。

持克制。我们不想干预或参与这些事件。因此我们特别惊讶，苏联想让我们也卷入这些事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想介入。”① 与此同时，卡达尔也最终被勃列日涅夫“说服”，同意对捷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7 月 22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紧急制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措施的具体步骤，包括：通过决议，认为有必要派遣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撤换捷克的党、政领导；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革命政府”名义，起草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军队的呼吁书；等等。这些文件，统统在 7 月 26、27 日两天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军事制裁的方针是否付诸实施及何时实施，苏共中央尚在等待切尔纳会谈的结果。

7 月 29 日，捷共中央代表团和苏共中央代表团在切尔纳举行会谈，这是一次更为激烈的争吵，也是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前的最后一次“会谈”。捷共为这次会谈确定的方针是：捍卫党的《行动纲领》；防止同苏联决裂。具体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同盟、主权和自由。苏方盛气凌人，会谈几度陷入僵局。最后，根据苏方的要求，捷共承诺：不许社会民主党存在；取缔“非党人士俱乐部”和“231 俱乐部”；恢复新闻检查制度。杜布切克作了很大的妥协。会谈过后一星期，勃列日涅夫就不断打电话，责问杜布切克“为什么不执行切尔纳的承诺”。杜布切克忍气吞声，解释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要经过预定在 8 月底、9 月初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和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威胁说：这将迫使苏联采取“新的独立措施”，气得杜布切克在电话里要求勃列日涅夫解除他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② 杜布切克软中带硬和拖延的态度，促使勃列日涅夫最后下定了决心。

苏军对布拉格的武装占领

8 月 10 日前后，苏共中央选定于 8 月 20 日采取军事行动，对捷克斯

---

① 转引自 *Пихоя Р. Г.*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1968 год，Взгляд из Москв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6，c. 3 – 20；1995，№1，c. 34 – 48。

② 从 8 月 9 日至 13 日，勃列日涅夫不断给杜布切克打电话，催问“执行切尔纳承诺”的情况。通话内容详见叶书宗《回眸“布拉格之春”——1968 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 199 ~ 206 页。

洛伐克实行武装占领。8 月 10 日以后，待命的苏军部队进入出击阵地，处于临战状态。8 月 16 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抵达柏林，视察准备出击的部队。第二天，他们又抵达华沙，进一步落实出击部队的战斗准备状况。8 月 16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还指示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对“健康力量”进行策反工作。一切准备就绪，8 月 17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做出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武装干预，并把行动日期定在 8 月 20 日。最后，政治局会议还批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致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信》、《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和军队的呼吁书》，并指示做好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巴尔比雷克、什维斯特卡等“健康力量”的工作。政治局会议甚至在没有一名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捷克政府成员参与的情况下，越俎代庖，起草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宣言》。这个宣言说：“爬上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右翼修正主义分子，向人民作了种种许诺，实际上却是一些政治上身败名裂的人。……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我国政府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未来，倡议团结所有爱国力量。反动派挑起的残杀同胞的战争威胁，使我们必然要求助于苏联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盟友答应我们的请求，在面临考验的困难时刻派兵支援我国。捷共中央主席团和革命政府号召全体公民，给协助我国的盟友部队以大力协助。”宣言还历数杜布切克奉行的政策的种种“错误”；允诺新的“革命政府”将给予人民的种种“优惠”；论证捷克必须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的正确性。会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指令契尔沃年科，把这份宣言的文本，转交给比拉克和英德拉。[①]

8 月 18 日，准备跟随苏联一起出兵的华沙条约缔约国领导人飞抵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他们作了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的最后布置和说明。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日夫科夫等都表示毫无保留地执行苏共中央的决定。当天，他们都立即回国，作最后的部署和落实。8 月 19 日，勃列日涅夫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各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各自治共和国第一书记到莫斯科，向他们报告即将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并要他们立即返回

① 转引自《回眸“布拉格之春”》，第 209 ~ 210 页。

各自的岗位，做好一切工作。苏共中央还批准了塔斯社将于20日在军事行动开始后发表的苏联政府声明的文本。最后，苏共中央指示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在莫斯科时间20日23时20分，即苏军全面出动之前一小时，拜会斯沃博达总统，告知苏联将采取的行动；同时指示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在华盛顿时间8月20日下午6～8时之间，也即苏军坦克即将开进布拉格的时候，拜会美国总统约翰逊，告知苏联的行动。

苏共中央政治局指定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苏联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大将任入侵捷克军队总指挥，出动的兵力是：苏军16个师约17万人（其中10个师来自苏联本土、6个师是驻民主德国的苏军）；波兰正规军3个师约4万人；民主德国2个师约1.5万人；匈牙利2个师约1.5万人；保加利亚1个师约5000人。从军事上说，东欧军队都是无足轻重的，不过要摆出一个华沙条约国联合行动的架势。唯一不参与行动的是罗马尼亚，为了不在事前引出麻烦，苏联对保加利亚参与行动的部队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调动。这支保加利亚军队，先从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瓦尔纳空运到苏联的敖德萨，再从敖德萨空运到民主德国与捷相邻的厄尔士山脉一线出击阵地，等待行动。如此复杂的远征，是因为罗马尼亚坚决拒绝保加利亚军队过境或飞越其领空。

军事入侵已迫在眉睫，而捷共中央主没有丝毫察觉，反而认为与苏共之间的激烈矛盾已有所缓和，根本没有想到苏联会采取军事行动。8月20日下午2时，捷共中央主席团按计划召开了会议，讨论定于9月间召开的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事项。

下午4时左右，布拉格鲁津机场指挥台接到两架苏联民用客机称出现机械故障，要求临时降落的信号。飞机安全降落后，停靠在机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机上下来几十个穿统一服装，提统一箱子的壮汉，机场警察以为是运动员，并未在意。午夜11时，原来安静地坐在候机大厅里的这些苏联人，突然从各自的行李箱里取出手提机关枪，按各人选定的位置，闪电般地占领了机场的各要害部门。原来这批“乘客”是苏军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那两架发生“机械故障”降落在鲁津机场的飞机，是活动雷达站。3分钟后，苏联巨型运输机装载着坦克和士兵，在活动雷达站的指挥下降落。坦克冲出迅速占领了整个机场。接着，每隔一分钟就有一架苏联运输机降落，坦克、装甲车、火炮、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各种军用物资，倾泻而

出。苏联大使馆派来的“向导”也进入机场，带领刚着陆的苏军，扑向布拉格的捷共和政府各要害部门，以及伏尔塔瓦河上的各座桥梁。

也是在午夜11时，已等待在出击阵地上的苏联、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华沙条约缔约国武装部队，分为8路，潮水般地涌入捷克斯洛伐克。入侵者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看起来就像不久前进行的军事演习一样。

在苏军开始行动前，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根据本国的指示拜会了约翰逊总统。其实，约翰逊早已心中有数。多勃雷宁面对约翰逊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念了莫斯科的电报。电报称：“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一个由内外反动势力组成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集团。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组织盟国对布拉格政府寻求帮助的呼吁作出了反应。因此，苏联军队已奉命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约翰逊仔细地听完电文，平静地“感谢多勃雷宁大使向他通报这一消息”，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和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进行会谈的情况。约翰逊的“平静”，连多勃雷宁也感到“十分惊讶”。3天后，腊斯克警告多勃雷宁：“下一个会不会是罗马尼亚？那就太过分了，而且我们根本不可能控制住公众的舆论。”[①] 苏联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也就默认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当时，约翰逊政府正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况且，约翰逊即将任期届满，也乐于同勃列日涅夫达成默契，息事宁人。

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进行到晚上11时半左右，切尔尼克被叫到隔壁听电话。过了几分钟，切尔尼克回来说：电话是国防部长楚尔打来的，报告华沙条约5国（除罗马尼亚外）的部队已越过国界进入捷克，到早晨6时全国即将被占领。楚尔还说，他在办公室里已被两名苏联军官扣押，只准许给总理打电话。

主席团会议室出现了短暂的愤激和骚动，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斯沃博达总统也赶来了。主席团首先决定：谁都不能辞职，一切合法成立的机构及其领导人必须坚守岗位；决不能在武装干涉下成立新机构，提出新的干部任免。主席团同时认为，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考虑，武装抵抗都

① 阿纳托·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第206～208页。

是不可取的，也不现实，决定号召全国人民“保持平静”，对从境外开进来的军队“不能进行抵抗”。主席团的决定无疑是明智的。现实的情况是，捷克斯洛伐克拥有4个坦克师、8个机械化步兵师、1个伞兵旅，约14.5万人，500架作战飞机，还有4万空军部队。这样微弱的军事实力，又毫无战斗准备，更加上指挥系统、通讯联络系统和情报系统已全被苏军控制，仓促之间与苏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况且，一旦发生战斗，则正中苏共中央下怀：苏军就会像1956年10月侵入匈牙利那样，名正言顺地来“镇压反革命叛乱”了。

面对苏军的突然入侵，主席团决定起草一个宣言——《告全国人民书》，以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名义发布。《告全国人民书》说：对于苏、波、匈、保、民主德国等五国军队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这件事，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团、政府主席团和党中央第一书记，都一无所知。“主席团号召全国公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保卫我国的国界了。根据同样的理由，也没有命令我国军队、公安部队和工人纠察队保卫国土。”《告全国人民书》要求党中央、国民议会、政府各部门都坚守岗位，并严正指出：五国军队的入侵“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此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电台已被苏军占领，电台的工作人员已转移到布拉格郊区的斯特拉霍夫中心转播站。捷政府邮电部长卡雷尔·霍夫曼倒向了苏军，拒绝服从捷共中央的命令。捷共中央依靠电台的工作人员，通过中心转播站，才把《告全国人民书》播送出去。[1]

8月21日凌晨4时，苏军占领了捷共中央大厦。苏军把留在捷共中央大厦里的人集中到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里，宣布“不准说话，不准自由行动”。上午9时，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切尔尼克（在政府办公室里）等4人，被苏军押走，推进已准备好的装甲车，开往鲁津机场。到了机场，他们被塞进装运坦克的运输机，经波兰西部的莱格尼查、外喀尔巴阡乌克兰，最后转到莫斯科郊外，被拘押起来。

苏联率领华约国军队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按原计划是扶持比拉克、英德拉等“健康力量”，组成“革命政府”，然后宣布苏军是应“革

① 转引自《回眸“布拉格之春”》，第219页。

命政府”的请求，前来拯救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镇压国内外反革命颠覆活动，并顺理成章地把杜布切克等人送上“革命法庭”。8月21日凌晨5时25分，苏联塔斯社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伏尔塔瓦电台，向全世界发表声明：塔斯社受权声明，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向苏联及其他盟国提出请求，希望给予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紧急援助，包括武装部队的支援在内。为此，苏联和其他盟国部队已于8月21日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然而，令苏联人意外的是，“革命政府”的组建遇到了阻力。

8月21日凌晨，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一结束，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等人便在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的陪同下，来到已被苏军包围的总统府，要求总统“委托英德拉组织政府”。但是，这一要求遭到斯沃博达总统的严辞拒绝。苏联和比拉克等人仍不死心。下午3时许，他们齐集在捷共中央招待所“布拉格饭店”开会。契尔沃年科提出：在新的党中央第一书记产生之前，由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等三人主持党的领导工作，由英德拉组成新的革命政府。契尔沃年科提出，“政府成员名单必须得到斯沃博达总统的批准”。当然，这实际上是克里姆林宫的意见。22日凌晨，这些人再次拥到总统府，要挟斯沃博达总统批准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新名单。斯沃博达告诉他们：有关党的问题，只能同杜布切克交谈；切尔尼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合法的政府总理，有关政府的事只能同切尔尼克商讨。斯沃博达还告诉苏联人：必须立即释放被捕的捷克斯洛伐克党政领导人，否则，任何谈判都是不可能的。

在两天的时间里，苏联拼凑“革命政府”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从苏联及其他华约国军队入侵开始，几乎是全民自发地出动，涌上街头，把苏军士兵和坦克围起来，向他们吐唾沫，扔脏东西。全国上空响彻“杜布切克!”“俄国佬滚回去!”的吼声。市民还把布拉格街道的路牌全部刷掉，写成“杜布切克大街”、“切尔尼克大街”、“斯姆尔科夫斯基大街”等，以至入侵的苏军连路都找不到。8月22日，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同时举行一小时的总罢工，抗议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五国军队入侵。在布拉格，汽笛一声长鸣，所有工作统统停止，行驶的车辆当街停下，全城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部队虽然没有抵抗，但是全国老百姓却在失去领导人的情况下采取了统一的行动，这种方式在世界上小国被大国入侵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入侵的苏军对此一筹莫

展，当时有人把这一现象称做“大象踩不断绣花针！”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行动和他们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使入侵的苏军不知所措，也令克里姆林宫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不敢妄为。以巴甫洛夫斯基为首的占领当局和契尔沃年科大使连连向莫斯科请示：下一步怎么办？莫斯科的决策者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

斯沃博达向苏联提出：必须释放被他们逮捕的捷克斯洛伐克党政领导人；捷、苏双方只能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经过反复考虑，面对出现的僵局，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只好接受这一建议。8 月 23 日上午，苏军被迫释放了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等人，他们由苏军的“俘虏”变成了苏联的“客人”。当天下午，苏、捷双方开始举行会谈。参加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成员，除杜布切克等人以外，还有从捷国内赶来的斯沃博达、比拉克、英德拉、胡萨克等人。

会谈开始后，勃列日涅夫说了一大通话，意思是：我们不谈过去的事，也不谈谁对谁错，我们就讨论如何面对已经出现的局势。勃列日涅夫的要求很明确，就是要捷共帮助苏共摆脱由于实行军事占领而造成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但是，杜布切克仍然坚持说：在捷共中央全会之前，在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根本不通知捷共中央主席团、国民议会、总统、政府总理和我本人，就采取了如此的军事行动，“照我的看法，这些措施不仅使我党和贵党，而且也使国际共运面临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去未曾遇到过的最复杂的问题”。[①] 苏共中央原想立即去掉杜布切克，另行组建捷克斯洛伐克的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但是，无论是斯沃博达还是切尔尼克，对此都坚决不予接受，而比拉克、英德拉等人这几天的公开表演，已使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声名狼藉。苏共中央最后不得不放弃立即搞掉杜布切克等人的计划，但是坚持要捷领导人承认国内存在着反革命复辟的现实活动，五国军事干预是正确的、合法的。双方谈判一直延续到 8 月 26 日午夜。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刺刀下的谈判。谈话间，勃列日涅夫情急之下，一语道破了莫斯科的内心世界：“捷克斯洛伐克自最后一次战争结束以来就是苏联安全区的一部分，苏联无意放弃它。出现了‘布拉格之春’，

①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沃罗诺夫同杜布切克会谈速记记录摘录（1968 年 8 月 23 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1 卷，第 306 页。

苏共中央担心它走向独立。杜布切克的那些讲话稿没有经过苏共中央批准，干部的调整也没有征得苏共中央的允许。对此，苏共中央是不能容忍的。”当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对此表示抗议时，勃列日涅夫急得立即站起来，脸涨得通红，浓眉紧蹙，大声喊叫，转身走出会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站起身，像军人一样跟着勃列日涅夫走出会场。会谈数次中断。①

苏共中央不仅以刺刀威胁捷代表团，更以屠杀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居民相要挟。杜布切克等人纵然以死相抗争，最后也只能妥协。8 月 26 日午夜，捷、苏两党签署了《莫斯科会谈公报》。公报不再提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势力进攻”，但也不提《行动纲领》，即否定了建设捷克斯洛伐克式社会主义的改革；捷克斯洛伐克方面不再提将军事占领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撤军问题将视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正常化而定；捷克斯洛伐克重申对华沙条约组织的承诺，保证毫不动摇地履行社会主义各国间多边或双边协议规定的义务。苏共中央本想继续扣押克里格尔，捷代表团表示：克里格尔必须一起回国，否则，他们将不离开苏联。8 月 27 日凌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回到捷克。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备受折磨，劫后余生。

8 月 31 日、9 月 1 日，捷共中央召开全会，这是在苏军占领下举行的中央全会。全会把科尔德、里戈、卡佩克、克里格尔、什维斯特卡等“开除出党中央主席团”，免除齐萨日党中央书记职务。苏军入侵时，齐萨日隐蔽到布拉格郊外去了，苏军没有抓到他，躲过一场大难。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者希克于 9 月 3 日被解除政府副总理职务，苏军入侵时正在南斯拉夫访问，躲过了血光之灾。此后，他留居瑞士，以教书为生。

1968 年 10 月 4 日，杜布切克等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盟国军队暂驻”条约。10 月 14 日，切尔尼克以捷政府总理的身份，再赴莫斯科谈判。10 月 16 日，捷、苏双方签订了《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除苏联外，华沙条约缔约国其他国家的军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捷向苏联驻军提供一切设施，承担一切费用；苏联驻军及其家属享有治外法权。这项条约，使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留驻”合法化。“留驻”条约签订后，

① 见《杜布切克回忆录》，第 234 页。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并没有停止抗议活动。1969 年 1 月 8 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学生扬·帕拉赫为抗议苏军的占领而自焚。帕拉赫的悲壮赴死，震动了全国，捷克斯洛伐克再次掀起了抗议苏军占领的新高潮。

苏联也在加紧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的改造。1969 年 1 月 16 日，斯姆尔科夫斯基被解除国民议会主席职务，1970 年又被“开除”出捷共中央。1969 年 4 月 17 日，胡萨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1970 年 6 月，杜布切克被召回国，“开除”出捷共，并被宣布为“人民和民族的敌人”。1970 年 6 月，切尔尼克也被解除政府总理职务，开除出捷共。苏联还指使胡萨克大肆迫害拥护和支持改革的各级党政干部。到 1970 年，胡萨克先后将其余 4 名捷共中央书记、9 名州委第一书记、59 名县委第一书记“开除出党”；1/3 以上的党中央委员、州委委员、县委委员，或撤职，或“开除出党”；1/5 以上党员被除名或“开除出党”。1970 年 12 月，胡萨克召开捷共中央全会，全盘否定“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全面接受“苏联帮助捷克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观点。

如同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其自身也没有自由一样，镇压别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其自身也必然在改革前止步。苏联在镇压“布拉格之春”的同时，窒息了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主义和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为苏联东欧体系的总崩溃埋下了又一颗新的种子。



“分离”还是对峙?
——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戴桂菊

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东正教在俄国的命运。旧俄时期，东正教一直作为俄国的国教而存在，俄国政教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交织的关系。国家把东正教当作精神支柱给予扶持，受到恩宠的东正教则竭力为维护专制制度服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立即确定了宗教与国家政权分离的新型政教关系模式。在长达74年的苏维埃时期，得到官方承认的俄罗斯东正教会[①]（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经历了从与国家政权对立到服从于国家政权，再到服务于国家政权的转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正教徒都赞成教会听命于苏维埃政权。那些不愿意服从苏维埃政权的东正教徒断然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并且成立了地下教会（Катакомбная церковь），他们成为苏联的隐形东正教徒；还有一些拒绝接受苏维埃政权的东正教徒离开祖国，流亡到国外并成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заграницей）。该教会长期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和苏维埃政权保持敌对状态，直到苏联解体。此外，俄罗斯

① 该称谓与下文中的“东正教官方教会”为同义语。

民间东正教——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也同俄罗斯东正教会有着颇为相似的经历。本文拟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分别揭示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上述分支的命运沉浮。

东正教官方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帝俄末期，俄国东正教官方教会——俄罗斯东正教会属于一个庞大的社会机构。它拥有占全国人口 0.5% 的神职人员，掌握着全国 0.8% 的土地，官方教会教徒的人口占全国国民总数的 69.9%。[①] 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前，东正教在俄国各宗教中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立即颁布了《土地法令》（1917 年 11 月 8 日），规定“土地私有权永远被废除”，“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修道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家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这就意味着教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被切断，教会人士对新政府的土地政策怀恨在心。为把教会阶层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消除教会旧思想的影响，人民委员会又颁布《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 年 1 月 23 日），规定“教会与国家分离”，“任何教会和宗教团体都不享有法人的权利”。[②] 这样，在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教关系一开始就具有对立色彩。对于教会来说，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难以接受的政教“分离”（отделение Церкви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关系为新政权确立下来。

苏维埃政权诞生不久，便经历了一场反对国内白卫分子和协约国侵略者联合武装干涉的国内战争（1918～1921）。在这场战争中，东正教会是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出现的。当时，许多神职人员都加入到白军的行列。在几股白卫军队中都有数量可观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参加。例如，在高尔察克军队里，有几千名神职人员，邓尼金的军队里有教士近千名，弗兰

① *Смолич И. К.*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том 8, часть 1, Мосва: Спасо-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ого Валаам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 1996, с. 28.

② 《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 年 1 月 23 日人民委员会令）第 3、12 条，参见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 303、305 页。

格尔军队中有神职人员 500 多名。[①] 苏维埃政权把教会人员视为白卫分子来处理。据不完全统计，仅 1918 年 6 月至 1919 年 1 月，除了伏尔加河流域和卡马河流域以外，全国被处决的神职人员就有：都主教 1 名，高级黑神品 18 名，神甫 102 名，执事 154 名，修士和修女 94 名。因参与反苏维埃活动被幽禁的神职人员有：主教 4 名，神甫 198 名，修士大司祭 8 名，修道院长 5 名。1918~1922 年有 27 名主教被捕，帝俄末期俄国的 10 万多名神职人员到 1919 年仅剩下 4 万名。[②]

1920 年，苏维埃政府在内战中的胜利已成定局，这时牧首和教会黑神品开始改变对这场革命的态度，宣称教会在政治问题上持中立态度。然而，1921~1922 年，新生的苏俄遇到了天灾，歉收和饥荒造成全国 16 个省份受灾，苏维埃政权又一次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为了筹措资金赈济灾民，1922 年 2 月 16 日，全俄中央执委会通过了《关于没收教会财产用于帮助饥饿者》的主席团令。法令规定"教会需将一切贵重金银物品、宝石，按照财产清单和契约移交给财政人民委员部各机构"。[③] 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对苏维埃法令采取抵抗态度，声称苏维埃的法令亵渎宗教和冒犯教规，号召教徒不惜一切手段来抵制法令的实施。面对教会的反抗，苏维埃政权再次采取暴力强制推行法令，又有一大批神职人员遭到镇压，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也被捕。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日趋巩固，东正教会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些有影响的白神品人士（бел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表示愿与政府合作，他们形成东正教内部的改革派（обновленцы）。1922 年 5 月 29 日，东正教改革派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活的教会"（Живая церковь）。该教会将白衣教士联合起来，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不久，革新派代表受到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的接见。得到官方承认的革新派教会还组建起自己的权力机构——最高宗教事务局（Высшее церко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1922 年 8 月，东正教改革派神职人员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要求牧首吉洪退位并把权

① *Пласкин Р. Ю.* Крах церковной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1917 – 1923 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8, с. 124.

② 百科辞典《俄罗斯文化世界》，莫斯科，1997，第 556 页。

③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ВЦИК "об изъятии церков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для реализации на помощь голодающих", *Покровский Н. Н.* Архивы Кремля, Политбюро и церковь 1922 – 1925 гг., книга, 2,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 с. 16.

力移交给改革派神职人员，还建议改组教会，吸收那些辛勤劳动的教徒进入教会高级管理层。这样，革新派成为 1922～1927 年间得到苏维埃政权正式承认的唯一的东正教组织。①

面对教会内部出现的分裂形势，俄罗斯东正教会上层改变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态度。1923 年，东正教会召开地方主教公议。牧首吉洪承认自己从事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行为，他对自己“所犯的反对国家制度的罪行表示忏悔”，并申明“今后不再与苏维埃政权为敌”，“永久地、明确地放弃反革命立场”。② 为了恢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吉洪宣布解散改革派组织，东正教会继续实行牧首制管理。然而，这些倡议并没有得到苏维埃政府的认可。1925 年 4 月 7 日，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吉洪去世。1927 年 5 月 10 日，都主教谢尔吉·斯特拉戈罗德斯基上书内务人民委员会，请求允许他管理俄罗斯东正教会并组建教会的最高管理机构——牧首区神圣公会（Патриарший Священный Синод）。由于革新派提出的允许主教结婚和神甫再婚等改革措施得不到多数教徒和教会人士的赞同，革新派的影响远不如俄罗斯东正教会大。基于此，5 月 20 日，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承认了以谢尔吉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7 月 29 日，谢尔吉发表了“致教民咨文”（即“谢尔吉宣言”），对苏维埃政府承认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表示衷心感谢并宣布服从苏维埃政权：“我们需要不仅通过口头，而且通过行动来证明，我们是苏联忠实的公民，是服从于苏维埃政权的公民。”③ 此后，革新派的影响骤然减小。1943 年，出于战争的需要，苏维埃政权完全支持谢尔吉领导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革新派受到致命打击。1944 年，大批革新派教徒并入俄罗斯东正教会。1946 年，革新派领袖维京斯基去世，革新派也随之解体。

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教会上层的不积极态度使苏维埃政权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来处理。1922～1938 年，苏维埃政权为摧毁教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无神论宣传成为俄共（布）及

① Свобод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икипедия，参见网页 http：//ru.wikipedia.org/wiki 中的“Обновленчество”词条。
②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学林出版社，1999，第 92 页。
③ *Штриккер Г.*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1917－1991），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церковью，книга 1，Москва：ПРОПИЛЕИ，1995，с. 270.

后来的联共（布）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1922～1932年，全国脱离东正教会的教徒达2500万，占全国人口的1/4。[①] 二战前夕，苏联东正教地方机构几乎全部被取消，神职人员多被关入集中营，拥有人身自由的主教寥寥无几，一些主教隐居在深山老林中或装扮成神甫度日，绝大多数教堂被关闭，全国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仅剩下几百座，成千上万的神甫改行。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苏联进入战争状态。在战争开始的当天，都主教谢尔吉发表《告东正教教民书》，明确表示"基督的教会为保卫祖国神圣疆界的所有东正教祈祷"。[②] 东正教会在战争中自始至终都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场上，许多神职人员和教徒都参加了敌后游击战或为游击战提供援助，他们组织救援队抢救伤员，往前线派送食品和军需物品。鉴于教会在调动苏联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加强民族凝聚力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苏联政府对教会的态度急速好转。1942年，国家允许东正教会用多种文字出版教会读物，被没收的教会印刷厂又归还教会。1942年，莫斯科中断了多年的东正教复活节十字游行在德军的炮火声中隆重举行。1943年1月15日，在都主教谢尔吉的请求下，斯大林允许东正教会开设银行账户，教会通过募捐的方式筹措资金用于国防。战争期间，教会共捐款3亿卢布，利用捐款组建了顿河王季米特里坦克纵队和涅瓦王亚历山大飞机战斗队。1943年9月4日，谢尔吉等三名都主教应邀来到斯大林别墅与苏联领导人商讨教会事宜。斯大林同意东正教召开地方主教公议的请求并答应提供物质资助，政教双方还探讨了有关开设神职学校、更新教会期刊、释放扣押神职人员、开办新教区以及为神职人员在全国的自由流动提供方便等问题。不久，苏联成立了直属于部长会议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教会机关刊物《莫斯科牧首区杂志》创刊。9月12日，东正教牧首制再度恢复，都主教谢尔吉当选为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苏联的政教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和谐的时期。1944年，谢尔吉去世。次年，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都主教阿列克塞·西曼斯基当选为新一任牧首。[③]

战后初期，苏联党和政府继续坚持战时宗教政策，保障公民的信仰自

① 乐峰：《东正教史》，第142页。

② *Штриккер Г.*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1917－1991), c. 329.

③ *Чумаченко Т.*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ерующие, 1941－1961 гг. Москва: "АИРО-ХХ", 1999, стр. 48.

由。因此，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东正教会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已解放地区的教区生活重新恢复，东正教会同其他基督教派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东正教的文化中心——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宗教活动又重新开始。1944年，莫斯科开办教士神学培训班和神学院。1946 年，该学院更名为莫斯科神学院。1948 年，该校校址迁到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敖德萨神职中学也于 1945 年恢复。1946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维尔纽斯等地有 10 所神职中学恢复。1945 年 1 月 31 日，中断了 27 年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地方主教公会开始工作。斯大林就牧首区在国际关系中的任务问题同东正教牧首和教会上层人士交谈。苏联政府表示，支持教会与其他宗教派别间的合作与交流。①

冷战开始后，苏联政府有意加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东正教世界的影响，企图将莫斯科建成东正教世界的“梵蒂冈”。1945～1948 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先后与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里阿、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波兰东正教教会建立了联系。另外，还同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英国、美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天主教、新教教会加强了联系。教会组织在苏联国内得到了较为自由的发展，1948 年末，莫斯科和全俄牧首区在组织规模上达到了战后最高水平，全国有东正教堂 14477 座，其中 1270 座是在 1945～1947 年建立的。在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注册的神甫和执事 13483 人，高级黑神品 70 人。在两所神学院和 10 所神职中学里共有在校生 562 人，修道院 85 座，修士和修女 4632 人。②

然而，1948 年 8～9 月，基督教世界成立了主张教会统一的世界教会委员会，东正教世界有三个独立教会参加了该组织。11 月，具有反共产主义情绪的美国纽约州高级主教阿菲那戈尔登上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宝座。这一事实宣告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充当世界东正教霸主的企图的破产。于是，苏联政府对东正教会由支持转为限制，1948 年末，苏联政府颁布法令，强调对国民加强反宗教宣传，禁止东正教会举行乡村间的十字游行，

① *Шкаровский М.*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ри Сталине и Хрущев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Грааль》, 1996, с. 213.

② *Шкаровский М.*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1943 – 1957 гг.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5, №8, с. 46.

除了祈祷以外，教堂里不许举办宗教音乐会，不允许黑神品上层在农忙时节四出活动，不允许在田间祈祷，不许在教堂里对儿童讲授神学课程。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将东正教教堂变成俱乐部和当作粮仓现象屡见不鲜，拒绝执行政府命令的神职人员遭到刑事处罚。50年代初，苏联东正教会的规模比40年代明显减小。1952年，全国供宗教活动的教堂有13786座，神甫和执事12254人，高级黑神品63人，修道院62座。与此同时，政府组织——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中央机构的成员却由最初的5人猛增到44人，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对教会进行监督，国家严格禁止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事宗教活动，将违反规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开除出党团组织。①

赫鲁晓夫执政伊始，便在苏联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运动。随之，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艺术领域都出现了短暂的"解冻"时期。50年代中期的自由气氛在东正教会生活中也体现出来。一些被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的神职人员获得了释放，1956年8月，俄联邦部长会议通过了将扎戈尔斯克城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建筑归还给莫斯科牧首区的决定。次年，列宁格勒圣三一教堂重新启动，东正教教堂里的工作人员得到了国家劳动法的保护。1956年秋，神学院和神职中学的在校生比1951年增加了1倍。全国共有修道院57座，修士和修女4661人。俄联邦有1/3的新生儿接受了东正教洗礼，1/3的死者举行过东正教教堂葬仪。②

在赫鲁晓夫的地位稳定以后，苏联领导人又沿着消灭宗教的路线走下去。从1957年开始，苏联大力加强无神论宣传。8月，莫斯科举行由350名无神论理论工作者参加的研讨会，寻求苏联人民摆脱宗教鸦片欺骗的途径。1958年上半年，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决定关闭曾注册过但未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仅1960~1961年度，被关闭的教堂就有1300座。国家明文禁止教会对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不允许教堂出售蜡烛和圣物，神职中学大批被关闭。同时，苏联各大中学校都将科学的无神论课作为必修课开设。1965年，全国东正教修道院仅剩下35所，教堂8000座。③ 赫鲁晓夫后期，苏联的政教关系日趋紧张和恶化，当今俄罗斯学者和教会人士把这一时期

①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 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 с. 275.

② *Шкаровский М.*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ри Сталине и Хрущеве, с. 213.

③ *Штриккер Г.*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1917 – 1991), с. 307.

称为东正教会受排挤和迫害的黑暗年代。

1964年末，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阶段超前论，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取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胜利，目前苏联正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国家更多地强调对神职人员和教徒进行思想感化，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国民。在对待宗教人士的态度上，官方提出了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神甫的方针。1965年，国家宗教管理机构——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和宗教崇拜事务委员会合并成一个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 по делам религий），负责管理苏联的各种宗教事务。为了进一步消除宗教在人民中的影响，苏联提倡马克思主义教育从娃娃抓起，因此，新生儿去教堂接受洗礼的传统习俗被破除，年轻的父母为孩子选用意识形态化的名字成为时尚。新人的婚礼也不再在教堂里举行，而是在国家户籍登记处的婚礼宫进行。

赫鲁晓夫宗教迫害的解除客观上为苏联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70年代，苏联城市居民中教徒人数的比例由60年代初的10%～15%增至20%，农村教徒则在10%～25%之间徘徊。[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有神学院两所，神职中学三所，即莫斯科神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列宁格勒神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和敖德萨神职中学。为了壮大新型神职人员队伍，国家允许神学院校扩大办学规模。学院校舍增多，在校生（包括函授生）达2000多名。60年代末，国家允许世俗高校的毕业生进入神学院校。70年代中期，神学院校中产生了一批苏联知识分子神学家和神职人员，他们有的曾经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地质学家和医生，有的则毕业于人文学科。按照决策者的初衷，知识分子进入教会院校是一种向教会输送共产主义思想的举措。但是，它却带来了决策者意想不到的后果：新型宗教干部中出现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建立各种宗教哲学组织，出版宗教刊物，不断强调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共性，这种思潮直接与苏联领导人所坚持的宗教与无神论的对立理论相抵触。因此，一些寻神派知识分子遭到了苏联政府的排挤和镇压。[②]

---

①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 с. 314.

②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Православняа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Москва: Библейско-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св. Апостола Андрея, 1996, стр. 355.

1970年，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阿列克塞去世，次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召开地方主教公议，选举克鲁基茨基和科洛缅都主教皮缅·伊兹维科夫任牧首。皮缅对政府的教会政策比较温顺，在任东正教会最高职位近20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政绩是应广大教徒的要求，颁令承认旧礼仪派为东正教徒（1971年）。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多，苏联国民中保护信仰自由的呼声高涨。1977年，苏联新宪法中增加了“保障苏联所有公民享有信仰的自由和权利”的条款。《科学与宗教》杂志是一种以宣传无神论为主的官方刊物，70年代末，教会机关刊物《莫斯科牧首区杂志》复刊。1981年，莫斯科牧首区出版大楼竣工，这里开始出版数量不多的教堂合唱录音带、祈祷书、古代教会读物等书籍，制造一些精美的圣像和圣器等。由于国内需求量有限，这些作品主要用于出口。当时，苏联的宗教哲学组织创办了许多地下刊物，他们受到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在国内宣传宗教神学思想，与苏联官方路线作对。①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苏联的最高领导权为安德罗波夫所掌握。他比前任对苏联经济和社会停滞现象有较为清醒的认识。面对苏联社会的危机局面，他对宗教活跃分子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手段，但对官方东正教会的活动则比较宽容。还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前，经安德罗波夫同意，1982年，达尼洛夫修道院（Данило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作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宗教和行政中心归还教会，政府还允许该修道院为迎接罗斯受礼一千年（Тысячелетие крещения Руси）而进行修复。1984年，契尔年科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强调党的反宗教政策，试图对东正教加强限制力度。② 然而，短暂的老人执政时期使他在宗教方面的计划一筹未展。1985年3月，苏联年轻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社会从此进入了解体以前的全面改革时期。

还在契尔年科执政时期，戈尔巴乔夫就掌握着苏联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权。在戈氏继位初期，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通过的党纲中仍明确规定：“必须普及科学的无神论的世界观以克服宗教偏见”。但是，80年代初苏联经济的危机形势和生产技术落后、财政赤字等现象使新一代的领导人

---

①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 359.

②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еформы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школы，документ апре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КПСС 1984 г. 参见 Правда，1984，14 апреля，стр. 3。

感到，继续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无异于死路一条。因此，他转向同美国的和平外交，同时，在国内推行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表示出改善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意向。1987 年，随着戈氏政治民主化改革程序的启动，苏联思想界异常活跃。莫斯科牧首区先后在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了三次神学国际研讨会，一些高校学者也参加了会议。他们谴责苏联政府长期以来对东正教的不公正待遇，要求为东正教平反。1988 年 4 月，戈尔巴乔夫接见以牧首皮缅为首的全俄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的成员，这是自斯大林以来苏联领导人与教会领导层的第一次会面。戈尔巴乔夫首次承认东正教会在苏联曾遭受排挤和其他不公正的待遇。教会领导人要求国家赋予教会以法人的地位，使教会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享有全权，并希望国家尽早制定宗教法，戈尔巴乔夫答应了教会的要求。1988 年 6 月，全俄东正教地方主教公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东正教会新的管理章程，对教会各级机构的组成、教区管理人员的选举办法和任期期限都作了明确规定。①

1988 年，苏联宗教界隆重纪念罗斯受礼一千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会把罗斯基督教的千年纪念日列为欧洲和世界历史及文化中的重大事件。苏联各地东正教教堂纷纷修复或重建。1986～1989 年间，苏联每年开放的教堂数量分别为：10 个、16 个、809 个和 2039 个。80 年代初，苏联境内共有东正教教区 6700 个。到 1989 年末，教区数量已经接近 1 万个。俄罗斯邦联境内的东正教修道院也由 80 年代中期的 3 个增至 100 个。② 宗教活动家通过大众传媒手段就社会道德、文化遗产和民族纠纷等问题同社会进行广泛的对话。1989 年初，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莫斯科神学院共同举办由历史学家、各地神职人员代表参加的东正教问题圆桌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它标志着苏联学术界重新审视和评价东正教的活动开始。

1990 年 5 月 3 日，莫斯科及全俄东正教牧首皮缅去世。俄罗斯东正教会召开全俄地方主教公会，按照传统的牧首选举方式推选阿列克塞·里吉格尔任牧首。苏联时期的牧首阿列克塞被称作阿列克塞一世，现任牧首称

①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Православняа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тр. 361.

②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 с. 400.

阿列克塞二世。1990 年 10 月，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在苏联出台。法令"承认宗教团体拥有法人资格"，取消对宗教团体的各种限制，教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明显扩大，教徒的信仰自由权得到保证。①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苏联实行多党制。多元化的形势造就了一批宗教政治派别，如 1989 年成立的"教会与改革运动"、"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1990 年产生的"人民东正教运动"和"俄罗斯东正教君主立宪党"等。1990 年 12 月，东正教会宣布成立教会青年组织。在第一届东正教青年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组织——世界东正教青年运动，目的在于吸引青少年投入教会的怀抱，加强东正教会间的国际合作。到 1991 年 1 月，东正教徒占苏联国民总数的 22%。②

东正教地下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俄罗斯东正教会对苏维埃政权由对抗转为服从。这一变化引起了部分东正教徒和神职人员的不满。1927 年，在都主教谢尔吉通过"致教民咨文"宣布服从苏维埃政权以后，以列宁格勒都主教约瑟夫·彼得罗维赫、莫斯科达尼洛夫修道院院长、高级主教费多尔·波兹捷耶夫斯基和高级主教安德烈·乌赫托姆斯基为首的东正教高级神职人员愤然离开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他们联合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反对与苏维埃合作的教徒和神职人员，共同成立了一个新的教会——"俄罗斯真正东正教教会（Русская Истино-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这样，自 20 年代末起，由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分裂出许多东正教小团体，例如，以约瑟夫为首的约瑟夫派（иосифляне）、以费多罗夫为首的费多尔派（феодоровцы）或达尼洛夫派（даниловцы）③ 和以安德烈为首的安德烈派（андреевцы）等。这些东正教派将俄罗斯东正教会称作"苏维埃教会"（советская церковь）或"红色教会"（красная церковь），将自己的追随者称作吉洪派

① Закон РСФСР о свободе вероисповеданий, 25. 10. 1990, статья 18. 参见 *Штриккер Г.*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1917 – 1991), с. 290。

② *Иван Дъячков* Почему нам нужны《Основы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 参见网页：www. km. ru, 11. 10. 2007。

③ 该派因发端于莫斯科达尼洛夫修道院而得名，它是费多尔派的别称。

（тихоновцы），以示他们只承认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吉洪的领导，而不承认吉洪的继任者谢尔吉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领导。由于诅咒苏维埃政权为“亵渎神的”政权，这些教派遭到政府的镇压，他们的活动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因此，这些组织通常被称作东正教地下教会。①

20世纪20~50年代，地下教会拥有广泛的市场。从社会阶层来看，地下教会的教徒主要是那些不愿意参加集体化的农民以及在消灭富农运动中被强行迁移到西伯利亚的农民。1927年，苏联仍有90.5%的人口是农民。②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许多殷实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内战结束后，苏俄又出现了灾年。1921~1923年，在俄国传统的谷仓地区——中央黑土带地区（沃罗涅日、坦波夫、库尔斯克、利佩茨克、米丘林斯克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农民因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不满而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怀抱，投靠到地下教会中。不久，地下教会的影响从中央黑土带地区扩展到乌克兰、库班、顿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谷仓地区。地下教会的领导层是从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分裂出来的高级神职人员。1928年初，有26个主教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地下教会的核心人物。到30年代中期，加入地下教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增加到50个。③

20世纪30年代，在苏维埃政权消灭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建立无神论国家的过程中，地下教会也惨遭同样的厄运。对于俄罗斯东正教会规模减小的情况，可以通过下列数据得到证明。例如，1920~1933年间，莫斯科正式启用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从600个减少到100个。到1936年，在十月革命前所有的东正教教堂中，只有28.5%的教堂在全苏各地得到使用，其余的全部被毁或改作他用。④ 然而，由于地下教会处于秘密状态，该教会的教徒们不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堂中作祈祷，他们通常在自己的家里或秘密组织起来从事宗教活动。因而，很难对地下教会的规模进行统计。根据苏联史学家提供的情况，在从苏联各富裕的农村地区强行被迁往西伯利亚的农民东正教教徒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地下教会的成员。另外，那些被

---

① Свобод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икипедия，参见网页 http：//ru.wikipedia.org/wiki 中的“Катакомбная церковь”词条。

②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 315.

③ 参见东正教地下教会官方网站中的文章“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Истинно-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1927－2007 гг.”，http：//www.catacomb.org.ua。

④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 168.

当作富农消灭的富裕农民教徒中也有地下教会的教徒。地下教会的三位创始人无一例外地被布尔什维克处决。1929 年，约瑟夫都主教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到哈萨克斯坦。他在咸海岸边生活了几年，在一个蜂蜜加工厂做会计工作。1938 年 11 月 20 日，他与地下教会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基里尔·斯米尔诺夫同时被处决；费多尔高级主教于 1937 年 10 月 23 日在伊凡诺沃监狱被处决；安德烈高级主教于 1928 年被流放到中亚，后来又被单独幽禁三年，接着，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37 年被处决。①

不过，地下教会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这里的隐形东正教徒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30 年代末，苏联东正教徒中有 75% 的人属于以谢尔吉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他们也被称作谢尔吉派教徒（сергиевцы），有 15% 的人为革新派教徒，有 10% 的人为地下教会的教徒。② 30 年代，在国家关闭东正教修道院的过程中，西伯利亚密林深处却出现了一些秘密的修士团体，这些组织就是由地下教会创办的。在苏维埃时期出版的一部《反宗教宣传资料集》（列宁格勒，1938，第 5 页）中，有如下记载：“在斯摩棱斯克，一些修士和修女们企图建立自己的集体农庄。但是，这些所谓的农庄中却隐藏着修士们的团体。”在北高加索和列宁格勒，也有一定数量的类似团体。此外，地下教会的教徒还建立了一些秘密的神职中学。莫斯科就有一家这样的中学。1938 年，该中学被当局发现并被强行解散，该校领导人瓦尔福洛姆主教被处决。③

作为对苏维埃体制的反抗，地下教会的教徒拒绝持苏维埃身份证，也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到苏维埃学校上学，或者只让孩子在那里学习 3～5 年，保证能够认识经书就辍学了。直到 40 年代后期，一些地下教会的教徒才允许孩子上中学。另外，“地下教会教徒还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也不服兵役，不在官方的就业单位工作，只是按照合同做临时雇工。那些被称作沉默派（молчуны）的地下教会教徒甚至不同官方人士讲话，个别极端教徒还不使用公共交通和电力”。④ 这些具有启示录情绪的地下教会教徒在行为上同

① 参见东正教百科网页 Открыт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Древо》中的“Андрей Ухтомский”词条，网址：http：//drevo. pravbeseda. ru/index。

②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 173.

③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 175.

④ *Демьянов А. И.* Истоинн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Воронеж，1977，с. 40－41.

俄罗斯传统的民间东正教派——旧礼仪派中的皈一派教徒十分相近。

在苏维埃体制下，地下教会一直无法以合法的形式存在。无论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时期，还是30年代的“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地下教会首当其冲地成为苏维埃政权专制的对象。1961年，在赫鲁晓夫颁布同不劳而食者作斗争的法令后，地下教会的教徒又因拒绝官方的安排劳动而被流放和被逮捕入狱。1961～1962年，几乎有一半的地下教会积极分子被捕。在流放中，这些教徒因坚决拒绝官方安排的劳动而被送上法庭，最后被关入集中营。由于许多地下教会的教徒因拒绝劳动这一罪名而被无限期地关在集中营，该教会失去了大批有生力量。虽然活下来的地下教会教徒在70年代初获得了自由，但是教会的生命力已经不强了。1959～1969年间，地下教会的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在剩下来的地下教会教区中，有70%的教徒已年过半百。[①] 按照苏联侨民学者亚·切尔诺夫的统计，1972年，苏联共有正式注册的东正教徒520万人，地下教会的教徒100万人。[②] 按照苏联当局的统计数字，70年代初，苏联共有1000万东正教基督徒，其中52%的人属于正式注册的东正教区，48%的人属于没有正式注册的教区和团体，地下教会在后者中又占一小部分。[③]

70年代以后，官方东正教会与地下东正教会的教徒出现了相互交融的现象。一方面，地下教会的教徒年龄老化，神职人员严重不足，许多教区主要依靠中老年妇女来秘密主持仪式。地下教会的活力衰退致使部分教徒感到未来无望。于是，他们又重新回归到官方东正教会的怀抱中。另一方面，苏联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引起了官方教会教徒的思想波动。一些教徒认为，官方教会已经完全变成服务于苏维埃政权的工具。因此，对于教徒来说，它已经失去了神性。于是，他们便离开官方教会，加入了地下教会。80年代末，东正教在苏联急剧复兴，国家对各派宗教均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地下教会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90年代初，地下教会的高级主教已经全部过世。这时，又有一大批教徒并入俄罗斯东正教会中。1990年，由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侨民组建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也开始在苏联开设自己的教区。部分地下教会教徒因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政

---

① *Демьянов А. И.* Истоинн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с. 35.

② 参见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 с. 320。

③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 с. 324.

治见解相同而加入到这些新教区中。这样，地下教会教徒已经所剩无几。到苏联解体前夕，各类地下教会教徒总计只有数千人。[1]

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1918～1920年，苏俄发生了一场内战。俄国保皇派东正教会人士一直站在白军立场上，同红色苏维埃政权对峙。1920年，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等旧俄将军领导的白卫军彻底失败，红色政权在苏俄巩固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批保皇派东正教会人士跟随白卫军残余流亡到欧洲、中国、日本和北美等国家和地区。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东正教会共包括65个主教区，其中64个分布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只有1个主教区设在美国北部的阿拉斯加。内战后，伴随疆域的变化和向外移民潮的兴起，俄罗斯东正教会教徒开始遍布世界各地。1920年12月，一些流亡到欧洲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高级主教在世界东正教会的中心之一——君士坦丁堡开会。他们在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许可的情况下，成立了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Высшее русское церко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заграницей）。很快，苏俄境外各国和地区（芬兰、拉脱维亚、中国、日本和北美等）的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都加入了该管理局。会议还选举基辅和沃伦都主教安东尼·赫拉波维斯基任管理局的领导。[2]

1921年，应塞尔维亚东正教牧首邀请，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迁往南斯拉夫。同年12月4日，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在塞尔维亚召开了卡尔洛瓦茨会议（Карловацкий собор）。这是首次由俄罗斯东正教境外各教区主教、教士中和平信徒代表共同参加的全体会议。会议成立了以安东尼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Заграницей，简称РПЦЗ），号召全体侨民团结一致，努力恢复俄国的君主制度。由于会议在卡尔洛瓦茨举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成员通常被称作卡尔洛瓦茨派教徒（карловчане）。建立之初，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宣称自己是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个临时自我管理组织并希望未来与

---

[1] Свобод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икипедия，参见网页 http：//ru. wikipedia. org/wiki 中的"Катакомбная церковь"词条。

[2]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Православняа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России и СССР，стр. 361.

俄罗斯东正教会合并。然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成立引起了苏维埃政府的严重不满。1922 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按照苏维埃政府的要求宣布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为非法组织并颁令取缔东正教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自此，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苏维埃政府的冲突急剧升级。1927 年，俄罗斯东正教会都主教谢尔吉发表了"致教民咨文"（亦称"谢尔吉宣言"），"要求境外神职人员做出完全服从苏维埃政府的书面承诺"，"如果不承诺这一点或者违反这一点，境外神职人员将被开除出莫斯科牧首区"。[①] 这一要求遭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强烈抗议。1928 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发表声明表示："坚决不接受都主教谢尔吉和他的圣主教公会提出的忠于苏维埃政府的建议。该建议是违反教规的，对于教会是也有害的。"[②] 此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分道扬镳。

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莫斯科牧首区在政治见解上迥然各异。它崇尚君主制，谴责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1938 年 8 月，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称沙俄时期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俄国最理想的体制，倡议生活在苏联的俄罗斯东正教徒和俄罗斯侨民共同为恢复俄国的君主制而努力，还提议追认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为殉道者和圣人。30 年代，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俄侨中影响很大。在俄侨生活的地区，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建立了许多新教区、教堂、教会学校和修道院。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一些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的旧俄思想家和艺术家最终选择了流亡道路。1921 年，一艘载着诸如尼·别尔嘉耶夫和谢·布尔加科夫等思想巨人的船驶离俄罗斯，一批俄罗斯思想精英侨居国外。这批被称作"俄国 20 世纪第一代侨民"的思想家成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忠实保护者和传承人。在俄侨知识分子精英聚集的法国，东正教思想家们创办了著名的精神中心——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Свято-Сергиевск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俄国侨民宗教哲学家

---

① Послание пастырям и пастве（Декларация митрополита Сергия），29. 7. 1927// Известия，19. 08. 1927，c. 63.

② *Протоиерей Сергий ЩУКИН*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заграницей 1922 – 1972，见网页：http：//www. russianorthodoxchurch. ws/synod/history/his _ rocorshukin. html。

和神学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和卡尔塔绍夫等，都曾在这个学院任教或担任领导职务。该学院至今仍是俄罗斯联邦境外东正教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1936 年，卡尔洛瓦茨派领导人安东尼被提升为加拿大、美国、中国和日本东正教主教区高级主教。俄国内战期间，有30 万~50 万名[①]白俄投奔俄国驻中国的传教士团驻地寻求避难。这一时期，俄国传教士团所在地成为俄国流亡人士的避难所。1922 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决定在北京设立主教区，以英诺森为首的第十八届俄国传教士团成为俄罗斯国外东正教会的一个主教区管理机构，英诺森被任命为该主教区主教，后又被提升为都主教。1922 年年末，北京主教区设立了上海和天津两个代理处。在中国的东北，形成了直接归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管辖的哈尔滨主教区。[②]

当然，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内部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成立不久，其内部就出现了分裂，逐渐形成了北美派（北美东正教主教区）、西欧派（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和卡尔洛瓦茨派三个派别。

俄罗斯东正教北美教区起源于 1794 年。当时，俄国的新土地开发者发现了北美的阿拉斯加并向那里移民。随之，俄国东正教会瓦拉姆修道院（Валаам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的修士们便在阿拉斯加建立了教堂。1840 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在阿拉斯加教区的基础上，设立了堪察加、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主教区。1872 年，该主教区总部移至旧金山，教区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北美地区。1905 年，在后来任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的吉洪做北美主教区高级主教时，北美东正教主教区总部又由旧金山移往纽约。十月革命后，北美东正教主教区失去了来自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年度财政拨款，开始独立为生。此时，一大批来自乌克兰等地的白俄教徒来到属于北美主教区的加拿大避难。于是，北美东正教主教区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联系密切起来。1922 年，北美东正教主教区加入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行列中来。同年，在全美东正教会第三次会议上，普拉东·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当选为美国和加拿大主教区都主教。该选举同时得到了俄罗斯东正教

① *Ипатова А. С.* 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20 век. Сборник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Братства, 1997, с. 305.

② 乐峰:《俄国宗教史》(下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第 606 页。

会牧首吉洪的认可。然而，苏维埃政权对此坚决反对，原因是内战时期在当红军占领奥德萨时，曾经担任敖德萨都主教的普拉东曾经组织了“圣武士队”（Святая дружина）进行抵抗。1924 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在苏维埃政权的压力下，取消了对普拉东的任命并将其遣送回国受审。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行为激起了北美东正教徒的反感。于是，北美东正教主教区宣布“普拉东为美洲东正教自我管理教会的领导”，从而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管辖。[①] 同时，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还表示，要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分离出去。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认为，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的决定是受分立主义情绪支配而做出的，应当受到谴责。顶着上述压力，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于 1927 年正式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分离出去。二战前夕，出于对苏联国内政治的不满，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于 1935 年再次回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 1946 年。苏联卫国战争期间（1941 ~ 1945），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曾经同俄罗斯东正教会接近，该教会的一些神职人员还向苏军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随着冷战的开始，该教会因不满苏联的体制于 1947 年又与俄罗斯东正教会断绝关系。经过多年的努力，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于 1970 年彻底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世界上 15 个独立的东正教会之一——美国东正教会（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Америке）。1971 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也正式承认了美国东正教会的独立。考虑到教民主要以英语为母语，同意该教会用英语作祈祷和主持圣事。[②]

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由俄国东正教侨民于 1917 年末在西欧创立。1920 年 10 月 1 日，安东尼·赫拉波维斯基以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的名义任命邓尼金手下的东正教主教叶夫洛基·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任俄罗斯东正教西欧主教区高级主教。1921 年，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区）承认了这一任命。1922 年，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因在国外从事反苏维埃宣传而被俄罗斯东正教会取缔。由于叶夫洛基在思想上属于自

① *Протоиерей Сергий ЩУКИН*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заграницей 1922 – 1972，见网页：http：//www. russianorthodoxchurch. ws/synod/history/his _ rocorshukin. html。

② Свобод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икипедия，参见网页 http：//ru. wikipedia. org/wiki 中的“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词条。

由派，不赞成俄罗斯境外教会恢复君主制的想法，反而博得了苏维埃政权的好感。1922 年 1 月 30 日，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颁令任命叶夫洛基为西欧主教区都主教。同年 5 月，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吉洪颁令由叶夫洛基管理整个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事务，即让卡尔洛瓦茨派服从于叶夫洛基的领导。1922 年，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总部迁入巴黎。叶夫洛基周围吸引了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和温和保守主义思想的俄罗斯侨民。1925～1946 年间，他任巴黎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院长，吸收卡尔塔绍夫、布尔加科夫、弗洛罗夫斯基和津科夫斯基等侨民宗教思想家前来任教。很快，该学院成为俄罗斯侨民东正教思想文化的中心。同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的许多学者一样，叶夫洛基也支持基督教大学生运动。他的思想显然不能为以安东尼为首的保皇派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人士所接受。1926 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决定接管叶夫洛基领导的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也不承认莫斯科对叶夫洛基都主教的任命。这样，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卡尔洛瓦茨派同叶夫洛基派的矛盾加剧。正在此时，俄罗斯东正教会颁布了谢尔吉宣言。出于对卡尔洛瓦茨派的不满，叶夫洛基领导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投入莫斯科牧首区的怀抱。1930 年，由于为十月革命中死难的东正教徒祈祷，叶夫洛基被莫斯科牧首区撤职。但是，广大的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的教徒们仍然跟随着他。1930 年，他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承认，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在西欧的临时都主教（Временный Экзархат）。1945 年，应叶夫洛基的请求，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又重新并入莫斯科牧首区。1946 年，叶夫洛基去世。考虑到苏联的政治环境，他的继任者决定将该教区再度转归君士坦丁堡牧首区。1947 年，该教区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承认。从此，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与俄罗斯境内外教会宣告无缘。该高级主教区涉及法国、比利时、芬兰、德国、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教堂祈祷用教会斯拉夫语进行，教徒多为俄裔西欧人。[①]

卡尔洛瓦茨派是苏维埃体制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强硬反对派。不论是

---

① 参见东正教百科网页 Открыт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Древо》中的"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ая архиепископия русских церквей"词条，网址：http://drevo.pravbeseda.ru/index。

北美派，还是西欧派，在苏维埃时期，都有过与莫斯科牧首区合作或者服从其领导的经历。此外，1927 年，在谢尔吉宣言发表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管辖下的日本东正教区转归莫斯科牧首区。二战结束后，在隶属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中国教区中，也有一些神职人员和教徒回归祖国，服从莫斯科牧首区的领导。然而，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所有分支中，唯有卡尔洛瓦茨派在整个苏维埃时期始终与苏联国家政权势不两立。二战期间，卡尔洛瓦茨派甚至与希特勒勾结，希望将俄罗斯从苏维埃体制下“解救”出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红军解放了东欧各国。为了避开红色政权，卡尔洛瓦茨派于 1946 年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总部由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瓦茨迁至德国慕尼黑。为了扩大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东正教界的影响，1945 年 8 月，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塞一世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指示提出倡议，欢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回归祖国。但是，卡尔洛瓦茨派坚决不予理睬。40 年代末，欧洲有一大批俄罗斯东正教侨民移民美国。随之，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教区在美国不断增多。为了方便管理，1950 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总部迁往美国纽约州乔丹维列的圣三一修道院并保持至今。20 世纪 60～70 年代，苏联积极支持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运动。为此，俄罗斯东正教会再次呼吁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回归。但是，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不仅没有响应，反而遣责俄罗斯东正教会具有异端思想——教会合一（уния）倾向。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长期没有联系和交往。[1]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全方位改革的启动，苏联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回归传统的热潮。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正教在苏联迅速复兴。1988 年，为纪念罗斯受洗一千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举行了隆重宗教庆典活动。此外，还召开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地方公会。会上，一些高级神职人员呼吁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人士就恢复统一进行谈判。然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对此反应冷漠。不仅如此，在俄罗斯国内东正教复兴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还努力在俄罗斯境内发展自己的势力。1990 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俄罗斯开设了第一批教区。随之，一些对俄罗斯东正教会不满的俄境内神职人员带着自己教区的

①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 с. 370.

教徒离开东正教会，投入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怀抱。这一情况导致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关系一度紧张。[①]

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许多分支经过痛苦的摸索，都在世界15个独立的东正教会中找到了归宿，唯有卡尔洛瓦茨派在教区管辖上归属不明。它既不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教规管理下的一个宗教组织，也不是东正教世界正式承认的一个自主教会。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塞二世积极呼吁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就恢复统一事宜进行对话。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高级主教们提出了恢复统一的先决条件：俄罗斯东正教会必须"中止跟随1927年都主教谢尔吉宣言的做法"、必须"对同苏维埃政权的合作表示忏悔"、必须"承认专制制度是俄国唯一的管理体制"、必须"对尼古拉二世及全家封圣"，以及必须"放弃支持普世基督教合一运动"。[②] 社会制度的变化是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恢复统一的基础和根本前提。经过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内部主张回归祖国的人士的共同努力，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这两个苏维埃时期的"死对头"，终于在2007年5月17日重新走向了统一。

东正教民间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国家不偏袒任何一种宗教，提倡信仰自由。针对俄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宗教不平等现象，法令规定："凡因信奉或不信奉某一宗教而剥夺权利的规定，一律废除。"[③] 这样，在俄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各宗教信仰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

在对待民间宗教的态度上，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之初，曾把教会的反对派——各民间宗教都当作同盟军来争取。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考虑到俄国民间宗教从许多方面的表现来说是反对现状的民主主义思潮之一，要求全体党员注意做这些信徒的工作，以便把他

① *Чуев А.*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РПЦ – эпохальное событие для Церкви и общества // Русская линия, 14.12.2007，参见网页 http://www.rusk.ru/st.php。

② *Мчедлов М. П.* Религия народов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2002, с. 441.

③ 《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年1月23日人民委员会令）第3条，参见乐峰《东正教史》，第303页。

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1] 临时政府的《信仰自由法》也是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强烈要求下制定和颁布的。出于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长期不满，俄国最大的民间东正教——旧礼仪派支持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 年，迫于反对派的压力，沙皇政府做出暂时让步，颁布信仰宽容原则，宣布建立国家杜马，以强化国家的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旧礼仪派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参政权利得到保障。这样，20 世纪初，与危机四起的俄国专制制度境况不同，旧礼仪派不仅没有随之而奄奄一息，反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旧礼仪派认为，俄国不需要进行任何变革。因此，对二月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采取不赞成甚至敌视态度。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决定把无神论宣布为武器，对以有神论为基础的各种宗教实行专政。新政权与包括旧礼仪派在内的各宗教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便具有一定的对立色彩。国内战争期间，苏俄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全国的大、中、小工厂一律收归国有。掌握大企业命脉的部分旧礼仪派作为大资产阶级阶层被铲除；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属于殷实农民阶层的旧礼仪派教徒被当作富农消灭，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一些人举家被强制迁移到边远贫困地区；在 30 年代的“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旧礼仪派被当作“宗教残余”甚至邪教而遭批判。

旧礼仪派对苏维埃政权也同样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日起，旧礼仪派上层就将革命的领导者列宁称为“敌基督者（антихрист）”，将共产党人和人民委员称作“敌基督者的仆人”，将红五星称作“敌基督的标志物”。[2] 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旧礼仪派刊物《教会之声》和《西伯利亚的旧礼仪教徒》等，都是积极从事反苏维埃宣传的舆论阵地。莫斯科的旧礼仪派富有上层，尤其是卢布申斯基家族，为科尔尼洛夫和邓尼金白卫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许多旧礼仪派哥萨克还参加了邓尼金的“自愿军”。参加弗兰格尔军队的旧礼仪派教徒数量也相当可观。[3] 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曾经被沙皇流放至此的旧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苏联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 5 页。

② *Миловидов В. Ф.* Раскол и судьба старообрядцев// Вопросы религии и атеизма, 1980, №25, с. 111.

③ *Кандидов Б.* Церковь и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на юге, Москва: Безбожник, 1931, с. 255.

礼仪派富有阶层积极资助和参加推翻现政权的活动。在高尔察克的军队里，旧礼仪派还组成了"圣十字"军队。

内战结束后，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在无可改变的现实面前，1922 年，旧礼仪派领导人不得不做出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选择。那些不愿意与现政权妥协的旧礼仪派上层人士，如大企业家和银行家巴·彼·卢布申斯基等，便流亡国外。在社会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设时期，旧礼仪派一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苏联报刊及文献中不难找到关于旧礼仪派阻挠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和记载。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保卫祖国，斯大林对宗教的态度缓和起来。旧礼仪派也随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局面，教堂和教徒人数有所回升。[①]

不可否认，苏联领导人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长期存在着偏见。他们过于强调宗教是旧社会的残余和落后现象，突出无神论与宗教的对立性，对和平时期宗教在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社会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肯定不足。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教条化理解，苏联当权者认为，随着人剥削人现象的消失，宗教将逐渐衰亡。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苏联的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赫鲁晓夫掀起了苏联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浪潮。农业改革的初见成效和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使赫氏的领导地位稳定下来。这时，苏联领导人又开始向"旧社会的残余"——宗教开战。1957 年，国家加大无神论宣传力度。接着，国家下令大规模地关闭各派宗教的教堂。1958 年，位于摩尔多瓦的苏联最后一所旧礼仪派修道院被关闭。[②]

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不再运用强制手段，而是通过冷落宗教的软措施，使宗教在苏联走向灭亡。自 1917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旧礼仪派像苏联其他许多宗教派别一样，饱尝了受排挤的苦痛。旧礼仪派作为工商阶层、哥萨克阶层和殷实农民阶层全部被消灭，旧礼仪派的基础教育设施被毁掉，教会期刊停办，圣像作坊和慈善机构也被关闭，教堂圣物被没收及

---

① *Дзюбенко М.* Борьба с церковью: Трансляция опыта，参见"宗教与国家"网页 http://religion.russ.ru/state/20020520-dzubenko.html。

② *Коломейцев П.* Есть ли будущее у старообрядцев? 参见 Религия и реформы，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1993，стр. 428。

改作他用。[①]

1986年，在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Белокриницкая иерарзия）的20个主教区中，仅有5个还勉强维持宗教活动，管理这些主教区的是一名都主教和两名主教。在全国126个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教区中，仅有神甫54人，况且绝大多数已年高体弱。[②] 单凭这些神职人员显然无法满足全国一百多万旧礼仪派教徒的宗教需求，各教区的教徒代表长老（старцы）和执事主动与神甫配合，共同承担着宗教礼仪事务。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戈尔巴乔夫政治民主化改革程序的启动，苏联思想界异常活跃，东正教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复兴。1988年，苏联宗教界隆重举行罗斯受洗一千年庆典活动。旧礼仪派教徒也积极为弘扬俄国传统文化而做出自己的努力。在列宁格勒的普希金故居，旧礼仪派文化人士举办俄国文学名著《大司祭阿瓦库姆行传》研讨会；在莫斯科罗果日墓地（Рогожское кладбище）的圣母大教堂，人们举办了旧礼仪派宗教音乐演奏会；1989年，在波罗夫斯克，旧礼仪派人士举办了旧礼仪派文化和历史回顾展。同年，苏联时期从旧礼仪派罗果日墓地圣母升天钟楼上被强行摘除的大钟历经50年的沧桑又物归原主。1988年，在罗斯受洗一千年庆典之际，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都主教区（Белокриницкая Митрополия）从罗马尼亚的布拉伊尔城（Браила）迁往莫斯科。至此，苏联境内的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恢复了统一，它的正式称谓为俄国东正教旧礼仪派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церковь）。[③]

俄国古代东正教会（Русская древле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是俄国旧礼仪派的另一个较大分支。它成立于1923年，即由主张革新旧礼仪派的萨拉托夫主教尼科尔·波兹德涅夫领导，由不承认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教规的部分教堂派教徒组成。伟大的卫国战争后，该教会的神学和行政中心转移到新泽布科夫城。1990年，位于莫斯科扎采里（距巴维列茨火车站不远）的旧礼仪派圣尼古拉教堂归还给俄国古代东正教会。随后，该教会的

① *Коломейцев П.* Есть ли будущее у старообрядцев? 参见 Религия и реформы, стр. 487。

② *Коломейцев П.* Есть ли будущее у старообрядцев? 参见 Религия и реформы,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93, с. 523。

③ 参见“宗教与传媒”网站“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Церковь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правка)”词条，网址 http://www.religare.ru/news20359.htm。

行政和神学中心也迁移到此。到苏联解体前夕，该教会包括9个主教区，共管辖分布在俄国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60多个教区及位于罗马尼亚的5个教区，教区数量共约70个，是仅次于俄国东正教旧礼仪教会的第二大民间东正教派。[①]

在俄国的旧礼仪派中，唯一承认俄国东正教会并服从莫斯科及全俄牧首领导的宗教分支是教堂派中的皈一教会（единоверчество）。1971年，莫斯科牧首区召开东正教地方会议，取消300多年前尼康将旧礼仪派教徒全部革除东正教教籍的规定，宣布承认旧礼仪派教徒为东正教徒，允许旧礼仪派在东正教会的教堂里进行祈祷并保持尼康改革前的宗教习俗。然而，旧礼仪派各分支对这一规定反应不一。绝大多数旧礼仪派教徒对此不予理睬，他们认为自己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东正教信仰，教会管辖下的东正教已经背离了东正教的原始教义。只有较少部分旧礼仪派教徒对东正教会的规定持赞成态度，进而接受了俄国东正教会的管辖。不过，他们仍保持着旧礼仪派的组织形式与宗教习俗，这个旧礼仪派分支就是现在的俄国皈一教会。[②]

古代东正教北方沿海教会（поморщина）是旧礼仪派中规模较大的反教堂派（беспоповщина）组织，它包括许多独立的中央管理机构。古代东正教北方沿海教会俄国委员会包括分散在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摩尔多瓦的100多个教区。此外，立陶宛有一个该派管理机构叫做立陶宛旧礼仪派最高委员会，它负责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两国的北方沿海派事务。拉脱维亚也有一个同样的管理机构叫做古代东正教北方沿海教会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老北方沿海派费多谢耶夫分支（Федосеевский толк）是反教堂派的另一个主要分支，它的中心是莫斯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区（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приход）。该宗教分支没有联系各教区的统一组织。1990年，随着苏联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的颁布，旧礼仪派的各个分支均获得了合法活动的机会。到苏联解体前夕，全国共有旧礼仪派教徒300万人，其中有200多万人生活

---

① Свобод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икипедия，参见网页 http://ru.wikipedia.org/wiki 中的"Русская Древле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词条。

② Свобод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икипедия，参见网页 http://ru.wikipedia.org/wiki 中的"Единоверчество"词条。

在俄罗斯联邦。[1] 从拥有教徒的数量上看，旧礼仪派是苏联最大的民间东正教派。

结　论

俄罗斯东正教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坎坷经历发人深思。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够对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做出如下总结。

（1）俄国政教关系的弊端是东正教会经受磨难的一个主要根源。拜占庭留给东正教世界的一个重要遗产是政教关系紧密交织。俄罗斯从拜占庭继承了这份遗产，并且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将其发扬光大。旧俄时期，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之间根本利益一致，双方相互维护，紧密配合，东正教会成为国家的一种政治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家政权被推翻，东正教会就将不可避免地惨遭同样的厄运。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维埃时期的命运变迁便是一个例证。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专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推行了一种与旧俄时期完全不同的政策——政教分离政策。由于俄罗斯东正教与沙皇专制制度密不可分，在苏维埃政权同旧体制作斗争的过程中，矛头必然指向东正教会。因此，苏维埃时期的政教分离并不是真正的双方互不干涉，而是政权对教会的专政。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受的劫难主要与其政治色彩过浓有关。此外，长期的政教交织模式使俄罗斯东正教会养成了依赖国家政权的习惯。这样，在每一次社会动荡之后，东正教会就要调整自己，以便适应新政权并证实自己的忠实与顺从。由于苏维埃政权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政治见解上存在重大分歧，甚至相抵牾，在适应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会经常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寻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俄罗斯东正教会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调整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上，其社会道德功能几乎丧失殆尽。因而，教会人士在民众中失去了威信，东正教对民众的道德伦理影响微乎其微。

（2）东正教精神文化的发展走入低谷。苏维埃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

① 见俄罗斯宗教网站：http：//www.express.irk.ru/1000/religion/chr/east/prav/star/index.htm。

不断加强无神论宣传，对东正教神学和哲学等所谓的"唯心主义"文化嗤之以鼻。国家允许东正教会出版的书刊数量有限，内容也不得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因此，在俄罗斯东正教所属的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校中，宗教读物内容简单，关于东正教哲学和神学思想的作品几乎不见。在苏联国内，重视东正教伦理道德观、价值观和神学思想的是俄罗斯传统的民间东正教派——旧礼仪派和苏维埃政治环境下产生的东正教地下教会。然而，这些东正教组织在苏维埃时期均一直处于半地下状态，它们的活动受到限制，它们的读物严格为政府和官方教会所监督。这些作品在民间只能秘密流传，影响很小。在苏维埃体制下，无论是东正教的官方教会，还是各类民间和地下东正教组织，都在为保留自己的生存权而努力，无暇顾及东正教精神文化的发展。因此，整个20世纪，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和哲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到今天，俄罗斯国内的东正教神学也无法同俄罗斯侨民东正教神学相提并论。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主体部分是卡尔洛瓦茨派。然而，该宗教派别"过于关心政治和民族主义，而不注重神学辩论"。[①] 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最注重的是同苏维埃政权和东正教官方教会作斗争，竭力宣传俄国专制制度的永恒性，根本不关心东正教文化遗产的弘扬与发展。在对东正教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俄侨思想家中，没有一个人属于卡尔洛瓦茨派。可见，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史上一个低潮和暗淡的阶段。

(3) 东正教在无神论时期并没有消亡。俄罗斯的20世纪是一个颇具动态性和充满矛盾性的历史阶段，世纪初建立起来的苏维埃体制到世纪末骤然瓦解。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也不例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仍普遍认为，随着苏联无神论宣传的深得人心，东正教作为一种旧思想的残余，在苏联国民心目中已不复存在。然而，此后短短几年时间，东正教却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在俄罗斯骤然复兴。到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联邦已有近一半的公民宣称自己是东正教徒。如何来解释这一悖论现象呢？根本原因在于，东正教在苏维埃时期事实上并没有消亡。

首先，俄罗斯东正教各派教徒在苏维埃政权下顽强地生存下来。对于多数东正教徒来说，俄罗斯东正教在苏维埃时期的发展史几乎是一部血泪

---

①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 с. 238.

史。不论是官方东正教、民间和地下东正教，还是俄罗斯境外东正教，都屡遭苏维埃政权的限制、排挤、镇压，甚至迫害。然而，在艰难的环境下，俄罗斯东正教各派教徒却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作为官方教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通过调整自己、迎合和顺从苏维埃政权等方式来为自己争取存在空间；地下教会和民间东正教采取躲避政府的方式秘密发展；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则利用公开对峙和斗争等手段与苏维埃政权展开势力范围争夺。苏联官方公布的东正教徒数字通常只指俄罗斯官方教会怀抱中的教徒数量。实际上，苏联境内外一直生活着一大批不为官方承认的“隐形”东正教徒。

其次，苏维埃时期国家对待东正教的态度也不是一味地打压。例如，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亲自接见东正教最高领导层，国家试图利用东正教来调动国民的爱国热情；冷战时期，苏联为扩大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影响而鼓励官方教会的发展；等等。国家每一次给予的短暂宽松环境都客观上为东正教的发展带来了动力。相应地，东正教的规模也有所扩大。所以，整个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态势可谓起伏跌宕。既有因受排挤而萎缩的状态，也有因政策放松而相对繁荣的局面。

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中心全部在苏联境外。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西欧派（叶夫洛基派）是俄罗斯20世纪东正教文化的主要载体。20世纪20年代由俄罗斯东正教侨民在法国创办的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是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和哲学思想家活动的中心。这里的思想家们（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和弗兰克等）以其卓越的神学成就奠定了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的巴黎学派。40年代末，一批生活在欧洲的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家，如弗洛罗夫斯基、洛斯基和梅延多夫等，移民美国。在那里，他们创办了以圣弗拉基米尔东正教神学院（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семинар）为中心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美国学派。苏联末期，在东正教复兴的过程中，这些思想家的作品纷纷在俄罗斯再版。对于饱受精神饥渴的苏联国民来说，这些思想宏著无疑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全方位改革的启动，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时间，官方东正教会可以公开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民间东正教和地下东正教由“隐形”急剧转为“显形”，境外

东正教会也开始在苏联境内建立自己的教区，传播自己的神学思想。这些现象综合在一起，构成了苏联末期前所未有的东正教复兴局面。总之，没有苏联时期东正教各派教徒的存在，就不会有当代俄罗斯东正教的真正复兴。



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马龙闪

苏联的解体和瓦解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才是一个国家巩固和强大的最重要因素？是以 GDP 为标志的经济实力呢，还是以核武器为标记的军事实力？这两样东西，苏联在当时世界上都是不算差劲儿的，非但不差，还是可以与美利坚一比高低的。可是，为什么竟哗啦啦如大厦倾，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呢？有人着眼于政治，着眼于党，这也是不错的；但决定一个国家巩固和强大诸因素中，比政治，比党更深层次的因素，还存在不存在？历史表明，这种更深层次的因素是存在的。那么，这种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目前，人们都在谈论文化软实力，都在思考怎样实现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和崛起。在具有一定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前提下，在决定一个国家巩固和强大诸因素中，文化软实力应该是属于更深层次的因素，因为政治的清明，一个党的强大，也是决定于与之相关的文化软实力因素的。

那么，怎样才能培植、塑造文化的软实力呢？世界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通过文化上的创新，才会有文化的强盛，才会有文化软实力的巨大影响。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文化的创新呢？文化的创新，不外包括理论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科技的创新，而集中一点，就是人文精神的创新。

再回到苏联国家解体的问题上来。那么，苏联解体的最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按照上述逻辑推断，这个最终原因，就是比党、比政治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软实力问题。因此可以认为，缺乏文化软实力，缺乏文化创新，就是苏联国家解体和瓦解的最深层的原因。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苏共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党。意识形态渗透在苏联国家机构体制和党的机体的每一个毛孔中，所以，意识形态在苏联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每一步骤中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当其意识形态反映并适应现实需要，能促进文化创新时，它就能极大地推动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反之，它就束缚和扼杀文化的创新，成为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阻力。因此，我们在研究苏联发展壮大、兴衰消亡的过程中，就必须把影响文化创新的苏联意识形态及其演变的历史、文化政策及其沿革的历史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来加以考察。

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苏共执政早期曾是一个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党，因而朝气蓬勃、兴旺发达，以其先锋队的资格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但因忽视自身改造，逐渐失去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而变为一种僵化教条、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思变革、阻挠改革的势力，最后终于落后于时代而为人民所抛弃，走上了衰亡的道路。苏联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苏联文化政策的沿革和意识形态的演变对其兴衰命运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研究苏联兴亡的根源，应对此加以重点的考察。

苏联文化政策的沿革，可以分为十月革命初期至20年代末期的文化政策，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即斯大林个人权力时期的文化政策，以及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几个主要阶段。现在，让我们对各个阶段的情况加以考察。

十月革命初期到20年代苏联的文化政策

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刚掌握政权不久，以列宁为代表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在党内还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这个党还拥有无可置疑的思

想文化的活力。这首先是因为，这个时期，党的思想理论以真正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符合并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列宁善于运用生动的辩证法，能随时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制定灵活的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因此，列宁及其后继者布哈林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能极为敏锐地认识世界并有效地改造世界，是很富有战斗力的。

列宁理论的活力，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十月革命前夕，列宁给党制定的最近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给人民以“土地、自由和面包”。在这一正确的理论和纲领基础上，党迅速发展壮大，并一举夺取政权。1917 年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只有 2.3 万人，经过半年多一点，十月革命时就发展到 23 万 ~24 万人。1917 年 4 ~5 月间，在其他政党看来，布尔什维克党要夺取政权，简直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是，仅仅过了半年时间，这个党以其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方针政策，极大地动员并吸引他们站到了自己一边，因而竟真的取得了政权。

列宁理论的这种活力，在取得政权后的一个时期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国内战争中不得已而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本来是犯了许多错误，严重侵害了人民利益的。但列宁没有贻误时机，适时发现并较快作了纠正。内战刚一结束，列宁就不失时机地迅速过渡到了“新经济政策”，并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①] 布哈林这时还提出，在苏维埃国家结束战争、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阶级斗争是逐渐趋向缓和的。[②] 这些思想理论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这个时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对待文化遗产和知识分子政策上重视克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左”的思潮和倾向。列宁强调“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③] 他对资本主义达到的全部文化成就，包括其经济管理经验，给予高度评价，主张加以吸取和应用。列宁主张团结、争取、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同他对待过去文化遗产的态度相联系的。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的载体，要取得过去的文化，就必须使用现有的知识分子。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 367 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第 343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1955 ~1959，第 50 页。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现代教育，也不可能造就自己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除了“资本主义昨天留给我们的材料”——旧知识分子和专家外，没有别的材料可供立即用来建设社会主义。①

列宁认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他们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推进了科学文化事业，会给资产阶级服务，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给无产阶级服务。② 关键在于，要对他们采取耐心谨慎的、讲究分寸的态度，主要以说服教育的方法，“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像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③ 在这里，列宁显然把知识分子同剥削者，同资产阶级相区分，将他们看作“文化工作者”；在谈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重新教育”时，也是同对“无产者自己”的“改造”、“教育”同样看待的。但列宁的思想也有不太连贯甚至有时是前后矛盾之处。④ 当他看到知识分子同苏维埃政权不太合作甚至进行对抗时，又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不过，总体上列宁是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的，包括在激烈阶级对抗时期对沙俄时代军事专家的使用。他也在生活待遇上关心知识分子，建立专门机构，负责妥善安置他们，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然而，俄国社会上存在着较强的反智主义，即轻薄知识分子的情绪，这是从民粹主义和其他极左思潮中表现出来的，也是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一种表现；同时，也与俄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而小生产者思想狭隘，容易把他们所受地主、资本家的沉重压迫也归罪、迁怒于为剥削者服务的知识分子这一情况有关。这种情绪也严重影响到无产阶级，波及布尔什维克党内。“军事反对派”反对使用军事专家，人所共知；“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也鼓吹排挤、打击知识分子，他们是极左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积极支持者。这样，党内外的极左思潮就干扰了列宁的知识分子政策。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9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786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6页。

④ 刘吉：《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学术界》2001年第6期，第12页。

但列宁对社会上和党内的极左思潮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总的来说，列宁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我们所讲的这个时期得到了执行和贯彻。

除上面谈到的以外，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时期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策上也较符合客观实际，比较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较能满足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布哈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阶级，在旧社会不可能享有文化。这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落后状况。因此，布哈林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怀抱里，无产阶级首先是“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通过自己的斗争，虽夺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无可争议的领导权，但这是指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权，在艺术、科学领域，却不能说无产阶级已成熟到了可以掌握领导权的地步。①

所以，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文化领域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反对极“左”倾向的斗争。先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接着是在20年代中后期反对“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思潮。因为这些派别不遗余力地鼓吹“无产阶级文化”，主张抛弃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化人，迫不及待地要求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列宁在批判左倾文化派别时说：“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字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② 又说，如果不提高和改善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③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4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6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7页。

并对它们加以吸收和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①] 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发展观就是，没有过去时代的文化，没有资产阶级的文化，不对它们加以全部了解，就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特别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文化极端低下的时候，首要的是学习读书写字，掌握一般文化知识，包括资产阶级文化，否则，是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的。所以，列宁对当时一心要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了尖锐的、持续不断的批判和斗争。列宁告诫青年说，你们不能从批判旧学校偏重书本知识，“就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主张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积极文化成果，他对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是持比较包容和宽容态度的。

列宁的这一方针政策，充分体现在由列宁奠基、布哈林主持制定的俄共（布）中央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中。这个决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上，都是一个少有的绝好的文件。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方面，它实质上规定了俄共（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总路线和总方针，构成了当时俄共（布）思想文化体制的理论框架，奠定了苏联20年代思想文化模式的基础。

这个决议首先对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趋向缓和的总趋势作了正确的阐述，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得政权以前煽起阶级斗争，实行把整个社会推翻的路线”，“而在自己专政时期则把和平组织工作提到第一位”。[③] 这就是布哈林所说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④] 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是“和睦共处，慢慢地改造他们”；同资产阶级是“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慢慢地排挤他们”；对知识分子则使他们“为革命服务，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⑤]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6页。
③ 张秋华、彭克巽等编《“拉普”资料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318页。
④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43页。
⑤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8页。

接着，“决议”对文学艺术的阶级性问题作了切合实际的辩证的阐述。“决议”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虽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但是“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①] 这实质上是反对当时在文化艺术阶级性问题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简单化倾向——动辄给某一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贴阶级标签。

“决议”的重点，也是占篇幅最多的，是对党在科学文化特别是文学方面的领导权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作了正确的规定。

关于党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权问题，“决议”作了审慎而明确的回答。它区分了党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权与党在政治、经济方面领导权的不同特点和不同情况。“决议”指出，科学文化的领导权“是比无产阶级正在解决的其他任务更复杂得不知道多少”：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能锻炼自己去进行胜利的革命，能给自己造就战士和领导者这样的人才，并且能给自己造成政治斗争的卓绝的思想武器，但是它当时不可能钻研自然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而且它既是文化上被压迫的阶级，同样也不可能创造自己的文学、自己的特别艺术形式、自己的风格。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了衡量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它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却还没有同样确定的回答”。[②] 这就是说，党在政治领域比在文化艺术领域更加成熟；党在政治方面已取得了确定无疑的领导权，而在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虽有取得领导权的“历史权利”——也就是说，在这里获得领导权，“夺取阵地”，“早晚应当成为事实”——但目前还得谨慎从事，目前还没有成熟到取得这种领导权的足够的程度。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文化艺术方面下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1）关于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问题。“决议”指出，在注意他们分化的同时，应充分估计他们“许多人作为文学技术的熟练‘专家’的重要性”，“应当是周到地和细心地对待他们”；在同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

①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7页。
②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7页。

思想作斗争时，“应当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①] 这是十分讲究分寸地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政策。

（2）对待无产阶级作家的态度。“决议”认为，文化艺术方面的领导权“整个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党应帮助无产阶级作家赢得“领导权的历史权利”，但他们“现在还没有”这种领导权。党应努力帮助他们成长，“支持他们和他们的组织”，“同时也应当用一切手段防止他们中间出现摆共产党员架子这种最有害的现象”，同“那些对旧文化遗产和文学专家的轻率和蔑视的态度作斗争”。[②]

（3）主张各文艺集团和流派展开“自由竞赛”。在坚持原则思想斗争的同时，党不仅允许各种艺术派别、团体和流派的存在，“还要对于一切可能而且一定会同无产阶级一起前进的文学集团表示最大周到、慎重和忍耐”，“党决不能偏袒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派别而使自己受到束缚”，“主张这方面的各种集团和流派自由竞赛”。[③]

（4）鉴于对文化艺术领导权问题的审慎细密，党在“决议”中特别提出，反对在文艺中进行“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的企图”。为此，提出要注意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选，以保证在这里实行“真正正确的、有益的和灵活的领导”。[④]

这个“决议”是以布哈林为首的主管俄共（布）思想文化的主要领导人，以列宁思想为指针，总结十月革命后苏俄文化运动，特别是苏联1922～1925年文学政策大辩论中同极“左”文化思潮作斗争的历史经验，通过较为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发挥集体智慧制定出来的。“决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决议曾在1951年1月28日由中国《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发表，但遗憾的是，这个决议的精神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从这个决议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党20年代文化上的方针政策是极为谨慎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决议”能够满足当时文化发展的需要，

①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9页。
②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9～320页。
③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20～321页。
④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21页。

其思想内容所体现的文化上的包容性、宽容性和文化艺术的多样性，是符合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的。“决议”提出的指导方针，不仅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也适应于整个文化科学领域。这样，就为20年代文化科学领域的创造性提供了条件，造成了苏联20年代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客观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在20年代的文化政策上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局限：一是，当时党内外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极左文化思潮，一些人对“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过分张扬，且把“无产阶级阶级文化”理解得过分狭隘，曾发生过否定文化遗产、排挤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专家和知识分子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文化政策；二是，由于当时阶级斗争的环境，党对“异己的”和“敌对的”意识形态标准掌握得过分苛刻，以致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了不该打击的科学文化界的大批重量级人物；[①] 三是，党内中下层干部和党员的文化水平过分低下，有数字显示，20年代初，俄共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不到1%，近63%的党员仅受过初小教育，26%的人仅自修了一些文化。这使贯彻布尔什维克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文化政策大大打了折扣。

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

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一场“大转变”。在这场转变中，联共（布）领导人抛弃了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放弃了20年代正在形成中的、体现在这个决议中的已具雏形的思想文化模式。

苏联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转变”，是随着政治经济领域的“大转变”而发生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转变”的过程中发生了思想文化体制模式的转型，由20年代的思想文化体制转变到了斯大林思想文化体制的轨道。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思想文化体制模式是在意识形态“大转变”的过程中开始逐渐形成的。

---

① 1922年苏联曾把160位著名的专家、教授、新闻记者和文化人驱逐出国。日后其中不少人在国外都成了国际上的著名学者和科技专家。

苏联的意识形态“大转变”，是由1928～1929年的反“右倾”斗争进行酝酿，由斯大林1929年12月27日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以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批判作动员，通过政治经济学领域对鲁宾的批判，哲学领域对德波林的批判，史学领域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文艺界对“拉普”的批判等，相继完成的。在这一“大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形成了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理论支柱，以大批判、大斗争、大清洗为主要手段的思想文化模式，使思想理论一步步趋向简单化、教条化和凝固化；另一方面，也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次连续不断的清洗和镇压，以雷霆万钧之力威吓、震慑、压服了思想文化界。斯大林的或者说联共（布）的思想文化模式，就是在这个意识形态“大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在30年代形成、确立以后，表现出了以下最明显的特征。

（1）确立了斯大林理论的独尊地位，树立了对斯大林个人及其理论的崇拜。实际上联共（布）奉行的准则是，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以其理论公式为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

（2）确立了以超高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工业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重中之重是发展军事工业，整个经济发展则以集中计划、产品交换为特征。这也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概念的主要内涵。

（3）确立了随着社会主义愈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加尖锐化的理论，而党内斗争则是这一阶级斗争特点的反映。

（4）提出了社会主义超阶段的理论——完成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即是社会主义的建成。

（5）形成了关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消灭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残余，必须抛弃资产阶级文化。

（6）以文化艺术的单一性取代其多样性，以钦定风格流派的垄断地位代替各风格流派的自由竞争。其集中表现是，在“大转变”过程中解散了几乎所有以前的文化艺术派别和团体，90%以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

（7）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是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残余，包

括一切中间的思想形态；以大批判、大斗争和整肃的手段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社会主义”的环境中培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垄断的方法，通过以政治和哲学粗暴干预文化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式，控制意识形态。这样就造成了思想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也导致了教条主义根深蒂固的长期统治。

这一模式中的思想理论特点，是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托季联盟和布哈林等一系列反对派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解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他自己片面、褊狭的解释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通过编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灌输进了联共（布）党的历史和全部实践活动中，以他个人的思想取代了列宁和党的集体的思想，并通过大力宣传《简明教程》，将其体现的思想理论神圣化、模式化、教条化，从而确立了这些思想理论的统治地位。

由于这一思想文化模式是经过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历次大批判、大斗争建立起来的，同时，又通过一整套威慑机制确立、巩固了下来，加上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数十年如一日地宣传灌输，人们已经对它习以为常，这样，就使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在人们思想中扎根很深，具有相当的牢固性。

联共（布）在这一思想文化模式中的文化政策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文化被限定在极为狭窄的范围内，把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反对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反对并抛弃过去时代和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甚至弄到连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也要抛弃的地步：在苏联战后对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的批判中，广泛传播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即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动”。

这时，还用庸俗社会学的“阶级性”解释一切：30～40年代，马尔的语言学曾大行其道，宣扬语言的“阶级性”。30年代中期，苏联以李森科为代表的伪科学学派开始抬头。当李森科在一次大会上大批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叫喊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科学”时，斯大林带头为他鼓掌。所以，发展到战后初期，非但不能容许摩尔根生物遗传学的存在，还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控制论，甚至当时发展起来的有机化学，统统称为“资产阶级科学”而加以围剿。斯大林思想理论的僵化，助长了苏联

伪科学学派的声势，压制了科学学派的成长，这就使苏联的科学缺乏创新，在斯大林时期同世界科学水平拉大了差距。尽管由于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的需要，使斯大林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如建立"监狱研究所"等）促进了与重工业以及核武器、火箭导弹和航空航天等军事工业有关的科技的发展，却贻误了农业和其他民用领域科学技术的平衡发展。

30 年代最重要的制度性变化是，思想文化走向更加封闭、更加集权。其突出表现是，书报检查制度更加严厉、更加把权力高度集中到党内来。如果说 20 年代在建立书报检查制度之初，主要是把检查的矛头指向社会，即资产阶级敌对势力，那么，到了 30 年代，则进一步把检查目标对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一经把这些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党内，问题就发生了变化（再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毕竟针对的是敌人，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尽管也有一个适度、适当的问题，但一经把矛头转向党内，性质就完全发生了变化）。严厉监控党内同志，把同志当成"敌人"，这就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也严重破坏、禁锢了党内的民主生活。

随着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敌对势力的检查，转向对党内反对派和所谓"异己势力"的检查，书报检查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由原先主要由政府行政系统实施监督检查职能的体制，转向了由党的机关直接实施监督检查的高度集中于党内的书报检查体制。1929 年 1 月 18 日，中央组织局在其《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的决议中，事实上取消了原先归出版总局实施的审批职权，转变为所有主要杂志只有得到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批准，才能出版；而"所有其他杂志"的出版，在出版总局履行批准程序时，还应"同中央宣传鼓动和报刊部进行协商"。[①]

不仅如此。在中央政治局 1930 年《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中，又再次削弱了出版总局的职权："解除出版总局中央机构从政治思想和军事、经济观点方面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查的所有业务"，作为代替执行这一任务的机制，设立了由党的机关向出版总局派遣"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确认特派员建制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责成确保具有出版总局特派员必要人员名额的前提下，务必在

① *Жирк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1, с. 290.

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而且，在文件中公开表明，要用党的工作人员取代职业检察官，其中是这样说的：“在地方报纸中，可以将特派员委任为报纸兼职编辑。”[①]

在这次书报检查体制变化的过程中，出版总局的机构大大缩小，而直接受党的机关监督、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样，党的书报检查机关就逐渐取代国家机关而直接行使书报检查职能。出版总局表面上虽然一直存在，还挂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后来的教育部名下，但实际上经过这次改组，它已被完全纳入了党的书报检查体系，包括它活动的一切方面，从领导人到列入官职名录工作人员的任命，都被置于党的机关的监督之下。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苏联党所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多层面的、高度集中的书报检查制度。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说法，这种检查制度要经过 5 个层级的 5 种过滤机制：第一个层级是自我检查，即由作者根据历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肃运动形成的意识形态标准，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实行自我的内省检查；第二个层级是在编辑文稿过程中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第三个层级是由编辑部或出版社送上级专门检查机关，即出版总局进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第四个层级是经由国家机关的惩治性检查，具体实施机关是政治保安局系统的政治监督司，后来则是克格勃的第五局；第五个层级是，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②]

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对书报文献检查的标准。联共（布）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甚至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③] 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加上将“敌对”的标准由社会转向党内，就可以衍生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和“反对派”以扩大化打击，这必然会把对书报文献的监控，变成对社会、对党内的书报信息封

---

① *Жирк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с. 290.

② *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 – 1953. С. -Петербург：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0，с. 14 – 22.

③ ЦГАЛИ СПб（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ф. 31，оп. 2，д. 8，л. 9。

锁，甚至转变为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成为密不透风的文化专制主义。

再加上从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之后，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到30年代，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①]——当这一切都成被严密监控的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内容的时候，那么，可想而知，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个何等狭窄的范围。

不要忘记，在苏联的体制中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是采取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通过。按前述对书报信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仅以出版总局的机构为例，它的人员编制就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检查官就达525人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查官就有将近5000人。[②]

从监控、查禁的情况看，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③] 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禁了12588条信息，还查出了23512处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歪曲”。[④]

不仅严查现行出版物，还对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1936年1月10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的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查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

随着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这以人文类图书为尤甚。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09页。

② *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с. 33.

③ *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с. 125.

④ *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с. 38.

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遇了全面销毁。据一个负责人员 30 年代向中央报告："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 10%，价值折合 25 万美元。"仅 1938 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 869 种、报纸 5451 种，法文杂志 640 种、报纸 33620 种，德文杂志 7620 种、报纸 3450 种，其他文种杂志达 5000 种以上，报纸近 5000 种。[1]

30～40 年代对科学文化发展损害最大的，是斯大林对科技专家、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镇压。这种镇压始于 1928 年的"沙赫特案件"，接着斯大林于 1929 年 4 月在中央全会上声明，"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2] 从此，就在工农业所有部门中展开了大抓"暗害者"的运动。稍后，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又展开了对"人民敌人"、"异己分子"的斗争。30 年代，这些运动不断进行，直至 1936～1938 年"大清洗"期间达到最高潮。战后初期（1946～1952）还在继续进行。

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政策，来自他对各类专家、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根本上说，源自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斯大林在 1939 年党的十八大《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把旧知识分子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先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因而"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而后来其中"漏网的大多数"，又去做了"暗害分子和间谍"，这就是说，他们知识技能最多，也最反动；"另一部分"，是"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他们"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政治上是很动摇的；第三部分是"知识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则"已经向人民靠拢，拥护苏维埃政权"。[3] 这显然是一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曾宣扬过这种理论，人们批判该理论时说，它是中国某某人鼓吹的，其实，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就说过了。在中国传播的这种"理论"，其源头无疑是来自斯大林。如果再追一下根子的话，"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是扎根于俄

① *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с. 127.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 122 页。

③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 257～258 页。

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马哈伊斯基主义。马哈伊斯基把知识分子同剥削阶级完全等同起来。[①] 他认为，剥削阶级能得以实现剥削，是对生产资料的大量占有；而知识分子则是通过对知识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实现剥削的。剥削阶级中的地主或资本家拥有的生产资料越多，他们越同工人农民为敌，越反动。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知识越多越反动"。斯大林从马哈伊斯基主义中推演出来的这一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最有名望、最有知识的专家、教授和文化人。所以，这部分人受打击最大，被逮捕关押的最多，以至在战争即将来临之时和二战期间，不得不在监狱中把这些专家、教授集中起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和"监狱设计中心"，勒令他们在关押中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这些可敬的科学技术专家们，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为了拯救社会主义祖国，忍辱负重，以"在押犯"之身，为军事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工作在这种监狱的环境下，其创造性被压抑、被摧残的情况是不难想象的。然而，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到底也成了斯大林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用斯大林上述的方法和途径发展科学技术，用前面讲到的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铸造文化，不言而喻，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样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充其量只是一些照葫芦画瓢的仿制品。以斯大林的理论是非衡量一切，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学术界的任务只是对斯大林的言论和党的决议、政策进行解释，没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试想，全国如果只能有一个或几个人的脑袋进行思考，其他人要是独立思考，就有被批判、关押，甚至掉脑袋的危险，这还能有什么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可言！

斯大林的文化政策在战后发展到了顶点，其后果暴露得十分明显。经过战争时期极端紧张、严酷而凝重的岁月，战争结束以后和平宁静时光的到来，使人们极端紧绷的心境大大放松了下来。与这种心情想适应，需要的文化食粮和文艺作品希望是轻松的、欢快的，能给人以美感享受和愉悦的东西，不再是承载着厚重思想或充满厮杀血污的东西。能够提供这种精

① 参见黄一兵《马哈伊斯基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之缘起》，《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52~56页。

神食粮的最好不过的人物，是列宁格勒的幽默讽刺作家左琴科和老资格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所以，在临近战争后期，这两位艺术家就活跃了起来。文艺刊物非常喜欢发表他们的作品；在莫斯科还专门为阿赫玛托娃举办了专场诗歌朗诵晚会。列宁格勒的文艺刊物对这两位本地作家更是喜欢有加，发表他们的作品尤多。当然，社会上的这种情绪以及人们对战后新生活的向往，在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期盼和要求。

但是，斯大林容忍不了人们的这种情绪，更容忍不了社会改革的要求。他习惯的是永远拧紧社会的螺丝钉。因此，斯大林一面对这种社会情绪，就视为一种严重危险，于是，便心起疑虑，要发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

1946 年 8 月 9 日，斯大林召见列宁格勒文艺界人士，点名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一系列作家。接着，从这年 8 月中旬到 1948 年 2 月，由联共（布）中央分别在文学、戏剧、电影和音乐四个方面一连发表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1946 年 8 月 14 日）、《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1946 年 8 月 26 日）、《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1946 年 9 月 4 日）和《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1948 年 2 月 10 日）等四个决议，对文艺创作和演出中的所谓“不问政治”、“无思想性”、上演“洋”“古”剧目、追求“形式主义”等，进行了严厉批判。同时，由主管意识形态的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亲自出马，解释中央决议，进一步上纲加码，对文艺界的许多作家和作品展开了声色俱厉的斗争。

文艺界的批判首先开始于 1946 年 8 月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发难。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人们喜欢的讽刺幽默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由于上述两杂志为他们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自然它们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左琴科被“决议”谩骂为文学上的“无赖和渣滓”，指斥他“专门写作空洞的、无内容的庸俗的东西”，“专门鼓吹腐败的无思想性、低级趣味和不问政治的习气”。他的作品《猴子奇遇记》被无端地说成是“以丑恶的漫画形式描绘苏维埃制度和苏联人”。[①] 阿赫玛托娃则被日丹诺夫痛骂为“一去不复返的”“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称她为“并不

①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第 33 页。

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①]“决议”将她论定为“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②]她的诗作被视为表现“为艺术而艺术”的、“不问政治的”作品。发表他们作品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则被指责为“自由主义”，丧失了“责任感”，发表的作品渗透着“对现代西欧资产阶级文化俯首崇拜的精神”。[③]与此相联系，“决议”还同时点名批判了一系列作家和作品。对于同两杂志有关的责任者，包括上自联共（布）中央宣传部、苏联作协理事会及其主席吉洪诺夫，下至列宁格勒市委和两杂志负责人，一一进行了点名批评，最后采取行政措施，勒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星》编辑部改组。尔后又假手苏联作协主席团决议，开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作协会籍，剥夺他们发表作品的权利，接着又开除了左琴科的公职，迫使他为谋生而就职于一个皮鞋生产合作社。

关于戏剧的决议矛头所向，主要是指责“过分热衷于上演历史题材”和“外国资产阶级剧作家”的剧本。[④]“决议”在批评戏剧演出状况时，竟一口气点名或不点地批判了十几个剧作家及其剧作。

在关于歌舞和音乐的决议中，措辞更加严厉，对整个音乐界，包括上自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工作委员会、作曲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下至一系列音乐家，特别是所谓“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⑤]，无不进行批判，并且指出，在音乐界“俄国现实主义音乐的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音乐的拥护者，在批评家中间占着领导的地位”。[⑥]决议把所谓“形式主义倾向”径直定性为“反民主的”、“反人民的倾向”，因而向“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的倾向的作曲家”进行讨伐，痛斥他们的音乐“强烈地发散着当代欧美现代派资产阶级音乐的气息”。[⑦]同时还特别谴责了现代派和革新派的所谓“形式主义”音乐和“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这包括了后来被公认为“苏联一代音乐典范”的杰出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内的一大批作曲家。

---

①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45页。
②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34～35页。
③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34页。
④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34页。
⑤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123页。
⑥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122页。
⑦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120页。

有关电影的决议提出了粉饰生活的一系列“公式化”标准，对一批著名导演和电影艺术家以及电影部直属艺术委员会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决定禁映《灿烂的生活》第二集。

除上述决议外，这个时期还发表了一些由斯大林授意发表的文艺评论，如1947年《文化与生活》刊登的《我们剧院舞台上的〈青年近卫军〉》、1948年年底《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戏剧批评家集团》等。通过这些授意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化、公式化的要求，更进一步将文艺引上了淡化冲突、粉饰生活的道路。

在开启文艺批判的同时，在哲学、生物遗传学、语言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也展开了一系列批判。

在哲学领域，是经斯大林提议，在1947年6月由日丹诺夫主持召开《西欧哲学史》全苏讨论会，对当时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主管意识形态的当事人亚历山德罗夫的《西欧哲学史》的批判，指斥其错误在于“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缺乏党性，仿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同他们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学派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而阐述德国古典哲学的客观意义是不允许的；在此广泛传播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即认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动”。这一观点引起的倾向不仅低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而且也低估了过去时代的许多哲学体系。这场争论暴露了苏联哲学界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某些简单化态度。

在生物遗传学领域的批判，矛头所向是针对苏联的摩尔根遗传学派，支持李森科的伪科学学派。

1946年1月李森科发表《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一文，公然否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对此文宣扬的观点强烈不满，他们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里·日丹诺夫[1]的支持下，在一些刊物和大学讲堂上展开了对李森科的批判。此外，还召开内部专门会议清算李森科的思想观点。李森科对此十分恼火，立即上告斯大林。于是，领袖亲自干预，布置召开了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

斯大林亲自圈阅审定了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所作的《论生物学现状》

---

① 尤里·日丹诺夫即联共（布）中央书记安·阿·日丹诺夫的儿子。

的报告，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他在会上更加有恃无恐地向摩尔根学派发动猛攻。不仅如此，会后他还对这一学派采取了四大行政措施：①给摩尔根遗传学派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将该派学者公然称之为“人民敌人”；②禁止各学校讲授摩尔根遗传学；③封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④解除摩尔根学派学者担任的一切行政职务。这样，在斯大林亲自支持下，便形成了李森科伪科学学派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由它称霸苏联生物学界的局面。

1950年进行的语言学批判，是把30年代被肯定的马尔语言学派从“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推上审判台，斯大林以发表了《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文章，作为对马尔语言学批判的总结。但斯大林没等争论充分展开就匆忙作了结论。这非但没有推进真理和发展真理，反而限制和损害了真理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以召开全国经济学讨论会的形式展开的。讨论会前期，会上呈现出了少见的活跃气氛。不少学者就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问题、价值规律在苏联起作用的性质和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问题以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问题等，打破教条主义框框和僵化思维，发表了创见。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好像为经济学注入了一线生机，并且有可能对苏联经济提出多方案的分析。

但奇迹并没有出现。斯大林对讨论会的结论《关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涉及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此后三个文件汇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变成了为苏联政治经济学确音定调的圣喻和经典。

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范围内的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而没有对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正因为这样，他拒绝了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作用范围的高度评价，拒绝了他们主张积极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革新要求。

差不多在这前后，法学界和史学界也进行了一系列批判。一些法学家被指责在有关法律和国家以及立法的问题上发表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对国家作用坚持“唯意志论”；史学家则被斥责“没有根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表现出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民族主义和庸俗经济唯物主义”等。这些批判和斗争一直持续到1952～1953年。

战后这一连串的批判运动，都是由斯大林亲自发动的，但也带有浓厚的日丹诺夫主义色彩。所谓日丹诺夫主义，主要是指苏联战后所实行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认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主张对其全盘加以否定，因此带有强烈的反西方主义色彩。同时，粗暴对待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其他文艺家，对他们进行凶狠的批判和制裁；对文艺实行比战前更全面、更严格的行政控制，完全抛弃了俄共（布）1925 年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决议；在科学文化中提出反对“世界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奉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政策。此外，还用僵化的理论教条，拿事先设定的框框，吹毛求疵地苛责于精神文化产品，这不仅扼杀了一批有价值的作品，也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战后批判运动针对的目标，是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俯首崇拜”，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实质上是全盘否定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实行文化上的封闭主义、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一政策虽然同战后紧张的国际局势不无关系，但“冷战”并不是在战后马上出现的。历史表明，在苏联拉响意识形态警报器之前，还未出现“冷战”的局面，苏联国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实际上在战争后期已显露端倪，因此这些斗争主要是国内形势的需要。固然它们同斯大林一贯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政策密不可分，但日丹诺夫这时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指挥官，这些斗争无疑也带有他个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色彩。

战后意识形态斗争的规模并不亚于 30 年代，其残酷性虽不能与“大清洗”时期大规模逮捕、镇压的情况相比拟，但其批判的范围和逮捕的人数并不算少。正是这个缘故，“人们往往拿 1948 年与 1937 年相比较”，认为一前一后“两个群众性的恐怖浪潮，由于席卷全社会而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沉重的回忆”。[①] 所不同的是，战后时期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一方面显示其鼎盛，显示其控制之森严，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僵化达到了极点：缺乏活力，不能接受新的科学认识，甚至为伪科学张目，扼杀新兴科学的发展。这预示着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和衰落。

当然应该看到，30 年代的工业化对文化教育的发展是有很大积极意义

① *Зубкова Ю.* Общество и рефррма 1945 - 1964гг., М.: Россгэн, 1993, с. 69.

的。它适应了人们急切改变国家贫困面貌的要求和愿望，在某种程度上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大大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因此，这个时期完成了扫盲，普及了小学教育，中等和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在战时，文化政策有所松动，战后为急迫的科研需要，在政治教育上放松了对科学家的要求，让他们集中时间和精力钻研业务，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这都有利于调动科学文化界的积极性，在不小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对发展科学文化的需要。

“解冻”与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政策

这个时期，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在思想文化领域平反冤假错案，调动了文化知识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在思想理论方面批判个人崇拜，破除了斯大林不少僵化的理论公式，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

（3）冲击了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改变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方式和活动方式，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4）批判了庸俗社会学，修改并放宽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解放了科学文化和艺术的生产力。

这些措施，使苏共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方针政策，较好地适应了人民群众要求发展科学文化的迫切需要。

在赫鲁晓夫时期，文化方针政策的一大显著特征，是思想文化的“解冻”。“解冻”是对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的一大冲击，它打破了斯大林思想理论的束缚，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这些发展和进步，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抛弃了斯大林时期的高压、惩治政策，实行了一系列同科学界和艺术界知识分子沟通对话的步骤，以便相互了解，达到说服教育的目的。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的这一政策和工作方式表现得十分明显，引起的变化是很大的。在过去，斯大林深居简出，同知识分子沟通对话是很少的，相反，30～50年代初，对文化界发起的批判运动却一个接连一个，镇

压声势一浪高过一浪。赫鲁晓夫采取的昭雪平反措施，标志着过去高压惩治政策的结束。除此之外，在重要关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不断同广大知识界代表举行见面会，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在赫鲁晓夫执政 10 年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同个别作家和文化人小范围的会见以外，仅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大型会见，在 1957～1959 年、1962～1963 年间，就举行了 8 次之多。在这些会见中，一方面听取了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意见，同时也由最高领导人出面发表了重要的政策性讲话。其中，赫鲁晓夫在 1962～1963 年的会见中尽管同文艺工作者发生过戏剧性的冲突和争吵，但是作家、文艺家敢于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直面争论，发表不同意见，且没有因此而发生严重迫害事件，这就表明了政策的进步。事实证明，这种沟通对话、说服方式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使知识界了解了党和领导人的政策意图，纠正了某些不健康倾向。尽管赫鲁晓夫的某些粗暴和简单化作风妨害了这种沟通对话所应达到的客观效果。

第二，纠正了斯大林时期文化政策上的错误，采取了某些宽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艺术家和学者进行创作和理论探索。赫鲁晓夫在文化方针政策上的这些改善，是同纠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相联系的。在“解冻”时期，除给无辜遭镇压的大批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文化人平反昭雪外，苏共中央于 1958 年 5 月 28 日通过《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决议，对联共（布）中央 1948 年有关上述歌剧的决议作了修正。虽然对错误的纠正还不够彻底，但确认了把肖斯塔科维奇等一批有才华的作曲家“称为反人民的形式主义流派的代表”是“不分皂白”，指出斯大林评价艺术作品的“主观主义态度”，说明《真理报》1951 年根据斯大林指示撰写的有关批判歌剧《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编辑部文章，是“错误的、片面的”。[①] 此外，还正式或非正式地在不同程度上给 30 年代遭到批判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和“德波林学派”恢复了名誉，也逐渐纠正了对 20 年代一些文艺流派和团体的错误评价。

通过纠正历史上的有关错误，自然放宽了现实的政策。以前遭到禁止

① *Чупринин С. И.* （*сост.*） Оттепель: 1957 – 1959: Страницы рус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Моск. рабочий, 1990, с. 402.

的题目被允许重新探讨，过去被作为“禁区”的题材又成为作家描写的对象。文艺中的“写真实”和“积极干预生活”成了主要口号；过去被视为畏途的讽刺幽默和抒情体裁又回到了文坛。作家和学者的精神解放，促进了他们的创作和学术探讨。

第三，修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定义，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做的规定，在有关文艺社会功能的理解上有失偏颇，片面地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而对文艺的认识作用、美感作用和娱乐性有所忽视，加上以后年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进一步僵化的教条主义解释，使文艺中“粉饰现实”和“无冲突论”得到发展，这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给苏联文艺带来了消极影响。1954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作协章程，对原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了修改：保留原定义的前半部分，把后半部分删去，即把整个定义规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需要艺术家从现实的发展中真实地描写现实”。

这一修改在拓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同时，也允许其他创造方法和风格流派的存在，这有利于文化艺术多样性的发展。这就使这一时期的文化比较而言，有了一定的包容性、宽容性和多样性。而随着对外科学文化交流的加强，科学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开放性，在不少方面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这便有利于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所以，赫鲁晓夫时期在科学文化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赫鲁晓夫毕竟是在斯大林思想的熏陶下，为斯大林体制模式塑造出来的。他虽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动者之一，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是很不彻底的。他反对的与其说是斯大林主义，不如说是斯大林个人。其表现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根源的分析，过多地着眼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方面，而从社会历史根源和体制方面则着眼很少。这就没有彻底打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教条主义，没有把个人崇拜同苏联体制联系起来，因此在文化领域还保留着许多过去的传统理论、传统体制和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仍像以前一样，把社会主义文化同过去时代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没有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文化同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

系问题。大家知道，日丹诺夫在30～40年代提出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对苏联文化的发展曾发生有害的影响，而对这一僵化的背离实际的理论，苏共领导一直没有加以触动。正是这个缘故，联共（布）中央1946年的意识形态决议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更有甚者，直到赫鲁晓夫时期还把科学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人为地将它们隔离开来。至于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共同的人类文明成果，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在实践中就难以起步了。

其二，把文化和意识形态混为一谈，提出反对在意识形态上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实际上导致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排斥。我们知道，一定的文化虽然总是同一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但文化是一个比意识形态广泛得多的概念，绝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二者简单化地混淆在一起。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和苏联理论界仍然没有能够走出这一传统的理论误区。在存在国际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将资本主义文化一概混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将其文化中的人类文明成果也排斥在外。

其三，基本上保留了过去高度集中的强制命令的思想文化体制。这种体制在赫鲁晓夫时期的一系列文化决策机制中，在苏共领导对许许多多文化、科学和艺术问题的解决办法上，都一一表现了出来。从赫鲁晓夫的言行中可以看出，这种体制在苏共领导人头脑中是没有动摇的。著名电影导演M. 罗姆在回忆中对此有过很好的描述。赫鲁晓夫1962年12月在接见艺术家的一次讲话中，曾谈及苏共领导应怎样解决文艺争论的问题。他说：这正像上校和将军发生争论一样，上校“很有说服力地讲述了一切，讲得很有说服力”，“将军听啊听着，也仿佛没有什么反驳的话要说。他听烦了上校的话，站起来发话了：‘喂，就是这么回事，你是上校，我是将军。向后转，齐步走！’上校必须向后转，开步走——去执行命令！就是这么回事。你们都是上校，而我呢，很对不起，是位将军。向后转，齐步走！请”。[①] 请注意，这段话不是赫鲁晓夫在其他非官方场合随便讲的，而是在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数百名文艺界知名人士作总结发言时，讲到党和国家应怎样领导文化艺术问题时，郑重其事说到的。这很能说明

① *Ромм М.* Четыре встречи с Хрущевым// Огонек. 1988, №28, с. 8.

苏共领导当时在文化艺术和其他各方面所采取的领导方法，也很形象地表述了他们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赖以运转的管理体制是行政命令式的。

其四，仍然存在着某些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体制的残余。在赫鲁晓夫时期，特别是在1958年以后，许多重大的文化艺术问题都是由赫鲁晓夫个人决定的，领导集体对他并没有多大的束缚力。比如，决定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特瓦多尔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在生物遗传学中继续压制"摩尔根—孟德尔学派"而支持李森科，以及其他许多决定，都是由赫鲁晓夫个人说了算数的。这种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体制的遗留从赫鲁晓夫的言论中也可找到很有力的注脚。他在参观马涅日画展时，在反驳雕塑艺术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尼关于他"不懂艺术"一事时说道：对于艺术，"我当矿工那会儿，我是不懂。当我是党的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按步升迁的每一级上，我都不懂。而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现在我肯定能够理解事物了，不是吗？"[①] 这与其说是个人崇拜的遗留，毋宁说是种特有的权力崇拜：权力越大，知识越多。同时，在赫鲁晓夫的头脑中还保留着这样的权力逻辑：人民的权力=党的权力，党的权力=我们（系指苏共党中央主席团）的权力，我们的权力=我（指赫鲁晓夫个人，即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权力。[②] 因此，在苏联应当由人民或党的领导集体做出决定的一切，在赫鲁晓夫看来，"我"个人（苏共最高领导）都有权做出决定。就实质看，这基本上没有越出斯大林个人权力体制的理论逻辑。

其五，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对知识分子的传统的不信任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对待"创作知识分子"，即从事文艺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到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人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不信任尽管已明显有别于斯大林时期，但这种传统的不信任情绪仍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排斥，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恐惧。由于知识分子是从事文化工作的，特别是"创作知识分子"又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干系最大，因此，对西方和传统文化的排斥，对异己意识形态的恐惧，便迁延到了知识分子身上。二是来自苏共领导人的经验实用

① 罗·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肖庆平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第287页。

② 参见 *Ромм М.* Четыре встречи с Хрущевым// Огонек. 1988, №28, с. 8。

主义和直感主义。赫鲁晓夫等人文化修养不高，在他们看来，“创作知识分子”总是在搞“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提出的问题“较为困难和不易捉摸”，他们不像科技知识分子那样，是在“为社会的利益而创造实物”，容易捉摸和把握，因而他对创作知识分子有着更多的怀疑和不信任，生怕他们同党争夺意识形态。[①] 而即使对待科技知识分子，凡为苏共领导人的水平所能理解的即给予支持，否则也加以排斥、打击。这从对待李森科派和摩尔根—孟德尔学派的态度就表现了出来。前一派学者的理论较为简单直观，也较易理解，且符合增加粮食的直接需要；后者高深，难以了解，不易看到潜在的、长远的巨大效益。正是这个缘故，赫鲁晓夫曾说道：“我们需要粮食，他们（指摩尔根—孟德尔学派）却在繁殖苍蝇。”[②] 于是，他宁可听信“种粮食”的李森科的谎言，却不愿意采纳“繁殖苍蝇”的科学学派的伟大真理。

由上可见，赫鲁晓夫在很多地方没能冲出斯大林思维模式和体制的束缚。他像斯大林一样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视为“金科玉律”。他也像斯大林一样奉行“权力越大，知识越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斯大林 30～40 年代在各个学术领域对各种具体的学术问题下指示、做结论，不仅在人文社会科学问题上是这样，甚至对草田轮作制、生物遗传学等问题也是这样，这就闹出了许多笑话，引起了严重后果。赫鲁晓夫也有类似的情况。从赫鲁晓夫的文化素质和成长背景看，他只可能从实际工作中感觉并发现斯大林的问题，从客观上对斯大林体制模式作某些冲击，他不可能改变这种体制模式及其僵化的状况。

这样一来，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通过批判个人崇拜，虽然消除了斯大林思想的许多僵化成分，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活力，以新的思想鼓舞了人民群众；虽然用新的文化政策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又重新焕发了人们创造的积极性，但由于赫鲁晓夫及其领导集团的思想局限性，又不可能彻底打破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这就限制了苏共在思想文化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

①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 127～128 页。

② 阿·阿朱别依：《赫鲁晓夫的悲剧》，陈明至译，民族出版社，1989，第 162 页。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文化政策的演变

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10月上台以后，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暂时让柯西金继续推行改革，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领域和文化政策方面开始停滞倒退，又回头维护斯大林那一套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僵化理论。

勃列日涅夫在思想文化方面停滞倒退，主要是在许多方面又回归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首先是中断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停止在思想文化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大家知道，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平反过程中往往是走两步停三步，时断时续，进行得缓慢而不彻底。不仅对含冤受害的个人没能一一平反，就连党史上一些重大政治案件（如布哈林案件等）和错误决议也没有加以纠正。当然，这与客观形势和人们的认识是有关系的，人们在那时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则完全中断了这个过程。非但对遗留案件不再平反，反而发生了对已纠正案件的倒算。由于恢复斯大林的理论，重新肯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某些理论公式，又在一定范围内给日丹诺夫和日丹诺夫主义恢复了名誉。更严重的是，在有些领域和有的问题上，又制造了新的冤案。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思想理论上的停滞倒退，还表现在对斯大林理论模式的回归，主要是大力推行"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对30年代斯大林提出的"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演绎。根据斯大林的提法，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基本接受了这一超阶段的理论，只不过在50年代末又加入了一个在苏联已取得社会主义"完全彻底胜利"的阶段，提出在60年代初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勃列日涅夫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但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这一纲领性的理论问题上，却又基本继承了赫鲁晓夫，仅把上述论纲稍事校订，改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而其基本内容同以前相比，除了强调了社

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外，并无实质性改变。

苏共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根据其意识形态总管家苏斯洛夫的解释，要以现实生活中“全面而协调发展”的“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为前提。而其经济条件是，要“具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能达到“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稳定而高速度的发展”；其社会政治条件是，具有“成熟的社会关系”。按照苏共文件，这种社会关系就是在苏联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这个共同体既是各阶级和社会集团已经接近的社会共同体，又是所有民族已经接近并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的民族际共同体。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文化条件，则是“国民教育的广泛发展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普及和树立”。[①]

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对70年代苏联社会的这种概述和描绘来看，它远远脱离了苏联社会当时的现实状况。它以一种理论纲领的形态，掩盖着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病、危机和痼疾，延误了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其实，它更像一首有关苏联国家社会的优美动听的催眠曲，催人飘飘欲仙，昏昏欲睡，把远未达到的未来的理想当作虚幻的现实，用来安抚人心，规避现实。

事实上，苏联现实社会在70年代远不是像“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那样高度发达，美妙和谐。列宁早就讲过，社会主义应当达到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而事实上，苏联的劳动生产率从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末，年平均速度大约下降了50%，即由7.2%下降到3.1%，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53%～5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0%～25%。[②] 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落后，苏联70年代在科学技术方面则进一步拉大了同美国的差距。“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苏联社会关系的中心是“社会统一性”的形成。而实际情况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在“稳定”的表象下，矛盾重重，危机丛生。一些社会集团的签名抗议运动，各种流派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少数民族的“返回家园”运动，抗议民族融合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各种不同利益阶层的对立和冲突也时有发生。苏共领导集团用“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掩盖矛盾，实际上是一

① 《苏斯洛夫言论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939页。
② 刘克明、金辉：《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626页。

种不敢正视现实的“鸵鸟政策”和“鸵鸟理论”。

“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满足现状，因循守旧，阻碍改革，导致停滞不前的理论。它编织了一个“发达”、“完美”的社会主义的花环，靠着这个花环的装点，造成了一派富裕、满足、安定、和谐的社会景象，这里显然已不再需要变革。勃列日涅夫时期中断改革，求稳怕变，社会停滞衰退，问题成堆，濒临危机边缘，同长期奉行这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理论是直接相关的。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文化政策上的倒退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文化政策上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实现各民族文化“接近”、“统一”的口号下，实行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政策。我们知道，民族主要是以风俗习惯、语言和文化为特征相区分的人类社会群体。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是随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的，也会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消亡。它们与各民族的历史同在，源远流长，是民族分野的主要标记。由于民族不可能在可以预见的一个较短历史时期内消亡，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也不可能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很快消失。苏共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出发，提出苏联随着异族通婚的增加，语言文化交流的扩大，产生了“人类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同时也认为，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丰富和相互繁荣，也产生了文化的共同体。这实际上是一种打着“发达社会主义文化”招牌的“民族文化融合论”。这是违背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这种“民族文化融合论”不断发展，到1972年为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通过苏共中央决议和最高领导人讲话广为宣传，形成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

勃列日涅夫1972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涉及文化问题时声称，“一种就其精神和主要内容而言是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已在我国形成”，它正为“没有民族界限”的“新文化”“奠定基础”。[①] 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在1972年围绕苏联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和此后的一个相当时期，有关民族文化的“统一性”，“苏联多民族文学的历史共同体”，成了苏联各意识形态机构和学术文化团体举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8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104页。

行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学术文化界有关主张“民族独特性”和文化中“民族成分”的任何言论，都成了苏联报刊大力批判的对象。

乌克兰文学评论家伊·久巴在《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中反对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广俄语，认为这是加速俄罗斯化，剥夺其他民族的合法权利。作者为这本书多次遭到批判，并于 1972 年被开除出乌克兰作协，同年 4 月又被苏联当局逮捕。类似这类学者反对语言同化而遭批判、裁处的事件，曾屡屡发生。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苏联各个时期虽一直程度不同地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推行文化上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融合政策最为突出，因此而发生的抗议事件和镇压事件也最为频繁。这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文化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

第二，在文化领域不断强化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一方面以对文化教育、文化宣传部门的监督和控制一步步僵化为特点；另一方面也突出表明，继续把社会主义文化同资本主义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不断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两个世界体系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要求“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动进攻”。[①] 同时还强调，在国际上要“同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进行斗争”。[②] 这表明，苏共非常强调对国外展开意识形态斗争。这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这一认识为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奉行的一种“冷战”政策。[③] 这个时期，苏联党和国家在文化上同西方斗争的主要目标，是“揭露资产阶级‘群众文化’和颓废派的反动本质”。[④] 实际上揭露、批判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除文化艺术之外，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许多领域。这一文化政策基本上仍是继承了过去的传统思想，把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完全等同起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

① 《苏共中央 1968 年四月全会决议》，转引自 Правда, 11 апр. 1968г.。

② Правда, 7 марта 1971г..

③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7 集，第 18 页。

④ ЦК КПСС о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Сб. докум., М.: Росспэн, 1987, с. 63.

苏共这个时期面向国内的文化政策，是不断加强僵硬的控制。1965 年 9 月，《真理报》主编 A. 鲁米扬采夫发表《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一文，提出应进一步处理好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强调要反对对艺术创作的"粗暴的行政命令"和"繁琐的监督"，主张要"让各种学派、风格、体裁存在，让它们进行竞争"。[①] 从本质上说，这篇文章的精神是同 1925 年俄共（布）中央关于党的文学政策决议相符的，但该文一发表，作者就立即被解除《真理报》主编职务。这表明，他的文化政策主张是为苏共领导所不容的。此后，苏共的文化政策更一步步走向僵化。到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这种趋势更加明显。1972 年 1 月 21 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指责各报刊对评论工作"要求不严"，对揭露资产阶级文化和"颓废派""不够积极彻底"，要求"调配干部"，以"加强编辑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和编辑部"。[②] 这一决议的确正像《真理报》专论所说，成了苏联文化界"长期的行动纲领"，在以后"很多年里决定着我国文艺批评思想的发展"。[③] 以后连续数年每逢该决议发表周年纪念日，苏联作协总召开会议检查决议执行情况，号召"进一步加强斗争"和"进一步加强管理"。

1972 ~ 1982 年间，苏共中央在关于电影、新闻、群众政治教育、宣传干部培养、文艺创作等数十个决议中，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强化了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和控制。但由于恪守过去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理论和方针，充其量配以"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作料，所以许多工作除靠行政强制手段加以暂时抑制之外，都往往流于形式而收效甚微。

第三，文化工作方式发生倒退，除没有采取 30 ~ 40 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镇压外，行政制裁和特定镇压措施不断加强，一些文化工作方法和手段又退回到了 1953 年以前的传统做法。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个时期距斯大林时期并不遥远，这个时期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多还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机制和传统都还保留了下来。只是经过赫鲁晓夫时期对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的揭露，这时的领导人已不愿、也不

① Правда, 9 сент. 1965г..

② ЦК КПСС о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Сб. докум., с. 62.

③ Правда, 26 янв. 1972г..

敢再承担这种镇压的责任。不仅政治领导人不愿这样做，就连安全部门的领导人也害怕再把自己同贝利亚或叶若夫钉在同一根耻辱柱上。但是面对思想文化界的活跃和一些人的“不轨”行为，仅用党内追究、开除党籍、剥夺公职，又不足以威慑所有人。这样，就需要采取介乎行政处分和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之间的某些中间手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手段得到了某些发展，比如，社会隔离，精神治疗，驱逐出国，剥夺国籍，等等。这些镇压措施比逮捕、审判要精致讲究，也更有效一些，波及更广的范围，扩大了打击面。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待官方认为的“不轨行为”和持不同政见者，除对少数人加以逮捕、关押之外，大多采取了上述手段。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初，苏联思想文化界一些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因发表与当局立场相左的文章，出版为官方不容的著作，举办与官方某人趣味不同的画展，或因主张民族文化独特性、反对强制推广俄语和俄罗斯化等而遭受批判、警告、查禁、行政处分和上述刑事治罪的，人数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数量。

此外，由于斯大林时代造成的与外界的隔绝状态，加上思想理论僵化带来对西方科技发展认识上的滞后以及体制上的障碍，苏共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拖延并扼杀了苏联的科学技术革命。本来苏联学术界认识科技革命重要性的时机并不算晚，早从60年代初苏联学术界就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后来甚至不断催促领导抓科技革命，苏共领导虽在70年代初提出了科技革命问题，但召开专门讨论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却被推延以至停开了，这就在苏联时期最终扼杀了科技革命。

勃列日涅夫时期思想理论的僵化，也扼杀了一切创新和倡导改革的理论。在远离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曾产生过一个主张改革的新商品学派，但却遭到了批判。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沃洛布耶夫院士为首的新历史学派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这位院士的所长职务被撤销。像这种有创新和改革思想的人物和学派，遭受批判、压制和打击的事件，在各部门各学科都曾屡屡发生。

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复旧，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又几乎达到个人崇拜时期的支配地位。这使苏共失去文化上的先进性，给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苏共自身的建设，从而也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由于苏联长期是一个意识形态极为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其整个社会政治生活

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向决定着它的治国方略和大政方针，而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又把苏联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引向简单化、教条化和僵硬凝固的道路，这样，它就长期束缚了苏联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从而把苏联社会推向了危机的边沿。

公开性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

事物的发展总是物极必反。在苏联文化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可以说是对以前时期，特别是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种逆反效应的结果，或者说是物极必反的结果。

斯大林时期形成并确立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在赫鲁晓夫时期受到了一定冲击，但未能被有效突破；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被部分恢复并被基本接受了下来。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基本和斯大林时期一样，是一种封闭、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教条主义色彩极端浓重。这种情况，在当时苏联除了极端顽固的保守分子以外，社会大多数人都是能够感受和认识到的。1985 年 4 月契尔年科逝世后的这种情况，同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后的情况比较相仿，因此，要求改革成了全党上下和全社会几乎完全一致的共识。正是这个缘故，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在当时引起了全党和全体人民几近一致的热烈响应和欢迎。

这种对于苏联社会严重停滞的深切认识，这种对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热切期望，早在 1977 年进行新宪法讨论时，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时在讨论新宪法期间，对“发达社会主义”新宪法的批评意见，像雪崩一样爆发了出来，总计向报刊和宪法委员会送达了将近 40 万条意见。[①] 劳动人民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问题，提出了大量尖锐的批评意见，从这里已经确定无疑地透露出了全社会对于改革的要求和愿望。但是，当时的国家领导和宪法委员会，对人民的意见却置若罔闻，不予理睬。时间这样又贻误了 8 年；到 1985 年契尔年科逝世时，社会各界对苏共领导僵化教

① *Злоказов Г. 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77г.：“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 мысл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1990，№10，с. 18.

条、停滞保守、无所作为等，所积累的不满和怨愤会有多深，可以想见。这一点也和斯大林逝世后的社会情绪有可类似之处。所以，正像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说，社会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们国内，教条主义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①

正是针对苏联过去封闭、僵化、教条主义和社会生活不民主的状况，戈尔巴乔夫在提出经济改革的同时，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第一次提出了“公开性”问题。他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公开性”概念的主要内容，应该说是对过去封闭性意识形态的一种革新。因此可以说，它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思想文化的总路线、总方针和总政策。

正像改革是历史的需要和必然一样，“公开性”作为打破改革壁障，为改革开辟道路的思想武器，提出这一方针是十分必要的。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掌握“公开性”的分寸和维度，怎样把握“公开性”开启的速度和进程。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主观上对苏联改革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如果说赫鲁晓夫当年对“解冻”过猛可能面临“洪水滔天”或遭灭顶之灾有足够认识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可能带来的危险则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他对“公开性”把握失度，开闸过猛，造成媒体失控，结果，“洪水淹了龙王庙”。

固然客观形势的发展也对“公开性”起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爆炸事故。戈尔巴乔夫在谈到“公开性”时曾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主张广泛发展公开性，但这是为了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而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初期，由于仍按以前的传统做法，掩盖了爆炸的规模和严重后果，引起了西方受放射性尘埃污染国家的严重抗议，因而促使苏联媒体开放报道幅度，这样就大大地推进了“公开性”的发展。

戈尔巴乔夫采取“公开性”的最先步骤，是于1985年夏天撤换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但这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党的整个庞大意识形

① 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第15、3页。

态机器还在按原先的制度运转。为打破事事封闭、保密的戒律，总书记把答美法记者问的谈话，马上公诸于《真理报》的报端；这种新的作风、新的做派，也有力影响了其他领导人。接着，开始鼓励报刊、电视和广播，揭露社会生活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对社会上下也是一大冲击波。

在揭露问题方面充当“公开性”带头羊的，是《星火》、《莫斯科新闻》和《论据与事实》等报刊。不久，就打破了报道和批评的“禁区”，对过去不经特殊批准就不能发表的资料和信息，开始公诸于众。在“公开性”这一不断深入和扩展的过程中，各地河湖沼泽严重污染的生态问题，也开始展现在全社会面前；有些问题还不时将矛头指向各级政府。

围绕发表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公映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所引发的事件，大大推动了被查禁作品的开放。由于这部小说和电影作品的发表受到部门和地方当局的阻挠，问题闹到了中央，由最高领导戈尔巴乔夫亲自批准予以发表，这样，就一下子解禁了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流亡者和镇压死难者过去被禁的作品，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查禁的和30~40年代镇压时期封存的作品。由于这些作品吸引了广大读者，大型文学刊物如《新世界》、《旗帜》、《十月》和《各民族友谊》等，争相刊载这些作品。一时间，这些刊物的发行量激增3~4倍。这些禁品的发表，成了当时苏联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

由于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影片《忏悔》等作品是反映斯大林时期镇压事件的，这些作品的发表，又大大推动了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题材作品的大量涌现。

此后，随着干部的调整，任命了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和党报《真理报》的新主编，也调整了一些大众媒体的领导，这又大大地推动了“公开性”的发展。

“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对它设定的界限，渐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1] 所以，虽然领导人不断接见各大媒体负责人，试图对报刊登载的内容加以控制，但实际上到1987年底和1988年初已经难以控制。再加上1988年废除了实行达半个多世纪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了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检查职能，这样，对大众媒体便完全失去

①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384页。

了控制。

任何社会，封闭总是专制和落后的产物；而开放和公开性总是民主、进步的先决条件。尤其像苏联这样封闭的国家和社会，没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和公开性，是难以推进改革的。所以，苏联在改革伊始就提出公开性问题，并说明公开性与民主不可分割的关系，原是没有错的；事实表明，在实行公开性的初始，也对动员群众参与改革起过积极作用。问题是苏联社会数十年堆积的“堰塞湖”太多、太大，而用公开性开掘的“导渠”，决口又过大、过速、过猛，以致造成堤坝溃决，洪水泛滥，冲决了一切可控的社会机制，最后导致国家解体，苏共瓦解。当然，这是由戈尔巴乔夫的严重错误造成的，致使一切失控，最终走到抛弃社会主义的斜路上去，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和精神支柱，造成全党思想涣散、组织瘫痪，而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极端民主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全然失去招架之力，最后直接导致社会解体、苏共解散和苏联的彻底瓦解。

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苏共瓦解、苏联解体与苏共的思想文化模式、文化政策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模式、思想文化政策，造成苏联文化缺乏创新能力，思想理论僵化，体制缺乏活力，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专制官僚体制压抑下死气沉沉，缺少创造生机。概括地说，苏共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模式对苏联社会、苏联剧变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僵化凝固的理论教条，特别是斯大林确定的社会主义观念，长期束缚、阻碍着苏联的改革，使数十年的改革屡遭挫折，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长期形成的危机无法克服。

其次，苏共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变形，失去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穿透力，造成注释风气盛行，创新思维能力衰竭，变成了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工具。结果，使积弊陈陈相因，把苏共和苏联社会引向危机。

再次，苏联历史上残酷的思想文化斗争不仅束缚、压制着人们的科学创新，而且镇压、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使科学不仅不能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反而使苏联经济停滞，导致在同西方国家竞赛中最终败北。

最后，苏联的思想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模式铸造了强大的保守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保守主义阻挠、贻误改革，造成积弊成堆，极端民主主义破坏改革，冲决改革的堤防。结果，保守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两面夹攻，把苏共引向垮台。

从苏联文化政策沿革、演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在十月革命之初，列宁领导的党曾是一支代表先进思想文化的力量，而到30年代以后，却逐渐丧失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特别是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苏共就由一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演变为主要由官僚特权阶层构成的一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扼杀改革的保守主义势力和反社会主义的极端民主主义势力相混杂的队伍。苏共演变的道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经验教训：一个政党只有保持文化的创新性、先进性，才能保持其本身的先进性，成为带领人民前进的先进部队；而一旦丧失其文化的创新性、先进性，就必然要落后于时代，蜕变为一股保守势力并从反面促成体制外改革势力，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并把党引向衰亡。而要代表先进的思想文化，就必须与时俱进，拥有能不断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思想理论，制定出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满足科学文化的特性和发展规律。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加强党的队伍本身的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特别是党的领导层的文化创新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先进的创新性文化，永葆先进政党的地位，领导国家不断增强文化的软实力，最终使党和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党和国家的衰落和败亡是不可避免的。

从修补到重构：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形成、发展与实践

中共中央党校　左凤荣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苏联民众对于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通过改革，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外部世界也强烈要求苏联改变政策。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为向世人说明其改革，专门出版了理论性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要改变苏联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为苏联社会主义注入新活力，“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在以往年代里形成的思维”。[1] 他要求大家必须克服自己头脑中的保守思想，用新的思维取代旧观念，可以说，“新思维”既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标志性用语，也是其改革的指导思想。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俄罗斯有的学者并不太关注，如在鲁·格·皮霍亚所著《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一书中，作者甚至没有提到“新思维”这个词和《改革与新思维》这本书，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第52页。

起因、过程与失败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①] 俄罗斯学者索科林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研究较深入，他详细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进程，他的结论是："新战略带来的后果是与它的提出者相反的和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经济改革失败了，但是政治民主化不仅扎下根来，而且具有自身的不以戈尔巴乔夫意志为转移的惯性。在政治改革的浪潮中形成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开始出现公民社会和分权。苏维埃社会的政治民主化，吸收了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模式，可以看成是20世纪主要的历史现象之一。……改革的设计师本人也成了这场源自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和平的政治革命的最后一个牺牲品。"[②] 俄罗斯历史学博士、教授亚历山大·加尔金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其实就是将民主的社会主义（它要求建立以团结和社会公正以及得到民主架构和程序保障的坚实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这一尝试的意义大大超过著名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后者在尚未采取最初的实际步骤以前即被扼杀。很明显，戈尔巴乔夫改革作为各种实践活动的综合过程尽管已遭到失败，但改革同时也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发展机会，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③] 著名学者斯拉文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中断和停止是因为，作为执政党的整个苏共在改革之初没有站在应当解决的历史任务的高度去应对时代的挑战。……政治改革应当从改革执政党开始，首先从改革对国内革新进程百般阻挠的党的官僚机关开始。"[④]

西方学者也很重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苏珊·彼得森将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方案称为"新思维"，而不是单指外交领域，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后便开始了广泛的改革计划，这一改革计划以其主要口号"新思维"或仅仅以术语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而被人们所认识。与重建——停滞的苏联经济的重建——相伴和它的成功

---

① 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② *Согрин В.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ю（1985－2001：от Горбачёва до Путина），М.：Весь Мир，2001，с. 251－252.

③ 亚历山大·加尔金：《戈尔巴乔夫改革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74页。

④ 鲍里斯·斯拉文：《当代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诠释》，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第129页。

所必须的是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改革及外交改革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是一个开放苏联社会的尝试，它既通过为言论、结社和新闻自由提供日益增长的机会又通过给消费者、职工和企业管理者以更大的权力来实现，新思维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民主化就是给予更自由的选举和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法律制度。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外交政策领域表现为同它的竞争对手关系的缓和以及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撤退。[①]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俄罗斯民众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看法，尽管俄民众"对整个改革主要持否定态度"，但同时却"又明确肯定改革时期的主要事件和进程"，"如今这一代俄罗斯人对改革的种种事件的评价要比10年前俄罗斯人更加肯定"，并且对改革时期的主要思想和价值观，如"公开性"（77%）、"民主化"（66%）、"新思维"（60%）、"全人类价值"（78%）、"市场经济"（66%）、"加速发展"（69%）、"差额选举"（62%）、"多党制"（58%）、变革（58%）等，都是多数予以肯定的；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是肯定者（42%）多于否定者（27%）。此外，调查中还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如今俄罗斯人对米·戈尔巴乔夫的工作的态度比对改革的总体态度更积极"，也就是说对戈氏本人更肯定一些。调查显示，积极评价戈尔巴乔夫的，多是年纪较轻、文化水平较高、生活状况较好，在经济领域较活跃的居民群体。[②]

中国学术界比较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在对"新思维"的定义上存在分歧，许新认为："新思维"思想有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虽然戈尔巴乔夫对"新思维"的阐述主要集中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但戈氏的"新思维"决不仅限于此。新思维的提出仅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开始，在后来的整个执政期间戈氏又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文章，制定和通过了许多政策、决议和纲领，这些都是新思维的继续、发展和体现。[③] 也有许多学者只在对外政策的层面谈论新思维，把"新思维"看成是戈尔巴乔夫对外部世界的

① Susan M. Peterson, *Perestroika*, *the Cold War* 1945 - 1991, 3 vols, Detroit, Mich.: Gale Research, 1992.

② 米哈伊尔·戈尔什科夫等：《俄罗斯人20年后看改革》，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第351~354、370~371、377页。

③ 许新等：《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99页。

重新认识，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总构想。[①] 学者们承认“新思维”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苏联传统政治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矛盾发展的结果”。“由于新思维是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在对“新思维”的评价上，大多从苏联改革的结果出发，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从提出‘新思维’开始、并在其指导下进行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右倾路线的思想基础。”[②] 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了，并成为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在改革初期，针对斯大林专制制度产生的严重问题，重视人与人权问题的理论探索还是应该肯定的。”[③]

本文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实质是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评价苏联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和在苏联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探索与实践，戈尔巴乔夫的思想经历了从完善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到抛弃这种模式、全面改造和更新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转变既反映了戈尔巴乔夫个人社会主义思想的变化，也是对苏联社会要求的迎合与回答。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内容既包括内政，也包括苏联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思想发展变化相联系，苏联于 1988 年和 1990 年两次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方针。本文要强调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并非戈氏一个人的思想，其政治新思维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得到了苏共党员干部和民众的拥护。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步子迈得过急过快的问题，由于民众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实惠，其政治要价越来越高，对苏联共产党的不满加深，反对派廉价的许诺和平民主义的口号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促使人们非理性的思维发展，最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思潮的极端发展冲垮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① 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第 714 页；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 708 页；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 860 页。

② 许新等：《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第 198 页。

③ 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第 524 页。

需要说明的是，涉及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不多，本文所用的直接材料主要是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当时一些重要会议的记录稿。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最初内涵与实践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提出苏联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为此，要完善社会关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清除妨碍社会进步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等社会前进的东西，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可能性与优越性。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解放思想，改变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戈尔巴乔夫强调从列宁晚年思想中吸取营养，吸取苏联过去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用新的思维代替陈旧的观念。在 1985 年 4 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就强调要解放思想，在 1987 年 1 月和 6 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都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与以前不同的看法，1987 年 11 月，在顾问们的帮助下，戈尔巴乔夫说明其改革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为我国和为全世界而作》正式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对改革[①]和当今世界总的看法和观点，标志着“新思维”理论正式出台。[②]

戈尔巴乔夫这一思想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立足于对苏联过去正反两方面的分析，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维主要是为完善苏联社会主义服务的。

（一）活跃人的因素，建设为人服务的社会主义

在执政初期，戈尔巴乔夫强调继承苏共二十六大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他所讲的活跃人的因素主要指加强体制改革，改进工作作风，增强责任感与纪律性，他在 1985 年苏共中央 4 月全会上说：“主要问题在于怎么样和依靠什么国家才能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局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

① 俄语一般意义的改革（реформа），是指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改进；而戈尔巴乔夫使用的“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则有“重建”、“重构”，甚至有“推倒重来”之意，这在苏联改革史上首次使用。

② 俄文书名为：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在中国通译为《改革与新思维》。

论，那就是实现这个高速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把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经济的集约化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上，改革管理和计划，改革机构和投资政策，普遍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从根本上改善工作作风，那么加速增长，而且是实质性地增长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首先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极其认真地、高效地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①戈尔巴乔夫强调要考虑人的利益和满足民众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戈尔巴乔夫制定了加速战略，试图通过这一战略改变苏联经济下滑的局面，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

随着"加速战略"推行受阻，体制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苏联原有的体制下，不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中的螺丝钉，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戈尔巴乔夫开始强调要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出发点，把人民的权利落到实处，认为："不活跃人的因素，即不考虑人、劳动集体、社会团体、不同社会集团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把他们吸引到积极的创造活动中来，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任务，就不可能改变国内环境。"②戈尔巴乔夫强调"活跃人的因素"，意在发挥人的主动性作用，把他们吸引到改革进程中来，让他们参与改革事业，这就需要解放思想，破除旧的思维与观念，为此公开性和民主化就成为戈尔巴乔夫活跃人的因素的主要手段。

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行政命令制度，官僚主义更加严重，背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革的目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而在其中居不容争议的优先地位的，是人及其劳动、理想和利益，是经济中、社会与政治关系和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也就是说，让社会主义成为为了人的社会，"为了使人的劳动富有创造性，为了他的幸福、健康、心身发育"。③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困难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政治制度的危机，而是由于没有充分贯彻社

①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关于继承二十六大方针的讲话，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500页。

②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岑鼎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第18页。

③ 米·谢·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7，第28、29页。

会主义的原则，由于背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服务这一原则造成的，社会主义是能够通过改革自我完善的。

（二）完善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1986 年 3 月 6 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列举党的“加速战略”的目标和内容时，就包含了政治民主方面的内容，“争取加速，就是说要加强民主，坚定不移地发展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扩大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开性，为发挥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①] 戈尔巴乔夫主观上希望通过扩大民主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在 1987 年苏共中央 1 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80 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障碍机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人民自治，是克服障碍机制的主要手段。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含义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指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揭示我们的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②] 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看成是需要全民参加和推动的事业，希望全民都参加进来，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主人，他强调：“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掌权，是实现劳动者的广泛的政治与劳动权利的形式，是他们关心改革并实际参与改革的形式”，并提出：“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成了党的紧迫任务。……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政治制度的所有潜力，用深刻的民主内容来充实党、苏维埃、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和劳动集体的工作，使社会机体的所有细胞充满新的生命力。”[③]

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不是抛弃社会主义，改革是使社会主义具有新的面貌、消除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因此，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新思维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改革开始时，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式是：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

①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第 430 页。

②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1987 年 1 月 27 日），苏群译《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7，第 132 页。

③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1987 年 1 月 27 日），苏群译《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第 142、143 页。

主。戈尔巴乔夫认为，“有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概念要根据历史经验和客观条件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强有力的促进经济、科技和社会进步的因素，如何最有效地把计划领导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社会实践过去和现在都在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这一问题的意义正在不可估量地增长”。[①] 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劳动人民主人翁的地位得到真正的落实，社会主义要具有“人的面貌”。

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利、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②] 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的基础是民主化，改革的重心是使全部社会生活的广泛的民主化，也就是让民众参与到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来，“只有通过始终如一地发展社会主义固有的民主形式，扩大自治，我们才可能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觉的纪律。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③] 关于如何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没有“现成处方”，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戈尔巴乔夫否定苏联传统体制中以党代政的做法，认为这限制了苏维埃这个就其本质来说是体现广泛民主和公开性的机关发挥积极作用，他提出：“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面临一项极其巨大的任务：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全面恢复苏维埃的威信和权力，为苏维埃在改革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积极地和创造性地工作创造条件。”[④] 要改变党的机关取代苏维埃的做

① 戈尔巴乔夫：《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1987年6月25日），苏群译《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第369页。

② 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477页。

③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21页。

④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95页。

法，“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①] 党的机关不再承担经济和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党的任务在别的方面——首先是从理论上认识各种过程的意义，及时地把握住矛盾发展中的临界点，校正战略和策略，制定政策和规定实施政策的方式方法，挑选和分配干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改革的进行”。[②]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同时也是为了使苏联的改革不致发生逆转，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以恢复苏维埃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1985 年苏共 4 月全会提出“加速战略”，但到 1988 年夏，加速战略正式宣告失败，苏联的经济并没有好转，苏共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阻碍机制的作用，虽然戈尔巴乔夫一直强调民主化、公开性、人民自治，但政治体制变化不大，大多被当成了宣传口号。面对改革的困境，苏共要寻找新的突破口。1988 年 6 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使我们预先防止最近几十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停滞现象的增多并且注定使当时进行的改革归于失败。经济管理职能越来越集中在党政领导人手中，这已成为突出的现象”。机构庞大，国家机构官僚化，“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经济、社会文化改革“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③] 苏共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恢复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把立法、管理和监督的职能集中于苏维埃，提高这个经选举产生的机关和代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把权力从党转到苏维埃手中。为了体现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又强调：“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他认为：“如果党委第一书记将被选为苏维埃主席，那么这将会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加强对执行委员会及

①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 95 页。
②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 104 页。
③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8 年第 5 期，第 18 页。

其主席的活动的监督，在管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苏维埃的情况下，将能更准确地区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能。"[①] 1988 年 10 月 1 日，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代表由公民选举产生的原则，似乎是将宪法中规定的"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作为苏联政治基础的人民代表苏维埃行使国家权力"、"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条款付诸实施，但戈尔巴乔夫以党的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而且地方也如此行事，显然加强了党对苏维埃的干涉，仍然是党政不分。在现代条件下戈尔巴乔夫这种直接民主的做法并不合适，党的各级书记兼任苏维埃主席也没能提高苏维埃的威信，人数众多、意见分歧严重的苏维埃难以承担领导国家的职责，加剧了苏联政治的无序化发展。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陷于繁杂的议会事务中，无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家事务上。同时，由于戈尔巴乔夫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最高苏维埃方面，党的决策体系被架空和削弱。

（三）扩大公开性

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就提出扩大公开性，他认为："不讲公开原则，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群众也不能参加管理。……那些习惯于马马虎虎工作、欺下蒙上的人在工作公开化的光照下，当国家和社会上的一切受到人民监督、人民看到一切的时候，确实很不自在。因此，我们必须使公开性成为绝对有效的制度。"[②] 通过公开性，让民众监督政府的工作，从而改变一些人不负责任的现象。1986 年 4 月 26 日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民众要求知道事实真相，国际社会也要求苏联提供真实的消息，这促使戈尔巴乔夫加强公开性。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公开性，其最初的涵义是让民众知道真实的信息，对国家管理机关进行监督，"应该对人民说真话，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开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③] 在谈到苏联社会的新变化时，戈尔巴乔

---

①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8 年第 5 期，第 22、23 页。

② 米·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6，第 63 页。

③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 43 页。

夫说："最明显的新气氛表现在广泛的公开性上。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大的公开性。人们应该既知道好的，也知道坏的，为了是好上加好，而同坏的要进行斗争。"① 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把公开性与社会主义民主联系起来，认为公开性是民主化的表现，同时也促进民主化的发展，所以戈尔巴乔夫强调："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是例行的运动。这些既然宣布了，就应该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不这样做，任何彻底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②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专门就公开性问题做出决议，决议"把公开性视为实现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和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力、自由和职责的必要条件。所有领域里的公开性是继续深化改革及其不可逆转过程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决议指出："必须取消使用关于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生态环境等统计信息的不合理限制，建立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搜集、处理和传布体系，保证各类图书馆开放，用立法方式整顿档案资料的利用。""制止报刊发表批评文章，以及刊登有损公民名誉和人格的非客观报道文章都是不允许的。公开性要求大众信息媒体担负起社会、法律和道德责任"。"不容许利用公开性损害苏维埃国家、社会的利益，损害个人权利；不容许宣传战争和暴力，反动的种族主义、民族和宗教偏执性，以及宣传残暴行为，传布淫秽作品，不容许利用公开性行骗"。③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关于公开性的初衷和实行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作为一个人民国家，民众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但是，苏联没有在相应的法律建设上下功夫，苏联人也缺乏法律意识，公开性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改革、提高全民共识的作用，正如沃尔科戈诺夫所说："戈尔巴乔夫开始了这一进程，但这一进程后来的发展并不是由他的决议所决定的。事实上公开性从内部破坏了建立在阶级谎言基础上的体制。"④ 公开性带来了社会的多元化，此时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公开性和具备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党制下搞政治

①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61页。

②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65页。

③ 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关于公开性》的决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12～513页。

④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А.* Семь вождей: В2 кн. кн. 2. М.: Фир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1999, с. 315.

多元化。”①

（四）重新认识苏联与世界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想改变苏联“邪恶帝国”的形象，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为苏联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调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无论对苏联，还是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他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了核时代，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在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只能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戈尔巴乔夫认为，“人类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以至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地球上继续这种竞赛，尤其是继续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太空，势必加快核武器积存和改进的速度，而这种速度本来就已达到疯狂的程度了。世界的局势会变得不以政治家们为转移。局势将为偶然性所左右。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相处，树立新的政治思维”。② 戈尔巴乔夫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要求用新的眼光看待战争与革命问题，过去，革命往往与战争相联系，但核战争的结局只能是普遍毁灭，因此，苏共二十七大的新党纲删掉了“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仍然敢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就将不再容忍使他们陷入毁灭性战争的制度。他们将消灭和埋葬帝国主义”。与此相联系，戈尔巴乔夫把新思维外交的核心定为：“承认全人类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③

由于对现代战争看法的根本改变，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安全观，不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别国主权与利益的基础上，不再牺牲别国的安全，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决权。“安全的唯一牢固基础，就是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一律平等。必须把自己的

① 鲍·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修订版），孙凌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第 22 页。

②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 118 页。

③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 126 页。

安全同国际社会各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决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求得自己的安全”。戈尔巴乔夫反对军备竞赛，宣布把军事战略建立在防御的基础上，并提出了合理、足够的原则。“新的政治思维同样不容违背地决定了军事思想的性质。军事思想应该是严格的防御性的。……我们时代普遍安全的基础，就是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尊重别人并对自己的社会持客观的、自我批评的观点。人民可以选择资本主义，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主权。各国人民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美国，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苏联”。[①]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不能通过武力战胜资本主义，核时代以战争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无异于自杀，保障苏联安全只能通过和平手段，因此，苏联不再追求军事优势，而是争取“低水平的战略平衡”，“足够的防御”，“在我们的时代，真正的、对等的安全是以水平越来越低的战略均势来保证的，从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②] 戈尔巴乔夫的安全理论放弃了苏联长期奉行的霸权主义，有积极的意义，其实际内容是苏联放弃了东欧这一势力范围，以换取结束与西方的冷战和对峙。但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件下，苏联单方面退却，是不是能真正解决问题？当苏联从传统控制区撤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去填补真空时，苏联将怎么办？这是不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戈尔巴乔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俄罗斯面对的主要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俄罗斯。

第二，在关于时代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提出和平共处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核时代“全人类生存的条件”。他提出重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放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指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资本主义不仅由于上次战争的教训，而且由于害怕自己在已成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面前被削弱，不愿意使内部矛盾发展到极限。内部矛盾已经转化为相互间的技术竞赛，利用新殖民主义来‘缓和一下’。世界发生了某种新的‘和平’的

①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23页。
②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21页。

重新划分——是根据列宁揭示的那种规划，即按'资本'来划分，谁更富有，谁在此时更强大，谁就拥有更多的份额。在一些国家，借口'苏联的威胁'，把资金转给军界工业界集团，以此来'消除'经济中的紧张状况。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也有助于调解矛盾、平衡利益"。资本主义可以在不进行军事化的情况下发展，许多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时期是在军费最低的条件下发生的。①

戈尔巴乔夫承认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能取代资本主义，而只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1986 年 3 月苏共二十七大提出苏联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保证使苏联人民在持久和平和自由的条件下劳动"，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绝对遵循的政治方针"。"党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的主要方向，依然是为反对核危险和军备竞赛、为争取维护和加强普遍和平而斗争"。"如果说到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安全只能是相互的，而如果以整个国际关系而论，安全只能是普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仅仅并且完全通过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苏共二十七大改变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它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思想转变成东西方在较低和较少危险的军备状况下共享安全的观念"，提出了"加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将苏联的战略目标变为谋求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创造有利于国内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②

第三，戈尔巴乔夫改变了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承认世界是一个整体。苏共二十七大提出新的对外政策构想的出发点是：尽管组成现实世界的各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然而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是相互依附的，它是一个固定的整体。戈尔巴乔夫从世界是由多种类型的国家构成的这一角度出发，承认世界是多侧面、多色彩、多变化和充满矛盾的，戈尔巴乔夫强调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强调利益均衡。戈尔巴乔夫指出："谁也不能抹煞社会主义世界、发展中的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还看到一个主要的趋势——国际社会各国日益增长的互相依存的趋势"。"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同样明显的现实，是出现了所谓的全球性问题，而且越来越尖锐，这些问题对于文明社会的命运也具有非常重要

① 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第 43 页。

②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第 679 页。

的意义。这里说的是对自然界的保护，是环境、空间和海洋的危急状态，是我们星球并非无限的传统资源。这里说的是原有的和新发现的可怕的疾病，是人类共同焦虑的问题，即如何消灭地球上广大地区的饥饿和贫困。……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必须建立有效的、以平等为原则的国际秩序和机制，以保证合理利用地球资源这些全人类的财富”。[①]

戈尔巴乔夫否定了两种社会制度完全对立的观点，提出在核武器出现使人类社会安全受到威胁的条件下，在世界经济联系扩大、相互依赖加深、全球问题突出的条件下，世界各国好比山坡上结队登山的运动员，谁也离不开谁。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世界是统一的，但他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轻易地接受苏联加入与它们竞争的行列，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抱有过分的幻想。

第四，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他提出“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分歧搬进国际关系的领域，让对外政策服从这些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防止战争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②] 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是国际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国家关系不同于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这也是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确定对外政策的主要教训。但是，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在国家交往中不起作用，意识形态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一个方面，戈尔巴乔夫完全否定意识形态利益，对资本主义毫不设防，也是片面的，并不能真正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与此相联系，苏联不再以阶级斗争的态度对待一切国际现象，强调和平共处原则不仅用于处理制度不同国家间的关系，也用于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等于承认了曾被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苏联外交的目标开始转为致力于为苏联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苏联放弃了冷战政策，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不再干涉东欧事务，为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提供了方便的外部条件，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的外交为苏联国内的改革创造了

①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16、117页。
②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23页。

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消除了与世界各大国的敌对，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条件进行改革。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转向及其目标

在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之前，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强调的重心是完善社会主义，更新社会主义，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在此之后，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提完善和更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建立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主张，戈尔巴乔夫看法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社会情绪的变化，掌握主动权。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新党纲，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观点被苏共所接受。

（一）形势的变化迫使戈尔巴乔夫改变看法

从1988年开始，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权力重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苏维埃是选举产生的机关，这就有可能使非共产党人当选代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事实上意味着在政治上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即取消了宪法所规定的苏共在苏联政治中的领导与核心地位。

1989年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与以前不同，这次实行差额选举，社会组织正式派代表参加选举。2250名代表按下列程序产生：750名代表从选民人数相等的地区选区选举；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选区选举（每个加盟共和国32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选举5名，每个自治区选举1名）；全国性社会团体（包括苏联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等）共选举750人。1989年4月4日，选举结果公布，在2250名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占87.6%。但是，许多党的干部落马，有20%的党员在竞选中被淘汰，莫斯科市长塞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落选，列宁格勒州委第一、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计委主席全部落马，许多反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叶利钦、索布恰克、波波夫、萨哈罗夫都成了人民代

表。共产党的100名代表是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的，因为很多人担心差额会把自己差掉。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仍然很乐观，认为苏共党员占87%的比例显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他认为，“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①] 但是，雷日科夫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党在选举中失败了，按民族地域选区推举的地方组织的30名候选人，很不光彩地落马了，输给了资历不深、名气不大，却更加“令人信服”的竞争对手。[②] 利加乔夫、索洛维约夫、卢基扬诺夫等也都忧心忡忡，也不完全同意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选举表明，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信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③]

1989年5~6月第一届人代会召开，代表大会上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人民代表首次有权组织政治反对派，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起初有150人，1989年夏天发展到388人，其中286人来自俄罗斯联邦。事实证明，这种人数众多，代表观点各异的苏维埃是“清谈馆”，它没有权威，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只是个立法机关，无法承担起管理国家的职责。但是这个民选的人代会排斥了党对立法和高层决策、高层领导人事权的控制，成了民主派强有力的阵地。叶利钦等反对派在大会期间的活动和发言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结束后，苏联出现的第一个合法的政治反对派。其代表萨哈罗夫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只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才能通过法律，这些法律在加盟共和国需经其最高法律机关批准才能生效；苏联人代会选举和罢免国家高级公职人员（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苏联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克格勃主席、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

①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510页。
② 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519页。
③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516页。

《消息报》主编等）。[①] 他的发言成为反对派的纲领，站在这一反对派阵营的代表人物还有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他们要求改变共产党在社会中的地位，要求实行广泛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党的机构不能干涉舆论；国家领导人实行由人代会选举产生的制度，选举应该是差额选举；加大改革力度，给共和国以更多的独立性和主权，打破行政命令体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消除少数人的特权；甚至还有人直接攻击戈尔巴乔夫，说他受周围溜须拍马者和夫人的影响。

1989 年 6 月，苏联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建立，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与以前不同的是，最高苏维埃变成了常设制，由人民代表大会从人民代表中选举产生，成员为 542 人。一年召开两次例会。党原来事实上掌握的立法权和政府干部任命权转归了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其常设机构，也不再由最高苏维埃选举产生，而是由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15 名副主席（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联盟院和民族院主席、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常设委员会主席和最高苏维埃委员会主席组成。新设立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成了国家的最高元首。新设置了宪法监督委员会，委员会由代表大会从政治和法律专家中选举组成，其成员有主席 1 人，副主席 1 人，委员 21 人，委员会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完全独立，只服从于苏联宪法。

改革的重心转入政治体制改革后，苏联社会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斯大林体制成了明确的被批判对象，造成了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的后果：国内的民族情绪发展，民族矛盾公开化，中央政权难以应付危机；舆论多元化发展成政治多元化，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拉脱维亚有“人民阵线”，乌克兰有“乌克兰拥护改造人民运动”，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人民阵线”，其代表于 1988 年 8 月 13 日在雅尔塔进行工作会晤；官僚体制对改革进行抵抗，经济形势更加恶化。1989 年 7 月 29 ~ 30 日，400 多名苏联人民代表自行串联，在莫斯科电影工作者之家举行了人民代表跨地区代表小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变相的反对派议会集团，选举叶利钦、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和帕尔姆为小组主席。1989 年 12 月，

① *Киселева А. Ф.*, *Щагина Э. М.* (*под ред.*)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 - 1995), М.: Гуманит. изд. центр ВЛАДОС, 1996, с. 323.

一些人民代表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指出："大多数居民正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丧失或已经丧失了对改革的信任，认为改革多半是口头的和表面的。许多人甚至不相信米·谢·戈尔巴乔夫。这种潜在的可怕的信仰危机，公开的不满和气愤与日俱增，并影响着从春夏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改革的第四阶段"。"改革的进程已到了原则的边缘，各机构反动头目的对抗在增长，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犹豫更一目了然。但是，错了。东欧发生的大好事就是例子，对于那些打算在不确定的时期内保持强行的'苏联共产党的先锋队和领导作用'，对于那些打算保留经济部门、指令性计划、国营集体农庄系统的垄断权的人是足够清晰的警告。必须在一定时候开始拆除这一切"。[①] 苏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苏共一党的执政地位被看成是与民主不相容的现象。

面对这种新的危急形势，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主流派只能退让，以求取得主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在 1989 年 11 月 26 日《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如果说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主要着眼于纠正社会的扭曲现象，完善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制度，那么现在戈尔巴乔夫则强调："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仅是说，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方面实际实行步骤。"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的改革既不是保存行政命令体制，也不是推翻十月革命的选择而走资本主义，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权威和马克思主义对待现实的态度，"要依靠建设一个人道的、自由的、理智的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智慧和道德潜力"。[②] 从此，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不仅改革的目标改变了，政治体制也开始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发展：实行总统制、取消宪法第六条、制定新党纲、提出发展市场经济等。

（二）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成为目标

戈尔巴乔夫比以往更加强调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社会主义是丰

① 《苏联人民代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摘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528 页。

②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 年第 1 期，第 2、3 页。

富多彩的，他改变了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强调苏共与社会民主党人“现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但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他正面称赞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对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对进行有助于提高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社会改革所作的贡献，并给予应有的评价。我们感兴趣地研究社会民主派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尽管情况有所不同，也努力利用其中适合我国社会条件的经验”。他认为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是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体制，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的改革只是消除了这一体制的极端方面，这一体制仍然保留下来了，这种官僚主义制度“导致丧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被取代了”。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自由的思想，其实质特点是确立真正的人民政权。他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①] 人是社会的目标，而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是为之服务的手段，要加大对人的投资，满足人民的需求，必须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戈尔巴乔夫强调与斯大林模式决裂，吸取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做法，实行多党制、多元化，建立真正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这一思想带有很浓的道德色彩，这一思想进而发展成把“人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追求。

1990 年 6 月 19 日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共产党会议上表示：“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作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②] 戈尔巴乔夫要求共产党按议会党的方式行事，苏共不再履行执政党的职责。

1990 年 7 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

①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 年第 1 期，第 5、7、11、12 页。

②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 642 页。

性文件和苏共新党章，为全党描绘了在多党制下党的建设的新机制。这个新机制标志着对传统的党建模式的彻底放弃。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党对国家的领导上，强调党放弃政治垄断，放弃在宪法中的特权地位，党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民主承认的领袖。第二，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强调尊重各党的独立性，并为此在中央增设了由各共和国党选送的代表的名额。第三，在干部问题上，强调决定干部的权力由上级机关转交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强调实行选举制，实行差额选举并有可更换性。第四，在党员个人权利上，强调允许不同意见的自由，党内要确保意见表达自由，不同观点和纲领的对比、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不允许存在派别，但允许存在各种按志趣和问题成立的横向联系组织。第五，在党内监督问题上，强调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可以监督同级党委。苏共二十八大形成的这个机制不可能在加强党的整体力量上创造奇迹。这时的苏共虽然事实上仍处于执政党地位，但在社会上反对派和党内反对派的内外夹攻下，苏共推行自己的改革政策日益艰难。到了 1991 年上半年，苏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以 1991 年八·一九事变为导火索，人们把所有不满都倾泻到苏共头上，造成了苏共被停止活动的悲剧性结局，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在苏联并未变成现实。

（三）承认多元化与多党制

1988 年苏联结束了书报检查制，从而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多元化。在多年的压制后，自由的大门一经打开，其发展势头几乎无法阻挡。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社会政治的多元化与多党制已经成为事实，“戈尔巴乔夫只能根据局势行事”。[①]

1989 年以后，各民族共和国的人民阵线、民主组织发展迅速，萨哈罗夫、叶利钦的跨地区议员团活动频繁。1990 年春，非正式组织发展到了几万个，实际上是三股力量在较力：权力暂时还在共产党，确切地说是党的最高机关手中，反对派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民主的运动和组织，另一个是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到 1990 年春各共和国和地方选举人民代表前

①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А.* Семь вождей: В2 кн. кн. 2. с.312.

夕，俄罗斯联邦的民主反对派结成联盟，其基础是“民主俄罗斯”运动。“民主俄罗斯”运动内有俄罗斯民主党、宪法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俄罗斯东正教民主运动、俄罗斯农民党。① 苏联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党并存，在 1990 年 1 月 22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国内政治气氛时，雷日科夫就认为：“我们在实践上已经转向了多党制。看不到另外的路。人民阵线发展成了政治组织。或者我们不承认这一现实，或者与其他政党一道走上广泛的民主制。需要明确做出回答：跟谁斗争和跟谁联合。”② 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基本同意雷日科夫的看法。但是，利加乔夫还坚持“应该保持一党体制。建立广泛民族公民阵线，把一切健康力量团结到这一阵线中。而共产党员要占据关键职位”。③ 梅德维杰夫、卢基扬诺夫等人也认为苏共的路线不是多党制。

在 1990 年 2 月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莫斯科举行了由“莫斯科选民协会”、“莫斯科人民阵线”等激进派组织召集的规模空前的集会，集会的讲坛就在中央委员们所住的莫斯科饭店外的一辆卡车上，集会打出的标语口号有：“把多党制写进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权力不能垄断”、“不要专制独裁者”、“政治局辞职”、“中央委员会辞职”，等等，叶利钦等激进派首领在会上发表演说，称苏共已经没有能力对本身进行根本改革，必须彻底改革党的机构，取消宪法第六条。这次集会的目的，显然是向中央全会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没有对集会进行干涉，他也想借此向苏共党内的传统派施压。2 月 5 ~7 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放弃一党制原则，承认了多党制的合理性和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必要性。党的高层领导几乎一致同意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同意修改宪法第六条。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党的革新需要对党与国家机关、经济机构的关系进行重大变更，要放弃实际上向它们发号施令和取代它们职能的做法。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承认的力量，才能在革新着的社会中生存和起到自己的先锋队作用。这就是说，它的地位不应当通过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不言而喻，苏共准备为

① Власть и оппозиция.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XX столетия. М.：РОССПЭН，1995，с. 313.

② АГ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Фонд 10，опись 2，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АСТ，2007，с. 126。

③ АГФ，Фонд 10，опись 2，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с. 127.

争取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但这将严格在民主进程范围内进行，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优先权”。[①] 雷日科夫也说：“我们感受到一个真理，即任何一个党都不能永远垄断权力，先锋队的地位不是宪法赐予的。因此，十分重要的是，在全会上我们应当老老实实、认真、十分负责地正视真实情况，不管它是多么痛苦。”“讨论是否需要多党制的问题已经过晚。实际上多党制已经存在。不管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动机如何，这一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反响。……我们必须掌握同其他社会政治实体共同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学问”。[②] 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取消关于苏共是政治核心，是社会领导力量的提法。虽然戈尔巴乔夫开始想在一党制下进行改革，但现代民主政治以权力制衡和政党竞争为前提，不可能建立在一党制的基础上，苏联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和激进改革派实行多党制的要求是无法拒绝的，这是苏共顺应形势发展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说：“任何激进的改革一开始就应该考虑自己改革的预先设想和时间表将会被推翻。生活这个主人会提出自己的速度、自己的逻辑、自己的事件先后顺序，会暴露自己的任性和失误，会显示出是悲剧演员还是喜剧演员，是英雄还是掘墓人来。”[③]

1990 年 3 月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修改了宪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进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订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一切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在履行其纲领和章程所规定的职能时，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进行”。“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会团体，参加有助于发挥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满足他们多种利益的群众运动。”苏共成了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地位一样的政党，苏共开始从一个执政党向一个在议会中活动的群众性政党过渡。这意味着苏共不再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苏共在法律上变成了一个与其他政党一样的社会组织，苏联开始实

①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第 4 页。

②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未刊，第 124、125 页。

③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第 209 页。

行多党制。

（四）按照西方三权分立原则彻底改革国家政治体制

苏联实行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兼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总书记的权限开始向最高苏维埃分权和转移。但是，最高苏维埃本质上的功能是议政、立法和监督，不能有效地做出决策，它也缺乏有效贯彻其决策的系统，因此，出现了权力真空和失控的现象。为了弥补最高苏维埃议而不决的缺陷、摆脱党对戈尔巴乔夫的阻碍作用，权力归苏维埃没多久，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提出要在苏联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思想，同时还陆续派出一些代表公开或秘密地前往美国、法国等地考察西方的议会制和总统制。1990 年 2 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要求给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将改革的政策付诸实施。从这时开始，苏联才开始按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1990 年 3 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开幕，会上就要不要设立总统职务和怎样选举总统进行了辩论。实行总统制本是激进派的主张，戈尔巴乔夫曾反对，现在他同意实行总统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稳，威信在下降，当了总统，便可以摆脱党的制约，不会因为党内形势的变化而影响到他的权威。设立总统制，使党和国家分开，国家便不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另外，苏联的混乱局面、日益恶化的形势，也需要有一个拥有强有力权力的国家元首。同时，戈尔巴乔夫接过激进派的这一主张，也使激进派措手不及。在人代会上，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实行总统制的决议；跨地区议员团提出要由民众直接选举总统，反对派成员阿法纳西耶夫则提出反对总书记兼总统，他担心戈尔巴乔夫会因此成为独裁者。这个提议正中党内传统派的下怀，戈尔巴乔夫当总统，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选举新的总书记的机会，也许可以重新加强党的权力，与戈尔巴乔夫抗衡。反对派很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收回了这一提议。第三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对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补充”，规定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第一任苏联总统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期 5 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总统是国家的元首，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总理、内阁成员、最高法院院长等重要公职人员的提名

权，签署苏联法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争端等；苏联最高苏维埃只享有立法和监督职能，卢基扬诺夫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以 1329∶495 票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有不少人弃权。

国家的最高权力转移到总统系统，各共和国也效仿联盟中央实行总统制，民选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苏维埃主席，他们不是对联盟中央，而是对本共和国的选民负责，许多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和平”夺取了政权。但是，苏联的总统制并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法治建设明显滞后，实际上仍是另一种集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系国家命运的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不是在最高苏维埃决定的，而是由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共同决定的，实际上是大总统与小总统支配着国家，最高苏维埃被抛在一边。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后，成立了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行政实权落到了总统委员会的手中，总理及其领导下的部长会议只是执行总统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在改革政策上，雷日科夫与总统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在雷日科夫看来，苏联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总统，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雷日科夫认为在联盟条约签订前对政权体制进行改变只会引起混乱，而戈尔巴乔夫却对政治体制进行无休止的改革，于 1990 年 11 月撤销了总统委员会，把联邦委员会从议事机构变为协调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行动的决策机关，取代总统委员会成为最高决策机构。改行总统制，使苏共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严重削弱。

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但他并没有真正利用自己的权力去维护联盟的统一，也没有利用这一权力整顿国家秩序，挽救国家的经济。改革后期，特别是 1991 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改革”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发展，苏共反对派开始左右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时苏联政权的政治资源已经大部分落人戈尔巴乔夫亲自培植的政敌——叶利钦之手。

经过 1990 年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苏联基本上转向了多元化、多党制、总统制，这与从前的体制有了实质性的差别，但这一体制是不完善的，中央行政权力大为削弱、法律体系不健全，难以挽救局势和摆脱危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初衷是好的，目的是让民众过上幸福生活，让社会制度为人的福利服务，但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其目标并未实现，这一结果与苏共党内意见不一致、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不无关系。

苏共党内在"新思维"实践中的分歧与斗争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苏联过去的弊病进行了深刻分析，也指出了苏联未来发展的方向，苏联改革的各项措施也都经过政治局、中央全会、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确认，但是，苏共并未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很和谐，他们在改革问题上有共识，都认为苏联需要改革，但在改革的步骤与目标上始终存在分歧，在性格与处事方法上也有许多难以相容之处。特别是随着改革的发展，苏共内部在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等问题上开始出现矛盾和分歧，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夹杂其中，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化，苏共党内的分裂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实践失败的重要原因。

戈尔巴乔夫仍然沿袭过去苏共很多老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他主管办公厅和组织部，却没有认识到改变机关作风的必要性。戈尔巴乔夫迷信更换干部，通过换上他认为有改革思想的干部来解决问题。他更换了大批干部，但党的机关的体制、作风和方法依然如故，不改体制，只换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戈尔巴乔夫也承认："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 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①] 戈尔巴乔夫虽然要搞民主化、公开性，却仍然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容忍有人对其工作进行批评，对叶利钦进行围攻和撤职，而实际上他又同意叶利钦的许多改革主张，结果把叶利钦推向了对立面，致使这个具有巨大能量的人成了改革和国家的破坏者。尽管他组建了自己的顾问班子，但常常是顾而不问，自己决策。他虽然取消了党的高级干部的一些特权，但他自己又花了国家大量资财到克里米亚修建豪华的新别墅。由于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领导能力有限，不能很好地发挥每个人的特长，1990 年后他个人的威信日益

---

①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 515 页。

下降，苏共未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改革的核心。

（一）苏共高层领导间分歧逐年扩大

1987年后在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改革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所谓“传统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由于改革事业本身的复杂性，存在着矛盾与分歧本来是正常现象，但因为苏共没有相应的机制来化解这种矛盾与危机，三派之间的斗争分化削弱了苏共党的力量，对苏联的改革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叶利钦，1931年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农村。1955年毕业于乌拉尔工业学院建筑系，曾经当过一年普通工人、工段长、工程师。30岁时加入苏共，后来从政，1976年成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85年4月，被戈尔巴乔夫调往莫斯科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建设部部长，半年之后被提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任期间，他能够深入市民群众，反对特权，打击黑社会，赢得了居民的普遍好评。从性格上看，叶利钦是个急躁激进、缺少耐心的人，权力欲、自尊心都很强，容不得别人的轻视。

从1987年秋天起，叶利钦等激进派开始向戈尔巴乔夫施压，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速度太慢，没有去碰官僚机构这个最“神圣”的东西，他们公开宣传“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这不仅引起了利加乔夫，也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不安。当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在全国搞反酗酒运动，要求叶利钦关闭莫斯科的酒厂并停止出售酒类产品时，叶利钦与利加乔夫间发生了公开分歧。戈尔巴乔夫没有支持叶利钦，而是静观他们二人在政治局会议上争吵，叶利钦感到工作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在198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上，刚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雅科夫列夫升为政治局委员，当了一年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斯柳尼科夫也晋升为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尼科洛夫则越过了候补阶段，直接升为政治局委员，而叶利钦仍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得到晋升。这对于自尊心很强的叶利钦来说，是个很大的伤害，他自然心怀不满。在工作上叶利钦与利加乔夫间冲突增多，于是，叶利钦于1987年9月12日致函戈尔巴乔夫抱怨自己的工作得不到支持，最后请求免除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叶利钦希望跟戈尔巴乔夫谈谈，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及时

回应。

在1987年10月21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向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公开提出了挑战。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戈尔巴乔夫在即将召开的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在当时的条件下，需要对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做出应有的评价。戈尔巴乔夫读完报告，请大家提意见，叶利钦犹豫地举了一下手又放下了，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利加乔夫本不想让他发言，想进入大会辩论，但戈尔巴乔夫坚持让叶利钦讲。叶利钦说：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他已经看过了，也提了意见，他不再提意见了。接着，他话锋一转，离开了大会的主题，谈到了改革的问题。他指责改革进展缓慢，人们一无所得，并说近来对总书记的吹捧有所增长，他还指责利加乔夫和书记处的工作作风没有任何改变，最后，叶利钦提出辞职。① 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对叶利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叶利钦的发言是不负责任的，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全会通过《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发言的决议》，指出：苏共中央全会认为叶利钦在1987年10月全会上的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委托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党的莫斯科市委会研究叶利钦同志关于解除他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申请，研究此问题时应该考虑到中央全会上所交换的意见。②

1987年11月9日叶利钦自杀未遂，11月11日，病中的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硬拉到莫斯科市委会上，这次会议是为了执行十月全会的决议而召开的，讨论解除叶利钦职务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和会议的参加者一致谴责叶利钦的立场，指责他怀疑改革；他攻击政治局和书记处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立场是冒险主义的；叶利钦在政治上不称职，工作中有严重失误，他的工作作风和所作所为是反民主的和独裁的。会议解除了叶利钦莫斯科第一书记的职务。1988年2月中央全会解除了叶利钦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叶利钦事件"在苏联引起了轩然大波，雅科夫列夫指出："整个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事件，它反映了由潜在的意见的分歧走向公开的意见分歧。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权力的最高层开始以较为明确的形式表明各自的立场。"③ 叶利钦获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被罢官的

①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2, с. 239－241.

②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2, с. 287.

③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186页。

叶利钦马上变成了一个游离于有70年历史的国家政治生活规则之外的政治人物。他成了国内所有不满者的领袖，成了前不久还是其领导成员的那个党的政治反对者……为未来年代的激烈政治斗争和政治对抗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1] 在处理叶利钦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过于情绪化，他反感的是叶利钦对中央工作的批评，而在对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报告的看法上双方是一致的，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他无论是对报告，还是对我在报告中阐述的思想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仅如此，他在全会上还发言，表示自己拥护报告，尽管当时并没有建议大家发言表态。"[2]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后来同意和接受了叶利钦的许多看法，在组织上他排除叶利钦等激进派，仍用利加乔夫等人，但在实际措施上他又把叶利钦等人当成推动改革的力量，因此，在叶利钦离开高级领导层后，戈尔巴乔夫跟叶利钦的关系时合时分，当他需要对付正统派或保守派时，往往与叶利钦形成一种联合或同盟的关系。

叶利钦事件有利于利加乔夫等政治局内认为应该加强社会主义信念的一派，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一所高校不知名的女教师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作者反对苏联社会出现的对历史消极现象的揭露，呼吁承认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些党的、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评价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她批评"左派自由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们只谈过去的错误不谈成就的做法，她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的这些讨论的主要和最最基本的问题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领导作用。"[3] 这篇文章实质是主张回到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上，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利加乔夫指使发的，利加乔夫本人说："正像所有读者一样，我只是在《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它。"[4] 但这篇文章显然与利加乔夫的观点相近，在之后召开的一次编辑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一读这篇文章，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开始了：列宁格勒和莫斯

①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574页。
② 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第18页。
③ 《安德列耶娃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10~511页。
④ 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第146页。

科举行了讨论并支持这篇文章的‘读者代表会议’，在一些州，党的地方报刊转载了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这种做法——转载中央报刊上的文章，只适用于非常重要的党的文件。转载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篇文章被视同这样的文件”。[①] 当时戈尔巴乔夫在国外访问，回国后他也没注意，但是，局势的发展让戈尔巴乔夫不安，没有人谴责这篇文章，利加乔夫运用这篇文章推行自己的、与戈尔巴乔夫改革不同的纲领，因此，戈尔巴乔夫在3月24～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戈尔巴乔夫并不反对刊登这篇文章，他反对政治局某些同志把它当成是标尺，他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在二月全会之后，是企图修正总书记的讲话，修正中央全会的决议的一次尝试”。[②] 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雅科夫列夫、梅德维杰夫、博尔金会同该报工作人员写的反驳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苏共高层实际上分裂了。通过这一事件，利加乔夫的影响力下降了，逐渐失去了主持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力，雅科夫列夫的地位加强了。

在1988年9月30日举行的中央非常全会上，葛罗米柯、索洛缅采夫辞职，政治局候补委员杰米契夫和多尔基赫去职，选举梅德维杰夫为政治局委员（没有经过候补阶段），选举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为中央书记。普戈担任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全会改组了苏共中央机构，成立了6个隶属于苏共中央的委员会：党的建设和干部政策委员会（主席为拉祖莫夫斯基）、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是梅德维杰夫）、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是斯柳尼科夫）、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是利加乔夫）、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是雅科夫列夫）、法律政策委员会（主席是切布里尼科夫）。通过这一变动，原来由利加乔夫主持的书记处实际上被取消了，此后，书记处就没有再开过会，直到苏共二十八大书记处的职能才恢复。戈尔巴乔夫此举是为了削弱利加乔夫的权力和地位，利加乔夫失去了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在领导层中的影响力大大降低了。

苏联转入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后，为反对派提供了参与政治合法的途径和舞台。从1988年12月起，苏联开始进行人民代表的选举。自由竞争和差额选举是这次人民代表选举的最大特色，各种各样的候选人纷纷

①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589页。
②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457页。

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宣传材料铺天盖地地散发，演讲、集会、游行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受欢迎的是敢于诋毁共产党的激进民主派，出现了所谓的“叶利钦现象”，即党委支持的候选人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党的机关没有好感的人却变成了得到人民强有力支持的人。在竞选活动中，利加乔夫再一次遭受打击，有人无中生有地说他有贪污行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保护他，在参加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中，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得到的反对票最多。

叶利钦和利加乔夫离开高层决策中心，但高层同样没有形成以戈尔巴乔夫为核心的坚强的领导集体，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与雷日科夫意见不同，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雅科夫列夫也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到 1990 年 10 月，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辞职，12 月雷日科夫辞职，按见证者雅科夫列夫的看法，“1989 年到 1991 年期间，保守派和改革派在中央争斗的结果是谁也没有取得胜利。失去了在转向市场时本来可以利用的极重要的有利条件，即联盟范围内的大市场”。[①] 戈尔巴乔夫任命普戈为内务部长、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帕夫洛夫为总理，这些被新提拔上来的人，实际上更不认同戈尔巴乔夫，正是他们在 1991 年 8 月 19 日发动政变。这场政变的结果是苏共的消亡，戈尔巴乔夫在回忆他为什么发表建议苏共自行解散的声明时说：“沙赫纳扎罗夫从福罗斯回来后，曾打电话给扎索霍夫说：‘请您赶快去医院找伊瓦什科，要求立即解救被囚禁在福罗斯的总书记，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扎索霍夫去了，政治局也召集了会议，要求同总书记见面，但是并没有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就是当时的全部真相。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同这些人一起在政治局见面，同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呢？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这一切情况都明朗化后，我宣布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因为我不可能同搞反宪法武装政变、公开欺骗党和人民的人继续一起合作。同时，我号召共产党员们，在当地组织起来，集体讨论自己活动的组织形式，作出自己的选择。”[②] 八·一九事变使苏联共产党这个有着 93 年历史的政党不复存在了，联盟国家解体的进程也加快了。

---

①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 186 页。
② 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第 39 页。

（二）苏联共产党的联邦化与分裂

苏共党内许多人对戈尔巴乔夫实行的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政策以及社会上出现的民族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潮并不认同，对苏联的前途表示担忧，退休在家的原莫斯科州委书记科诺托普 1989 年 6 月 15 日写给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委员的信就很有代表性，他在信中列举了社会上出现的民族主义、歪曲历史、诋毁列宁、攻击强力部门等许多现象，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错误的，“我认为，我们不可饶恕地、过早地在计划体系尚未完善的时候就将其摈弃，转而依靠‘超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经济’理论，我们过早地抛弃了党的领导作用，首先是党的干部政策，转而依靠缺乏应有纪律和严格秩序的、虚构的自愿人民政权制，将我们的‘议会’变成资产阶级的议会更是灭顶之灾，因为在那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只有‘美元’和富商们才能行使真正的权力。也可以这样形象地说，他们愿意饶恕谁就饶恕谁，愿意将谁处死就处死谁。人民代表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蛊惑人心者，而人代会有时就像是个大戏台，并非偶然”。[①] 苏共内的正统派希望摆脱戈尔巴乔夫，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后，许多人要求不让戈尔巴乔夫兼任党的总书记，在 1990 年 3 月第三次人代会上就“被选为苏联总统的人不能兼任其他政治和国家职务”进行了表决，结果在 2250 名代表中，赞成票 1303，反对票 607，未获通过。[②]

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使苏共失去了对苏维埃的控制，它导致政治家和党员不再对苏共中央负责，而对选民负责，导致地方分离主义发展，联盟中央失去权威。这使苏共联邦化，1990 年 1 月立陶宛共产党率先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原来作为维系国家统一力量的苏共无法再发挥作用。在这一进程中，俄罗斯共产党的建立既是苏共联邦化的表现，也是苏共党内正统派发展的结果。

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它没有共和国的党组织，实际上苏共依托的就是俄罗斯。在改革的过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在发展，1989 年 12 月成立苏共中央俄罗斯局，没有什么作为。要求成立俄罗斯共产党的

---

① 《科诺托普就民主化与公开性问题致信戈尔巴乔夫》，《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521 页。

② 阿·亚·索布恰克：《苏联政局演变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徐小海等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 148 页。

呼声越来越高，利加乔夫对此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也很难顶住压力，只好放任自流。1990 年 6 月 19 日俄罗斯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这次会议变成了俄共的成立大会，其党员占苏共的 62%。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库普佐夫没有被选为俄共中央第一书记，当选者是波洛兹科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建立和党的重心从联盟中央向共和国的转移，主要是向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转移，使戈尔巴乔夫无法阻止在苏共党内出现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反对派”。[①] 伊万·波洛兹科夫和根纳季·久加诺夫在苏共遭到批判的时刻成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将它同联盟的领导层相对抗，从而对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导致苏联解体。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导者并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对戈尔巴乔夫持批评的态度，1991 年 1 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指出，改革发生了蜕化，“扩大民主，提高人们福利的改革都还没有实行”。“现在，自由派，如果准确地说，叫做右派或简称反动派，撕下了民主派的假面具。在宣布反共产主义是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后，便把那些已被推翻阶级的继承人、民族主义者、影子经济的投机分子，即受到苏维埃政权限制的所有人都集合到他们的旗帜下”。“现在我们再也不能谈及任何多党制，只有捍卫社会主义改革的苏联共产党。也有为数不多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他们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政治面目，那就是反共产主义。这些集团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是为了与苏联共产党作斗争，是为了夺取政权。我们没有什么公开性。如果说从前是苏联共产党垄断公开性的话，那么现在这种垄断已归与其对抗力量的一方。正是他们在对社会意识施加自己有腐蚀作用的影响”。[②]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政治上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行动上支持叶利钦与联盟争主权，投票赞成通过俄罗斯主权宣言。

1990 年 2 月，苏共中央公开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和民主纲领派的文件，承认了党内存在派别；政治局委员向党报告工作的制度在 1990 年 7

---

① 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第 145 页。

② 《波洛兹科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544～545 页。

月党的二十八大上实行了。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对派取得了民众更多的支持，在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开始讨好反对派，他公开说民主纲领派拟定的《民主纲领》中有许多建议是合理的，应当吸收进党纲草案中。面对党内主流派的压力，戈尔巴乔夫又同意苏共中央发表《致全苏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说《民主纲领》的起草人和“彻底的民主派”实际上是想把党搞垮，奉行从内部分裂党、使苏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方针，应当与走上同党作斗争之路的人划清界限，同派别集团的组织者划清界限。但是，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戈尔巴乔夫并未想实施。

苏联共产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党内派别林立、思想与路线极度混乱，正确思想和决策难以集中起来，使党本身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凝聚力，它已经没有能力来把握和左右政治局势，更无法带领人民群众前进了。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之间，叶利钦与中央委员会、政府之间的斗争对党的损害很大，特别是叶利钦在党的二十八大上抗议性地退党，对造成党的信任危机和党的瓦解起了不小的作用。1990 年 3 月苏联改行总统制后，党的权力受到进一步削弱，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在 1990 年下降了一半，叶利钦等人的威信急剧上升。[①] 1991 年 6 月 12 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加强了他同戈尔巴乔夫抗衡的地位，因为他是民选的总统，而戈尔巴乔夫是由人民代表选出的。叶利钦上任后便开始自行其是，他访问美国，表示要独立自主地与美国发展联系，表示俄罗斯不执行苏联政府制定的下一年的经济计划，禁止各政党和群众性的社会运动的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团体、军队和企业中设立基层组织和进行活动。对于叶利钦针对联盟中央和苏共的这些命令与决定，戈尔巴乔夫无力进行改变。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更是带头向联盟中央争权，直接导致了国家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对立肯定会把我们的国家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并使双方丧失理智，从而使我们的工作失去意义，因为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代会后开始的那场苏联与共和国的法律之战首先打击了经济，打击了人心与事业”。[②]

---

① 戈尔巴乔夫在 1990 年 1 月的支持率为 44%，12 月则降至 21%；73.4% 的被调查者支持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上的工作。转引自 Л. Н. 多布罗霍托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治对抗 1500 天》，新华出版社，1993，第 235 页。

② 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 454 页。

（三）党的民主体制建设明显滞后

戈尔巴乔夫在推行他的新思维时，不是依靠党的干部和党员，而是依靠全体民众，搞全社会的民主化，实际上把民主的次序搞反了，应该首先抓党的民主化，再搞社会的民主化，因为苏共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党，实际上是管理国家的权力机关。戈尔巴乔夫从社会的民主化开始，实际上成了让苏共交出政权，把权力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但由几千人组成的苏维埃本来只是个立法机关，内部纷争不断，根本无法行使行政权力，导致社会全面失控和混乱。戈尔巴乔夫欲通过改革改变党的形象，也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沉重的历史包袱使苏共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在80年代中期，苏共有党员约1920万，可以分成四部分。一是人数最多的普通党员，约1870万；二是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成员——从区委委员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约43.9万；三是各级领导机关的第一书记及机关干部，共8.6万；四是苏共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党的二十七大后为477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32人），党中央机关干部（到1990年1月1日为1363人），总共1812人。构成总数97.4%的普通党员在确定党的方针中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占总数2.3%的各级党委会成员（从区委委员到中央委员），权力只在自己的主管地区，在中央决策的范围内实际上也无权。从30年代初开始，斯大林把党的常设机关与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的关系倒置，这些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只起开会举手的作用。党内实际掌权的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30~32人）及中央组织部和办公厅的领导（15~20人），垄断了党内一切大权，他们只占党员总数的0.3%左右。[①] 这种权利失衡的现象导致了苏共领袖专权，广大党员没有自主性、主动性和自律精神，他们认为党的政策和决议与自己无关，只是驯服地执行上面的指示与命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应该改变这种情况，恢复党的生机与活力。

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从体制机制上改革党，他只是一味地变动干部，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到1986年3月6日苏共二十七

---

① *Оников Л.* КПСС：анатомия распада.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аппарата ЦК. М.：Республика, 1996, *с.* 75.

大闭会，戈尔巴乔夫对苏共最高领导层进行了4次重大的人事变动：有2人从政治局候补委员递升为政治局委员（切布里尼科夫、谢瓦尔德纳泽）；有2人从中央书记处跃升为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雷日科夫）；有2人由中央委员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塔雷津、索科洛夫）；有3人从地方调任中央书记（尼科诺夫、叶利钦、扎伊科夫）；有3人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格里申、吉洪诺夫、罗曼诺夫）；解除了76岁的鲁萨科夫的书记处书记职务。与此同时，对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政府各部委、各共和国、市和州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调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17名正副主席中有8人被撤换，部长会议13个正副主席中有7人退休，新提拔了7人；有3个共和国的党中央一把手被解职，6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9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易人，35个部长、46个区委第一书记易人。苏共二十七大组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新班子，政治局委员有：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葛罗米柯、扎伊科夫、库纳耶夫、雷日科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尼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和谢尔比茨基。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杰米契夫、多尔基赫、叶利钦、斯柳尼科夫、索科洛夫、索洛维约夫、塔雷津。中央书记有：戈尔巴乔夫、比留科娃、多勃雷宁、多尔基赫、扎伊科夫、齐米亚宁、利加乔夫、梅德韦杰夫、尼科诺夫、拉祖莫夫和雅科夫列夫。有1/3的中央委员是新人，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葛罗米柯、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利加乔夫4人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亲密支持者，戈尔巴乔夫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感到改革受到了阻碍，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决定》。全会提议修改选举法，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各级干部均在党委会的全体会议上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企业各级领导的选拔与更换也必须通过选举。但在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及各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仍然掌握着干部的任免大权，党员和民众对干部的任免影响并不大。如：1988年9月30日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普戈被选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0月4日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召开全会选举新的第一书记，其程序与以前并无实质区别，先是普戈谈形势和对第一书记职务的要求，然后他推荐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亚·瓦戈利斯为候选人，并强调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已经跟瓦戈利斯谈过话，政治局支持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关于瓦戈利斯为第一书记候选

人。推荐阿·戈尔布诺夫为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①] 绝大多数人的发言都支持普戈的动议，但也有人提议应该举行秘密投票，把阿·戈尔布诺夫也列入第一书记候选人名单，最后还是把亚·瓦戈利斯一人列为秘密投票的候选人，他也高票当选（117票），没有人投反对票，有2票弃权。

虽然戈尔巴乔夫强调实行民主，但这种民主并没有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上，党的领导与决策并没有实现民主化与科学化，一方面是党内派别林立，另一方面仍然是个人专断，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制约，许多重大问题都由戈尔巴乔夫一人说了算。戈尔巴乔夫在安排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时，常常让不同的人负责同一项工作，如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都负责意识形态工作、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都在对外政策上有发言权等。博尔金在评述这件事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挑起大家冲突和争吵的本事实属罕见，我始终不明白，他是想利用这种关系的不协调来达到轻松地领导政治局的目的，还是由于个人性格和缺乏必要的经验才造成这种局面。但是，最后只有一个结果——政治局会议上互相拆台，常常无法通过一致的决定。"[②] 1989年底，苏联人民代表在一份声明中对苏共的评价是："作为积极的群众性政治组织的苏联共产党，一般说来已不存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宣传职能。像从前一样，它只是一个自我产生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加入了许多努力工作的人和有理智的人，但是他们不占大多数，而主要的是作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系统的机关，其中包括国家机关，按起源和职能而言属于极权机构，与真正的改革并不相容。"[③]

由于举措失当，戈尔巴乔夫欲通过改革改变党的形象，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据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990年10月24日至11月5日在党员中进行的社会调查显示，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威信，67%的被调查者认为它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20%的共产党员对自己的党员身份持动摇、中立、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虽然表面上没有退出苏共，实际上已不参加党的政治生活，不参加会议，

① 《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八次全会记录（1988年10月4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苏联历史：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25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

② 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228页。

③ 《苏联人民代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摘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28页。

也不交党费。半数以上的党员拥护取消企业、军队、法院、检察院、内务机关中的党组织。[①] 共产党员对党的态度尚且如此，党在普通民众中的威信与地位可想而知。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没有反对政变。中央委员会未能采取坚决的立场去谴责和阻挡，没有发动共产党员去同践踏宪法的行为作斗争。阴谋家中竟有党的领导干部。许多党委会和大众新闻媒体支持了国事犯的行动。这将共产党置于错误的境地。许多党员拒绝与阴谋家们合作，谴责政变并且加入到反对政变的斗争中。谁也没有权利对所有共产党员进行无理指控，而我，作为总统，认为有责任保护他们，作为公民免受无理的指控。在这种局势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该做出艰难的、但是很切实际的决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我认为自己不可能继续履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能，并让出相应的全权。我相信，忠于宪法和社会振兴方针的充满民主精神的共产党员们，一定会主张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同一切进步力量一起，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继续推行根本的民主改革的党。"[②] 在解散苏共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没有召开任何会议，一句"建议苏共自行解散"的话就把这个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无产阶级政党解散了，恰恰说明戈尔巴乔夫没能实现党的民主化，苏共仍是一个听命于总书记的党，这样的政党很难承担起改革的重任，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完成改革事业。

总之，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新思维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改变苏联国家的停滞状态，使社会主义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在6年的改革中，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目标在变化，实现新思维的方法与途径也在变化，新思维的目标（不管是最初提出的，还是最后确立的）并没有实现，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没有成功。但是，戈尔巴乔夫及苏共提出社会主义应该为人服务，人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等思想还是值得研究的，新思维实践中的教训也是值得总结和吸取的，不能因为苏共失去执政地位就对此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

① 陈爱茹编译《苏共解散前夕共产党员的情绪》，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

② 《戈尔巴乔夫关于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的申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51页。

分崩离析：民族问题的总爆发与苏联解体

中共中央党校　左凤荣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改革的进行，长期被掩盖的民族问题也浮出了水面，从80年代末期开始愈演愈烈，从要求本民族权利的民族主义发展成民族分离主义，这一问题的恶性发展直接导致了苏联这个联盟国家的解体。

苏联的民族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苏联官方宣称民族问题早就解决了，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法国学者埃莱娜·唐科斯在1978年出版的《分崩离析的帝国》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苏联的民族问题，他认为，"六十年中，苏联政府完成了一些巨大的社会改革工作。无疑它遇到过许多问题。但在它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该书分析了苏联存在的大量民族问题，认为"苏联不是一个消除了一切差别的完全统一的大家庭，各民族对自己领土和文化的感情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这些大小不同、情况各异的民族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与中央政权发生了明显的

危机”。[①] 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休·塞顿－沃森认为，“苏维埃时代，俄罗斯化重于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化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政策，而是苏维埃帝国政治、经济集中化政策的意外结果。苏维埃自1917年至今，苏联领导人从来没有因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而狂热过，其言辞恭维了俄罗斯民族，而其行为却在清除俄罗斯的文化遗产”。[②] 萨哈拉姆·阿卡巴扎德则指出，苏联相信它拥有对它的成员共加国和土地的全部主权。因此在苏联统治的近70年里，俄罗斯人在全苏联居于支配地位。这就使苏联境内各民族产生了一种被侮辱感，于是想恢复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及民族文化，而当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之时，非俄罗斯人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各国便向统一的苏联民族的神话发起挑战。他们拒绝接受他们是自愿加入苏联这一官方说法。他们要求复兴他们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直至真正的自治以至独立。[③]

由于民族政策上的偏差和失误，美国学者大卫·安兹和米切尔·科兰明确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民族主义已经在全国各个部分复兴，以至于海伦·凯勒预言“莫斯科面对的所有问题中最紧迫的和最顽固的就是由少数民族提出的”。[④] 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邓洛普认为，“如果将来的领导人中包括一些民族主义者或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同情者，那么他们就会采取有力的措施改善苏联俄罗斯人民的条件，其产生的副作用很可能是俄罗斯民族撤离边境，放松对非俄罗斯地区的控制。这种让步减轻了压力，从而促进了真正的联邦制的产生，甚至导致某些边境共和国脱离联盟”。[⑤] 西方学者还注意到了国际的影响，在20世纪更加广阔的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是重要的政治话语，而苏联的民族群体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因此，正是长期被苏联政府和戈尔巴乔夫所忽视的“民族的叛乱”最终毁坏了这个社

① 埃莱娜·卡·唐科斯：《分崩离析的帝国》，郗文译，新华出版社，1982，第271、215页。

② 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刘靖北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9页。

③ Shahram Akbarzadeh,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of the USSR and Formation of the Independent Republics*, *History Behind the Headlines: The Origins Of Conflicts Worldwide*, Michigan: The Gale Group, 20001, pp. 252 – 265.

④ David MacKenzie and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 co., 1993, p. 734.

⑤ 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201～202页。

会主义国家。[①]

美国学者科恩把苏联解体看成是一场悲剧，认为苏联完全可能通过渐进的改革拯救自己，就像美国废除奴隶制那样。他不同意把苏联说成是一个帝国或特殊帝国的解体，而是从另外的角度解释苏联的解体，即苏联的解体不同于其他帝国（包括俄罗斯帝国）是战争或革命的结果，促使苏联瓦解的力量不是边远殖民地区的分离主义，而是“帝国”自身的中心地区的政治领导。他认为经济因素在苏联解体中不是主要的，“苏联是被政治而不是经济打垮的”。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是个人因素，主要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的争夺。[②] 英国学者雷切尔·沃克与科恩的观点相近，他说当俄罗斯“决定收回自己的主权时，‘中央’就会失去维持其权力的财富来源，戈尔巴乔夫成了没有国土的总统，苏联政府成了没有领土可以统治的政府”。[③]

苏联民族问题的总爆发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直接相关，尽管苏联一直存在民族问题，但没有合适的条件和土壤，这一问题处于隐蔽状态，美国施罗德教授研究了苏联发展日益缓慢的经济，他认为，“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导致族际关系紧张和民族冲突的潜在因素大量存在着。尽管民族主义活动会时常发生并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但是，在没有严重的国内剧变或国际冲突的条件下，很难相信它们会对现存的政治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④] 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这一问题被压住了，民主公开性之风把它吹开了。

中国学者也很重视对苏联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之间关系的研究，赵常庆等著《苏联民族问题研究》一书从沙俄时代讲起，从理论到实践分析了苏联的民族问题，并有专门一章论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族问题，概述了这一时期民族问题的表现、产生的原因、解决的措施。该书认为，“苏联民族问题的产生、激化直至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苏

---

① Robert Strayer, *Why Di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Change*,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p. 36.

② *Коэн С.* “Вопро вопросов”: Почему не стал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Спб, 2007, c. 67－68、77、95.

③ 雷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张金鉴译，改革出版社，1999，第167页。

④ 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177～178页。

联的解体与某些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膨胀有很大关系"。对于民族问题与苏联改革的关系，赵常庆等人认为"民族冲突是造成戈尔巴乔夫改革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①] 吴楚克的《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一书，也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论述了苏联的民族问题，他的观点显然与赵常庆等人不同，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放弃共产党领导权以及和平演变是导致苏联裂变的根本原因。[②] 此外，在一些有关苏联兴亡的著述中，也大多涉及民族问题。[③] 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著述的一个共同的弱点是没有对当时发生的涉及民族问题的重大事件进行详细的分析，大多只是一笔带过；在史料的运用上，也基本上以当时的报刊资料为主。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伊始并没有意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接受的是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的观念。事实是苏联的民族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苏联的民族问题是长期积累的问题，这里既有民族理论本身的欠缺和民族政策的失误，也有外部世界的影响，更有国家体制不合理带来的问题。在改革年代民族问题的出现是正常的，戈尔巴乔夫的失误在于没有正视这一问题和及时化解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在革新联盟的问题上缺乏远见。本文认为，民族问题的爆发引发了苏联的解体，也葬送了苏联的改革，但苏联的解体不是必然的，是许多政策失误的结果；在资料的运用上，本文尽量用一些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记述。

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民族问题总爆发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沙皇俄国时期，由于不断向外扩张，俄国吞并了周边许多大大小小的民族，形成了多民族国家。在苏联时期，虽然出现过许多侵害少数民族的事件，但其成就也是不容否认的，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很大发展，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民族融合的趋势也在发展，形成了许多由不同民族成员组成的家庭。据统计，不同民族成员组合成的家庭在 1979 年占家庭总数的 14.9%，1989 年占

① 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 196、189、194 页。

② 吴楚克：《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 11 页。

③ 如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7.5%（在7710万户家庭中合成家庭有1280万），如果加上这种家庭的双方父母家，其数目更大。用俄语作为交际语言的非俄罗斯族人在1926年是640万人，而到1989年已经达到1870万人。[①] 到1989年苏联有2.867亿人，其中俄罗斯族有1.452亿人（占50.6%）。在俄罗斯俄罗斯族占1.474亿人的81.5%，81.4%的苏联居民、88%的俄罗斯居民认为俄语是自己的民族语言并能自由掌握。[②] 苏联领导人很得意，认为苏联已经成功解决了民族问题，形成了“苏联人”共同体，实际上苏联的民族问题并没有解决，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一）苏联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苏联的国家结构是按民族属性划分的，结构特别复杂，苏联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区，共有53个之多。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有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5个民族自治州和10个民族自治区，其中有4个是两个民族共同自治的。据1989年的调查，在俄罗斯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中，多数的冠名民族都不占多数，如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人只占21.9%，俄罗斯族人占30.3%；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人只占24%，俄罗斯族人占70%；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人占45.4%，俄罗斯族人占37.7%；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卡累利阿人占10.0%，俄罗斯族人占到了73.6%；科米自治共和国，科米人占23.3%，俄罗斯族人占57.7%；马里自治共和国，马里人占43.3%，俄罗斯族人占47.5%；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摩尔多瓦人占32.5%，俄罗斯族人占60.8%；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乌德穆尔特人占30.9%，俄罗斯族人占58.9%。民族人口占多数的自治共和国只有：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奥塞梯人占53.0%；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鞑靼人占48.5%，俄罗斯族人占43.3%；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图瓦人占64.3%；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楚瓦什人占67.8%。由两个民族共治的自治共和国，力量也是不均衡的：车臣一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车臣人占57.8%，印古什人只

① *Барсенков А. С.*, *Вдовин 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38 – 2002.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3, с. 307.

② *Барсенков А. С.*, *Вдовин 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38 – 2002. с. 308.

占12.9%，俄罗斯族人占26.7%；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人占48.2%，巴尔卡尔人只占9.4%，俄罗斯族人占32%。在五个自治州中，没有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如犹太自治州犹太人只占4.2%，俄罗斯族人的比例高达83.2%。在10个民族自治区中，只有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的冠名民族的人口占了多数，其余都是俄罗斯人居多，超过半数。[①]"在这种结构下，有一些民族自然产生了为了拉平和提高自己的'国家'的地位或者获得这种地位的想法"。[②]

苏联这种以民族属性划分国家行政区划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为什么有的民族可以建立共和国、自治共和国，有的只能建立自治区，有的还没有这样的权利；有的自治共和国建立了又被随意取消，如伏尔加河日耳曼人共和国和克里米亚鞑靼人自治共和国；有的民族自治地区显然名实不符，冠名民族并不占多数。这一方面造成了对民族属性的强化，苏联国民首先认同的是民族属性，而不是国家属性；另一方面造成国中有国，各行政区之间人口、面积、经济实力极不平衡。

（二）苏联的联邦制潜伏着巨大的冲突

俄罗斯帝国解体后，在后来苏联领土的范围内，在法律地位上与俄罗斯联邦并列的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它们各有自己的行政建制——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有自己的军队和货币。在国内战争时期，在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共和国通过与俄罗斯联邦签订双方条约这一形式，结成同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在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联合的人民委员部（包括军事、财政、劳动、交通、邮电等），这些委员部在各共和国驻有全权代表。国内战争结束后，如何处理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各共和国的关系问题提上了日程，在成立国家联盟的问题上，列宁与斯大林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斯大林当时负责民族事务，他拟定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

①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522页。

② *Барсенков А. С.*, *Вдовин 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38－2002. с. 309.

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称为“自治化”方案），要求其他民族国家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赞成，白俄罗斯主张维持现状，实际上反对这样做，乌克兰干脆不予理睬，格鲁吉亚坚决反对。列宁认为，这个“自治化”方案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他主张：“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①]

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建立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列宁也不赞成国家分裂成许多小国。斯大林与列宁分歧的根本点在于：斯大林没有完全理解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想用行政压制的办法解决问题，而列宁认为通向这一联盟的道路是自愿的，不能靠暴力。早在1917年10月列宁就说过：“我们希望俄罗斯（我甚至想说大俄罗斯，因为这样更正确）人民的共和国能把其他民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但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暴力，而是完全靠自愿的协议。否则就要破坏各国工人的团结和兄弟般的联盟。”“‘自决’一词曾多次引起曲解，因此我改用了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自由分离的权利’”，“我们尤其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因为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压迫在邻近的民族里留下了对所有大俄罗斯人的极深的仇恨和不信任；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来消除这种不信任”。[②] 这里体现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承认分离的自由，但并不等于鼓励分离。

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还表现在国家体制上。斯大林坚持把苏联建成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列宁则主张建立名副其实的联邦制国家，在这个联盟国家里，首先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决裂。列宁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共和国的权利，他说：“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其他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这个方面应制定极严格的规章”，“这里要有一个详细的法典，这个法典只有居住在该共和国内的本民族的人才能够比较成功地拟定出来”。“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213、21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69、370页。

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①] 列宁主张，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联盟内各成员国间的平等，靠联盟能增进各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时正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政策主张是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放开手脚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1922 年 12 月 30 日，苏联成立，并得到各民族的接受与认同，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存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但这些国家都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统一的；乌克兰等少数民族为能与大俄罗斯民族在联盟中拥有平等的权利而感到满足；面临着共同的来自资本主义方面的外部压力。在苏联成立之时，斯大林虽然接受了列宁的建议，收起了“自治化”方案，但列宁的设想并未完全变成现实。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斯大林仍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没有让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作为平等的成员加入联盟（它们以外高加索联邦的名义加入，1936 年它们才各自成为加盟共和国），主要原因在于格鲁吉亚是“自治化”方案的坚决反对者。虽然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但随着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变成了单一制国家。苏联成立时，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部级机关只有 10 个，到 1947 年，部长会议下设的部已达到 58 个，到 1982 年，苏联有 33 个全联盟的部和 31 个联盟兼共和国的部，6 个全苏国家委员会和 14 个联盟兼共和国的国家委员会，总计 84 个。再加上其他中央直属机关 26 个，总数已达 110 个。在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央集中了大量的权力，地方权限很少，各加盟共和国根本就没有自主权，它们支配的工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 10%。苏联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用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人为地在全国搞劳动分工，常常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如乌兹别克生产棉花，棉布却不能自己生产；土库曼斯坦产天然气，这里 90% 的居民却用不上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是畜牧业基地，肉的供应却很紧张。中央迫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把哈萨克斯坦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又把乌兹别克适宜种粮食的土地划给哈萨克斯坦，把乌兹别克适宜放牧的土地划给塔吉克斯坦。这些共和国感觉没有平等地位，它们只是中央命令的执行者，根本就谈不上有自己的经济自主权。这种单一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55 页。

性体制的权力不平衡潜藏着严重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苏联在事实上是单一制国家，而在宪法上却是联邦制国家，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宪法和国语，在1924年宪法中规定了每个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载有“共和国主权”的提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的疆域，非经该共和国的同意，不得变更”。1936年宪法甚至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发生外交关系、签订协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领事，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有本共和国军队的编制。1977年宪法中也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只是没有具体细则，因为根本没打算实行。既然宪法规定了各民族国家有退出联盟的“自由”，所以当各民族国家纷纷宣布独立于苏联之时，许多人认为他们这样做并没有违背宪法。

（三）民族不平等政策留下的隐患

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的民族地区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也出现了大量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斯大林时期造成的，后来的领导人又没有很好地解决。戈尔巴乔夫当政后，仍然面临着这些问题，民族问题的突然爆发，严重干扰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在行政区划的问题上，斯大林在划分各地区疆界、分配自然资源和土地时，并没有完全按民族来划分，几乎各共和国都有其他民族的聚居地，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也是犬牙交错，留下了许多隐患。

在确立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中，斯大林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落后的中亚地区，强行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严重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在30年代大清洗的过程中，许多民族地区的领导人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被处死或关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对少数民族不信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40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又以与德军勾结为名，把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整个民族驱逐到中亚，许多人在迁移过程中死亡，新居住地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劳改营，斯大林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整个民族进行惩罚给这些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是

苏联民族关系史上极不光彩的事件，成为影响苏联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苏共二十大后，苏共为一些少数民族平反，并允许他们返回原住地，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如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等虽然得到平反，但不允许他们返回原住地，也没有恢复他们的民族自治实体。1987 年 7 月 9 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44 年来我们积累了 250 卷要求恢复公正的签名和声明。"①

斯大林在语言文化上推行俄罗斯化政策，30 年代哈萨克人通常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被拉丁字母，后来又被基里尔字母所代替。纳扎尔巴耶夫深有体会地说："苏联的民族政策是从俄罗斯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不管用怎样响亮的意识形态口号来加以掩饰，他们总是在继续，时常以更残酷和反常的形式继续沙皇制度下开始做的事情。这个制度也好，那个制度也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对待民族边区方面都推行一种强硬的政策。无论是这个，还是那个制度，从来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注意地方居民的利益，对他们的所有抗议行动一律残酷地进行压制。"②

（四）苏联时期扩张和兼并的影响

斯大林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逐渐放弃了列宁关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俄国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的传统提法，把反对所谓地方主义倾向放在首位，地方上的一些合理要求往往被他当成地方民族主义进行反对。在卫国战争期间，各民族的人里都有投敌行为，如弗拉索夫率领的"俄罗斯解放军"大部分人是俄罗斯人，斯大林对此却闭口不言，在 1945 年 5 月 24 日招待红军将领的讲话中，他说：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斯大林努力为沙俄的侵略扩张辩护。他批评恩格斯 1889 年 2 月写的《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他说："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当作一篇指导性的文章，或者不管怎样，从说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角

---

①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 108 页。

② 努·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命运、个人》，陆兵、王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 130 页。

度来看，总是一篇对我党工作人员极有教益的文章。然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从它的内容中就可看出，尽管有其优点，可惜却不具备这些性质。不仅如此，它还有许多缺点。如果文章发表时不加批判，这些缺点是会把读者弄糊涂的。”他用讥讽的口吻说：“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性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出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1]

斯大林极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欲把十月革命后失去的沙俄旧有领土收回，斯大林利用二战前后的有利时机，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于1944年10月10日从中国吞并了唐努乌梁海地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得到了687707平方公里的土地。莫洛托夫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了斯大林的别墅。那地图并不大，只有小学生教科书那么大。斯大林用摁钉把它钉在墙上，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边界：‘这里的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上的中国一带画了一圈，‘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指土耳其海峡——引者）。”[2] 在日本投降时，斯大林发表的《告人民书》中，把苏联对日本的胜利看成是对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报复，是为战败的沙俄雪耻。他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

①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第2～3、5页。

②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王南枝等译，新华出版社，1992，第15～16页。

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这就是说，萨哈林群岛和千岛群岛将归苏联所有，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①

斯大林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成为影响苏联稳定的重要问题。1939年8月23日，在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及1939年8月28日签署的苏德秘密议定书，把波罗的海三国划归了苏联。1939年9、10月间，苏联又分别与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签订互助条约，规定苏联在三国境内有驻军、建筑军港和空军基地的权利，但是，斯大林并不以此为满足，1940年6月，苏联照会三国政府，指责他们对苏联不友好，提出三国应该改组政府，8月初苏联正式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联此举超出了苏德秘密协议的范围，希特勒十分不悦，苏德就此举行了会谈，并于1941年1月10日签署秘密议定书，为了补偿德国的损失，苏联政府向德国支付750万美元，相当于3150万马克。三国加入苏联后，斯大林把数以十万计的当地居民强迫迁至苏联内地或驱逐出国。波罗的海三国始终存在着要求独立的势力，当地的反抗从未停止过，为苏联解体留下了隐患。

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奉行民主化与公开性政策，这为长期被压制的民族问题的浮出提供了条件，民族问题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其表现也多种多样：有以立陶宛、格鲁吉亚为代表的反抗联盟政权的民族分离主义；有少数民族反抗共和国主体民族的运动，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为代表；有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支持俄罗斯脱离苏联的运动；有受到斯大林不公正待遇的民族要求返回家园的斗争。在这里，地方领导人的自私行为和权欲起了很大作用。

1988年初在戈尔巴乔夫规划下一步的改革步骤时，民族问题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挡住了去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苏姆盖特市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第比利斯事件、波罗的海三国的

① 《斯大林文集》，第470页。

民族运动等接踵而至，这些民族冲突各有各的原因。但是，戈尔巴乔夫及苏共领导对许多突发的民族冲突事件处理失当，民族冲突的战火没有被熄灭，最后烧掉了苏联这个多民族联盟的大厦，也终结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对民族矛盾估计不足

苏联共产党长期把民族问题等同于阶级问题，认为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民族问题也解决了，对民族问题的评价一直都比较乐观，认为苏联各族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各族人民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经形成了。戈尔巴乔夫也深信这一点，对民族问题估计不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改革开始时，并没有涉及任何民族问题方面，在 1986 年 2 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苏共纲领中，声称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得到顺利解决。在 1987 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 70 周年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宣布：“民族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革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社会经济上为民族平等铺平了道路，为拉齐所有共和国、所有区域和所有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做了特别多的工作。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是十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①] 在 1987 年 11 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盛赞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如果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会像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作，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②] 戈尔巴乔夫看不到苏联在民族问题上长期积累的问题。在改革的开始阶段，他认为苏联在民族方面存在的一些矛盾是理所当然的，如民族自我意识提高，表现出一些民族主义倾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第 32 页。

②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岑鼎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第 101 页。

向，不尊重其他民族的人的情绪，他要反对民族局限性和沙文主义、地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的任何表现，加强族际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苏共的公开性、民主化政策，为民族主义的全面爆发提供了条件，给他们提供了公开要求自己的权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绝好机会。在改革的气氛下，长期被压抑的民族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在民族问题上首先敲响警钟的是1986年3~4月间发生在雅库茨克大学一批俄罗斯青年和雅库特族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接着是阿拉木图事件，1986年12月16日，苏共中央在未与哈萨克当地领导人商量的情况下，任命非哈萨克族出身的科尔宾取代库纳耶夫，引发民族骚乱。苏联当局把这看成是民族主义的抬头，采取了强力手段进行镇压。戈尔巴乔夫后来反思说："12月25日，政治局通过一份十足传统的决议，目的并不是分析事态发生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而是要给点颜色让哈萨克斯坦、同时也让其他地方瞧瞧。人们遵循着这么一个业已形成的概念：一切都应当本着统一和友谊的轨道办，惟一的危险便是民族主义的本能暴动。这种暴动并非由于存在实际问题，而是历史遗祸，是外部力量的影响所致。"[①] 此事实际上是已经复兴的民族主义在苏联改革时期的第一次公开表现，其警示作用本应该受到苏联领导人的重视，但戈尔巴乔夫却未予以重视，失去了在民族问题尚未转化成危机前调整民族政策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乐观并不能消除民族问题，1988年2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尖锐化，2月18日戈尔巴乔夫提出在二月中央全会上专门讨论族际关系问题，"只有在尊重各民族的成就、荣誉、文化、语言和历史时，在尊重各民族间广泛的共同性时，才可能有真正的族际主义和各族间真正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是我们最伟大的价值观。与此同时，任何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都是与之不相容的。民族主义的任何形式都是盲目无知的"。[②] 他强调按列宁的理论与实践原则处理民族问题。在2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才真正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应该给这些问题排排队。现在应该首先结束亚美尼亚混乱的局势，我们已授权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507~508页。

②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 АСТ, 2007, с. 23.

（中央）书记处：着手研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心平气和地研究，也不要弄明白多少就公布多少。在此要让他们的人也参加，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应该成立一个代表委员会：由学者、知识分子组成，而不要只让党务和政工工作者参加。政工人员总是过多地束缚于分析事实的工作上：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现在应该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委员会，指定领导人，让他们去考察、访问、讨论。"①

鉴于第比利斯事件，1989 年 4 月 10 日，苏共意识形态部部长、法制部部长、党的建设与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给苏共中央提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关于维护法制的报告，要求转给各地方党委，他们指出："今年 4 月 10 日塔斯社报道的关于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局势的尖锐化情况，又一次表明了各地方党、苏维埃和维护法律各机关适时地采取预防措施的全部必要性。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各边疆区及各州党组织注意，必须对每个地区正在形成的局势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必须进行有效的、杜绝各种反社会现象的工作。党的委员会和基层党组织应保持高度警惕，在对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评价中不允许温情主义和无原则性，坚决杜绝任何旨在动摇国家基础的谰言，不放过任何一次违背法律的行为。……建议各党委会仔细研究执委会关于竭尽一切努力巩固每个地区的纪律、秩序和组织性的补充措施。"② 但没有见到苏共中央下发这个通知。

民族问题日益尖锐，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明显滞后，苏共中央终于决定于 1989 年 9 月召开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各地代表不同要求的信件寄到了苏共中央，有的说："今天我们国家民族团结已经动摇了，在一些加盟共和国里发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导致民族关系紧张的事件。极端主义分子成了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受到坚决抵制。在许多情况下共产党领导人给了他们主动权，而且佯装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有的说："只有把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变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它的国民经济才有可能完全按全苏劳动分工的原则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合理地综合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气候条件，物质和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600 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647～648 页。

劳动资源。”有的说：“拉脱维亚民族被逐渐淹没在外来人的海洋里。由此产生了民族磨擦和共和国改革力量分裂的现实威胁。”还有的说：“我们、俄罗斯人已经为民族间的实际平等工作了70年。因此，我们长期观察了至今仍没有正常生活条件的非黑土地带。俄罗斯人散居在各民族边疆区，而在那里他们经常被提醒，当地居民应当有特权。苏维埃政权教导我们所有公民不分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不可动摇的公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一原则不适用于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我接受的是明显歧视俄语居民的法律。”① 从这些信件看，普遍存在着不满，苏联的民族关系确实到了该重新研究和解决的时候了。

在1989年9月19~20日召开的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苏共纲领）》，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对苏维埃体制加以改造，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内容加以充实；扩大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的权利和机会；保证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为自由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创造条件；加强各种保障，以杜绝根据民族特征限制公民权利。② 但这个决议为时已晚，各地的民族主义已经发展起来，这个决议的针对性不强，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因此，很少有人对其感兴趣，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1940年并入苏联不合法。

改革联盟体制，从实际上的单一制向联邦制过渡，扩大共和国和自治体的权力，扩大地方的管理职能，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根本没意识到这一问题，没有对联盟体制及时做出修改，没有想到改组联盟。1989年5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我国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③ 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要划分联盟、共和国、自治区的权限。9月全会首次提出制订并签订联盟条约的问题，但直到1990年苏共中央2月全会后才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直到1991年春天才积极加入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进程中来。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基本错误在于，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22~525页。
②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22~123页。
③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21页。

他没有倾听加盟共和国要求赋予他们经济独立的呼声。除波罗的海诸国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含哈萨克斯坦在内，并没有追求分离、完全和盲目的独立。我们想到一点——可能会自我掌握本身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应及时向各共和国提供在联盟框架中最大的独立。我相信，国家可以避开以后很多动荡”。他认为，“如果哈萨克斯坦90%的工业置于莫斯科各部的监控之下，怎么可能独立地整顿经济局势呢？遗憾的是，我多次有关提供更多的经济独立的要求成了旷野呼声”。[①]

1989～1990年通过了扩大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权限的《关于苏联地方自治和地方经济的基本原则法》；明确保障民族语言自由发展和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法》，《苏联和联邦各主体成员间权限划分法》等。1990年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规定退出苏联的共和国要得到国民不少于2/3的赞成票之后才能宣布进入过渡期；其内部有自治实体的，投票要在自治实体中单独进行，这些自治实体有权决定留在苏联还是留在独立的共和国内。加盟共和国在退出苏联的决议通过后，要有一个过渡期，不超过5年，在过渡期内解决“要求退出的共和国在加入苏联时不属于该共和国的领土的地位”问题。但是，这个法令没人执行，没有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和退出苏联时走了这个程序，而面对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联盟中央没有任何办法。

苏共中央对民族冲突事件处置不当

虽然民族问题呈现出越来越尖锐化的趋势，但开始并没有马上提出脱离苏联而独立的问题。在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比较强烈，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存在着很强的反俄情绪，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主要是争夺纳卡州的归属。然而，由于苏共领导人处置失当，使得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激化。突出的有以下几次重大事件。

① 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命运、个人》，第60页。

（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发展成民族仇杀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在苏联南高加索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面积4400多平方公里，80年代末的人口约18万，80%左右是亚美尼亚人，信奉基督教。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行政中心为斯捷潘纳克特。1923年7月，在没有成立自治州之前，该地区属亚美尼亚管辖，叫汉肯德村。1923年7月7日成立自治州，为纪念邵武勉而改名，并由联盟中央政府决定，划归阿塞拜疆管辖，当时该州居民90%为亚美尼亚人。这是斯大林做出的决策，完全违背了该地区人民的愿望。对此，亚美尼亚一直十分不满，一有机会就要求联盟中央“纠正”。自1987年10月开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人们希望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由此使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两族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

1987年纳卡州的7.5万人签名寄给戈尔巴乔夫，要求将之与亚美尼亚合并，戈尔巴乔夫没有答复。1988年2月，冲突开始，亚美尼亚人开始游行和罢工，2月20日，纳卡州州委会以亚美尼亚代表110票对缺席的阿塞拜疆代表30票通过了致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呼吁书，要求把该州转归亚美尼亚管辖。苏共中央本应该纠正历史的错误，公正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苏共中央并没有立即着手解决这一问题。2月2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戈尔巴乔夫强调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反对改变疆界，他建议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共和国的领导聚集在一起，自己解决问题，他派利加乔夫和拉祖莫夫去巴库，派雅科夫列夫和多尔吉赫去埃里温，分别做双方的工作。政治局要求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使局势正常化，两国领导人对此都不满意。

1988年2月26日，戈尔巴乔夫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民书发表，呼吁两个共和国的居民在民主进程和法制框架内行事，认为现有民族地区布局的任何更改，都有损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现在最主要的事是集中克服复杂的局势，解决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态和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积累的其他问题……我号召你们表现出公民的成熟性和自制力，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维护社会秩序”。[1] 公开信的内容，立即引起亚美

①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c.25.

尼亚人的反对。当天，戈尔巴乔夫还会见了亚美尼亚创作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谈了对局势发展的担忧，要求大家保持团结和友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事态压下去，到2月26日，埃里温的示威人数就达到了100万人，并从和平示威发展到兵戎相见。那里的一切都已陷于瘫痪，一切都停滞了。附近一些村庄的居民也开始成群结队地涌向埃里温，抗议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内容。巴库也举行了示威游行，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市也立即发生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游行和骚乱，2月27～28日苏姆盖特发生了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两天内有32人被杀，其中亚美尼亚人有26名，100多人受伤，一些房屋和汽车被烧毁，许多亚美尼亚人的住宅遭洗劫，不少人遭殴打、强奸。一些10～100人不等的团伙在市内流窜，寻找下手的对象。当地警察没有干预，而实际上包庇暴徒，被拘留的20个人中16人被释放。[①]

面对日益尖锐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1988年2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通报说："集会者在发言中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卡拉巴赫的问题，它与亚美尼亚合并的问题。他们说，斯大林时代对这一问题的决定是错误的，是在众所周知的条件下强加给人民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因此现在应该在民主和改革的框架内解决。"[②]"现在，阿塞拜疆方面开始有反应了，首先是那里死了人，于是开始谣言四起。阿塞拜疆人由于担心遭到迫害已开始出逃，同时他们声明说，亚美尼亚人不让他们住在那里，于是导致了动荡。再说斯捷潘纳克特也不平静。现在阿塞拜疆那边也开始行动了。我似乎觉得阿塞拜疆的行动也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这在纳希切万表现得特别明显，那里也聚集了成群的人们"。[③]

亚佐夫通报了来自苏姆盖特的情况，一位将军在报告中说，部队刚好碰上一群年轻人胡作非为，于是驱散了他们，但这些人仍三五成群地继续为非作歹，他们烧毁汽车，行凶杀人，已经有14人被他们打死，还有许多人被送到医院。切布里科夫补充说：110人受伤。弗拉索夫通报说：有14人被打死，其中3名妇女，3名阿塞拜疆人，6名亚美尼亚人，其余两名死

---

① 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580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87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93页。

者身份正在调查，另外还有71人受伤，其中亚美尼亚人48名；6辆汽车被烧毁；在13座房屋里发生19起纵火案；政治教育所、公共汽车站遭到破坏；强暴案4起；54名警务人员遭围攻；已拘捕47名闹事者，其中有5名是趁火打劫者。[①]

戈尔巴乔夫也认识到苏姆盖特动荡不安，许多人趁火打劫，他同意国防部长下达命令，迅速把军校学员和其他部队派进苏姆盖特。他还协助空运了3000多名警察到那里。他们立即展开行动，到5点钟的时候已控制住了局势。对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及涉及的两个共和国，戈尔巴乔夫强调要稳定局势，他批评个别领导人卷人此事，“简短地说，现在应该控制住亚美尼亚，以免他们有过激的反应。我们原打算我们派往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同志能在星期一回来，这样我们可以在星期四交换一下意见，但现在我想，目前他们还得留在那里继续这一工作，而且还要加强。这项工作在亚美尼亚已经完成，但可能不够全面，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因此这项工作也要在这里继续。现在应该把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都动员起来。我们现在急需情报，但你就是得不到情报。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人隐情不报，老是捂着盖着。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和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都有个别同志卷入此事，他们不干正事，但是什么都知道”。“他们对这种情绪暗送秋波，并甘当俘虏，现在更是难以自拔。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全会支持公开信，但他们却要求成立委员会。他们现在走得太远了，并且还在不断地煽动人民的情绪。这是事实。但我们还是要理解这一点，并像人们所说的，给他们一次机会。我们就做一些让步，改变一下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但一定要保持局势的稳定”。他提出应该采取的措施：一是要大力吸收人民参与局势正常化的进程；二是采取措施解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积累的矛盾，防止内讧蔓延；三是要采取措施加强这两个加盟共和国间的交往。[②]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在苏姆盖特实行宵禁，戈尔巴乔夫强调不能开枪，以防伤到群众。但没有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做出决议，只是要求把近三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信件整理成专辑。戈尔巴乔夫强调：“我们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93～594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95～596页。

在民族事务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它超过了一切，这是基础，是运用改革和民主化阶段可以解决尖锐问题的基础。很明显，我们就应该这样安排工作，现在就立即结束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事件，分析其中的原因等等，仔细讨论。如果中央必须通过一项关于卡拉巴赫的决议，那也要等到共和国自己就其社会经济问题请求我们出面时再做。"[①] 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归属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苏共中央并没有做出裁决，戈尔巴乔夫还幻想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能达成协议，能够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苏共中央更换了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亚美尼亚，阿鲁秋尼扬取代了杰米尔强，在阿塞拜疆，韦济罗夫取代了巴吉罗夫，但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渗透到共和国的各级党组织中，对共和国的党政领导形成了压力，听命于莫斯科对他们不利。

1988 年 6 月 14 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同意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并入亚美尼亚；6 月 17 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重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仍旧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表明，这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不仅不阻止民族冲突，而且亲自参加和积极支持本国的民族主义者，这种倾向在其他地方也在发展，"越来越明显的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越来越得到党机关的支持。在苏联解体前，早在别洛韦日协定之前，党就开始依照民族原则解体"。[②]

苏共中央的政策是不能变更疆界，担心由此引发连锁反应，戈尔巴乔夫强调暴力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为了避免冲突演变成武装对抗，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决定自 1988 年 7 月 26 日起，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实行中央直接治理，并任命阿尔卡季·沃尔斯基为自己派驻斯捷潘纳科特的"全权代表"。1989 年 11 月，沃尔斯基结束毫无成效的使命返回莫斯科，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失败。

1989 年底巴库局势又激化，阿塞拜疆的人民阵线十分活跃，1990 年 1 月 13～15 日，一股反亚美尼亚和反俄罗斯的屠杀洪流在巴库出现，有数十人被殴致死，大批亚美尼亚人开始逃亡，"整个共和国到处都是暴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602 页。
②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 583 页。

行。有18个区的政权机构被捣毁，在与伊朗接壤的200公里长的边境线上，边防设施被毁坏”。[①] 1月15日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讨论巴库的问题，但没有就此问题做出决议，会议决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其他一些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巴库的局势继续恶化，许多非阿塞拜疆族人开始逃亡，18日晚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宣布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市内筑起了街垒，苏维埃和党的机构已不能控制局势，1月19日，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民书》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决定从20日零时起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1991年8月）。1月19日深夜军队开进巴库，与人民阵线的战斗队发生冲突，83人死亡，其中有14名军人及家属。[②]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没有得到及时制止，阿塞拜疆人民阵线逐渐发展壮大，掀起了民族仇恨浪潮，据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说：“在1988年，将近200万人口的巴库居住着20余万亚美尼亚人。这是继埃里温之后亚美尼亚居民人数最多的城市。冲突爆发之前，阿塞拜疆居住着大约50万亚美尼亚人。这是亚美尼亚境外该民族与其他民族混居人数最多的地方。可现在只有几千人继续住在巴库，主要是与民族通婚的妇女。”[③]

（二）第比利斯事件无人负责

格鲁吉亚民族是苏联所有民族中民族特征保持得最完整的民族，这个外高加索民族有着热爱自由的传统，富于反抗精神，“格鲁吉亚族只要觉察到稍有损害它的民族特征，它就最公开、最猛烈地进行反抗”。[④] 在苏联成立时，他们曾激烈地反对过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反对过苏联的民族一体化政策。在民主改革的气氛下，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组织发展迅速，1987年末开始成立了各种团体和组织，如“伊里亚·恰夫恰瓦泽协会”、“圣伊利亚真理会”、“格鲁吉亚民族正义联盟”等，还成立了以尚

---

①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623页。

② АГ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Фонд 10, опись 2,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125。

③ 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第104页。

④ 埃莱娜·卡·唐科斯：《分崩离析的帝国》，第206页。

格拉亚、奇亥伊泽和其他文化活动家为首的人民阵线，他们宣传格鲁吉亚是20年代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提出了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口号，领导人物有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1988年11月第比利斯局势趋于紧张，反对派在政府大楼前举行几千人的集会，要求独立。在第比利斯市检察长和戈尔巴乔夫发出呼吁后局势稳定下来，到11月末停止了集会。这次事件暴露出很多问题，正如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所说："在极端非常的条件下，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基层党组织、党的和经济工作的积极分子在劳动群众、居民、青年中的思想工作是软弱无力的。虽然后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正如事件进程所证明，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不彻底的。"[①]

据雷日科夫所言，格鲁吉亚后来局势的恶化与谢瓦尔德纳泽有关，在谢瓦尔德纳泽被戈尔巴乔夫调到中央后，帕斯季阿什维里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他在格鲁吉亚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牵涉一些曾与谢瓦尔德纳泽共事的高官，如格鲁吉亚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哈别伊什维利，格鲁吉亚总检察长和库塔伊斯克市党委第一书记自杀，他们都是谢瓦尔德纳泽提拔和重用的干部，案子已经牵连到谢瓦尔德纳泽。1988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曾同人民阵线的领袖们会晤，具体谈了什么不清楚，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无非是想要动摇格鲁吉亚的局势，赶走帕斯季阿什维里。而在这个问题上，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就成了同盟者，严格说来是成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救星"。[②]

1989年4月第比利斯事件的导火线是"阿布哈兹问题"，在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发展起来后，他们对非格鲁吉亚族进行攻击，1989年3月18日，有阿布哈兹州委成员参加的群众集会上，通过决议要求把阿布哈兹升格为加盟共和国，阿布哈兹的第一书记在决议上签了字。[③] 格鲁吉亚人对阿布哈兹人的愿望极其不满，从4月4日起，第比利斯市发生大规模示威，反对阿布哈兹族的要求，但以后运动的矛头从强烈谴责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领导人的分离主义，发展成要求民族独立的游行、示威、集会，提出了"格鲁吉亚独立！""打倒俄罗斯帝国！"，规模愈来愈大，几千人在政府大

①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50页。

②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51页。

③ АГФ，Фонд 10，опись 2，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c.60.

楼前静坐，甚至绝食抗议。

面对群众性集会，格鲁吉亚的领导人显然没有处理这一事件的经验，帕斯季阿什维里向集会者发表讲话，无人理睬，反对派领导人要求格鲁吉亚独立，要求与中央直接对话，在这种背景下，格鲁吉亚领导人倾向于用强力手段驱散集会者。1989 年 4 月 7 日，帕斯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电苏共中央，在谈了格鲁吉亚的紧张局势后，请求用非常手段解决问题。电报说："我们认为有必要：1）立即追究那些打着反苏维埃、反社会主义、反党的旗号的极端派分子的刑事和行政责任（对此有法律依据）；2）借助于内务部和荣膺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军区的补充力量在第比利斯实行特殊制度（宵禁）；3）依靠党、苏维埃、业务部门积极分子的力量采取一系列政治、组织和行政措施以稳定局势；4）制止以联盟和共和国的大众传播手段发表使形势复杂化的报道。第 1、2、4 条请求批准。"[①]

4 月 7 日在苏共中央会议上，当时戈尔巴乔夫在伦敦访问，会议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主持，梅德维杰夫、斯柳尼科夫、切布里科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亚佐夫，以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特鲁申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没有做记录，只是"建议必要时在第比利斯实行宵禁并就此问题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②] 会议决定必须给共和国政府以帮助，运用内务部、国防部的军队维护法律秩序，但要求谨慎使用兵力。随后内务部机动部队和高加索军区的野战部队调往第比利斯。[③]

根据事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调查，"在 1989 年 4 月 7 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后，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大将立即口头命令科切托夫将军和罗季奥诺夫将军赶赴第比利斯市，按照当时形势自己决定如何行动。就在那一天（1989 年 4 月 7 日 16 点 50 分），总司令部首长莫伊谢耶夫大将以国防部名义发布命令，派伞兵陆战队前往第比利斯，去警戒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并在进出第比利斯市的一些主要道路上组织稽查，同时命令第比利斯驻防军三支部队处于完全战备状态。按照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什洛夫的命令，还从各地区调来内勤部队小分队和特种警察分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639～640 页。

② АГФ, Фонд 10, опись 2,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61.

③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 57 页。

队，总人数 2000 余人”。[①]

当日晚上，科切托夫将军和罗季奥诺夫将军抵达第比利斯后会见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帕斯季阿什维里和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在这次会见中，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又一次坚决请求实行宵禁，这一点没有得到科切托夫和罗季奥诺夫的同意，他们借口部队数量不足。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于 1989 年 4 月 7 日晚上 11 时从国外访问回到莫斯科，并了解了格鲁吉亚的情况，当时他便建议派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前往格鲁吉亚。4 月 8 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讨论格鲁吉亚形势的第二次会议。会议由政治局委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切布里科夫主持，出席会议的成员和 1989 年 4 月 7 日相同，利加乔夫因休假未出席。出席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和苏联内务部长巴卡京。和前一天晚上一样，会议内容没做记录，且所通过的决议没有用文件形式记录下来。

同一天，收到了帕斯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苏共中央的电报，在这份报告里，帕斯季阿什维里一方面说第比利斯的形势仍然十分紧张，在政府大楼附近不断举行着成千上万人的群众集会，主要口号仍和以前一样：“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消灭自治”；等等。在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举行了一次 3000 ~ 5000 人的格鲁吉亚人的大会，反对将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分出来。在一些高等院校中，部分学生为支援参加大会者宣布绝食。但是，电报又说，在总体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府和各地方党和苏维埃的机关掌握着局势，正在采取一些稳定形势的必要措施，特别是在第比利斯 111 个企业和机关内建立了维持秩序和加强组织性的工人战斗队，参加人数共 4685 人。和内务部及荣膺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军区一起制定并正在实行一些保卫法律秩序的措施，目前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不需要采取另外的补充措施。[②] 有鉴于此，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没有去第比利斯。利加乔夫后来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去格鲁吉亚是错误的，因为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安排，在收到帕斯季阿什维里这封电报前，谢瓦尔德纳泽应该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662 ~ 663 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641 ~ 642 页。

在第比利斯了，“谢瓦尔德纳泽如果像戈尔巴乔夫提议的那样，于4月8日早晨去了第比利斯的话，4月9日凌晨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①]

1989年4月8日傍晚，发布了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命令，由部长会议主席奇赫伊泽签署。“根据这一命令，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在动用内勤部队和苏联军队的军事服务人员情况下采取措施使集会人群离开政府大楼前的广场，这是惟一的一份不是由党的机关，而是由国家机关通过的有关制止第比利斯市非法群众运动的文件”。[②] 4月9日，苏联内务部部队发布了关于驱散人群的作战命令，由3419部队驱散和清理小组组长巴克拉诺夫中校和参谋长克列伊梅诺夫少校签署，“4月9日夜间，集会形势急剧复杂无法控制。参加集会的8000多人号召罢工，号召公民不要服从政府。他们提出了民族主义和反苏性质的口号，号召推翻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建立共和国临时政府，并要求脱离苏联。……部队任务是：与3219部队协同，执行驱散参与大规模动乱人员的特殊作战任务，制止反苏、反社会团伙，清理政府办公大厦附近的广场。驱散人群的工作沿鲁斯塔维利大街到共和国广场进行。尔后切断所有通向广场的路段，禁止公民进入广场。根据上级作战首长的决定，采用17P－73型装备。禁止对妇女和未成年人使用橡皮棍。为了对人群施加精神影响，驱散小组使用了配备战斗技术装备（БТР－60пб）的装甲输送车。根据上级作战首长的决定，在遇到非常紧急情况时，还给驱散小组配备的消防车上安装了水龙头，但禁止向妇女和未成年人使用水龙头喷射”。“行动计划和部队行动草案由叶菲莫夫将军和格鲁吉亚内务部长戈尔戈泽签署，然后得到罗季奥诺夫将军的批准”。[③]

悲剧事件发生在4月9日凌晨，根据帕斯季阿什维里向苏共中央的报告，凌晨4时，“使用武力清除政府大楼旁广场上参加集会的群众。按照权威机关预先制定的计划，动用了共和国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小分队的力量”。“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部队的小分队并没有使用枪炮和冷兵器，他们严格遵守关于小心对待妇女和青少年的指令。极端派分子使用棍棒和石头进行疯狂反击，在此情况下前几排的集会参加者不停地向前逼近，于

① 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第274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62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43～644页。

是人群失去控制，朝着已宣布绝食躺在人行道上的青年人冲去。此外，人群中还有不少挑衅者使用了白刃，在一片拥挤中有16人丧生（13个年轻妇女和3个男人），100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其中有22人是军人（13人被送入医院）。对受伤者给予了急救”。[①] 但是，1989年12月9日苏联人代会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决议表明，在用“暴力驱赶”集会参加者时，曾使用了橡胶棒、“特殊物质”——有刺激作用的有毒物质、步兵小铁铲以及有一次（根据法医鉴定）还使用了火力器。另一方面，集会者随着反抗力越来越增加，为反对“驱逐暴力”他们也使用了顺手的工具。[②]“事件的许多参加者：普通老百姓、警察局工作人员和军人都不同情况、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悲惨的结局是16个集会参加者当场死亡，另有3人很快死在医院中，军人和警察局工作人员都未见死亡。准确确定游行者和军人及警察局工作人员的受伤人数遇到一定困难。但与此同时，委员会掌握足够的材料从整体上来判断4月9日事件中造成的医疗后果。根据格鲁吉亚共和国卫生部的材料，在驱逐行动进行时和行动之后几小时内，前来第比利斯医院就医者共有251人，其中183人住院治疗。之后的一些日子里，需要急救的人数呈波浪形上升（4月13日、21日、27日和5月5日）。总的来说，从4月9日到5月9日这段时间，到各医疗部门就诊的人数总共有3000～4000人。住院治疗的有近500人。到目前为止，登记防治和治疗中的人数有将近1000人”。[③] 但是，雷日科夫不同意这个报告，他认为当时使用的“稠李树”和“K－51”属于警用瓦斯，并不是毒气，内务部有权使用这些特殊制剂对付犯罪分子，在这一事件中有251人就医，其中183人住院。在这些事件中有189名军人受伤。16人死在事件现场，3人死在医院。[④]

从格鲁吉亚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来看，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善于处理突发事件，如此多的人参加的这种非法群众集会，肯定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一味迷信用暴力手段解决自然不会有好效果。在处理这一事件中也暴露出苏联体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政府还是党中央应该承担职责不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44、645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70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70～671页。
④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72页。

清，雷日科夫抱怨身为部长会议主席，完全被排除在事件之外。第比利斯事件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运用武装力量解决社会群体性事件并造成伤亡遭到一致谴责，对此，领导人之间相互指责和推诿，无人承担责任，矛头指向了军队。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谈到第比利斯事件时说："那里的非正式团体从1989年4月4日起在政府大厦前连日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打出的口号是'格鲁吉亚要独立!''打倒俄罗斯帝国!'。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当时许多'老一辈'干部都有这毛病），还是采用武力为好。4月7日他们建议第比利斯实行紧急状态。在当天的苏共中央的会议上（叶·库·利加乔夫、维·米·切布里科夫以及其他人员参加）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①]

谢瓦尔德纳泽认为利加乔夫应该为这一悲剧负主要责任，利加乔夫则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去格鲁吉亚调节冲突，应该对此负责，戈尔巴乔夫并非不知情，他同意了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认为书记处也没有决定使用武力。他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亚佐夫擅自决定的，是他赞同外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采取行动。[②] 雷日科夫认为党中央采取了不一致的立场，诿过于人，"在那些日子里，政治局始终没有开过全体会议。只是几位政治局成员碰头研究一下局势。苏联部长会议根本没有被吸收参与此事"。[③]

政府和军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损害，军界领导人认为国家领导人不公正地将政治家挑起的危机的责任转嫁到军队身上。在第一届苏联人代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戈尔巴乔夫没有勇气出来承担责任，博尔金曾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即使人们认为您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仍然会影响您的总书记、武装力量总司令、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形象。可能是下属使您不明真相。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挥员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至于是什么人的

①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15页。
②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16页。
③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63页。

具体过错，以后再查。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看到您的勇气、正直和高尚气度，从而信任您。您会使无辜的士兵免受攻击并保卫军队。"[①] 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承担责任，军人自然对他不满。

第比利斯非法群众集会的组织者并没有受到处罚，在苏联人代会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承认："政府大楼前非法群众集会的组织者（采列捷利、加姆萨胡尔季阿、昌图里亚和非正式组织的一些其他领导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刑事、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人在集会过程中破坏了各种社会秩序，号召群众不执行政府当局的合理要求，这样，也就没有试图阻止事件的悲惨结局发生。"[②] 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联盟方面，都没有对这些人进行惩处，他们后来成为促使格鲁吉亚独立的重要力量。在第比利斯事件后，有一封由 60 人签名的信送交苏共中央，信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从去年秋天起该市居民，其中包括我们——军官、超期服役的准尉、工人和职员、外高加索军区军人家属都是煽起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亲眼目睹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苏维埃政权存在 70 年的这个加盟共和国的境内充满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子能够任意活动，不受惩罚，公然号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迫害共产党员，把外国军队引入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加盟共和国政府不是采取果断的措施及时制止类似行动，而是去巴结一些青年大学生和一些知识界的小团体。我们认为，还是这种立场导致了悲惨的第比利斯四月事件。"[③]

4 月 12 日格鲁吉亚广播和电视发布了戈尔巴乔夫告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书，他对第比利斯发生的事件表示痛心，他表示"相信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和劳动者，能够考虑格鲁吉亚人民的人文传统、表现出理性、健康的思维和高度的责任心，保卫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我们的兄弟情感和友谊。同志们，格鲁吉亚恢复平静取决于你们。"[④] 戈尔巴乔夫除了相信格鲁吉亚人的理智之外没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4 月 14 日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帕斯季阿什维里、奇赫伊泽和切尔科吉亚被解除职务，贡巴里泽当选为格共中央第一书记。

---

① 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 329 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675 ~ 676 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522 页。

④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63.

第比利斯事件的悲剧性后果在苏联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掀起了反对中央政府使用武力的浪潮。在4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谈到了军队的作用，他告知国防部长亚佐夫：从今以后没有政治局的决定，军队不得干预类似事项。[1] 1989年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讨论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局会议上说，“不得动用武力。在对外政策中已经放弃使用武力，那么在对待本国人民时就更不能求助武力了”。[2] 这就无异于告诉高加索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今后中央绝对不会使用武力”。[3] 第比利斯事件使政府很难再次考虑使用军事力量惩办闹事的共和国，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可以肆无忌惮了。

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势力继续发展，1989年6月建立了人民阵线，11月17～19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修改宪法，确认共和国在其境内拥有土地、矿藏、河流、森林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力；若苏联的法律、法令不符合格的利益，格则停止这些法律、法令在境内的效力。1990年10月底，在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选举中，格共受挫，反对党联盟“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获胜。此后，组成新议会。“圆桌会议”领导人兹·加姆萨胡尔季阿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新议会删去了格宪法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联”等有关条款，取消了国名中的“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字样，规定格鲁吉亚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并升起了1921年以前的黑、白、深红三色旗。1990年12月8日，格共二十八大宣布脱离苏共，其目标是使格鲁吉亚脱离联盟。

1991年4月9日，在格鲁吉亚议会非常会议上通过了国家独立宣言。宣言强调指出，“格鲁吉亚主权共和国的领土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并决定设立总统职位。同年5月26日，加姆萨胡尔季阿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8月9日，议会通过了《国营企业私有制法》，走上了独立改革的道路。在苏联解体前，格鲁吉亚已经脱离了联盟中央，事实上独立了。

（三）受害民族返回家园的问题难以解决

这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留下的后遗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接受这些

①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65.

②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70.

③ 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226页。

受害少数民族的哈萨克斯坦领导人说："对主要居住在苏联边境地区一些民族的全体人民开始进行残酷的镇压。他们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控为带有'卖国情绪'。爱好和平的人们，大多为老弱妇孺，被紧急地（甚至不让他们收拾个人用品）装进运牲口的车厢遣送到我们的草原。仅在运转期间就有数万被驱逐出境的人由于冻饿或患病死去。当时被强行迁到哈萨克斯坦的有1.85万户远东朝鲜人（保存下来的统计资料中只有户数）、近80万伏尔加河沿岸的日耳曼人、来自苏联西部的10.2万波兰人以及50.7万北高加索居民。克里米亚鞑靼人、土耳其梅斯赫特人、希腊人、卡尔梅克人以及苏联的其他一些民族也遭到放逐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厄运。"[①] 赫鲁晓夫时期为受害民族恢复了名誉，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1987年民族主义活动接连不断，但还未形成规模，组织程度也不高。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重返克里米亚，其人数有35万人，1987年夏天，数以千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获准回到克里米亚，他们打着"无祖国，毋宁死"的标语走在莫斯科街头，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对面的花园中安营扎寨，戈尔巴乔夫承认他们的权利，但又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50多年过去了，克里米亚已经发生了变化，鞑靼人被斯大林驱逐后留下的空白已经被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所填补了。

"早已'冻结'的民族冲突和受迫害民族的痛苦遭遇就这样闯人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安排改革的日程，打乱了戈尔巴乔夫想为改革规定的进度表"。[②] 1987年7月9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鞑靼人重返克里米亚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恢复克里米亚自治体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应该从实际出发，他表示"应当在乌兹别克斯坦为鞑靼人创造丰富多彩的生活条件，给他们以关怀。那些已经抵达克里米亚的，就让住在那里好了。而且也要给予帮助。但要做鞑靼人的工作，要他们不再往克里米亚迁移。要号召人们从实际出发"。[③] 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其成员有葛罗米柯、谢尔比茨基、沃罗特尼科夫、乌斯曼霍贾耶夫、杰米契夫、切里科夫、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委员会与乌克兰领导人决定让一部分鞑靼人返回克里米亚，但问题并没有

① 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命运、个人》，第127页。
② 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第221页。
③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10页。

得到解决，直到1989年全部鞑靼人才获得了返回克里米亚的权利，但不恢复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如果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共和国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准许回到克里米亚，中央要求乌克兰领导人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们提出要求移民迁出的共和国付给乌克兰一笔补偿费，足够移民修建住房和发给交通费用，但是哈萨克斯坦坚决反对。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哈萨克斯坦给这些人提供了安身之地，提供住房和工作，又没有提出将他们强制迁出的问题，有什么理由应该支付补偿费呢？恰恰是中央应当筹措经费来安置回乡的人”。①

鞑靼人问题没解决，德意志人的问题又出现了。1988年2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雅科夫列夫谈到了德意志族人的问题。德意志族人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开始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享有免服兵役的权利，后来，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这一特权被取消了。定居下来的德意志族人总共有40多万。卫国战争前夕，斯大林将居住在苏联西部地区的德意志人、波兰人等集体强迫迁往东部地区。40多万德意志人被强迫迁到库伦达大草原上，它在苏联西西伯利亚的南部，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在100~250米。境内有苦咸水湖库伦达湖，蕴藏芒硝。

一部分日耳曼人要求恢复伏尔加河区日耳曼共和国，曾存在于萨拉托夫州境内。纳扎尔巴耶夫回忆说：“为放逐到哈萨克斯坦的伏尔加河区日耳曼人恢复政治名誉和公正的问题，我不得不进行无数次的谈判。事情的复杂性在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开始了恢复伏尔加河区日耳曼人共和国的斗争，战前该共和国一直存在于俄罗斯现萨拉托夫州境内。另一部分人怀疑这一想法的现实性，便要求我们协助他们尽快移居德国。还有第三部分人，他们对生活的看法更现实一些。他们要求国家帮助他们复兴传统、语言、文化，同历史上的祖国建立更密切的文教和业务联系。”②

乌兹别克费尔干纳悲剧性事件，使居住在这里的麦斯赫特土耳其人深受其害。1944年11月斯大林把居住在格鲁吉亚麦斯赫特区的全部220个居民点的10多万人迁走，到1989年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麦斯赫特土耳其人有6万，其中有1.2万人生活在费尔干纳河谷地带。1989年5月23

① 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命运、个人》，第135页。
② 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命运、个人》，第136页。

日，一场由市场上一盘浆果而发生的斗殴，引发了种族仇杀，乌兹别克的小青年们煽动说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占据了主要职位，排挤了乌兹别克人，杀害他们的孩子，强暴他们的妇女，到6月3~4日集中了3000多名暴徒，打砸抢烧，后来在内务部队的干预下事态才平息下来，6月14日雷日科夫对此事的总结中说："烧毁的房屋有数千座，到当天为止，共发现尸体106具……以前多人受到人身伤害，其中约150人为军人。失踪者为数百人（其中有的在发现时已被悄悄掩埋）……到1989年7月1日止，迁出费尔干纳州的人数达到2.1万人，其中1.6万人是麦斯赫特土耳其人。"[①] 在这次事件中有12人因犯谋杀罪被惩处。费尔干纳事件破坏了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关系，麦斯赫特土耳其人要求返回格鲁吉亚，但格鲁吉亚很难安置他们，因为他们的地方早被格鲁吉亚人占据了，苏联政府不得不把1.5万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分送到俄罗斯的三个州进行临时安置。

发生费尔干纳事件的背景也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在乌兹别克斯坦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组织，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乌兹别克斯坦是乌兹别克人的乌兹别克斯坦"，1988年12月在塔什干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有人打出了"让俄国佬滚回俄罗斯去，让鞑靼人滚回克里米亚！"的标语牌，类似的事件在安集延也有，还出现了极端宗教组织，要求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有人公开制造武器。[②]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迈出了第一步

1988年以后，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普遍发展起来了，出现了许多以争本民族主权为宗旨的民族主义运动或组织，其产生的基础是广大群众对生活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中央及地方行政领导的官僚行为、对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不满，最初提出的口号也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弱和崩溃，民族分离主义迅速发展，波罗的海三国就是典型。

波罗的海三国的国际法地位特点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是不同的，它

①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84页。
②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87~88页。

们是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于1940年被苏联吞并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始终不予承认。波罗的海三国人对苏共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不满，特别是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觉得在变成少数民族，如拉脱维亚，本民族人口占共和国人口的比例从1936年的75.5%下降到1970年的56.8%；爱沙尼亚，本民族人口占共和国人口的比例则相应从87.7%下降到68.2%。[①] 1989年，在爱沙尼亚境内，爱沙尼亚人的比例减少到了61.5%，拉脱维亚人在拉脱维亚境内只占52%，只有立陶宛较好地保持了本民族的优势，占79.6%。[②]

1987年8月正值《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周年纪念时，波罗的海三国要求公布这个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为大批被驱逐出境的受害者恢复名誉，1987年11月18日这个1918年拉脱维亚独立的日子被确立为民族节日，数以千计的群众不顾当局的警告上街游行，向里加的自由纪念碑献花，1988年2月16日，立陶宛独立70周年纪念日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代表这种民族情绪的运动和组织也开始发展起来，1988年6月，立陶宛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季斯”开始发展起来，开始提出一些政治要求，1988年夏他们多次举行群众大会，要求更多的社会民主、独立自主、社会公平，要求知道历史真相。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周年纪念日，他们在维尔纽斯举行万人大会，说明这一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开始公开支持并参与“萨尤季斯”的活动，反对这一运动者企图阻止他们举行的未经批准的群众大会，但遭到攻击，共和国的政权因此出现危机，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松盖拉被撤职，由支持“萨尤季斯”的布拉藻斯卡斯接替。1988年10月22～23日“萨尤季斯”召开成立大会，苏联许多加盟共和国和城市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在其决议中提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权应该包括：支配经济的一切部门、经济、政治，预算编制以及财政、信贷、贸易、税收和海关的政策”。[③] 戈尔巴乔夫把这一组织看成是支持改革的力量，对其极

---

① 新华社国际部编《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民族问题资料》，1972年8月，未刊，第58～59页。

② *Киселева А. Ф.，Щагина Э. М.（под ред.）* Хрестоь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1946－1995），М.：ВЛАДОС，1996，c. 346.

③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c. 45.

端民族主义倾向估计不足。不久，立陶宛出现了与之相对立的国际主义者的“统一运动”，要求民族平等，使用俄语和立陶宛语两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但得不到立陶宛共产党的支持。[1]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出现了许多非官方的组织和人民阵线。波罗的海三国的最高苏维埃宣布本民族语言为官方语言，当时还没有提出退出苏联的问题。

在1989年3月举行的人代会选举中，“萨尤季斯”获得了立陶宛所得到的41个名额中的34个。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代表团坚决主张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拟定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他们还坚决要求调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情况，并对该条约的后果进行评估。1989年中期“萨尤季斯”事实上获得了共和国的政权后，逐渐变成了主张国家脱离苏联的力量。

198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萨尤季斯”组织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活动，三国居民组成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把三国的首都连接起来，三国有1/5的居民走上街头，“几乎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不接受斯大林于1939年强加的这个强制性的联盟，渴望独立。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已从戈尔巴乔夫保证国家统一的同盟者变成了敌人。改革首倡者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要么是可保证群众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的深入，要么是保住联盟”。[2] 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民主。戈尔巴乔夫开始否认存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但又在苏联第一届人代会上设立了以雅科夫列夫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1989年12月雅科夫列夫作为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主席在第二届苏联人代会上做了“关于对1939年缔结苏德互不侵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时的情况和法律后果的总结报告”，这是苏联第一次承认苏德条约还有瓜分东欧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秘密附加协定，人代会就此做出决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谴责1939年8月23日签订《秘密补充议定书》的事实以及与德国签订的其他秘密协议。大会认定秘密协议自签订之时起在法律上无效，不具有约束力。这些议定书并不能为苏联同第三国的相互关系构建新

①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116页。
② 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第233页。

的法律基础，但却被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用来向其他国家提出最后通牒或施加压力，以破坏对它们的法律义务。"[①] 这样一个决议，证明了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占领不合法，无异于鼓励波罗的海三国从苏联分离出去。1989 年 12 月 20 日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宣布该党脱离苏共而独立。

1990 年 1 月立陶宛共产党决定脱离苏共而召开非常中央全会，1 月 11 日，戈尔巴乔夫偕夫人到立陶宛，同各方人士进行接触，劝说他们留在联盟内，"分离会损害各族人民的利益。独立自主、重新划分权限、非集中化都是对的。但是要保留合作和相互配合。批评联邦制没有意义，这一制度在我国从来没有过，我们至今一直生活在单一制的国家中。让我们先在现在的联邦制中生活吧，以后再确定去向。我们可借鉴世界联邦制国家的正面经验"。[②] 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使命。"无论结局如何，失败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1990 年 1 月，亚佐夫以军人的方式一语道破其中的实质：'要是有一个共和国分离出去，戈尔巴乔夫就会完蛋，可他要是使用武力加以制止呢，那同样也会完蛋'"。[③] 戈尔巴乔夫的劝说没起作用，他离开立陶宛时明白，立陶宛人决心独立了。

1990 年 3 月，在立陶宛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中，维尔纽斯国立音乐学院兰茨贝基斯教授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季斯"获胜，兰茨贝基斯被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在他的提议下，立陶宛议会于 1990 年 3 月 11 日通过了《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据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宪法在共和国内失效，立陶宛还把在立陶宛的所有企业收归共和国所有。

在立陶宛议会通过立陶宛独立决议前，苏共已经意识到重新当选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将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立陶宛国家的决议，为此，吉连科、梅德韦杰夫、马斯柳科夫、拉祖莫夫斯基[④]于 1990 年 3 月 5 日就采取紧急措施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给苏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采取相应的措施，3 月 6 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采取紧

①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 122 页。
②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 123 页。
③ 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第 230 页。
④ 吉连科，苏共中央书记；马斯柳科夫，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拉祖莫夫斯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

急措施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的决定，提出的措施主要有：①在《消息报》上发表有关立陶宛分立主义势力的打算和决定脱离苏联可能产生的经济及别的后果的材料。②通过苏联最高苏维埃就立陶宛打算脱离苏联问题发表的声明。③（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日程被确定的当天）通过并公布在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联公民及联盟所属的组织）的利益的声明，即由于即将通过成立独立自主的立陶宛国家的决议，苏联政府打算在立陶宛内实施的措施。④审议关于保护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财产措施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⑤审议关于在苏联人民代表第三次紧急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在“各加盟共和国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程序的苏联法律”通过前，暂停执行苏联宪法第 72 条的建议问题。⑥组织一系列大众新闻媒体的活动（举办中央电视台的“圆桌会议”并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按专门的计划），总题目是：匆忙通过这个共和国退出苏联的分立主义的决议将给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带来的消极后果。⑦补充审议在通过立陶宛退出苏联的决议的条件下，围绕苏联共产党立陶宛临时中央委员会（拥护苏共纲领派）可能复杂化的政治局势问题。[1] 这些措施基本上是政治与法律层面的，对于根本不把苏联法律放在眼里的立陶宛分离主义者难有约束力。

1990 年 3 月 15 日，苏联第三届人代会否决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决议，决定委托苏联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保障立陶宛境内每一个居民的合法权利，3 月 21 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关于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保障苏联公民权利和维护苏联主权的命令，但立陶宛根本不予理睬，仍然自行其是。在 3 月 22 日讨论形势时，瓦连尼科夫将军建议对立陶宛实行紧急状态、总统治理、派遣军队等措施，戈尔巴乔夫不予考虑，他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1990 年 4 月 3 日匆忙通过了退出苏联法，实质上是一个限制加盟共和国退出的法律。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迫使立陶宛屈服，1990 年 4 月 15 日，对立陶宛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提高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对许多重要商品禁运。结果却适得其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531～534 页。

反，损害了中央的形象，加剧了立陶宛反抗联盟的情绪，他们召回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中的立陶宛籍人民代表，并宣布建立自己的军队。立陶宛共产党发生了分裂，大部分归顺到独立力量一边，小部分转入地下。戈尔巴乔夫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苏联的宪法和维护统一。“戈尔巴乔夫的犹豫不决，促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领袖越走越远”。[①] 4月末立陶宛方面表示要与中央对话，“立陶宛不反对将独立宣言解释为一个视共和国地位为‘革新后苏联的参与成员’的文件。这一方案的具体实现应当与联盟商定，分阶段进行。这是寻求实际解决问题的基础”。[②] 在立陶宛代表团与中央代表团的谈判中，双方的立场都很强硬。

在立陶宛独立的同时，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也于1990年3月30日通过向独立过渡的决定，5月8日改国名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也于1990年5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改国名为拉脱维亚共和国，恢复1922年共和国宪法。尽管戈尔巴乔夫一再宣布他们的独立是非法的，但无法阻止他们走上独立之路。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效应在苏联起了示范性作用。

1990年10月4日，立陶宛通过《叛国法》，规定立陶宛共和国公民如果主动参加“其他国家”或者“外国组织”，旨在破坏立陶宛主权的活动，将被剥夺自由15年，或被判死刑并没收个人财产。1990年11月20日立陶宛议会通过了组建国土保卫局的决议，实际上承担国防部的职责，开始组建军队。由于商品极度短缺，立陶宛政府被迫于1991年1月6日傍晚大幅度调整商品价格，第二天街头出现了抗议活动，一些大企业宣布罢工。1月8日，维尔纽斯市街头被不满的群众挤满，形成了以“统一运动”、拥护苏共的立陶宛共产党人和工会为一方，以拥护分离的“萨尤季斯”、“立陶宛自由联盟”为另一方的对抗。为了平息事态，议会通过了撤销政府调整价格的决议，普伦斯克涅—布拉藻斯卡斯政府辞职。

对于波罗的海三国不断发展的独立倾向，从1990年底开始，戈尔巴乔夫也曾倾向于用强力手段解决。1991年1月10日，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立陶宛恢复苏联宪法的效力，立陶宛没

① 罗·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5页。

②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25页。

有答复。立陶宛内部要求立陶宛留在苏联的人们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认为局势可能失控，“萨尤季斯”与救国委员会可能发生冲突，要求实行总统治理。1991 年 1 月 11 日立陶宛“民族自救委员会”成立，他们向常驻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卫戍区和波罗的海军区求援。军队于 1 月 12 日控制了维尔纽斯电视台，当夜，坦克开进了维尔纽斯，13 日凌晨 1 时 30 分，坦克包围了立陶宛电视台大楼，克格勃特种部队强行占领了这座大楼，有 14 名立陶宛人和 1 名特种兵战士死亡；军队在进攻议会大楼时，遭到群众阻挡而停了下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基斯号召市民抵抗，保卫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其他共和国也声援，国际社会反响强烈，美国、欧洲许多国家，日本等都发表声明，指责苏联在立陶宛用兵。在内外压力下，维尔纽斯卫戍区部队撤回了兵营。这次事件挽救了正在丧失威信的兰茨贝基斯等民族分离势力，转移了人们对他们提价政策的不满，损害了苏联的形象，给国际社会造成了民主受到暴力镇压的印象，立陶宛共产党以及一切被公众认为同这次事件有关联的力量实际上被消灭了。

叶利钦等民主反对派借立陶宛事件对戈尔巴乔夫等人进行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叶利钦飞到了爱沙尼亚，与波罗的海三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起商讨对策，表示相互支持，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召集紧急会议。1 月 20 日“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组织 20 多万人参加的游行，声援立陶宛，要求苏联总统、国防部长辞职，要求俄罗斯有自己的总统和军队。

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开始逃避责任，他声称自己对使用军队一无所知，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也声称没有下令动用军队。雷日科夫认为，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军队不可能参与。[①]“为了控制当地局势，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被紧急派往维尔纽斯。瓦连尼科夫将军和驻地军官进行交流之后，马上建议在立陶宛实施苏联总统直接管制，但戈尔巴乔夫否定了他的建议”。[②] 戈尔巴乔夫在 1 月 22 日的讲话中说：“发生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事绝对不是总统的路线，正是为了实现这一路线才实行总统制。因此，我坚决驳斥围绕这

①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 148 页。
② 罗·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 17 页。

一问题的所有投机、所有怀疑和诽谤。”他要求政治组织通过法律的途径获取政权，不要使用武力。[①]

关于立陶宛事件，经过多年的调查，立陶宛法庭于1999年8月宣布对立陶宛共产党6个前共产党人士进行长期监禁，其中包括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布罗季亚维丘斯和中央部长叶尔莫拉维丘斯，其罪名是参与“民族自救委员会”和领导苏联特种部队。但圣彼得堡出版的《记者调查》证实，是“萨尤季斯”的战斗队员制造了1月12日晚的流血事件，他们是从电视塔附近建筑物的顶部向人群开枪的。[②] 立陶宛事件，为民族主义分子制造了反对联盟的口实。

法律手段不起作用，军事手段行不通。维尔纽斯事件的后果是严重和长远的，这一事件被叶利钦充分利用，“正是维尔纽斯事件促使叶利钦及其控制的最高苏维埃发表声明：必须建立自己的、俄罗斯的军队，这激起了‘联盟中央’拥护者的营垒大发雷霆。同时应当指出的是，维尔纽斯事件还产生了另一种结果：它促使叶利钦及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签订共和国间的双边协定——顾及每个伙伴的利益、以每个共和国在其境内最大限度主权完整为前提的协定”。[③] 1991年2月9日，立陶宛举行全民公决，90%的公民投票支持国家独立。此后，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已成定局。

如果仅仅是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本不会对整个联盟造成什么伤害，它们三国人口只占苏联总人口的2.8%，也不拥有重要资源。然而，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进程起了示范性作用，大大鼓舞了其他共和国民族主义的发展，1989年9月乌克兰“鲁赫”成立，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塔吉克、吉尔吉斯等都出现了民族冲突。1990年以后苏联经济状况恶化，苏共和联盟中央机关的瘫痪，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一些人开始认为，只要脱离苏联，人民就会过上好日子。民族主义逐渐演变成了分离主义，但这些民族分离主义并不能动摇苏联的根基，最后埋葬苏联的是俄罗斯的民族分离主义。

---

①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202.

② 2000年6月3日《圣彼得堡消息报》，转引自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21页。

③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第674页。

俄罗斯民族分离主义给联盟的最后一击

俄罗斯是苏联的支柱，苏联虽然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但力量并不平衡。苏联的面积是2240.22万平方公里，俄罗斯的面积为1707.54万平方公里；1981年苏联的人口是2.666亿，俄罗斯的人口为1.39165亿。[①] 在自然资源、经济实力等各方面，俄罗斯相对于其他共和国都占有绝对优势，苏联可以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可以没有外高加索三国，但绝不能没有俄罗斯。

在苏联各地民族主义思潮奔涌、民族分离主义日益发展之时，作为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并没有站在联盟一边，叶利钦为了与戈尔巴乔夫争权，对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是波罗的海三国与联盟争权和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到1990年6月，俄罗斯这一全新因素加入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大合唱，6月12日，在叶利钦等人的鼓动下，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903票赞成，13票反对和9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的声明》，宣布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宪法和法律在俄罗斯全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联邦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这表明："俄罗斯内部倾向获得主权的情绪开始迅速发展。这种情绪是渴望与努力在本国疆域内团结起来，永远摆脱这样的状况：在俄罗斯发号施令的同时，又在许多方面与苏联融为一体。在俄罗斯的许多地区——非黑土地带、外乌拉尔、远东走向经济上荒芜和衰退的同时，俄罗斯仍是输血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满。"[②]

戈尔巴乔夫认为，"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宣言。紧随这一文件之后，其他共和国也相继通过类似宣言，不仅是加盟共和国，也还有自治共和国。开始'主权国家大检阅'，结果，寻求与立陶宛调解之路告吹"。[③] 长期在俄罗斯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认为，1990年6月12日是苏联开始终结的准确日期，"1990年6月12日是一个转折的日期，它对后来许多事件有影响，它

① 《苏联百科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第1、671页。

② *Примаков Е.* Годы в большой политике. М.: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1999, с. 76.

③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26页。

注定了濒死期及其速度、方式，并迅速地使挑选不同抉择的可能性丧失殆尽。正是在这一天，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以绝大多数的选票赞同了其主席鲍里斯·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国家的提议。这就是所有接踵而至的分立主义倾向的起点和开端，这些分立主义分子先是断送了苏联，而后是俄罗斯”。[①] 在俄罗斯的示范作用下，到 1990 年 12 月又有 9 个共和国：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发表了主权宣言。1990 年 10 月 24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令，重申联盟法律优先于共和国法律，但同一天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规定在俄罗斯境内共和国法律高于联盟法律。

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联盟体制、建立新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提上了日程，1990 年 9 月 25 日，成立了包括苏联总统、最高苏维埃主席、部长会议主席、民族院主席、各共和国负责人在内的筹备委员会，起草新联盟条约。1990 年 11 月 23 日，新联盟条约草案公布，供全民讨论，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明确表示不签署联盟条约，俄罗斯提出了许多保留条件，叶利钦更热衷于与其他共和国进行双边谈判和签订双边条约。

1990 年 12 月 24 日，苏联第四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新联盟条约的总概念及其签署程序》的决议，决定把现行联盟改组为“自愿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民主的联邦制国家”。决定由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条约的起草工作和决定签署的程序。为了取得民意的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于 1991 年 1 月 16 日通过决定，在 3 月 17 日就是否保存革新后的联邦举行全民公决。1991 年初建立了起草新联盟条约草案的专家小组，领导人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弗·尼·库德里亚夫采夫和总统的两个代表：列文科和沙赫纳扎罗夫，参加这一小组工作的有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参加讨论和做出决定。戈尔巴乔夫这一行动采取得过晚，这是在中央与各共和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开始的。加盟共和国的对抗使中央名存实亡，为摆脱危机，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通过签署新联盟条约来寻求出路。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加剧，在 1991 年初，莫斯科街头游行不断，矿工举行罢工，不断提出让苏联总统和内阁辞职，1991 年 2 月

① 朱利叶托·基耶萨：《别了，俄罗斯!》，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第 118 页。

19 日叶利钦在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事情已经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保留‘改革’这个词的同时，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改革，他要保存现有体制，保存强硬的中央集权，不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以独立自主。……我完全不同意总统的立场和政策，我要求他立即辞职。”[①] 3 月 9 日，《真理报》刊登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第一个方案，叶利钦声明：“我们不需要现存的任何形式的联盟，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心——庞大的、官僚化的……我们应该摆脱它。改革已经进行了 6 年，人们让我们相信，我们正在破坏这个体制，我们事实上已经走上了民主的革新，原来这是一个谎言。”[②] 叶利钦摆出了一副要与联盟中央对着干的架势。

叶利钦想阻挠和破坏全民公决，他认为：“全民公决的目的，其一是为了赋予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以合法性质，其二是为了取得同俄罗斯的独立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利’。”[③] 1991 年 1 月 26 ~ 27 日在哈尔科夫召开“主权共和国民主力量大会”，有来自 11 个加盟共和国的 40 多个政党和组织参加，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民主俄罗斯运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号召对 3 月 27 日举行的是否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说“不”。[④] 2 月 7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决定在全民公决票上加上第二个问题：“您是否同意设立全民投票选出的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目的是巩固自己在与联盟中央关系中的地位。

1991 年 3 月 17 日，80% 的苏联公民参加了全民公决（有 6 个共和国官方拒绝参加全民公决，它们是：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拉脱维亚、亚美尼亚、爱沙尼亚），其中 76.4% 的人赞成保留联盟，21.7% 的人反对，还有 1.9% 的票无效。在俄罗斯联邦，有 76% 的公民参加了全民公决，表决的结果很奇怪：一方面有 71.3% 的参加者赞成保留联盟，另一方面有 70.8% 的人赞成在俄罗斯设立总统职位，而这实际上是反对联盟的。俄联邦参加投票的人和赞成保留联盟的人在共和国中占倒数第一和第二，在俄联邦的中心地区，赞成保留联盟的人很少。俄罗斯的全民公决结果很难说是苏联总统设想的胜利。

---

① 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第 27 页。

②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212.

③ 叶利钦：《总统笔记》，第 26 页。

④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203.

在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时，根据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决议，也加上了一个问题：您是否同意在组成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的宣言的序言中写明乌克兰的国家主权？有 80.17% 的人回答是肯定的，高于赞成保留联盟者（70.2%）。这确定了乌克兰法律高于联盟法律的思想基础，在事实上排除了建立新的联邦制国家时乌克兰完全合乎要求加入的可能性。① 在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哈萨克斯坦，89% 的公民参加了投票，其中 94.1% 的人赞成保留联盟。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土库曼斯坦赞成保留联盟者的比例分别为：82.7%、93.7%、94.6%、93.7%、96.2% 和 97.9%。②

叶利钦并不受全民公决结果的约束，戈尔巴乔夫忙于制定新联盟条约，叶利钦则忙于与其他共和国加强双边联系，以增强与戈尔巴乔夫讨价还价的资本。布尔布利斯回忆说："还在 1991 年 4 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代表团多次举行会晤，在此之前就与这些共和国签订了双边协议。这些协议能够成为新联盟条约（没有当局竭力保留的具有极权主义内容的联盟中心）的基础，但是，卢基扬诺夫和戈尔巴乔夫注意到这么做对他们的危险后果，依靠新奥加廖沃进程轻易阻止了我们。"③ 1991 年 5 月 5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决定建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 月 12 日，俄罗斯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选举，叶利钦以 57.3% 的得票率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巩固了自己作为俄罗斯主人的地位。叶利钦当选总统是对中央政权、苏共、俄共的打击，"设立俄罗斯总统，并且赋予他很大的权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在苏联国家大厦下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地雷。在俄罗斯即将出现一个新的，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基本不依赖于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的权力中心，出现一个与苏联竞争的国家"。④ 叶利钦比戈尔巴乔夫有权威，因为他是全民普选产生的，而戈尔巴乔夫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由苏联人民代表选出的，叶利钦被民意推上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使他这个"小总统"比戈尔巴乔夫这个"大总统"更加强有力，同时，波波夫当选莫斯科市长，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市长，实际

① *Барсенков А. С.*, *Вдовин 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38 – 2002. с. 374.
②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215 – 216.
③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220.
④ 罗·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 46 页。

上苏共在俄罗斯联邦已失去了执政地位。

叶利钦上任后便开始自行其是，他访问美国，表示要独立自主地与美国发展关系，声明俄罗斯不执行苏联政府制订的下一年的经济计划，禁止各政党和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和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团体、军队和企业中设立基层组织和进行活动。对叶利钦针对联盟中央和苏共的这些命令与决定，戈尔巴乔夫无力进行改变。为了争取叶利钦能够签署新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联盟中央只保留了制定安全、外交、社会政策以及协调经济活动等权力。1991 年 7 月 12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的决议，7 月 23 日，各共和国领导人再次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会晤，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全部到会，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也到会。卢基扬诺夫说，最后一次讨论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最后文本的会议上仍是非建设性的。有人建议从条约中删除提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主权联邦国家的内容，他们拒绝它有财产权，坚持只有一套税收系统。乌克兰代表在会谈中宣布，乌克兰将不会在 9 月中旬前决定自己与联盟条约的关系问题。15 个加盟共和国中只有 8 个准备签署条约。①

1991 年 7 月 23 日在新奥加廖沃协商好的新联盟条约最后文本没有对外发表，8 月 15 日《莫斯科新闻》上意外刊登了这一文件，戈尔巴乔夫对报纸刊登这一条约大发雷霆，下令追查和严惩透露消息的人。1991 年 8 月 16 日苏联各大媒体也争先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文本。按照新公布的条约文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简称仍为苏联。② 新条约规定，“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为平等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联邦制主权民主国家”，“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保留独立决定涉及本国发展的一切问题的权利，在国际关系中苏联为一个主权国家，但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联盟成员国的相互关系原则是：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合作互助、诚实履行根据联盟条约和共和国间协议而承担的义务。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作为主权的联邦

① 转引自 *Барсенков А. С.*，*Вдовин 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38 – 2002. с. 375。

② 在俄文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的缩写一样，都是“СССР”。

制的民主国家，但主权共和国是第一位的，条约规定，在联盟职权范围内，联盟法律至高无上；在共和国职权范围内，共和国法律在本共和国境内至高无上。土地、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均为各共和国所有。联盟没有税收权，联盟的财政预算要取决于共和国提供多少，条约中没有新的宪法通过的期限，也没有确定参加者的义务。条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后，1922 年的联盟条约即同时失效。

1991 年 7 月 29 ~ 30 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秘密会晤，戈尔巴乔夫建议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总统不是在 9 ~ 10 月，而是在 8 月 20 日开始签署条约。共和国的领导人同意了这一建议，因为他们明白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代会不会通过这样的条约，而 8 月份人民代表们正在休假，是签订条约的好时机。在交换意见中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共和国领导人关于在财政预算中实行单一的税收体系的建议。戈尔巴乔夫还同意解除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副总统亚纳耶夫的职务，他们三人商定由纳扎尔巴耶夫任总理。叶利钦在谈到新奥加廖沃条约时说："我同戈尔巴乔夫突然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们二者的利益终于相互一致了，这些角色让我俩完全满意。戈尔巴乔夫保住他最高的职位，我则保住自己的独立。这对于我们二人而言乃是理想的决策。"[①]

以为万事大吉的戈尔巴乔夫于 1991 年 8 月 5 日去克里米亚休假，计划 8 月 19 日回来，莫斯科准备好在 20 日的签约仪式。8 月 19 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强硬派发动了政变，他们本意是挽救联盟，但政变不得人心，只坚持了三天，这次事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正如雷日科夫所说："我认为政变成了标志我国改革寿终正寝的界石。改革陷于濒死状态了吗？是的，它曾进行垂死挣扎。而现在，改革不可避免地死亡了。不论是侥幸还是倒霉，这迟早会受到历史的审判。"[②] 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认为，"苏联的历史已经结束，1991 年 8 月 21 日这一天，撕下了苏联历史的最后一页。尽管苏联在这之后又垂死挣扎了几个月，但从这一天起，俄罗斯联邦

① 叶利钦：《总统笔记》，第 45 页。

② 尼古拉·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高洪山、韩生民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第 5 页。

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已经开始了它的历史计时，尽管这个新国家此前只有一个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做的事，还有他想干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① 八·一九事变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个是使戈尔巴乔夫离开了权力，大大加强了叶利钦的权力，很多人站到了叶利钦一边；另一个是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激进力量得到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不再起作用。俄罗斯实际上已经顶替联盟中央，这让许多共和国不满，也促进了独立浪潮的发展。

八·一九事变后，苏联国内掀起了一场独立的浪潮，各国纷纷发表独立声明，确定总统选举日期，起草宣言。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分别于 8 月 20～21 日宣布独立，恢复 1940 年以前的宪法。8 月 24 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

8 月 24 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是独立的民主的国家，从这一时刻起，在乌克兰领土内只有共和国法律机关通过的宪法、法律、法令有效。将于 1991 年 12 月 1 日就批准乌克兰独立的文件在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

8 月 27 日，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宣布独立，30 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31 日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宣布独立，9 月 9 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9 月 23 日亚美尼亚，10 月 27 日土库曼斯坦宣布独立。在别洛韦日协定签订前只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没有宣布独立。

戈尔巴乔夫仍在为保持联盟进行着最后的努力，为了争取各共和国能够签署，戈尔巴乔夫再次做出让步，确认新联盟将是邦联式的民主国家，但叶利钦反对“主权国家邦联”的提法，建议改称“民主国家邦联”，他还强调要等乌克兰 12 月 1 日全民公决的结果，如果乌克兰不签署，俄罗斯也不会签署。

1991 年 12 月 1 日乌克兰全民公决的结果是赞成乌克兰独立，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首任总统，12 月 3 日叶利钦率先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12 月 7 日叶利钦率领一班人马，撇开戈尔巴乔夫来到白俄罗斯，与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会晤，决定了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为苏联的解体

① 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 124 页。

进程画上了句号。

叶利钦回忆道："别洛韦日会谈是秘密进行的，为此甚至动用了特种部队来保卫整个官邸。……会议的紧张程度随着分针的移动不断增强。我方参与文件起草工作的有布尔布利斯、沙赫赖、盖达尔、科济列夫和伊柳辛。我们在新的别洛韦日条约的构想和提法上下了很大功夫。显然我们必须当场签署所有这些协议，不能再耽搁了。"[①] 曾参与起草别洛韦日协定的沙赫赖认为，1991 年 12 月 1 日乌克兰的全民公决为这一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起先鲍里斯·叶利钦和斯塔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还希望说服列奥尼德·克拉夫丘克以某种形式保留联盟。……然而乌克兰总统甚至不愿听到'联盟'这个词，最后找到了'联合体'这一形式作为各国在同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空间共存的方式"。[②]

这种说法并不能推卸叶利钦的责任，如果俄罗斯不选择独立之路，苏联不会彻底解体，没有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苏联都可能存在，但是没有了俄罗斯，苏联便不可能存在了。正如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所说："恰恰俄罗斯的利益和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主要角色。"[③] 雷日科夫在谈到叶利钦的作用时也说："为了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用自己的行动千方百计鼓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行动，以此作为同国家中央政权斗争的政治杠杆。一旦作出最重要决定的关头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跑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有意识地展开了搞垮国家的行动。"[④]

1991 年 12 月 8 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的领导人发表声明，并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结束了。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成了决定苏联命运的一个特殊的政治因素，在改革浪潮中兴起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摧垮了联盟大厦。苏联的解体，与历史上没有很好解决民族问题直接相关，长期以来，苏联

① 叶利钦：《总统笔记》，第 131 页。

② 沙赫赖：《苏联解体的谎言与事实》，载杨新宇、谢尔盖·沙赫赖、阿利克·哈比布林《变动中的法与宪法》，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 318 页。

③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 593 页。

④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 386～387 页。

一方面宣传“民族自决原则”，按民族属性划分行政区域，另一方面又过分强调无产阶级族际主义原则，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各民族的权利得不到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受到国家共同性的威胁，积聚了许多不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各民族提供了表达自己要求的机会，但他对民族问题显然估计不足，既没有很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解决好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当问题和危机来临时，他又盲目相信人民的理性和各民族间的兄弟情谊，没有发挥联盟中央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没有及时更新联盟，没有及时划分联盟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使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在叶利钦的领导下，一方面对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又与联盟中央争权，让戈尔巴乔夫一次次挽救联盟的努力落空。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叶利钦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



作者简介

戴桂菊，女，1965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俄语学习》杂志主编。已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代表作：《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主持完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系列教材《俄罗斯国情多媒体教程》。

董洁，女，1983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朝鲜史、冷战史。主要研究成果有：《〈朝鲜策略〉的源起——是黄遵宪个人构思还是清政府的决策》（《韩国学论文集》第十六辑）等。

郭永胜，男，1959年生，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代表作：《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黄立茀，女，195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代表作：《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6）。

李庆华，男，1962年生，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历史文化所在读博士，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已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等。

刘玉宝，男，1962年出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史博士研究

生，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成果有：《苏联核武器生产厂的人才政策及劳动纪律》（《西伯利亚研究》，2007 年第 1 期）等，及译著《俄国社会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柳植（杨存堂），1934 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主编。发表学术论文 60 多篇，代表作：《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世纪性的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等，并参与主编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吕雪峰，男，1974 年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已发表的论文有：《“贝奈斯公式”与 1943 年苏捷条约》（《俄罗斯研究》2006 年第 3 期）、《俄国档案中的百分比协定：斯大林与丘吉尔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国际冷战史研究》第 3 辑）等。

马龙闪，男，1941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学术津贴。已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百余篇，代表作：《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沈莉华，女，1970 年生，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已发表学术论文 20 篇，并参与《西伯利亚学与中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一书写作。

沈志华，男，1950 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70 余篇，代表作：《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 - 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2007）等，并总主编 34 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师建军，男，1966 年生，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成果有：《俄国社会革命党土地社会化纲领的命运》（《俄罗斯研究》2006 年第 3 期）、《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深层原因》（《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6 期）等。

宋永成，男，1966 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已发表

论文近10篇，如《民族自决原则与戴高乐政权的合法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民族自决原则与戴高乐政权的合法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王洋，男，197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曾在《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2006年）发表译稿：《巴黎和平会议上的“希腊问题”》。

吴伟，男，195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远东问题》（俄）等杂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代表作：《苏联与“波兰问题”（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勃列日涅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并参与主编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肖瑜，男，1975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0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成果有：《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最英明？——锦州攻坚战再考察》（香港《二十一世纪》2008年10月号），并在《冷战国际史研究》杂志发表译作多篇。

徐天新，男，1934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主持国家教委社科基金项目《欧洲统一的思想与实践》、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冷战中的大国战略关系研究》。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代表作：《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并参与主编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姚海，男，1952年生，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已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代表作：《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台湾淑馨出版社，1992）、《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当代俄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并参与主编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叶书宗，男，1936年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已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代表作：《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苏联兴亡史》（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002）等，并参与主编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余伟民，男，1951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代表作：《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十

月革命》（《现代化扩展中的世界与中国》，学林出版社，1999）、《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史学理论研究》2004 年第 2 期）等，并参与主编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郑异凡，男，1935 年生。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代表作：《天鹅之歌——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对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布哈林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2006）、《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并参与主编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朱小萍，女，1975 年生，华东政法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发表《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学术史回顾和档案文献介绍》（《历史教学问题》2004 年第 1 期），并参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7 卷翻译工作。

左凤荣，女，1964 年生，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代表作：《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读懂斯大林》（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普京执政下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
1917-1991　下
作者=沈志华主编
页数=1210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8
SS号=12299204
DX号=000007477968
简介=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477968&d=764FB0039AD8C3E47EA9B67DE8467BC0&fenlei=1106080806